

吉林市革命故事集

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編

封面设计：康 林

封面题字：刘道中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号：9303019

开本 787×1092 1/32 10.5印张

字数 230千字 工本费5.00元

赵尚志在狱中

1927年4月初春的一个下午，吉林第一监狱的法警正高喊着犯人的名字从死囚号里往外提人。这里的囚犯都知道，

“上午提人是审讯，下午提人是执行（枪决）”，监号里的囚犯们都屏气听着。3个关在死囚号的土匪被提了出来，往外押解时一个人高喊：“兄弟们，爷儿们，来世再见吧！”这凄惨绝望的喊声，使整个监号里鸦雀无声。不一会，未决号的监门打开了，“赵尚志、韩守本出来！”一个老看守在喊，“二位先生，给你们道喜了！”若问给犯人道喜意味着什么，他俩都明白，死神就要降临，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了。可他们并没有惊恐，毫无惧色地走出了监号。监狱有个规矩，凡被处决的人犯均出西门赴刑场。赵尚志、韩守本被敌人绑着，押出了西门。出监狱大门不远就是一个土屋子，刑警把他俩和土匪押到土崖下，令他俩面对土崖跪下，赵尚志说：“老子不跪，站着死！”韩守本说：“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不一会，枪声响了，三个土匪应声倒下了，赵尚志、韩守本依然挺立在土崖下。一个军法官说：“好样的，带回去吧！”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想借此吓唬一下这两个年轻犯人。回号后，难友们说：“我们以为这会儿你们早到阴间了。”赵尚志说：“闫王爷还不想让我去，这回已尝到死的滋味了，以后就更不怕死了”。

赵尚志、韩守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入狱前受党组织的派遣，在长春一边参与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一边做我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一次，他们到一个日本人开的刻字店刻

“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印，被日本店主向军阀当局告发而被捕。赵尚志、韩守本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深信三民主义。长春警察厅根据查抄的印刷品，认定他俩为“共产党正犯”，按“共产党重大嫌疑犯”交吉林省督军军法处处理。3月4日，赵尚志、韩守本被押往吉林，投入吉林第一监狱。

吉林第一监狱是吉林省三大监狱之一，地处吉林市巴虎门里，俗称“巴虎门大狱”。陆军监狱和军法处看守所也设在这里，狱里关押着近千名已决（判刑）囚犯，也有军法处的未决（等候审判、量刑）犯。在押犯入成份复杂，有共产党、国民党及对当局不满的政治犯，也有土匪、强盗等刑事罪犯……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当时监狱里有几个叫做“炕头”的罪犯，入狱前这些家伙都是为害一方的流氓恶棍，强盗惯窃，入狱后他们不改亡命之徒的本性，勾结看守、看守长，在狱里称王称霸，欺压同监犯人，是监狱里的一害。这个监狱有四个大“炕头”，人称“四大金刚”，许多难友身受其害却敢怒不敢言。赵尚志来后不久，便和狱中几个接上关系的党员商量，要教训一下“炕头”，借以扩大狱内地下党的影响。1928年春，一个专抢富户的“胡子”被投入监狱，“炕头”抢光了他身上的钱，还强迫他交，“胡子”哀求说没有了，几个人不仅把他暴揍一顿，还不让他吃饭，晚上硬逼着他睡在尿桶旁，“炕头”和帮凶撒尿时故意溅他一脸。早上让他抬尿桶，干重活。青年囚犯陈福祥看不过去替他求情，“炕头”一声吆喝，一群帮凶把“胡子”和陈福祥按在地上，劈头盖脸地打起来，还说他们要逃跑、暴动。看守早已和“炕头”串通一气，不由分说，反将陈福祥二人关进黑牢。后来活活把“胡子”打死了，陈福祥

也险些丧命。赵尚志利用法院过堂的机会，向法官控诉了看守与“炕头”的不法行为，但毫无结果，于是赵尚志组织政治犯暗中搜集“炕头”的不法行为，集体签名，向典狱长、法院指控这些坏蛋与看守、看守长互相勾结干下的种种坏事。赵尚志对典狱长和法院提出警告：“如不处理，将向社会、报界提供情况，将狱中黑幕公布于世！”监狱当局害怕政治犯闹事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不得不给那四个“炕头”戴上重刑具，押往分监。几个被指控并且证据确凿的看守、看守长，也被调到分监去了。狱中的地下党员为难友们除了一害。几天后，赵尚志又动员几个犯抢动罪行的青年，把在狱中横行霸道、以打中国人取乐的特殊犯人——八、九个白俄痛打了一顿。看守上来干涉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帮家伙喝醉酒后要放火烧监狱，我们才打他们，不然监狱就着火了。”狱方明知中国犯人借口教训白俄，但找不到反驳的证据，也就不再深究，从此白俄老实多了。他们说：“赵尚志这小子不好惹，千万别碰他。”赵尚志除暴安民、惩治不法之徒的行为，使狱中难友十分佩服，他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了。

除掉了“炕头”，压住了白俄，难友们的处境仍十分艰难——疾病和虐待时刻折磨、威胁着犯人。监狱的典狱长肆意虐待犯人，大量克扣囚粮。狱中无论冬夏，一律两顿饭，早饭是一碗高粱米粥，一块酸臭的萝卜咸菜，晚饭是一个窝头，一碗清水菜汤。火炕从来不烧，虱子、臭虫满炕爬，咬得难友们彻夜难眠，监狱里无处洗澡，无处理发，病了没药，一旦瘟疫蔓延，犯人便接二连三地死去，即使在平时也有病、饿而死的，王典狱长借之大吃“空头”。赵尚志与共产党员韩守本、张有仁等商量：“咱们不能眼看着被他们折

磨死，大家要团结起来跟他们干！”赵尚志组织共产党员串连同监难友揭露王典狱长的种种恶行。一天，监狱的余看守长（地下党员）告诉赵尚志：“张学良要搞东北易旗，几天后省府要来大员到监狱视察”。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便分头找党员和政治犯商量，决定搞一次反对克扣囚粮的绝食斗争。

监狱教务科“教诲师”刘作桓为人正直，暗里与狱中地下党有联系，赵尚志就让他把绝食斗争的计划传达给各号犯人。他还帮助弄来了墨、笔，联络了一些同情政治犯的看守。这天上午10点，王典狱长陪着省府大员到监舍视察。大家把早已写在白被单上“控告典狱长”的大字标语伸到铁栅外，各号难友纷纷高喊：“反对克扣囚粮！”、“改善犯人生活条件！”面对省府大员，王典狱长热汗直流，狼狈不堪。省府大员很不高兴，匆匆转了一圈就走了。犯人们当天开始绝食。吉林第一监狱是省城重地，“犯人”绝食对省府震动很大。吉林省督军张作相派省高等检察厅长肖如华到狱中处理这件事。开始狱方追查闹事者，企图用蹲小号、戴重刑具把绝食斗争压下去，无奈组织起来的囚犯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二、三天过去了，有的监号开始出现昏死者。狱方惊慌了，赶忙派人到各监号“好言相劝”，做了不少的可口饭菜，并答应改善监狱条件。狱中的看守平时也受气挨压，再加上受到共产党“囚犯”的熏陶，十分同情政治犯的绝食斗争，一度曾用罢岗行动配合“犯人”斗争。高等检察厅长肖如华怕事情闹大，眼看近两个星期的绝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不得不答应一切条件，当众宣布王典狱长撤职调离，难友们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1928年12月东北易旗，监狱把赵尚志、韩守本的案情

报告给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来电，把赵、韩二人解往南京审理。1929年3月经南京审理后认定，赵尚志、韩守本系国民党党员，为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一案在吉林监押，系旧军阀所为，最后判决无罪释放。

赵尚志出狱后，立即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抗联，成了抗日名将。他带领部队英勇抗击日寇侵略者，立下了赫赫战功。

张永生

肖丹峰智斗袁麟阁

1928年1月31日，在国民党反动军阀统治下喧闹一天的长春市，随着夜幕的降临逐渐平静下来，座落在六马路的大东日报社里亮起了灯光，点燃了火炉。报社总编辑肖丹峰站在窗前，透过结着冰花的玻璃窗，遥望街上熠熠闪光的灯火，陷入了沉思。

肖丹峰，双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由吉林一师毕业后来到长春，以大东日报总编辑身份从事地下斗争，负责中共吉长临时县委宣传和学生支部工作，当年他只有26岁。

就在肖丹峰沉思的时候，突然街上由远及近传来一阵汽车声。出于地下工作者的敏感，他朝窗外一看，只见一群穿着警服的警察，像乌鸦似的闯到报社门前砸门。沉着的肖丹峰盘算一下，不慌不忙地让会计王玉书去开门。趁警察还没进屋，肖丹峰稍加整理一下东西，然后钻进被窝里假装睡觉。

王玉书是报社的一个年轻人，十分精明、能干。他很佩服肖总编的才干、平易近人的态度和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平时和肖丹峰处得很投机。王玉书刚来到门口儿，就见一群警察破门闯了进来。

原来国民党长春警察厅第一署长袁麟阁接到上峰的命令：“大东日报社总编肖丹峰实属共产党首领，火速缉拿，不得有误。”敌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屋来，第一句话就问：

“肖丹峰在吗？”

王玉书见势不妙，回答说：

“不在。”

敌人又问：

“屋里有人吗？”

王玉书稍加思索说：“有位吉林来的客人。”袁麟阁闯进里屋一看，床上躺着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戴着眼镜的青年。在袁麟阁的记忆里，肖丹峰是瘦高个儿，不戴眼镜的中年人。袁麟阁定了一下神，仔细看一遍，认定这个人不是肖丹峰。

原来，有一次袁麟阁邀请大东日报总编辑赴宴，肖丹峰意识到这样的场面不宜抛头露面，应付官场又不能不去，便让报社记者项文元替他去应酬了。所以，袁麟阁一直张冠李戴把项文元误认为是肖丹峰。

即使是这样，袁麟阁也不肯轻易放过，唯恐肖丹峰在自己的鼻子底下溜走。于是，他声色俱厉地盘问肖丹峰。肖丹峰有问必答，丝毫问不出破绽。袁麟阁心里寻思，难道肖丹峰跑了？沉思了一下，又吩咐警察到后院找来了七、八个检字工人，让他们辨认屋里的这个人是谁。

朝夕相处的工友们看着肖丹峰的神态和屋里的势态，已猜出根由，异口同声说不认识。袁麟阁无奈，只好带领警察到后院去搜，搜了一会，仍是一无所获。袁麟阁不禁恼羞成怒，端着手枪，又凶恶地闯进前屋，枪口对准肖丹峰的脑袋：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肖丹峰已有了思想准备：

“免贵姓赵，名云山，彩的云，山水的山。”

“哪来的？”

“吉林”

“干什么的？”

“教员”

“哪个学校的？”

“毓文中学。”

“校长是谁？”

“李光汉。”

“学校在什么地方？”

“临江门。”

“到这来干什么？”

“报社约我来改稿子。”

.....

连珠炮式的审问，使屋内的空气异常紧张。袁麟阁脸色铁青，肖丹峰却坦然自若。狡猾的袁麟阁用征询的目光扫视一下旁边站着的警察，那警察对肖丹峰的回答连连点头。

袁麟阁显得十分懊丧，刚想要走，他一下子又盯住挂在墙上的棉大衣。他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就伸手翻大衣兜。会计王玉书心里深为肖丹峰捏把冷汗。因为大衣兜里装着肖丹峰的记者证，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可奇怪的是，袁麟阁翻遍了所有的衣兜也没找着什么可证实肖丹峰身份的证据。王玉书也不禁奇怪，肖丹峰的记者证哪儿去了呢？袁麟阁没抓到，又没搜到证据，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待警察走后，王玉书惊讶地问肖丹峰：“你的记者证呢？”肖丹峰指着地上通红的火炉说：“我早就把它转移到哪里去了。”

当袁麟阁犹如丧家犬，返回长春警察厅的时候，已是东方欲晓。肖丹峰告别战友，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报社，转移到新的地方，去迎接新的战斗！

刘建伟

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29年，驻扎在延吉县翁声砬子的东北陆军十三混成旅七团第三营招募的新兵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粗眉大眼、纯朴中透着刚毅、憨厚中透着精明的青年。在训练中他吃若耐劳，很快就在新兵中初露头角，深得营长王德林的赏识。他就是以后有名双枪将——史忠恒。

史忠恒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世道的不公，生活的磨难，使史忠恒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性格，他爱憎分明，富有反抗的精神。1926年，史忠恒终于不堪忍受屈辱而离家出走，几经辗转投到王德林部下当兵。

王德林响马出身，性格粗犷豪放，重义气，讲本事，史忠恒在这里感到心情很舒畅。由于他聪颖好学，不久练得能双手使枪，并被提升为班长。王德林见他是一块“好料”，又把他送到旅部军事教育连受训，使史忠恒又学到许多军事知识。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在沈阳得手后，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史忠恒深深愧疚自己身为军人却不能救百姓于水火，下决心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这天他找到几个无话不谈的“哥们儿”班长商议。

史忠恒开门见山地说：“弟兄们，现在小日本是越来越凶，当官的不抗日，咱们也跟着挨骂，老百姓养活咱们当兵的有什么用啊！”

“是呀，军人不卫国算什么军人？”一个班长附和道。

“唉，长此下去，国将不国，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又一个叹道。

“光叹气有屁用！”史忠恒一拳砸在桌面上，“当官的

不抗日，咱们自己干，就拉队伍和他们拼，至少也不能让小鬼子在咱面前耍威风！”

“对，史大哥，你领头，咱们兄弟豁出来和小日本拼一场！”

大家七嘴八舌，主张抗日的情绪如蒸腾的沸水到了顶点，史忠恒接着说：“我看咱们先建立个组织，平时多和弟兄们唠唠，打鬼子得人多势众才行。”众人觉得史忠恒说得在理，就决定成立反日会，由史忠恒当会长，大家共同向士兵宣传抗日救国。从此，抗日思想便如飘落的蒲公英种子，在士兵中撒播开。

1931年10月，日军吉会路修筑测绘队的几个测绘员强行闯入三营防区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到三营炮位窥测。史忠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气愤难捺，他马上找到几个反日会员说：“弟兄们，咱们天天说要抗日救国，今天就要来真格的了。小日本欺人太甚，竟来到咱们营里搞鬼名堂，我看咱们就先收拾这些鬼子！”出乎他的意料，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搭腔。史忠恒的血忽地一下涌上来，他真想狠狠地给他们几个耳光。可转念一想，他的心情也不禁沉重起来，上面命令不抵抗，这打鬼子就是违抗军令，会招来杀身之祸呀！自己只是个小班长，既无力号召别人，更无力保护别人，难怪弟兄们不说话呀！可是，就让小鬼子在三营的防区里示威吗？不，绝不能！想到这里，他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大家说道：“我也理解各位的难处，不过我是打定主意了，你们都不干，我自己干，我情愿做战死鬼，也不当亡国奴！”

在场的人看到史忠恒如此坚定刚毅，都被深深地感动了。想到亡国的耻辱，想到战士职责，这些热血男儿怎能压抑心中的怒火，他们一齐拥上来：“好，史大哥，我们跟你

一起干。”看到弟兄们终于鼓起了勇气，史忠恒心中十分欣慰，不过他还是劝道：“弟兄们，此事性命攸关，望三思而行！”弟兄们激昂地说：“史大哥，啥也别说，我们也和你一样，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看到大家决心很大，史忠恒悄声说了句：“好，弟兄们，抄起家什，跟我上！”说完率领十几个弟兄直奔三营炮位而去。

再说这几个日本测绘员，为什么敢在东北军的防区里耀武扬威地横冲直撞呢？在他们的印象中，东北军都是些属兔子的，一触即溃，一打就跑，因此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料正当这伙人要去三营炮位窥测的时候，忽然从路边钻出十几个东北军，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只见他们一个个刀出鞘，弹上膛，满脸怒气，日测绘队长一见不由地倒退几步，心想，哪来一群不要命的家伙，稍镇定一下，便手指对方叫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快地开路！”

史忠恒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混蛋，你们是干什么的，到我们防区搞什么鬼名堂，我警告你们，赶快回去，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日队长一听不禁有些恼怒：“我们大日本皇军奉命测绘道路，你们的不要挡路，不然死啦死啦的有！”

史忠恒一听更是气愤：“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你们可以来去自由，我们中国人不让你走就死啦死啦的有，好，今天就看看咱们谁死啦死啦的有”。不过为避免冲突扩大，他还是说道：“告诉你们，防区属军事重地，外人不得擅自入内，你们要是强行进入，我们……”

“笑话！”日队长一听，不禁一声冷笑，回头对其他队员说：“你们瞧，他们还要在大日本皇军面前舞刀弄枪，啊

，哈哈……”其余人也一同狂笑起来。笑声稍停，日队长又接着说：“你们的蒋委员长让你们的不要抵抗，明白？快快的开路！”回头又一挥手：“我们的继续前进！”说着队伍直奔史忠恒他们冲过来。

日本人的话激荡着每个人的心，身为军人面对侵略者却不能抵抗，这岂不是军人的奇耻大辱！史忠恒一见敌人肆无忌惮冲过来，恨得咬紧牙关抬手就是一枪，只见那个日本队长“咕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另外几个弟兄也随着开了枪。

这伙日本人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头一次遇到抵抗，骄横之气早不翼而飞，没被打中的慌忙扔下工具，嚎叫着向回跑去，身后留下了日测绘队长等三具尸体。

史忠恒等人的正义行动，给狂妄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以当头一棒，日本对此事哪能善罢甘休。日本驻龙井领事馆通牒伪警备司令宫吉兴，要求缉拿“凶手”，汉奸熙洽也电令王德林要尽快严惩“凶手”，他们还派人伙同日寇亲自往三营驻地直接找到营长王德林兴师问罪。一时三营的空气变得十分紧张，大家都在惶惶不安地等待着。

此刻史忠恒心中也不平静，虽然杀了几个日本人出了口恶气，可是小鬼子和上司追问下来怎么应付呢？王营长这么长时间也没动静，肯定是有心保我，不过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况且鬼子气势汹汹，搞不好还要连累更多的人。不行，我不能让王营长为难，于是他决定前去自首。弟兄们一听史忠恒要自己送上门去，都纷纷劝阻。史忠恒把利害关系向大家一讲，他们不禁对史忠恒十分敬佩地说：“那好，我们也一起去向王营长求情，要是不行，咱们就造反。”一行人簇拥着史忠恒向营部走去。

此时此刻王德林正在屋里琢磨着怎样答复日本人，忽然房门被推开，史忠恒等人大步走了进来。只见史忠恒跨前一步，“营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小鬼子是我杀的，我不让你为难，把我绑上交给日本人吧！”说着摘下双枪递到王德林面前，他身后弟兄们也唰地跪了下来，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营长，不能这么做呀！”

王德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史忠恒等手下弟兄，心中十分激动。“绿林”时就除暴安良、扶贫济困的王德林，在“9.18”后看到东北军妥协退让，看到日本侵略军的残酷霸道，看到骨肉同胞的深重灾难，抗日之心早已暗中滋生。听到史忠恒带人去杀日本人的事后，他在心中不住地称赞。这些天，日军和吉兴、熙洽等人追着要严惩凶手，王德林就在想方设法保护史忠恒。面对今天的情景，他更为部下能有如此爱国之举和慷慨赴死之胆略而自豪，也深深地为之感动。他又扫视了一下弟兄们，然后说道：“弟兄们，大家请起，我知道，忠恒是好样的，你们大家都是好样的。你们杀了小日本，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谁不高兴啊！你们让我把忠恒给日本人送去，也太小瞧我王德林了。今天，我借此机会宣布，我王德林从今天起反正抗日，弟兄们愿意抗日的跟我干，不愿意的悉听尊便！”王德林的这番慷慨激昂、肝胆相照的剖白，令史忠恒等人万分激动，他们忽拉一下把王德林围了起来：“我们都跟着你干！”王德林宣布了反正抗日，也似乎卸下了压在心上的一块重石。他兴高彩烈，满脸放光，“好，弟兄们，咱们就一起狠揍小日本这狗娘养的。”他转身拿来两把手枪放到史忠恒手上：“忠恒，我王德林以后打鬼子可少不了你这双枪将啊！”

1931年11月23日，王德林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

在史忠恒等爱国官兵请缨杀敌爱国激情的触动下，毅然率部举起了抗日旗帜，于1932年2月8日，正式成立了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王立新

情报十万火急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抗联游击队的交通员金相和突然接到老交通朴大叔送来的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要他立即转送给地下县委。情报的内容是地下县委组织被叛徒告密，敌人决定在当天夜里在县城内进行一次全面大搜捕。情报必须在中午十二点前送到县委，不然敌人行动了，那地下县委就要遭到破坏。损失就不可想象了。

清晨，金相和推开房门，夜里一场大雪下的足有二尺多厚，山野白茫茫一片。这样的天气倒使经验丰富的交通员犯了寻思：雪停了，日本鬼子的巡逻队必然要出动，通往县城，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敌人在这条路上除了设有几处哨卡外，还经常出动巡逻队到处游动。哨卡可以绕过去，难躲开的就是巡逻队，搞不好就和他们遭遇上，怎么办呢？这时老交通朴大叔的话又响在他的耳边：“情报必须在中午十二点前送到。不然地下县委……”想到这里，他回身带上门，端起妈妈早已为他盛好的饭菜，狼吞虎咽地扒拉几口，摆下饭碗笑着对母亲说：“妈妈，今天我要出去完成最重要的任务，你再给我带上一瓶酒吧，路上冷了好暖暖身子。”

金妈妈看了一眼儿子说：“你刚才不是已经喝过了吗？怎么还要酒呢？喝多了万一误了事情怎么办！”

金相和二十五六岁了，可是在妈妈面前，总是有一股孩子的顽皮劲，他凑到母亲的近前说：“妈妈，昨晚上下雪的太大了，天又这么冷，你就再给带上一瓶吧！”

金妈妈看着儿子笑了。老人家知道儿子是个有正事的人，平时从不无故贪酒吃。儿子二十刚出头就和打鬼子的抗联队伍有联系。以后亲自组织起农民自卫队、反帝同盟会、儿童团等，带领群众袭击警察所，打死恶霸地主潘光年，在蛤蚂河子这一带孩子大人都知道。后来参加了抗联组织，更是没白天黑夜的跟着干，不论是为游击队护送干部，给队伍筹物送粮，还是传递情报，每次都能巧妙地 and 敌人周旋，准确无误地把事办成。于是，她从柜子里拽出一瓶老白干，递给儿子并嘱咐着：“路上要少喝，当心误了大事！”

金相和高兴地给妈妈来了个立正敬礼：“妈妈，你就放心吧！”然后把棉袄大襟一扞，拿根草绳子往腰上一扎，狗皮帽子扣在头上，告别母亲走出家门，踏着没膝深的大雪上路了。

这时太阳刚刚从东山嘴里爬出来，映得雪地银光闪闪。刺得金相和的两眼直冒金花。到县城有近百里路，一个上午把情报送到县城，时间也真够紧张，再说，路上还说不准遇到什么麻烦呢！他没有想的更多，迈开大步，深一脚浅一脚只顾向县城奔去，不多时，已走出了罗圈沟口子。沟口外，没有草，也没长树，是一漫平川雪地。金相和伸手摸摸怀里揣的情报，暗自提醒自己：这是通往县城的唯一的路，也是敌人严加防范的地段，一定要小心，只要顺利闯过这片雪地就好办了。他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远处的雪地里有一溜黑点在移动着。他忙停下来，用袖口擦了擦被雪刺花了的眼睛，终于看清了，是十几个人迎面走来。他想起，地下县委最近几次组织城里工人暴动，农民抗粮抗税，闹得鬼子整天吃不好睡不安，特别是有几个据点的炮楼子被游击队给端掉了以后，敌处处加强了防守，这回可不能粗心大意，怀里揣的是

最重要的情报啊！渐渐地，他看清了远处的来人正是肩扛大枪的警察巡逻队。他们这么早就出动，一定是有紧急行动，说不准与今天晚上的行动有关系呢！

巡逻队越来越近了，看样子他们已经看清了自己，想躲是躲不过去了。金相和虽然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可是怀里揣着与多少人生命悠关的情报，眼前又孤身一人，怎么对付这伙荷枪实弹的巡逻队呢？他的心不禁咚咚跳个不停。他伸手摸了一下怀里的情报，心想，也只好这么办了。于是，他从腰间把酒瓶子摸了出来，用牙咬去塞子，人嘴对瓶嘴，一仰脖，“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又往身上洒了一些，塞上瓶盖儿揣回怀里，然后装成醉酒的样子，里倒外斜地向巡逻队走去。还没走几步，一个前趴子摔倒地雪地上，支支巴巴地半天才爬了起来，弄得满身是雪，接着又幌荡两下子，然后一个“腚墩”坐在雪地上干脆不起来了。

再说，巡逻队早已盯上了金相和，见他坐在雪地里只露着出半个身子，不知他在干什么，十几个人急忙散开队形，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气势汹汹把他围在中间。其中一个瘦高个子站得远远的，用手枪指着金相和问：“你是什么人，雪这么大不在家里呆着，出来干什么？”

金相和醉眼惺忪地瞅着十几个警察，含含糊糊地应付着说：“给……给……给我老婆抓药去。”

“你他妈的别装了，是不是给抗联送情报的？”瘦高个子紧逼着金相和。

“啊，啊……送情报，送什么情报？我一个庄稼人，不懂什么叫情报。”金相和仍支吾着。

有两个警察见坐在雪地里的金相和说话支支吾吾，就凑到近前咋呼起来：“看你这身穿戴也不是个好人，快说，你

到底是干什么的！”

金相和看着这群疯狗一样的巡逻队心想，这还是万幸。万一今天碰到了鬼子巡逻队，可就更难对付了。于是他装着醉眼朦胧地说：“我不是送情报的，是去抓药的。”

瘦高个子看样子象个头头，他见金相和不承认是送情报的，有些火了，用手枪指着金相和的脑袋说：“情报到底放在哪里，你不说就给你个枪子儿！”

“在这……这里，你们看吧……”金相和边说边从头上的狗皮帽子里拽出一张纸条，递了过去。

瘦高个子一看金相和拿出一张纸条，心里非常高兴，一把抢了过去，放到眼前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对一旁站着的矮个子说：“小个子，你认字比我认的多，我看不懂这是什么情报，你仔细看看……”

矮个子接过纸条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说：“排长，这哪里是什么情报，你看这上写的‘丹参、香附、丹皮……’这是中药单子。”

瘦高个子排长发火了，把药单子抢到手，撕个粉碎，一把摔到金相和的脸上，然后用手枪指着金相和的脑门吼叫起来：“我看你有点活腻了，情报到底有没有？”

这时金相和似乎醒了酒，忙说：“长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的全是实话，是去城里廉家药铺抓药，不相信，你就到前边问问吴碾官他二姨！”

“你他妈的欠打，胡咧咧些啥！”矮个子见金相和怀里像揣着东西，接着追问：“你小子怀里鼓鼓囊囊地，揣的是啥？”

“是……是啥我拿出来你们看看就知道了！”金相和坐在雪地里，冻的浑身直打冷战，哆哆嗦嗦的手刚往

怀里去掏，可吓坏了站在四周的警察，他们怕金相和掏出手榴弹什么的，急忙就地卧倒。当他们看清了金相和从怀里掏出来的是个酒瓶子，个个气得疯狗一样，狂叫道：“他妈的，不给点厉害，你是不会说实话的？”

金相和好像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干脆就不理他们了，自个儿把瓶盖打开，又喝起酒来。瘦高个排长走到金相和近前，一把抓住金相和的袄领子，把他从雪地上提了起来，旁边站着的警察上去搜身，结果什么也没搜到，只闻到一股呛人的酒气，气得排长抬起腿来就踢了两脚，踢得金相和就势又坐到了雪窝里。排长一看，弄不出个什么名堂来，泄气地说：“真他妈的倒楣，一大清早就碰上这么一个醉鬼。”他把手一挥说：“快走，别因为一个酒鬼误事！”

金相和坐在雪地上，望着越走越远的警察巡逻队，心里一阵高兴，不觉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在他摔第一跤时，就把情报埋进了雪下。他从雪里抠出情报，小心地揣了起来，然后用帽子拍掉身上的雪，迎着升起来的太阳，迈开大步奔县城而去。

王凤阁

奇袭“老集团”

袭击“老集团”，是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在桦甸境内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次重大战斗，这次战斗取得很大胜利，给了日伪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老集团”的由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实行一系列野蛮政策。

1934年，日本侵略军在桦甸地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成立所谓“清乡委员会”，以“治安肃正”为名，疯狂捕杀抗日志士，强迫散居在山区的农民归村并屯，建立“集团部落”（集团村庄）。仅1934年在桦甸江东就建立了64个“集团部落”，企图借以隔绝广大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

1937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我国森林资源，伪满洲林业株式会社北海木业组合，在桦甸木其河上游的上八道河子原始森林中建起一个采伐基地——木其河林场。日寇为了防止抗日联军袭击，在林场区四周筑起了围墙，四角设有炮楼，场部和营部暗设地洞。围墙上挂着铁蒺藜并挂满罐头盒儿，一碰就响。东门紧闭，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开放，出入只能通过西门。西门门上包着铁皮，有伪警察日夜站岗防守，劳工出入要由工头和警察检查身份证。日寇自称林场大院是敲不碎的乌龟壳。警察队长李海山扬言：“抗联要想攻下木其河林场，起码也得三天，而三天之内哪路援军都能赶到。”日本人称这个土围子为“老集团”。在“老集

团”里住有日本侵略者 21 人，伪森林警察一个中队大约 120 多人，劳工 1000 多人，有运木材的大牛 300 余头，还有大量的粮油和工具等物资。

“老集团”成了人间地狱。劳工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被赶到山上做苦工，寒数九也要在冰雪覆盖的森林里采伐，晚上五点钟才收工。劳工们只能干活，死伤病残无人管，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想逃跑比登天还难，不论出工收工都有荷枪实弹的工头、军警和自卫团严密看管，逃跑者被抓回来立即当众处死。因此劳工们早就盼望着抗日联军能把他们救出这座人间地狱。

进军“老集团”

1938 年冬季，抗日联军已处于困难时期。魏拯民率领二军四师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袭击红石、白山、夹皮沟一带的日伪军据点，粉碎他们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讨伐。为了解决给养等困难问题，1939 年 1 月 19 日，杨靖宇司令带领司令部警备旅、少年铁血营，从蒙江（今靖宇县）来到桦甸老金厂的东南沟抗联密营与魏拯民会合。2 月 18 日是旧历年，过了年部队召开了党组织会议，重点研究解决军需供给和抗日策略，最后决定：用缴获敌人的物资武装自己，壮大队伍，抗击日寇。

1939 年 3 月 13 日，杨靖宇和魏拯民率领司令部警卫旅、少年铁血营和二军四师大约七百多人，从密营出发向木其河“老集团”进发。抗联部队走到桦甸与敦化交界的富尔岭顶上，正好遇到从“老集团”里跑出来投奔抗联的一个劳工，他向杨司令报告了“老集团”的情况。杨靖宇和魏拯民为了搞清“老集团”里的敌情，派一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化装成劳工，通过“家理教”的关系和一个姓王的（外号老

面包) 伪警察取得联系, 了解守敌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设施情况。

痛歼“老集团”

1939年3月14日, 杨靖宇和魏拯民听取了侦察员的汇报后, 当即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命令一团团长崔贤担任主攻, 其他团担任佯攻。当天夜里, 崔贤团长带领200多人的先头部队, 从富尔岭山顶出发, 迅速拔掉林场周围的八个据点后, 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老集团”, 后续部队也都及时赶到了预定地点。面对敌人的四堵高墙和四座炮楼, 强攻十分困难, 唯一的办法就是破门而入, 显然这是一场硬仗。杨靖宇决定用一小部分兵力攻打四个炮楼, 并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大门。

午夜时分, 杨靖宇开枪发出进攻的信号, 激烈的战斗立刻打响了。担任佯攻的战士们向四周炮楼开火, 主攻的一团用四挺机枪对准场部大门万弹齐发, 无数条火舌呼啸而去, 同时手榴弹也在大门外炸开了花。一刹间, 包着铁皮的大门已是百孔千疮, 在弹雨中摇摇欲坠。院里的敌人还在拼命还击, 可是难以抵挡住抗日联军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大攻势。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杨靖宇决定一鼓作气攻下大门, 敲碎这个乌龟壳。于是在机枪的掩护下, 突击队向大门猛冲。弹雨中, 冲在前头的班长金百山中弹牺牲, 这更激起了抗联战士的无比愤怒, 战士们一拥而上,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大门连同门柱子一起倒下, 战士们呐喊着冲杀进去。伪警察队长李海山正指挥残敌负隅顽抗, 抗日联军一阵猛烈扫射, 李海山和警尉补郑文彬等三人立即被扫倒, 其他伪警察死的死, 伤的伤。这时战士们发现院子里顽抗的警察并不多, 从一个俘虏口中得知, 原来枪响后大部分警察从梦中惊

醒，来不及穿棉衣就跑出来，打开后门逃到山上去了。抗联战士追到山下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由于抗联的政治攻势和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伙敌人听到喊声便立即下了山，举起双手交枪投降。在押回这批俘虏时，一名伪警察班长说：日本人为了防备万一，在屋内挖了地窖，这次他们见抵挡不住，便都纷纷钻进地窖里去了。抗联战士很快找到洞口，命令他们出来，可是这些日本鬼子硬是不出来，于是抗联战士对着洞口一阵机枪扫射和手榴弹轰炸，敌人顽固到底，还是不出来。战士们气愤已极，于是叫劳工把谷草塞进洞内，倒上火油，用火烧烟熏，将20多个日本鬼子全部烧死在洞内。

抗联一路军攻打“老集团”的战斗前后不到两个小进就胜利结束了。这次战斗消灭日寇20多名，击毙了伪警佐李海山和警尉补郑文彬等，俘虏伪警察120多名，缴获轻机枪3挺。抗日联军从敌人的仓库里缴获了大量的粮食、香烟、罐头以及子弹、衣服等军用物资，得到了牛百头，马20匹，还解放了上千名苦难中的林业工人。在撤离时，林场工人帮助抗联把战利品用大牛运走，抗联战士们带着缴获的机枪、弹药，赶着牛，让被俘的警察背着粮食、棉衣、食盐在工人人们的监督下，翻过了富尔岭。剩余的物资、营房、办公室、劳工宿舍全部放火烧掉。回首望去，一片冲天大火，日寇苦心经营的“老集团”被烧成了灰烬。

召开庆功会

1939年3月15日拂晓，杨靖宇和魏拯民主持召开了庆功会，用缴获的白酒、大米、白面和肉，犒劳大家饱餐一顿。杨靖宇司令还向劳工和警察们讲了话：愿意参加抗日联军的欢迎，不愿参加的可以发路费回家。并告诉他们，不要

再为日寇卖命，要支援抗日联军，共同驱除日本侵略者，解放自己家园。杨靖宇讲话后，当时就有70多名工人参加了抗日联军。没有参加的也都表示，不当亡国奴，要支援抗日联军打败日本鬼子。庆功会开完时天已经亮了。第二天，杨靖宇决定由警卫旅一团许国有带领一部分兵力去八道河子西北沟阻击敌援兵，大部队转移到柳树河子和大蒲柴河等地休整。

3月16日，日本鬼子和伪讨伐队聚集了七百多人追赶抗日联军，妄图报复，在富尔岭与抗联阻击部队展开了激战。由于抗联占据有利地势，居高临下暗处阻击，敌人多次进犯均被击退。这次战斗又消灭日伪军80多人，抗日联军牺牲16人，许国有团长捐躯沙场。战斗到天黑，抗联部队主动撤出阵地，转移到柳树河子等地。日伪军恐怕再中埋伏，未敢追击，只好败退回去。

抗联袭击“老集团”的胜利，使抗联威名远扬，令日寇闻讯丧胆。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抗日群众逐日寇救中华的斗志。

刘 忠

大刀先锋——张胄子

磐石县的东南角有个黑石镇，镇内有一个大商号——天宝玉，经营绫罗绸缎，京广杂货，店主姓张名胄子。提起此人，倒有点来头。据说张胄子原是天津人，行伍出身。只见他六尺高的大个子，虎背熊腰，黑红脸膛，大手大脚，动作敏捷，祖传一口虎头刀耍起来风雨不透。幼年在学堂读书时，一听老师讲“八国联军进北京”呀，清朝和日本订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呀，他就气得浑身发抖，立志要为民族雪耻、为百姓报仇。别看他年纪小，气度非凡很象大人，一说话憋声憋气，动不动就撸起胳膊，眼睛瞪得溜圆。

父兄们看他是块当兵的坯子，就送他去当兵，一来为国效忠，二来图个光宗耀祖。那时正是国民党的天下，打了两家铺保，才入伍补了个二等兵。别看他性格彪悍，却很重义气，弟兄们有个大事小情、三灾八难的，他总是乐善好施，勇于相助。由于他很受大家的喜爱，又屡建战功，当兵不到三年，上峰便提拔他当班长、排长直到连长。

“九、一八”事变后，经他多次请求，终于走上抗日第一线，实现了他杀敌雪恨的心愿。在对日军作战中，他率领连队冲锋在前，深入敌阵，英勇杀敌。张胄子一杀红眼，就摘下背上的虎头刀，砍小鬼子的脑袋，象削大萝卜一样。按道理，有许多次战斗本应该乘胜追击，但不知为什么，长官总命令他们节节退让。一来二去，他摸透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一气之下，便和情同手足多年的弟兄们商量，要弃暗投明，单独抗日。多数弟兄拥护他的主张，少数不愿走的他也不勉强，能走的跟他走，离不开的就留下。于是他带着四五十人巧妙地离开了部队，爬山涉水几经风险，

辗转来到了磐石境内。因为他们一出关就听说，吉林省有个磐石县，那里是抗日烽火最炽烈的地方，是东北南满地区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据地。

这一天，张胄子率领他的队伍来到磐石县呼兰旗北郭家店一带，正赶上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的赤色游击队向日寇出击。他们看到游击队一路上扒铁路、截火车、锯电柱、强袭日伪军据点，终于击毙了日本走狗，救出被抓去的爱国同胞。这件事，张胄子和他的弟兄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紧接着在三道岗驻防的日伪军连长龙介天打死三名日军后率部起义，黑石镇驻防的伪军营长宋国荣率领全营官兵宣布反正。这接二连三的事件使张胄子懂得一个道理：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抗日救国的理想。于是他带领那几十名弟兄毅然取路到了宋营、龙介天连的驻地黑石镇。

黑石镇和江南乡隔着一条辉发江，距县城磐石有百余华里，四面环山，地处偏僻。磐石虽被日军占领，但实际上他们只有一个守备队（约一个连的兵力）驻守县城，所以明知黑石镇有反正的宋营、龙连和一些抗日山林队驻扎，也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黑石和江南地区几乎成了敌区里的真空地带。所以张胄子审时度势才决定在东街拿出了十几年的积累开了一座商号，既作为掩护，又可谋些经费，养活那几十号人。为了聚众抗日，他在商号的后院又建了一座洪炉制造刀枪。他和弟兄们走遍黑石镇，江南乡各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招募了近百名爱国壮士。这些新老壮士都寓兵于农，除了干农活和特殊情况，常常在指定地点习武练兵，由张胄子向壮士们传授大刀武术。每逢练武时，宽敞僻静的空场在山光林影的笼罩下，刀光闪闪，杀声四起，大有战无不胜的豪

迈气概。张胄子站在高台上挥拳踢脚，舞动大刀，壮士们应声而作，精神饱满。他先教壮士们持刀姿势、变换队形等基本功，然后才正式教刀法，什么劈头连身法，砍头断腰法，护身腾挪法等等。壮士们闪跳腾挪，手中的虎头刀左劈右刺，越练越精。

张胄子为抗日而聚众练兵的事儿，不但得到众多百姓的赞许，也引起了起义的宋营长的注意。一天晚上，宋营长来到天宝玉商店中与张胄子会面，俩人一见如故，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会心地笑了。俩人喝了一通见面酒，订下了大事一桩，这就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初十攻打磐石县，要给日本强盗一次毁灭性打击。不久，参加举事的宋营、大刀会、龙介天部和傅殿臣山林队等首领聚会议事，公推宋国荣为司令，并议定张胄子的大刀会为先锋队。聚会后各路队伍秣马厉兵，加紧准备。

时光真快，一晃由春起开始练兵，到现在树叶眼看发黄了，张胄子的大刀会不断发展壮大，人数达三百之众，各个刀法娴熟，勇气倍增，就是排两行纵队也得摆出半里地。

战前的编队誓师大会上，张胄子把弟兄们集合成一个方队，自任大法师，他的一位老部下袁大个子任帮练，下面还设有小头目掌管十个分队。全体大刀会壮士精神抖擞，披挂整齐。头上一律系着一条红头巾，上身斜披着一条尺宽的黄缎带。队前打着一面大黄旗，中间绣着一个“刀”字。祭拜天地之后，张胄子登上高台，威风凛凛，习惯地一撸胳膊，瞪圆了眼睛，憋声憋气地向部下们说“弟兄们！我们是抗日救国正义之师，象赤色游击队那样，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同胞，要与日寇血战一场。大丈夫为国捐躯虽死犹荣……”接着台下的壮士们一齐高唱：“我们是

大刀会，同是爹娘生，一心爱国家，阵前打冲锋”。歌声高亢有力，慷慨激昂，在山野中久久回荡。

八月初十，各路抗日人马数千人，把磐石城围得水泄不通。大刀先锋张胄子率领的大刀会士气高昂，军容整齐，进军路上秋毫无犯。

黎明时攻城战斗开始了，大刀会首攻城东南角。城东南角由日本守备队守护，那里设有炮台，垛口上架着机枪，真是枪打一溜火，炮响一溜烟。战斗打响后，那里的枪炮声响成一片，大刀会被火力压得直不起腰来。张胄子怒气冲天，虎头刀朝城墙一挥大声吼着：“弟兄们，给我冲上去！”弟兄们扛着事先准备好的云梯分数支梯队接踵而来。有的弟兄扛着云梯还没接近城墙，就被敌人打倒在半路上，有的刚爬上云梯就被打下来，更有的刚踏上墙头，又被日寇的刺刀捅了下来。这样反复多次，大刀会的壮士伤亡了许多，鲜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张胄子一见，两只眼睛通红，额角上崩起了青筋，撸起胳膊，一面指挥，一面仔细观察寻找敌人防守的漏洞。他终于发现，尽管日军居高临下，但炮台突出处的下面是个半月形的空虚点。他决定利用这个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子弹不能回射的空隙，命令弟兄们滚到墙根下利用云梯登城墙。由于云梯越来越多和队伍的火力配合，大刀会壮士终于登上墙头。第一个登上去的是邦练袁大个子，只听得鬼子兵们喊：“干爸泪！干爸泪……”（干爸泪是日语，鼓励、加油的意思）。袁大个子摘下背上的大刀对准把着机枪的一个鬼子，嘴里喊着“什么他妈‘干爸泪和干娘泪’的”，照着头部“咔嚓”就是一刀，只见鲜血四溅，刹时机枪哑了。鬼子兵慌了手脚，大刀会的弟兄们又跳上来好几个。这时，东门城楼起火，墙头上的日伪军瞥见火光大

起，炮台上机枪也不作声，再加上攻城部队连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交枪不杀！”都丧失了斗志弃械纷纷逃跑了，只剩守城日军全部蜷缩在东南炮台里，死守不出。张胄子指挥大刀队壮士发起猛攻，日军士兵又被打死几个，而大刀会的弟兄们也是伤亡惨重。大刀毕竟抗不住机枪，大刀队壮士所以那样勇敢无畏，是颗颗爱国之心在激励着他们啊！

日军的援兵将到，据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磐石非久占之地，所以宋营等部在攻下县城三天后，就各自撤回驻地去了。张胄子也率领数不足百的弟兄含着热泪掩埋了牺牲弟兄的尸体后踏上了归途。不料在路过烟筒砬子时，遭敌伪军警的伏击，大部分弟兄血肉模糊尸横路边，张胄子不禁壮泪纵横，只身杀出条血路闯出了重围。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蹒跚地回到黑石镇，把他亲手创办的商号天宝玉全部出卖，兑了一千块现大洋，全部送给了牺牲的壮士家属，权作抚恤和谢罪，自己连盘缠都没留，就告别了江南父老，踏上还乡之路。

不表张胄子昼夜兼程，风餐露宿，新仇旧恨，百感交集之苦，再说黑石镇有位教书的老先生，出于对张胄子这位爱国英雄和大刀会壮士们的敬重而作了一首歌，歌中唱道：

辉发江水日月流。
永唱大刀先锋属张胄。
背景离乡为国家，
名利早丢在脑后。
三百弟子歼倭寇，
大刀建功日月俦。
嗖嗖刀挥舞，
滚滚敌人头。

山河来喝彩，
丈夫志已酬。
义贯长虹，
名垂千秋。

的确，张胄子为了抗日救国，义结群英，不惜倾家荡产，将生死置之度外，真可谓动人魂魄，大义凛然。至今人们每当谈及大刀会打先锋进磐石的故事，对张胄子这位爱国人物，仍无不肃然起敬。

沈 友

双胜险境脱身

“双胜大爷，不好啦，外面鬼子兵上来了！”

木业工人杨大个子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工棚子里，向正在给工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抗联一路军第五支队长双胜报告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这是1937年初冬，发生在蛟河境内琵河大山沟里，小地名叫杨家店木业工棚子里的一个真实的智斗鬼子讨伐队的故事。

双胜，是他的报号，原名叫祁永全，原籍山东。“九·一八”事变后，激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义愤，来到东北，拉起队伍，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事业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带着队伍一直活动在敦化、蛟河、桦甸一带，特别是蛟河境内的琵河，山高林密，是他抗日活动的老根据地。当年五十出头的双胜，头上系根小辫，腮下总是挂着一簇嘎呀胡，由于他抗日打鬼子出名，从不招惹百姓，群众都亲切地称他双胜大爷。

当他听到杨大个子的紧急报告，一跃身跳下木板铺，透过门缝向外一看，不禁叫了一声：“哦，真的都上来了，少说也有百八十人！”这时只见全副武装的鬼子兵，各个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冲了上来，眨眼之间就把工棚子围个严严实实。

原来双胜这次只身出来，是为抗联队伍筹集冬装和活动经费的，哪曾想，他的行动被警察署的狗腿子牟怀人知道了。牟怀人这小子坏透了。他蹲到什么粪堆上就拉什么屎，他一听说双胜到了杨家店，就连忙打电话给鬼子讨伐队长中村，报告双胜出动的消息，为讨鬼子的欢心，还说他要亲自

带队去抓双胜，敢拿自己的脑袋担保，肯定能抓到。

中村小队队长拿起话机，一听是牟怀人打来的电话，火就不打一处来，开口就骂：“巴嘎呀噜，你的脑袋的几个的有！”中村队长对牟怀人为什么动这么大肝火呢？因为牟怀人这小子，总想在中村队长面前讨好，可是总也没办出一件露脸的事来。几次表白要亲手抓到双胜，可都没有抓到，所以中村对牟怀人很不满意。中村生气的骂他：“你的饭的白白的吃了，大事的干不了，双胜在你面前两次跑掉了！”

其实，中村小队队长也是有苦难言。双胜的小分队在这一带真是神出鬼没，比如拦截日军讨伐队给养车，十多辆大车装的东西都被截走；还有夜袭讨伐队的宿营地，一百多名鬼子全给“包扎”了。讨伐队多次调兵遣将，也找不到双胜的队伍，中村也屡遭上级的训斥。

牟怀人本想再向中村队长辩解几句，又一想，在抓双胜这件事上，真没作过一次脸，也不怨中村队长对自己不满。他想起前两次抓双胜，不禁又是一阵窝火憋气。第一次是双胜在岭前干沟子屯参加乡亲的婚礼，正巧牟怀人也赶去抹油嘴，两人相遇了，面面相视了好一阵子，牟怀人怕只身一人斗不过双胜，没敢当即动手。正当他暗中打发人给警察署送信时，双胜乘人多眼杂，赶忙扮个端盘子厨师，偷着从后门溜走了。第二次是双胜坐张马爬犁回山，正和牟怀人的爬犁走了个对头碰，爬犁很快就擦了过去，当牟怀人反应过来以后，调过爬犁就追。双胜发现后边爬犁追了上来，紧甩了几鞭，海黎马四蹄蹬开，爬犁像箭射的一样快，爬犁后边扬起团团雪烟，前后都见不着人。这时牟怀人手中的枪响了，前面的爬犁猛跑，后面的爬犁紧追不舍。双胜一见情况紧急，怕到前面遇上什么麻烦，就采取了应急措施，当爬犁行到一

转弯处时，双胜猛抽了海黎马几鞭，爬犁好似飞起来一样，双胜乘机滚下爬犁，一个翻身滑进路旁雪谷里溜走了。牟怀人在海黎马扬起的雪烟中穷追不舍，好不容易追上了，一看只有一匹马拉着一张空爬犁跑着，双胜不见了。牟怀人气的一拍大腿骂了一句：“他妈的，又跑掉了！”

中村虽然对牟怀人两次没抓到双胜不满意，但也不甘心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他把电话机咔嚓一推，转身吹响口哨集合起队伍，直奔琵琶河杨家店日本人开办的“北海木业公司”。讨伐队行动倒很迅速，20公里的山路，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中村一挥手，讨伐队“哗啦”一下把工棚围了起来。

“哐荡”一声，工棚子的风门被踢开了。第一个冲进来的，是个留着仁丹小胡、胖敦敦的鬼子，腰间挎着长长的战刀，紧跟在后面的的是个戴墨镜的人。他先用眼睛扫视一下昏暗的工棚子，然后对着工人说：“大家都站起来，不要乱动，现在我给你们引见一下。”原来说话的是个翻译官。他转身向那个挎刀的鬼子点点头说：“这是皇军小队长中村，他很关心大家，现在来看看你们！”接着他又对中村叽哩哇啦翻了几句日本话。中村把脑袋一拨楞，外边又进来几个日本兵，中村和翻译堵着门口，鬼子兵有的钻到工人的铺底下乱翻，有的用刺刀乱挑行李，一时工棚子里闹得乱哄哄的。折腾一气什么也没翻到，便对工人进行搜身。双胜早已料到鬼子是来抓他的，乱翻一阵是为了找证据。但是还好，啥也没翻到。双胜带着狗皮帽子，脚穿乌拉头，一身肥裆大袖的棉衣，同木业工人打扮成一个模样，两下都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谁。

几十号工人没见过这么紧张的阵势，有的吓得脸色煞

白，大气不敢出一口，有的站在地上哆嗦成一团，也有的给双胜递眼神，让他快想办法逃走。

乘着混乱之机，双胜回身从身旁的柱子上，拽下一条半截子帆布围裙扎在腰间，又从地上提起一只喂牲口的料桶，叮个铛个地搅拌几下，桶里的料溅了出来，弄得满身湿里呱叽的，然后迈开大步向门口走去。工人一看双胜要走，都为他捏一把汗，他们想：“这要是被鬼子认出来，那还跑得了。”

翻译一见这个工人打扮的小老头要出去，忙用手止住道：“唉，你要干什么去，不准乱动！”

这样的场面双胜见得多了，他不紧不慢地对翻译官说：“老总的不知道，日本木业公司经理龟田太郎，天天来催促我们快快的集材，牲口的喂饱好拉爬犁呀！”日本北海木业公司在这里作木头，讨伐队是知道的，双胜临时编了一套话，真的没引起中村的怀疑。但是翻译官还是不放过他，走上前去说：“你把桶放下。”没容双胜分说，就动手搜身。双胜把料桶往胯下一放，然后挺直了腰板，两只胳膊伸展开，接受翻译官的搜查。

工人们都把脸转过来，盯着翻译官的一举一动，紧张得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因为双胜总是随身带着两支短枪，怎么能逃过搜身？

奇怪的是，翻译官左搜右摸，什么也没摸到。他又上下打量一下站在眼前的这个老头，本想弯下腰去再摸两条裤腿，可是双胜的围裙和裤腿沾的都是酸了巴叽的牲口料，难闻得直呛鼻子，也就不再往下摸了，他对着双胜说：“你要快去快回来，不要耽误时间！”

“是的，翻译老总，俺快去快回来，你就放心吧，什么

事儿也误不了！”双胜说着，提起料桶，走出工棚子，直奔畜棚里走去，山里天黑的早，这时，四周群山已罩在夜幕之中。

工人们见到双胜走了出去，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可是他们也有点儿纳闷儿，双胜身上明明是别着两只短枪，怎么就没被搜出来呢，他把枪到底放到哪儿去了？

原来双胜在提料桶时，借着鬼子乱翻东西的时候，就把两只手枪深深地别进了裤腰里。双胜原想搜身时万一露了马脚，往出掏家伙也来得及，可是又一想，不行，不到万一不能暴露，所以在拌料时，趁鬼子不注意，顺手把两支枪扔进了料桶里，这样就骗过了搜身的翻译官。溜出了工棚子。鬼子兵把每个工人的身上搜了一遍，也没发现可疑的东西，中村队长急眼了，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你们这里边双胜的有，快快地说出来！”工人们互相看看，谁也不出声。中村一看这情形不禁大为恼火，“嗖”的从腰间拔出那足有五尺多长的战刀，举到头顶上，哇哇啦啦地对着翻译叫个不停。翻译忙解释说：“中村小队长说，你们若是不把双胜交出来，今晚谁也别想活着，通通地杀头！”

“你们是来找双胜的，”杨大个子一看谁也不开口，同时估计双胜这工夫也走远了，就凑到翻译跟前说：“你们找双胜怎么不早说呢，刚才拎着料桶出去的那个小老头，就是双胜！”翻译一听双胜从身边溜走了，知道这事不好交待，上前两步，举起手“啪啪”扇了杨大个子两个耳光子，气得脸象猪肚子色儿，狠狠地骂道：“他妈的，你们都是哑巴？怎么……怎么不早点报告呢？”

“咳，翻译老总，你是不知道呀，双胜那个小老头，可不是好惹的，他手里使的双家伙，一打起仗来左右手开弓，

就象机枪扫射一样，谁敢当着他的面向你们报告呀！”

杨大个子说完这番话，把翻译官的鼻子都给气歪了。中村一旁听出双胜逃掉了，“咔嚓”一声把战刀插进刀鞘里，反手就扇起翻译的嘴巴子，打得翻译站得溜直的，一个劲的喊：“哈依、哈依！”接着，中村狂叫一声，一脚踢开风门冲了出去。等中村到了畜棚子一看，地上放着双胜刚才提来的那只料桶，槽头上的老黄牛正在“咯吱”、“咯吱”的吃着夜草，双胜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凤阁

虎穴除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大肆武装讨伐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手段收买豢养了一些民族败类，建立了汉奸组织“朝鲜人民会”。他们四出活动，以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我抗日力量。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中共磐石地下党的一名党员崔小峰，经不住严酷斗争的考验，卖身求荣，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向鬼子报告了我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使磐石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而地下党的继续活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保证抗日斗争的顺利开展，磐石中心县委决心惩处这个叛徒，给那些叛国投敌的汉奸以严正警告，为党的地下工作扫平障碍。可是崔小峰也深知自己罪孽不小，抗日游击队不会轻易饶过自己，便乔装改扮仓惶逃往南满，藏身于山城镇的一个粮米加工厂中，不再轻易露面。中心县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县委特务队的李明海去山城完成惩处叛徒的任务。

李明海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受尽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仇恨的种子在他心中生了根。共产党在磐石开展活动后，他积极参加党的活动，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县委特务队的成员。特务队除了保卫县委机关外，还不时打击惩处汉奸叛徒等日寇走狗，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打狗队”。长期的对敌斗争把李明海锻炼成为一个胆大心细、智勇双全的优秀游击队员。

接受惩处叛徒的任务后，李明海马上与山城镇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稍加准备后便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山城镇属奉天（今辽宁省）管辖，紧靠在铁路边，是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因此敌人在这里也加紧了布防。这天火车进了站，李明海从车窗中探出头一望，见站台上黄乎乎黑压压尽是鬼子宪兵警察，一个个端着枪，横眉立目，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逼人的寒光。一个戴眼镜的鬼子大佐，挥舞着战刀来回巡视，嘴里不停地叽哩哇啦地乱叫，警察、便衣特务守在出站口，正在搜查下车的旅客，尤其对青年人更是严加盘查。李明海看到这一切，心里一沉，怎么过这道鬼门关呢？他一边思考着对策，一边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旅客，忽然他眼睛一亮，马上向不远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走去。那老汉正吃力地提着两个大包袱，蹒跚地走向车门。李明海来到近前，亲切地询问：“老大爷，您下车啊！来，我给您拿包袱。”老汉转头看了看，想是猜出了李明海的心思，便顺口道：“好！”他边把包袱递给李明海边说：“小伙子，别怕，一会儿搜查你的时候，就说咱是一家人。”李明海提着包袱，搀扶着老大爷走下车厢，奔向出站口。警察看到李明海，便凶神恶煞般叫道：“站住！检查！”说着把李明海拉到一边，边搜身边问：“干啥的？”李明海沉着地答道：“种地的。”老汉在旁赶忙说：“啊老总，这是我儿子。”几个警察翻了一气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才将他们放出车站。

李明海谢别了老汉，及时赶到接头地点，同山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党组织派了老李、小朴两位同志协助李明海。吃过晚饭，三个人聚在一起，低声商量着行动的办法。老李介绍说：“粮米加工厂对面就是日本守备队的营房，还有伪军一个连驻防，警察署的警察和便衣成天东游西窜。”小朴补充道：“那个叛徒就在粮米加工厂，临街是柜房，后面是

磨米房。”老李又说：“敌人这一段时间盘查得很紧，动不动就戒严、搜查、抓人。”李明海听了介绍后，笑着说：

“崔小峰这家伙还真滑头，找这么个地方就以为咱们不能动他了。”老李说：“可不是，咱们还真得好好商量商量。”三个人一齐陷入了沉思。

李明海在此之前就打好了主意，这次行动只能智取，不能蛮干，否则即使杀了叛徒，自己也会受损失。因此这次来他连枪也没带，只在怀里揣了根细麻绳，可是怎么进去呢？惊动敌人怎么办？李明海对如何行动及行动的每一个细节认真仔细地考虑着。小朴急了，“李大哥，你看咱们怎么办啊！”听了这话，李明海缓缓舒展开紧锁的双眉，胸有成竹地说：“老李、小朴，咱们有办法。”老李和小朴一听，都面露喜色，“快讲讲，什么办法？”“我的想法是，”李明海接着说，“咱们都扮成农民模样，这样出来进去就容易了，至于时间，就选在中午，趁工人回家吃饭的机会，用这个……”说着，他掏出麻绳作了个勒脖子的架势。“那勒不死就坏了，”小朴又担心地说。“没关系，我再找个大铁钉钉进他的脑袋，保证把崔小峰这个狗叛徒送回老家去。行动时，你们两个在外面给我望风，我一个人进去收拾这家伙，你们看咋样？”两人同声说：“行，没问题！”接着，又约定了联络暗号以及撤退路线，觉得一切万无一失，大家这才分头休息。

第二天近中午时分，李明海三人分别来到粮米加工厂。这时正是工作时间，院里的磨米机正“轰隆、轰隆”响个不停，工人们进进出出，对外面来的几个人也都没有介意。李明海向老李和小朴一使眼色，摸了摸怀里的细麻绳和特地找来的一只七寸铁钉，便沉着地走进磨米房。进了屋，他先以

敏锐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屋里的环境，一眼就看到叛徒崔小峰。崔小峰是个身高五尺，略显水蛇腰的中年汉子，上身穿着一件自制的朝鲜族衣褂，下身是条甩裆裤，头戴旧单帽，浑身上下沾着面粉，这时正在一个角落里搬米袋子。

李明海镇定地快步走上前去，面带笑容，一把抓过崔小峰的胳膊好似老友相见似地热情招呼道：“哎呀，原来你在这啊！可真让我好找！”李明海这一举动，吓得崔小峰浑身一哆嗦。原来这家伙自叛变后一直是吃不好，睡不宁，总怕有一天打狗队会找上门来要脑袋。虽然跑到山城镇躲起来，可他心中有鬼，让李明海这声招呼给吓了个半死。待他听清李明海的话，这才定下神来。可抬头一看，一时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那了：哎，这个人，你说认识吧，又想不起是谁，你说不认识，他却认识我。这家伙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啊啊”的敷衍了几句。周围的人看李明海的亲热劲以为他们是老朋友，隆隆的机器声又淹没了二人的对话。因此大家谁也没在意。一会儿，午休铃声响了，工人们都各自回家吃饭，崔小峰也想趁机溜走，又被李明海缠住，只好留下来，屋子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心怀鬼胎的崔小峰，眯逢着一双小眼睛，盘算着这个不速之客的来历。看着李明海强壮的身板和他眼中射出的锐利逼人的目光，崔小峰不禁周身打了个寒战：我的妈呀，别是打狗队吧，看着这架式来者不善，自己还是早溜为妙。这家伙眼珠一转，皮笑肉不笑地说：“来，咱们到前柜房唠吧，在这儿也没个坐处。”原来这家伙想起来在前柜房住着一个打更的，想过去找个照应。李明海看出叛徒对自己有了怀疑，那还能走，便随口说：“没事，就在这吧！”为了寻找机会，李明海先发制人，连株炮似地问：“你在这混得咋样

啊！”“每月挣多少？”“还用人不？”……崔小峰只好一一作答。狡猾的叛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对面就是日本守备队，只要我把你诳出去，哼，那就由不得你了。想到这，便凑前讨好地说道：“你还没吃饭吧，咱们到街里去喝两盅。”李明海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诡计，马上伸出他那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叛徒的胳膊，“不忙，咱们见面还有好多话没说呢？”这一抓疼得叛徒呲牙咧嘴，只好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垂头丧气地坐下来。可他贼心不死，又抬头讨饶地说：“兄弟，用钱不？我这儿有。”李明海不屑地一笑：“不用，我也有。”

正当叛徒无计可施的时候，外面传来更夫的脚步声，崔小峰又象打了针“强心剂”，立刻精神起来。他故意放开声音说：“工人快上班了，你住哪，我下班找你去，有啥事我一定尽力。”他是想让更夫听到他的话好进来救救他，可听着听着脚步声由近而远，更夫又回前柜房去了，崔小峰一看这最后一根救命草也没抓住，立即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李明海见时间不早了，便站起身来怒视叛徒说：“崔小峰，咱们也不用耽误工夫了，我就是打狗队的李明海！”崔小峰一听，立时瘫倒在地，这下可完了，他想跑，可看到李明海铁塔一样，哪敢挪动半步。李明海一一例数崔小峰的罪行，崔小峰则叩头如捣蒜，一个劲的求饶：“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求你饶过我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

趁崔小峰叩头求饶的机会，李明海敏捷地掏出麻绳，猛地一抖便套在叛徒的脖子上，双手一叫劲，崔小峰立时没了动静。李明海庄严地宣布：“崔小峰，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判处你死刑。”崔小峰哪肯罢休，手抓脚蹬，妄图挣开绳索。李明海边用力抓住绳子，一边用脚猛踢叛徒的腿弯

处，叛徒摔倒在地，李明海用膝盖抵住崔小峰的腰，双手用力勒紧绳子，一会儿，崔小峰就老实了，身子发软，嘴里也吐出了白沫。李明海一看叛徒昏死过去，便抄起一块木方，将大钉子钉进了叛徒的脑壳。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事先写好的告示放在崔小峰的尸体上，然后解开小麻绳放在怀中，仔细拍拍身上的尘土，转身出门，不慌不忙走出了粮米加工厂。来到门口，他向老李和小朴一示意，任务已经完成了，三个人便各自淹没在街巷之中。

中午过后，来上班的人才发现崔小峰被人钉死了，尸体上还放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人民的叛徒，汉奸的下场！”这消息如同长了翅膀马上传遍了山城镇，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都伸出大拇指称赞打狗队智勇多谋，又惩处了一条日本侵略者的走狗。而敌人听到这个消息却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又是戒严，又是搜捕，为了抓住“赤匪”，把个山城镇搞得鸡犬不宁。而此时，李明海早已安然出城，隐没在归途的山林中了。

高 岩 王立新

夺 枪 记

磐石县委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一个七人的打狗队（特务队）。1932年，省委派杨佐青到磐石工作。杨佐青来到磐石后，积极协助队长李红光开展工作，不久就使打狗队发展到20多人，并改称磐石赤色游击队。队伍壮大了，可队里的武器实在缺乏，除了3支手枪、两颗手榴弹外，剩下的就是些土枪、鸟铳、大刀片了。许多队员看着手里的家什儿直叹气：“唉，拿这玩艺儿可怎么打鬼子呀！”杨佐青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去找李红光商量：组织上一时还无力给我们解决武器，要想把队伍全部武装起来，看来只有向敌人“借”了。这想法正与李红光不谋而合。从那以后，他们就十分注意这方面的消息，想找机会干一下。

不久，李红光和杨佐青带着赤色游击队开赴磐东区，他们一面进行除奸斗争，一面积极扩充队伍。几天下来，又有不少人加入了游击队，而武器则显得愈来愈少。如何夺取更多的武器，成了每个队员日夜琢磨的一件大事。

这天深夜，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后，杨佐青倒在炕上便酣睡起来。夜半时分，忽然觉得有人推他。杨佐青睁眼一看，原来是李红光。李红光边推杨佐青边不住喊着：“老杨，快醒醒，咱们缴枪去！”杨佐青一听说要去缴枪，马上来了精神，腾地一下跳下炕：“队长，你快说，上哪去缴枪！”

原来李红光得到一个情报：距呼兰镇西南20多里有个地主叫李保董，人称李二闫王，最近网罗一批兵痞流氓成立了大排队，有20多条好枪。据群众讲，这些大排队本来就

是一帮地痞无赖，如今有了枪，更是飞扬跋扈，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其实一天天吃喝嫖赌，胡作非为，老百姓深受其害却又敢怒不敢言。杨佐青听了这个消息，兴奋得直搓手：这可是个好机会，咱们正愁没枪，李二闰王就送上门来了。我看，咱们就来它个一窝端！“好！”李红光兴奋地说，“咱们先研究一下行动计划，然后向县委汇报。”于是二人连夜召集打狗队的骨干分子，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夺取敌人枪械、武装自己队伍的行动方案，然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十分支持他们的想法，李、杨二人见县委同意，俩人一合计，此事宜早不宜迟，第二天傍晚就带着队伍出发了。

李保董是磐东地区有名的恶霸地主，家有良田百亩，为人奸诈狠毒。他的家是一个独立的院落，院中有十来间青砖瓦房，周围又砌起高高的围墙。按说李家大院也算森严壁垒，可是自从共产党在磐石开展活动以后，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不时有起义、暴动发生，这一切让李保董感到心惊胆战。他琢磨自己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这些穷棒子一旦活动起来，那我这家产性命是两难保全哪！因此李保董出血本买了二十多条好枪，组建起一支大排队，一方面是为了看家护院、镇压百姓，更主要的是为了给自己显威壮胆。大排队成立后，李保董一心指望他们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便特意腾出两间厢房给他们住，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可没想到这帮家伙恶习难改，没几天就聚赌成风，把李保董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赌窝，附近的赌徒都慕名而来儿。每天晚上闹得乌烟障气，赌得不可开交。李保董一看这情形，气得大发雷霆：

“他妈的，老子养着你们是吃干饭的？磐石现在有了游击队，你们不好好给我看家护院。他们来了咋办？”没想到这帮家伙软硬不吃，一个个满不在乎：“怕啥？游击队加起来

不过3条破枪，他敢到咱这太岁头上动土？哼，老子还怕他们不来呢？”李保董一寻思，也是个理，可心里仍不放心，严令家丁严加防范，以防万一。大排队的家丁见李保董不再说啥，胆子更大了，依旧天天吃喝赌钱，有时连岗哨也参与进来。唉，李保董看在眼里，天天不住地摇头叹息，却又无可奈何。转念一想，这二十条枪也不是吃素的，量他游击队也不敢自找麻烦。于是他索性也不再督促，对家丁们的吃喝嫖赌睁一眼，闭一眼。

这天晚饭过后，天还没黑，大排队的赌局就设了起来。一开始门口还设了岗哨，可这家伙勉强站了个把儿时辰，终于实在忍不住屋里那帮人吆五喝六的诱惑，想出不了什么事，便也一头扎进厢房过瘾去了。

夜深了，朦胧的月光洒下来，平添了几分寂静。就在这时，一小队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李保董的家宅附近。不用说，他们就是李红光、杨佐青率领的游击队。李、杨二人先来到李宅门前仔细看了一下，不对，敌人的岗哨怎么没了？换地方了还是撤到院里去了？为了慎重，李红光马上派了一名队员过去侦察，其余的人就地隐蔽下来。不一会儿，那个队员就跑了回来：“报告队长，我都仔细看过了，没有岗哨，只在西厢房里有人乱喊乱叫，好象在赌钱。院子里也没有岗哨。”李红光、杨佐青一听心中暗喜，真是天助我们，没有岗哨给我们的行动减少了好多麻烦。于是李红光一挥手，队员们便按预先的安排悄悄散开，把李宅紧紧包围起来，杨佐青指挥着几个战士把二人抬（一种土炮）抬过来架在了李保董的家门口，炮口直对着西厢房。见一切布置停当，李红光与杨佐青一点头：“按计划行动。”于是他们带着四、五个队员进了院子。

这天他们都换了装束，一个个敞胸露怀，歪戴帽子撇着嘴，边走边不停地骂骂咧咧，那架式活象一群地痞无赖。几个人进了院一看，果然一个人也没有，往前走几步往西厢房一瞧，嗨，好家伙，只见里面挤满了人，南北大炕上各聚一堆，一个个捋胳膊挽袖子赌得正欢呢！李红光向大家一使眼色，几个人便摇摇晃晃地向西厢房走去。

再看这些赌徒，此时正赌得聚精会神，对进来的几个人丝毫没有察觉。那些赢了钱的，一个个眉开眼笑，不时发出粗野刺耳的狂笑，那些输钱的则虎瞪着眼，呼呼直喘粗气，头上的青筋迸出老高，面红耳赤，犹如困兽一般。赌的不轻松，那些看热闹的也闲不着，不住声地帮腔起哄，整个屋子人声嘈杂，乱成一团。看到这些家伙的狼狈样儿，队员们不禁感到好笑：都大难临头了，还作发财梦呢！他们向四周一寻视，只见西墙上一溜儿挂着二十多条长枪短枪，尤其是那二十条长枪，个个锃明瓦亮，闪闪发光。队员们真恨不得马上冲上去把它们抓在手中。李红光非常镇定，他向大家一摆手，队员们便分散到几个屋角，从身上摸出家伙，把大排队围了起来。李红光见队员们已做好准备，便来到地中央，把手榴弹擎在手中厉声喝道：“不许动！”这声音如劈雷炸响在空中，震得屋子里嗡嗡作响。那些红了眼的赌徒一时被这声断喝震住，浑身一激灵，便呆若木鸡，可眼睛还直直地盯着牌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纷纷把头转向屋门口。噢，又来了几个，怎么，耍牌吗？玩就过来，在地上站着干嘛？再说玩就玩呗，吆喝什么！老子手气正兴，你这一喊，好运气全他妈给吓跑了。这帮人呆呆地望着来人，心里不住地瞎琢磨。有几个反应快的发觉事情不对头，刚想站起来，却见黑洞洞的枪口和手榴弹逼了过来，直吓得又一屁股坐了

回去。趁此机会，队员们冲过去把二十多条枪都摘下来端在手中，枪口对着这些不知所措的赌徒。李红光见枪已到手，便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们是磐石赤色游击队，今天到此借枪一用。”听到这儿，这些大排队都吓得浑身一哆嗦。别看他们平日耀武扬威，此时此刻却都成了霜打的茄子。李红光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今天我们且饶了你们的性命，不过可得记着，如果今后还敢欺压百姓，胡作非为，那么游击队可就不客气了。现在你们都老实呆着，都别动，谁动打死谁！”说完便带着队员们退出西厢房，来到院外。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李红光马上集合队伍，带着缴获的武器一路急行军回到了根据地。而那些赌徒还真乖，一个个动也没动。其实好多人的心还没从牌桌上转出来，依然云山雾罩地作着发财梦呢！

那么李保董呢？其实李红光那声断喝就惊动了。他本想出门看看出了什么事，可刚一露头就看见架在门口的二人抬和手持枪械的游击队员，接着又听到李红光的话，吓得他忙转身回到屋里，拉了老婆一头钻到桌子底下，半晌没敢出来。老家伙在里面不仅害怕，还冤呢！为啥？那血本换来的二十多条枪拿回来还没听几回响呢就全都送给了游击队。他在桌底下真是又气又恨又心疼，差点没背过气去。

游击队初战告捷，极大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他们用缴获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打击日伪军，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这年6月，这支队伍正式发展成为东北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

王立新

披肝沥胆入虎穴

1932年秋天，在磐石县吉昌镇长胳膊屯，大地主张志仁组织了一支有20多条枪的地主武装。这支队伍不但不抗日，相反还到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并对我伊通区委的工作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年12月，伊通特支把这一情况向磐石中心县委作了汇报，要求县委想办法拔掉这颗钉子。经过研究，县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刚刚成立一个月的磐石游击队。

磐石游击队成立于1932年11月，孟杰民任总大队长兼第一大队长。孟杰民原名孟庆春。还在读中学时，他就积极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斗争，并于193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工作，发动群众暴动，策动东北军哗变，在斗争中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才干，被人们赞誉为智勇双全的“孟大学生”。在他担任游击队长不久，便在磐石滚马岭打了一次漂亮仗，缴获敌20人多打枪，更使敌人闻风丧胆。

接到县委消灭地主武装的指示后，孟杰民马上着手作战前准备。他考虑到张志仁家的大院有高墙角楼，易守难攻，强攻的话必定会带来伤亡，因此他想找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经过认真考虑研究，他决定先礼后兵，尽量减少游击队不必要的损失。

1933年1月1日，天气格外寒冷，晚饭后，队伍踏着厚厚的积雪从玻璃河套出发了。经过5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半夜时分来到长胳膊屯附近。孟杰民马上派人给张志仁送信，要他交出全部武装，游击队可以保证他生命财产的安全。否

则将采取军事行动。

张志仁见了代表问明情况后，这家伙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堆出一副笑脸说道：“组织武装抗击日本，我张志仁坚决支持，你们提的条件都好说，你回去请你们领导来一趟，咱们具体商量。”

代表回去后把情况一说，大家都觉得有些奇怪：张志仁这家伙老奸巨滑，为啥这次答应得这么痛快？一定有什么鬼点子。于是大家纷纷劝阻孟杰民不要去谈判，千万不能中了这个鬼地主的奸计。孟杰民和政委初向辰也没完全相信张志仁的话。但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有必要冒点风险。于是面对大家的劝阻，孟杰民说：“同志们，干革命总是要冒点风险的，我们现在抗日打游击不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吗？可我们并不怕。张志仁这家伙很可能心怀鬼胎，但只要我们有准备，不会吃亏的。反过来说，现在上级正要求我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实也需要我们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夺取这批枪支，甚至争取这支队伍，这对我们红军游击队，对我们整个抗日事业，是一个多大的贡献哪。”为以防万一，孟杰民安排初向长带队伍在屯口接应，他自己带穆参谋去和张志仁谈判。一切安排妥当后，孟杰民满怀信心地大步向屯里走去。

然而他没有想到，狡猾的张志仁已暗中策划了罪恶阴谋。

原来张志仁早已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日本侵略者，成了一个铁杆汉奸，他时刻想着要在日寇面前献上一功。这次游击队领导要来谈判，张志仁看到机会难得，便一边假意答应，一边暗中派心腹到伊通县警察队报告，然后又和他的姐夫张文荣密谋要在家中暗算游击队领导。这些事刚安排好就听说

游击队长孟杰民到了，张志仁忙拍拍衣服，整整帽子，来到院门口迎接。

门开了，孟杰民和穆参谋大步走了进来。看着孟杰民那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样子，张志仁心中不禁打了个寒颤。穆参谋指着孟杰民对张志仁说：“这就是我们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孟杰民。”张志仁赶紧走上前弯腰施礼，皮笑肉不笑地说：“孟大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孟杰民对这一套根本不屑一顾，和穆参谋直接走进了客厅。

双方落座后，孟杰民开门见山地说道：“张志仁，现在日寇占我山河，杀我人民，无恶不做，凡是中国人都应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党已经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因此咱们应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可不能不顾大局啊！我们希望贵庄把所有枪支尽数交出，支援抗日武装力量，决不能霸地一方，专干欺压百姓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张志仁心中盘算着警察队还没来到，便狡诈地应承道：“那是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咱哪能眼瞅着小日本在这瞎折腾呢！”

“那当然好！”孟杰民接着说，“既然你也赞成，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定下来，你马上把枪支收集到一起，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去。”

为拖延时间，张志仁又堆着笑脸说道：“孟大队长，这事好说，不急不急……来人哪，上茶！”他又站起身来冲着孟杰民拱拱手：“孟大队长，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不其然，您好不容易来到寒舍，先喝杯茶暖暖身子，其余的都说。”

孟杰民看张志仁贼眉鼠眼、拖拖拉拉的样子不禁心中生

疑。觉得在此不宜耽搁太久，便与穆参谋交换一下眼色，站起身来正色地说：“张志仁，这里情况复杂，我们不便久留，现在你马上去收集枪支！”

“别，别急嘛，来，请坐，坐……”张志仁还想拖延。孟杰民两眼一瞪，一拳重重地擂在桌面上：“张志仁，你给我放老实点儿，可别耍什么鬼把戏，赶快把枪交出来！”说罢起身就要往外走。

“慢——”张志仁冷笑一声，他估计警察队快到了，便剥下伪装露出狰狞的面目。“嘿嘿，孟大队长，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实话说吧，我们的人已把这个屯子包围了，你们今天是插翅难逃！来来来，请坐，孟大队长，你不是要谈判吗？你我就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听了这话，孟杰民心中猛地一沉：这个狗地主真的出卖了我们！此时此刻，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在屯外待命的红军游击队：这是一支多么宝贵的抗日力量啊，决不能受到任何损失！想到这里，他马上示意穆参谋出去鸣枪通知部队，他自己则转过身来对张志仁厉声斥道：“张志仁，你这个狗汗奸，别白日作梦了，想让我们投降，那是痴心妄想！我警告你，不要认贼作父，留下千古骂名，你与人民为敌，绝没有好下场！”说完他便向门外走去。

这席话说得张志仁面色铁青，恼羞成怒。这时暗藏在里屋的张文荣也走了出来，见孟杰民正向门外走，一时不知所措。心狠手辣的张志仁猛地抽出手枪，从背后向孟杰民开了枪。枪声划破黑夜的沉寂。正向外走的孟杰民突然感到身体一震，血从伤口涌了出来，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他艰难地扶着门框转过身来，眼里喷出一团怒火直射向张志仁和张文荣。他艰难地把手伸向枪套，想抽出手枪来惩罚这个铁杆汉

奸，可是由于伤势过重，身体摇晃一下，倒了下去。

穆参谋趁此机会跑到院里鸣枪示警，然后翻过院墙去通知游击队。

正在屯口待命的游击队员们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大家马上向张家大院冲去，迎面正撞上脱险而来的穆参谋。穆参谋把张志仁暗中袭击、孟杰民中弹负伤的情况一说，队员们都气愤填膺，纷纷向政委初向辰请战。看着同志们一张张因激愤而涨红的脸孔，想到亲密的战友深陷虎穴、生死未卜，初向辰猛地把手一挥：“打、狠狠地打！”战士们马上包围了张家大院，发起了猛攻。可张志仁这家伙早已有有了准备，他命令手下依托高墙和角楼负隅顽抗。而游击队由于没有重武器，攻打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奏效。就在这时，接到张志仁密报的伊通警察队又从后面包抄过来，游击队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险。战士们一个个杀红了眼，不顾一切地投弹、射击。听着周围密集的枪声，初向辰猛地冷静下来：不能这样硬拼，必须撤退，否则游击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想到这里，他马上命令队员们撤出战斗。战士们多么不愿意丢下大队长离去啊，可为了保存实力，他们眼含热泪，心里叨念着孟大队长的名字，撤退到山里去了。

红军游击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孟杰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磐石人民深深地怀念着他，有人编了一首歌纪念和颂扬人民的儿子：

爱国的志士，革命的青年，为了拯救祖国，为了民族解放，他带领同学，拿起了长枪。到处打击日寇，消灭汉奸豺狼……

王立新、季春

韩扬文抗“出荷”

伪满洲国时，永吉县西南金家乡五里河屯，只有百十户人家。

屯里有一位普通农民，叫韩扬文，排行老三。他从小受尽地主的压榨和凌辱，为求得自身生存，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性格。他特别乐意帮助人，哪家有点儿大事小情，甚至夫妻矛盾、家庭不和，都找他出主意，拿办法。当地农民敬重他，尊称他为“韩三爷”。他不仅在全村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面前享有威信，就连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慑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也不情愿地对他敬怕三分。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推行“粮谷出荷”，就是强行征粮。广大贫苦农民，尤其是小家农户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点儿粮食，眼巴巴地被迫缴“出荷”，纳地租，剩下的连口粮和下年种子都不够。要是再遇上旱涝天灾，即使罄各家所有，也远不足完成“出荷”，因此不少农民便不得不将口粮、种子忍痛交出去，全家只能糠菜填腹，忍饥度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又以所谓“支援圣战”、“报国出荷”为名，增加了“出荷粮”负担，伪县公署的“粮谷出荷督厉班”，每到秋季就倾巢出动，分赴各个村屯，催逼农民送“出荷粮”。地方官吏也趁机进行敲诈勒索。

五里河屯一些地主豪绅与屯长白景文、村长孙家润和伪县公署股长黄星垣互相勾结，不按土地面积合理分担“出荷粮”，而把大部分“出荷粮”强加给小门小户的贫苦农民头上。但是又怕农民抵制招惹是非，于是买通县督厉班，给韩

扬文减“出荷粮”，只求他不替小户农民出来说话。小门小户农民负重难忍，都找韩扬文帮助想办法。

韩扬文为人公正，不畏豪强，听到这种种不合理的摊派，十分气愤。就不避风险地去吉林市请律师具文状告当地少数富豪与一些汉奸伪吏从中作弊，要求“出荷粮”要合理均摊，给小户人家一条生路。可是民虽举，官不究，相反却以所告不实、有意抵交“出荷”为由，把他拒之门外。

状告无门，韩扬文仍不服气，便对小门小户的农民说：“他们（指伪政府官员）不管，咱们自己管，咱们软磨硬泡就是不交，看他敢怎么的！”他暗示各小门小户暂停送粮，并采取各种方法，对付督促“出荷粮”的汉奸和伪官吏。恰在这时，伪永吉县长宋德谦接到金家村“出荷粮”受阻的报告，就匆匆从吉林赶来处理。这个伪县长一到五里河屯，韩扬文就代表群众向他请愿申诉，伪县长假惺惺地表示要“秉公办事”。但他走后，摊派给各小户的征粮数字不但未减，而且催交得越来越凶。地主豪绅们也在暗中散布：“抗交‘出荷粮’是犯法，轻者坐牢，重者要招杀身之祸……”有些胆小怕事的农民，想偷偷地把“出荷粮”送去。

1944年冬的一天，十几辆送交“出荷粮”的大车路过五里河屯，韩扬文知道后，率领抵交“出荷”的群众，赶忙迎到五里河桥头。他朝着送粮车，摆手高喊：“乡亲们！不要害怕，把车赶回去，这粮咱们不能交！交了粮，全家大小怎么活！”接着他又说：“若是有人问，你们就说‘出荷粮’是我韩三麻子（群众送的绰号）不让你们送的，要杀要剐由我一人承担！”送粮的车主听韩扬文这么一说，都从心里敬佩他的胆量，又看到那么多农民拒交“出荷”，心一横，又

把送“出荷粮”的大车赶了回去。一路上他们迎到的粮车也都跟着中途而归。

一天，韩扬文去岔路河办事，又看到十几辆送交“出荷粮”的大车在岔路河粮栈门前排着，车主和老板抱着鞭子站在旁边。韩扬文走到近前一问才得知，因为粮栈故意刁难强压等级，农民才没有卸车。韩扬文气愤地说：“赶回去！不刁难不压等级还不愿意送呢！何况压等级，更不能给，赶快把粮拉回去。”送粮的农民听他一说气愤地调过大车，一辆辆都赶了回去。

韩扬文连续两次挡回送“出荷粮”的大车，惊动了地主豪绅、地方官和伪县公署。他弟弟韩扬朝很担心，劝他说：“哥，你这样和日本人和官府闹，能行吧？”韩扬文对弟弟说：“只要大家都不交‘出荷粮’，把我抓去也没啥了不起！”金家村抗交“出荷粮”的斗争波及到花家、岔路河、一拉溪等村，一连几天，入库粮数锐减。因此五里河屯的“出荷粮”任务没有按时完成，结果使豪绅们企图强加小门小户负担的阴谋没有得逞，官府还是被迫按土地数量分担了。

五里河屯一带的村屯长和豪绅们投机未成，恼羞成怒，便串通官府，到处翻粮抓人，打骂老百姓，进行煞气泄愤。五里河屯刘四矮子家中仅剩4斗谷子，已炕在炕上也被强行扫去。北大沟贫农刘闯，因没按期交足“出荷粮”被带到屯公所，打得皮开肉绽。

这一年一个严冬的早晨，田野铺着一层白霜，农户的茅房顶，懒洋洋地升起缕缕炊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虽是临近年关的早晨，山村仍是那样冷清。突然，一辆汽车从五里河屯北岭开过来，它象一颗灾星，搅破了山村的寂静。汽

车“嘎”的一声停在韩扬文门前，左邻右舍都预感到不妙。只见三、四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下了车，向扬文家走去，乡亲们都为韩扬文捏把汗，默默地企盼着：韩扬文呀，你快跑吧！

韩扬文自抗粮开始就料到有这么一天，早就做好了准备。当听到远处车声、犬吠时，便跳窗向东逃走了。这群虎狼似的伪警察，闯进了韩扬文家，翻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

韩扬文逃出以后，决心去桦甸投奔中国工农红军。他一路急走，星夜兼程，又饿又渴又累，到一拉溪天已半夜。他停下来看看四周没什么动静，就敲开一个朋友家的门，说明来意，住下了。

第二天，外面风声越来越紧，他隐蔽一天，半夜又上路东行。

当天要亮时，韩扬文刚到吉林西的老爷岭，无意中被追捕他的伪永吉县警察局的警察拦住抓走了。

韩扬文被捕入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家乡，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抗粮斗争继续深入发展。日伪当局为平息事态，缓和矛盾，不得不采用怀柔政策，相应地调整一些小户的“出荷”负担。

在押期间，韩扬文受尽了酷刑，一只眼睛被打伤，一个脚趾头被打断，但他没株连一个人。伪永吉县警察局最后按“反满抗日”等罪名，准备把他引渡到伪吉林省高等法院。

在伪高等法院审理过程中，乡亲们为解救韩扬文联合向“高等法院”推事李庆义（乡邻）求情，从中周旋。通过贿赂和多方努力，伪高等法院算是从轻以“聚众滋事”、“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送交思想矫正局进行无期徒刑。

韩扬文受所谓几次矫正以后，被送到抚顺煤矿。他在煤

矿里背煤，过的是犯人的生活，受的是非人的待遇，吃的是发了霉的糠面窝窝头，烂菜加点盐的清汤，就是强壮的汉子，身体也会拖垮。韩扬文忍受着折磨，一直到东北光复，才幸存出狱。

韩扬文出狱后，真正感受到摆脱日伪统治的喜悦，沐浴到解放后的阳光，体会到只有斗争才能胜利地真理。解放前他虽未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6年1月却当上了岔路河区民主政府的副区长，实现了他参加革命的愿望。

刘蕴忠

红色“大亨”

1942年元旦的傍晚，朔风凛冽，格外寒冷，古老的吉林市在狂风大雪中挣扎着。

死气沉沉的街道上，亮着稀疏昏黄的路灯，一位年约30多岁富商模样的人在疾走着。他头顶灰色的礼帽，身着青色礼服呢棉袍，手提一只精制的小巧皮箱，身材魁伟，面目冷峻，两道剑眉下闪烁着一双机警有神的大眼睛。街道两旁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临街墙壁上白灰涂抹的“武运长久”、“王道乐土”、“日满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大字标语，使他心头格外沉重，他脸色阴沉，眉宇间拧成一个浓重的“川”字。他就是原中共吉林特支书记、现经党组织委派重返故里从事情报工作的李维民同志。

李维民出身于殷实家庭，父亲英年早逝，家道中落。他中学毕业后失业在家，埋首读书，结交了张玉珩、纪儒林等中共地下党员，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也成了中共地下党员。他以铁路站务员为掩护，在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罢工，领导学生运动，后因叛徒告密，上了日伪当局的黑名单。从此他流亡关内，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学习和跟随刘少奇同志从事地下斗争。这次在延安受命同电报员崔岳分头回吉林搞情报工作。

此时，李维民已走进一片简陋不堪的贫民区，径直来到了一座低矮的茅草房前。他先是机警地看了一下四周——雪花纷飞，寂静无人，然后才上前轻轻地敲了敲房门。不一会儿，“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手端油灯走了出来。“先生，您找谁？”老太太困惑地打量着门外这位仪表堂堂的“阔佬儿”。

看着面前衣衫褴褛、满脸皱纹的母亲，李维民极力抑制住喷薄欲出的激情，颤抖着说道：“娘，我是维民哪，您连儿子都认不得了？”

“谁？维民！”老太太的眼睛一亮，忙借着跳跃不定的微弱的灯光仔细端详着面前长高了、也变阔气了了的儿子，“真是维民，我的儿呀！”

“啜唧”——油灯跌落在地上，母子二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暗夜里扑面的飞雪中紧紧搂在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当重新拨亮油灯时，李维民已坐在家中一条破旧的长凳上。环视四周，屋内除一条倚墙而设的火炕，一条长凳和两只旧木箱之外，真可谓家徒四壁。

看着欣喜若狂的母亲和垂泪的妻子，李维民不禁百感交集。他站起身来走到妻子身旁低声轻柔地说道：“莲荣，这十年你也受苦了！”妻子望着归来的丈夫，悲喜交加，不禁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一切安定之后，李维民重新坐下，面对询问他十年经历的母亲，妻子搪托地说道：“十年前我逃出之后，便流亡到关内，与几位朋友合伙做了几笔生意，赚了些钱，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好让你们享享清福”

突然，李维民好像感到少了点什么，四处逡巡了一会儿，回头凝视着妻子问道：“伯坝呢？”

不提则已，一提起儿子，妻子又扑到炕上放声大哭起来。

李维民焦急地望着把一把又一把抹泪水的母亲：“快告诉我，伯坝发生什么事情了，快告诉我！”

“自打……自打你那次……从家中逃走……”

后……日本人就……来家中抓你……打了我还……还不算……他们……他们踢死了……踢死了……哭着喊着要爸爸的伯坝哪……呜呜呜……这群野兽呀……畜牲呀……我的伯坝哟……我的孙子哟……”

老人断断续续地哭诉，更激起了李维民胸中的愤恨。他紧攥双拳，咬着牙说道：“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和这群野兽算总帐！”

李维民在家中歇息了几天，从母亲和妻子口中知道了他走后家中的一些情形。

原来，在他逃离吉林之后，他母亲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吉林市德胜门外侯圣绂（侯有麟）家里当保姆。侯圣绂经营汽车运输，开设木器厂，是吉林省有名的士绅。李母对李维民称道他：“侯先生可是个大善人哪，要不是他常周济我们，我们娘俩早就饿死了，他可是个菩萨心肠的人哪！”

侯圣绂在吉林市可谓财大气粗，为人又四面鉴光，八面玲珑，为生财有道，与许多日本人和伪宪官员私交甚厚，所以李维民决定通过他在吉林市站住脚跟。

侯圣绂家住在德胜门外的一座古老大宅院里。这座宅院四周是青砖围墙，门前八级石头台阶，朱漆大门，院内青砖铺地，过厅、抱厦，起脊大瓦房。正房中间是书房兼客厅。这天，侯圣绂正在捧着水烟袋吸烟歇息。一位须发斑白的老管家蹑手蹑脚地进入客厅低声说道：“老爷，李嫂向您请安来了。”

“噢！”侯圣绂随意应着。

“哦，她是带着刚从关内回来的儿子来的，听说她儿子发大财了，一回来就兑了幢大房子，嗨，真是衣锦还乡

啊！”老管家眉飞色舞地描述着。

侯圣绂满腹狐疑地说道：“是不是叫李维民的那个，当年不是犯了”反满抗日“罪跑掉了吗？”

“是呀，可人家做起大老板来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如今谁去理会。”老管家仍然辩解地说。

“好吧，叫他们进来！”侯圣绂继续吸着烟。

一会儿，在管家的引导下，老太太和李维民进了客厅。侯圣绂面前审视着这位衣着入时神采奕奕的年青人，心理有了几分好感。

李维民上前一揖到地，恭敬的说：“候先生，老母这些年承蒙您大力帮助才得以温饱，深恩厚谊，我李维民衔环结草未能报其一、二，今日登门叨扰，特地，致谢！”说着把一张大红礼单双手呈上。

“哎，哪里哪里，李老太太在这里帮了我们的帮忙，何以称谢！这礼品嘛……”侯圣绂矜持地说道。

“如果候先生不肯赏脸，真叫在下过意不去了。”李维民满脸真诚地说。

“好吧，既然如此，鄙人就不客气了。”侯圣绂一挥手，老管家上前接过李维民手中的礼单，退了出去。

寒暄完毕，三人落座。侯圣绂呷了一口茶，笑吟吟地说道：“李先生这些年何处高就哇！”

李维民一拱手，毕恭毕敬地说道：“在下十年前年轻气盛，一时卤莽闯下大祸，不得不远走关内，与几位旧日朋友经营服装生意，十年辛劳，赚了点小钱。无奈思亲心切，结束了生意，赶回了吉林。”

“噢，原来如此，这些年孤身在外闯荡，栉风沐雨，困苦劳顿，也真是难为你了，好在苦尽甜来，荣归故里，那么

。李先生对日后作何打算呢？”

“不瞒您说，我打算先办一个弹棉厂，厂址就选在致和街附近夹信子。东北天寒地冻，棉织物可是居家必备的。可我此次返吉，细心留意，偌大个吉林市竟没有一个象样的棉花厂。我打算购置一些新式机器，虽然是小本经营也可加倍获利。到时还要请侯先生鼎力相助。我想为侯先生准备三成股份，不知侯先生意下如何？”

侯圣绂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还真有点儿经营头脑，不禁笑容可掬地连连点头称“好”。可是李维民此时却埋头不语，一脸怏怏不悦之色。侯圣绂见状忙问何故。

李老太忙接口道：“咳，这孩子一回来就吵着要办厂子，可就是有一件事犯愁，到今个还没报上户口，整天唉声叹气的！”

侯圣绂略加沉吟，把手一扬说道：“这事何必犯难，明儿我和警察署的中岛先生过个话儿，保证两天之内李先生就可成为满洲国的子民！”

李维民与李老太太连连称谢。

不久，有侯圣绂、李振鹏、刘兰亭等吉林工商界头面人物作股东的“裕顺德”弹棉厂便开市大吉了，李维民堂堂正正地当上了“老板”，在吉林工商界占了一席之地。接着他又在牛马行附近的通信胡同办了个“永茂东”估衣铺，并邀请吉林有名士绅马德恩、王可耕做股东。这样一来，李维民在吉林市不仅生意兴隆，而且名望日增，不少人称他为“吉林大亨”。

在日伪魔爪控制下的吉林，光有钱还不行，还要有政界做靠山，才能逢凶化吉，站稳脚跟。李维民借助当伪德胜区区长姑夫的权势广交政界的“朋友”。为了掩护自己，他拜

吉林家理教首领张锦轩为师，加入了家理教，还当上了晋隆町义勇奉公队永远分区的副队长。

李维民终于成了吉林市工商界的“名人”，家中常常迎来送往，宾客盈门，根基越来越稳固。

这位吉林大亨表面上苦心经营着生意，热情应付着各界人士，满口“日满亲善”、“共存共荣”，暗地里却从事着抗日救国的事业。1944年初，一同从延安回来的电报员崔岳到吉林之后，李维民借故去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接上了关系，取回了发报机，回来之后，他经过严格考查，从伪税务局、军管区、永吉县公署、铁路局暗中发展了五名情报员。由他们搜集情报，不时地借作客之机提供给李维民。发报机放在李维民家里，夜深人静后由崔岳把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直接发到革命圣地——延安。

当然，日伪当局也并没有高枕无忧地睡大觉，因为他们意识到，用枪、炮、刺刀维持的统治，犹如坐在火药筒上发号施令，随时都有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所以他们四处伸出触角去刺探一切可疑人与可疑事儿。这不，最近一些日子，伪满警察厅的日本人宫田正为不断出现的可疑电波而食不甘味，坐卧不安。

寒冬腊月，浓黑的夜色笼罩着繁华闹市中的一幢壁垒森严、阴森恐怖的大楼——伪吉林警察厅，凛冽的寒风撕扯着楼顶上耀武扬威的日本太阳旗。楼内宽敞的大厅内，宫田正在猩红的地毯上来回踱着步，肥胖的圆脸上现出迷茫、困惑之色。他已派出对他死心塌地、曾屡立“战功”的特高股股长葛明福，亲率爪牙去寻找那神秘的电台，可是一个礼拜了仍无回音……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进来！”宫田坐回宽大的桌案后面。

门被轻轻地推开，一个留着分头、穿着蓝缎棉衣裤的家伙，一脸媚笑地蹭了进来，他就是特高股股长葛明福。他进来后，“啪”地一个立正，然后深深地一躬，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太君”。

“葛桑，你的快快讲清楚！”宫田不奈烦地追问着。

“太君，电台虽然没查到，可是我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

“什么消息！”

“太君，我打听到李维民有通共嫌疑。”

“噢？”宫田一愣，李维民是有名的士绅，虽然十年前有过反满抗日的嫌疑，但时过境迁这么多年，如今又富甲一方，怎么能通共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宫田冷冷地盯着葛明福。

“是咱们的嘱托（日伪特务的内部称呼）赵明宇听李维民的叔伯六哥李福云说的，他说李维民曾去过延安。”葛明福小心地看着宫田的脸色说。

“只有这些？”宫田皱起眉头。

“是的太君，目前只知道这些。”葛明福把身子一挺惶恐地答道。

“葛桑，你立刻采取行动迅速查清李维民的身份，但不要轻举妄动！”宫田呼地站起来训斥道。

“是！”葛明福深深鞠了一躬转身退了出去。

一天午后，李维民正在家中同几位情报员边搓麻将边核计着下一步的工作，突然他妻子跑了进来说，赵明宇来了。

李维民皱了一下眉头，赵明宇是他家原来的邻居，现在明里做生意，暗里却是警察厅里的嘱托，他来干什么？是不

是敌人嗅出了什么？想到这里，李维民让几位同志回避一下，决定单独应付这个日伪密探。

赵明宇还未跨进客厅，就向屋内站着的李维民拱手道：“李老弟，一向可好？”

李维民微微一笑道：“托赵大哥的福，维民还算可以。”

两人落座又寒暄一会儿，李维民就直接了当地问道：“赵大哥今天怎么有空儿来，难道有事吗？”

赵明宇干笑了几声说道：“大哥有笔生意，想求李老弟帮帮忙。”

“噢，赵大哥的门路那么广，又有什么事儿求到我名下呢？”

“我有几苗上等山参，想托可靠人，带给延安客户，不知……老弟能不能……”赵明宇死死盯着李维民，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

李维民心里一震，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赵大哥可真会开玩笑，我到哪给你掏登（东北土话，寻找、物色的意思）去延安的可靠的人哪！”

赵明宇半闭半睁着眼斜视着李维民，手指慢慢敲击着八仙桌子说道：“一民老弟，你在延安呆过一阵子，难道连一个熟人都……。”

李维民心里一惊，心想这家伙从哪知道我的化名呢？难道出现了叛徒，可是……不管怎么的还是先把他撵走再说。

“赵大哥，你真是包打听啊，连我的‘字’都知道。是呀，我是到过不少地方，南北有名的水旱码头我几乎都去过了，可惜就是哪个穷延安没走过。”李维民沉静地说。

“一民老弟真的没去过吗？”赵明宇不阴不阳地问道。

“赵大哥难道缺钱了，非要给我戴红帽子，好去宪兵队领点赏钱吗？那就请便吧！”说着李维民站起身来下了逐客令。

“唉，一民老弟别发火……”

客厅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俩人陷于僵持状态。正在这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俩人回头一看，原来是伪德胜区区长李维民的姐夫刘兰亭。

寒暄之后，三个人都坐不来，李维民诉说了赵明宇逼着他承认去过延安的经过，显得异常激动。没等赵明宇辩解，刘兰亭就把脸一沉：“赵先生，你未免太不讲义气了吧。我外甥在吉林立足未稳，不少人就落井下石，怎么你也想讨个便宜。别忘了，上次那些货都是我让维民给你送出去的！”

赵明宇一听顿时蔫了。不久前，他弄到一批当时的禁运物资，是通过刘兰亭转手倒卖的，而且他还欠刘兰亭一笔款至今未还。不想这事儿今天又让李维民知道了，一时方寸大乱，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知如何是好。刘兰亭见状忙从中打圆场，俩人也就顺水推舟，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最后赵明宇悻悻地走了，连顿饭都没混上。

刘兰亭临走前又嘱咐李维民：“维民哪，赵明宇这个人 是特高葛明福的红人，还是小心为好”。

送走了姐夫刘兰亭，李维民思忖很久，才想起可能是十年前，离家路遇六哥，失言流露出自己的行踪。这次虽然是妻了莲荣暗中把姐夫找来解了一时之困，但敌人决不会善罢干休的。所以，他做好了应付的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一天晌午，李维民正要从弹棉厂回家，一名职员进来通报说，有一位从关内来的老板要面见他洽谈

生意。李维民只好重新坐下，与来人见面。来人声称姓陆，是山西太原一个大药店的“老板”。他一身青灰云丝葛棉袍，一顶深褐色的礼帽，一进屋眼睛滴溜溜乱转，坐下后又递烟又问候，好象故友重逢一样。

他们先谈了一些买卖上的生意经之后，那位陆“老板”话锋一转低声说道：“李先生，我有一批药材‘藏红花、川芎、当归、何首乌’，想运到吉林，求您给卖出去，只是货量太大，需‘八节车皮’，看看李先生能不能帮忙？”

听到这里，李维民内心一惊，这不是以前规定的接头暗号么，难道这个人真是来接头联络的？不对，这个暗号早已废止不用了。所以李维民并未对暗号，他平淡地说道：“本号本小力单，向来不经营药材，恐怕……”

那人一听马上笑着说：“李老板，这货可是从北边运来的，您总得想办法才是！”

李维民也笑着说：“陆老板，商场如战场，没把握的事我是不做的！”

那人一阵哈哈大笑，然后往左右看了看又小声地说：“一民同志，我是延安八路军总部派来与你联络的，有重要事商量！”

李维民心中豁然一亮，迷团顿释，此人根本不是什么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员，肯定又是日伪当局派来试探的。因为李维民是由延安有关情报部门单线领导，每回来人都是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内线同志，向来没和八路军总部有直接联系。他心中有了底数，就站起来说：“好吧，你先休息一下，我找个地方再唠！”

他回到办公室给侯圣绂打了个电话，说有个可疑的人物，在厂内……。不一会儿，侯圣绂领着三、四个警察

赶来，以红色分子嫌疑犯抓走了那个人。李维民目送着他们远去，嘴边不禁露出轻蔑的笑意。

李维民——这位“红色大亨”，照常经营着生意，应付着各界从士，那红色的电波也始终回荡在吉林市的上空，直到1944年。

“八·一五”东北光复后，李维民公开了身份，任吉林特支书记，不久任吉林市委书记。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李维民被调到哈尔滨，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司令部工作。东北全境解放后，李维民历任鞍山市公安局长、鞍山市市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在“十年动乱”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积愤成疾，不幸于1976年3月20日病逝于北京。

长 凡

巧取蛤蚂河子

1933年，在磐石活跃着一支磐北抗日游击队。他们虽然人数少，武器差，可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敌人寝食不安。日军也曾间派兵“进剿”，可屡次兴师动众，却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找不到。于是日军头目命令投降日寇的蛤蚂河子村的恶霸地主汪百发组织训练会兵，由鬼子发给他们枪支弹药，让他们配合日军“围剿”抗日游击队。

磐石游击队队长叫李明海，这年32岁，一米七五的个头儿，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显得十分精明强干。以前他曾在红军部队任连长，是位很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得到这个消息后，李明海想：蛤蚂河子是反动地主武装的一个重据点，这里距磐石县城较近，又是敌人接近我玻河套根地的前沿，如打下蛤蚂河子，对我游击队的活动无疑扫除了一个重要障碍。而且最近日军为准备冬季讨伐，在那里屯积了大量物资，打下蛤蚂河子，既可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又可提高我军的威信和影响。“对！一定要把蛤蚂河子打下来！”李明海的拳头重重地敲在桌面上。决心下定后，他马上召集分队长开会，讨论行动方案。

李明海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情况，然后说：“同志们，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但是怎么打呢？大家都来商量商量。”分队长们对恶霸地主汪百发早就有所了解，听说他又组织会兵要讨伐游击队，更是异常气愤：“打，坚决打！这帮会兵有什么了不起，都是地痞无赖，一群乌合之众，我看把它包围起来，聚而歼之。”也有人讲：“强攻是下策，那样会给

游击队带来伤亡！”“对，”另一个接着说：“我看咱们应该智取，这样还可以节省子弹，减少伤亡。”李明海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议论，仔细思考着。最后他摆摆手：“同志们，我觉得咱们是应该智取，像孙悟空一样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给他来个中心开花。”这时有人问：“那蛤蚂河子把守很严，怎么进去啊？即便有人进去，枪也进不去呀！”李明海笑着说：“哎，别忙啊，我看咱们就来个以假乱真……”听了李队长的计划，大家不住地点头。李明海又和大家研究了一些细节问题后，便着手动员战士们做战前准备工作。

蛤蚂河子是个较大的村落，有一百多户人家。村东有一座高宅大院，这便是汪百发家。汪百发外号汪绝户，这家伙六十来岁，娶了三个老婆，为人奸诈，心黑手辣，他放高利贷，抢男霸女，滚边挪界，强占土地，真是无所不为，无恶不做。他家有土地三方（每方40垧），在吉长二市还有大商号，颇有权势。自从共产党在磐石开始活动后，这家伙听说红军游击队替穷人说话，专门和大财主作对，便到县里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封了他一个会董，任自卫团长，又给他枪支弹药，于是招兵买马，不久就搜罗了30多个地痞流氓。同时，他又加高院墙，在四角修了炮楼，由会兵昼夜看守。这还不放心，还派会兵在屯子路口放了卡子，盘查往来行人。经过前前后后这么一阵折腾，汪百发摸着没胡子的下巴有些得意洋洋：“嗯，什么他妈的共产党游击队，他能把我怎么样！”小鬼子见他还有两下子，也就对他很重视，把许多军用物资都存放在他这里。这下汪百发更神气了，没事便带着四个保镖在屯里转悠，四处训话，那腰板儿挺得倍儿直溜。

却说这年二月的一天，天气少有的晴朗，太阳也暖融融的。汪百发照例四处巡视一番后，便回家和三姨太抽大烟去了。屯口处，站岗的会兵在阳光下晒得迷迷糊糊，昏昏欲睡。这时，从远处传来阵阵拨浪鼓声，只见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货郎正向屯口走来。这人上身穿件粗布小棉袄，下身是青土布薄棉裤，脚穿洒鞋，边摇拨浪鼓边不住地吆喝。会兵见了，忙端起枪：“站住！过来检查！”那货郎不慌不忙、一步三摇地走到会兵跟前：“老总，我都来多少次了，你还不认识我？”那家伙看了看货郎，好像有点面熟，但又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于是不由分说一把夺下担子：“妈的，认识也得检查！”说着便动手乱翻一气。看没什么好东西，便随手抓起一包香烟往口袋里一揣，“行了，进去吧！”那货郎还想说什么，张张嘴没吱声，挑着担子进了屯。那会兵又咋呼上了：“怎么，老子拿包烟也不愿意，妈的，没收你的担子就是便宜你了！”边骂着边点着烟卷儿抽起来。

这家伙烟还没抽半截，忽见前面过来一群队伍，慌忙扔下烟头仔细观看，原来是一队伪军。只见他们一个个腰挂刺刀，身背长枪，由一个军官带领着大摇大摆地向屯子里走来。别看这会兵在老百姓面前很霸气，一见伪军可就蔫了。咋的，人家是正规军啊，你个会兵怎么说也是低人一等啊。这不，那会兵一见是伪军，慌忙上前点头哈腰地说：“长官，你们……”不等他问完，就见那军官看都不看，说声“找汪百发”，便带着队伍进了屯。这会兵一直在旁边行举手礼，举了半天也没捞着军官的正眼相看，气得这家伙鼻歪口斜：“妈的，神气个屁，看哪天让游击队给收拾了！”

再说这队伪军，进屯后并没有进汪家大院，只走到院门口便散开了。先进来的那个货郎，此时正站在汪百发的家门

口。他的担子已放在地上，什么鞋呀、袜呀、香烟哪都摆了出来，吆喝得正起劲。几个伪军凑了过去：“老总，买袜子？”货郎搭衬着，“嗯！老子看看再说。”这几个人翻来覆去摆弄半天，其中一个看中了一双袜子，“得，我就来它了。”说完拿起来就走。“哎，老总，您没给钱哪！”货郎赶紧说。“给钱？”那伪军回过头来，“老子辛辛苦苦打日本，你们还不该犒劳一下，要钱？要个屁！”说完又要走。货郎急了，上前一把抓住那个伪军，两个人吵成一团。这时汪家大院门里门外的会兵听见外面吵得厉害，一个个也忘了看家护院，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儿，一时间货郎周围聚起好多人。那货郎和伪军依然争吵不休。忽然只见那货郎放了手，回头抓起扁担：“好啊，你们这些当兵的，买东西不给钱，今天这买卖我不干了，你们尽管拿吧！”说着把货挑推翻在地，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这些会兵一看，白拣东西不要钱，便忽啦一下拥上去抢。正当他们抢得起劲时，忽然觉得自己的腰上顶上了黑洞洞的枪口，这一下会兵都傻了眼，还在楞神之际，就都乖乖的缴了械。

这时另一部分伪军迅速冲进汪家大院。院里的会兵有的在睡觉，有的围在一起打牌九，谁也没注意外面出了什么事。忽然间听到耳边响起了一个炸雷：“不许动！举起手来！”等这些家伙抬头观瞧，都不仅楞住了：端着枪站在面前的分明是一伙伪军，这不是自家兄弟吗？为啥用枪指着咱们？其中一个胆大的放下手站起来说：“我说弟兄们，有话好说，都是自己人呀……”没等他说完，便听一个伪军道：“少罗嗦，告诉你们，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一听这话，吓得那个会兵“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原来这些伪军都是游击队员乔装改扮的。

与此同时，那个货郎也捋下头上的帽子，正是游击队长李明海。他从身旁战士手里拿过一支手枪便向院里冲去。此刻汪百发与新来的三姨太正在房中抽大烟，这三姨太是新近从长春翠花楼用三千银元赎出来的妓女。此时她正娇声浪气地吵着管汪百发要钻石戒指呢。正当他们闹得不可开交时，就听屋门“砰”地一声被撞开，一个货郎打扮的彪形汉子手持短枪冲了进来。进屋后，他马上用手枪直指着汪百发的脑袋，厉声喝道：“别动！”老奸巨滑的汪百发听着门被撞开就觉得不好，立即伸手从枕下摸出了手枪，还没抽出来，就听“叭”地一声，汪百发手枪被打落在地，手腕上顿时鲜血淋漓。汪百发一声惨叫，整个人缩成一团，抖动着胖墩墩的肉蛋子似的身子哀求道：“好汉饶命，有话好说！”三姨太早吓得魂飞魄散，躲在墙角一动不敢动。来人正是李明海。看着汪百发等的狼狈象，他不禁一声冷笑：“汪老爷，我可不是什么好汉爷，我们是抗日游击队，来吧，汪老爷，请到外边来吧。”汪百发一听是游击队，立时没了魂，被李明海揪着拖出门，被战士们捆了个结结实实。

战斗计划顺利完成，李明海正要命令战士们打扫战场，忽然从跨院跑来一个战士：“报告队长，我们还钓到几条大鱼！”李明海抬头一看，只见战士从东跨院一溜押出五个人来。原来这五个地主都是当地的恶霸。他们看到汪百发招兵买马，势力愈来愈大，便合计着要投靠汪百发，依靠这棵大树保护自己。这一天五个家伙一齐来到汪百发家，密谋一阵儿后，便在东跨院搓起麻将来。却不料还没打上一圈，游击队就将他们包了饺子。李明海一看十分高兴：好，这可是个额外收获，把他们押到一起，听候审判。

屯里的老少乡亲，听说游击队抓住了汪绝户，个个心花

怒放，一齐拥到汪家大院门前。只见汪百发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往日的骄横霸道一扫而光，早已成了霜打的茄子。心中埋藏已久的怒火迸发出来，人们都冲上前去，你一拳我一脚，只打得汪百发象杀猪一样嗷嗷怪叫。

李明海走到门前，踏上石阶向大家一挥手，兴奋地说：“乡亲们，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今天，我们抓住了投敌卖国的恶霸地主汪百发，现在我代表人民判处他死刑！”人群沸腾了，人们簇拥着游击队员押着汪百发等几个人来到村外，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汪百发这个恶霸地主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蛤蚂河子这一仗，不仅消灭了汪百发的会兵，缴获许多枪支弹药，而且还在这里缴获了大量的猪羊肉、米面和大量衣物。游击队员把这些物资运回根据地，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阴历年。同志们纷纷称赞李明海能干，几个同志开玩笑说：“还是老当兵的行！”。从此，“老当兵的”的绰号在游击队不翼而飞，以后一提“老当兵的”都知道是说智勇双全的游击队长李明海。

宋 森、王立新

智 破 重 围

1933年9月18日，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开创南满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杨靖宇根据省委指示，在磐石县玻璃河套将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由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全师共300人。独立师成立后，部队士气高昂，主动出击，屡屡败敌。敌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十分惊恐，这年10月，纠集起一万多日伪军对独立师进行讨伐围剿。杨靖宇和李红光在分析形势后，制定了避实就虚、突出重围、外线歼敌的作战方针。10月27日，独立师出其不意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长白山区挺进。

这年冬天，杨靖宇准备率独立师北上蒙江，开辟新的抗日战场。当独立师行进到金川县大荒沟轱辘屯附近的密林中时，突然遭到2000多日伪军的包围。杨靖宇和李红光处惊不乱，立即指挥独立师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一时间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积雪被气浪掀起，在阵地上弥漫成苍茫的雪雾。独立师战士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趴冰卧雪，顽强地和敌人战斗着。时间慢慢过去，一天、二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虽然战士们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可自己也有很大的伤亡，更严重的是，独立师并未突破敌人的包围，而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正一步步缩小着包围圈。

听着阵地上的枪炮声，杨靖宇和李红光的心情格外沉重，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敌人数倍于我，硬拼是不行的，而几次突围又都没有成功，再这样消耗下去，不久就会弹尽粮绝，那独立师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啊！不能耗下去了，一

定要想办法突出去。他们又来到阵地前沿，一边观察敌情，一边思考突围的办法。密林边际，阳光下白皑皑的雪地上，黄乎乎的鬼子和黑乎乎的伪军格外显眼，他们正嚎叫着向独立师发起一阵阵的进攻。战士们或趴在冰雪堆成的掩体中，或隐蔽在树后，顽强地抗击着，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但是战士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严寒、饥饿和日伪军一起摧残着战士们。

“不行，绝不能再这样硬拼下去了。”杨靖宇一拳砸在雪地上，看着冰雪中的战士，脸上露出了刚毅的神情，“党把独立师交给我们，我们绝不能把独立师葬送在这里！”

此刻李红光也在苦苦思索：是啊，这已是第三天了，战士们消耗太大，这样硬拼只能全军覆没，必须想办法突围出去。硬闯肯定不行，我们缺乏火力掩护，再说战士们经过二天的战斗也太疲劳，即使冲出去也不能甩掉敌人，怎么办呢？两个人一齐陷入了沉思。

天渐渐黑了，凶残的日伪军这时害怕在夜战中吃亏而停止了进攻。他们在密林周围燃起了一簇簇篝火，日伪军们用刺刀挑着抢来的鸡、鸭在火上烤着，吃着，夜风中不时传来鬼子的阵阵狂笑声。一轮明月在天空中升起，皎洁的月光映照着阵地前白皑皑的雪地和雪地上横七竖八的日伪军尸体。杨靖宇和李红光依旧趴在阵地前注视着敌人的动静，思考着突出重围的办法。忽然，两人眼睛一亮，目光不约而同地紧盯着阵地前敌人的尸体上。杨靖宇一双手由于激动而在雪地上拈来拈去，口中还喃喃自语：“鬼子，衣服……”听到这些，李红光也是心中一动。两人相视一笑，接着两人的手就紧握到了一起。杨靖宇兴奋地叫道：“对啊，怎么早没想到，咱们就来个瞒天过海。量他小鬼子也摸不着头脑。老

李，你不是会说日本话吗？咱们……”原来李红光虽只上过几年小学，但他学习刻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这在独立师是相当有名的。李红光听了杨靖宇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二人马上退回密林中，进行新的战斗部署。

经过侦查，杨靖宇决定把突破口放在敌人防守较弱的轱辘屯。接着他又命令战士们趁天黑摸到阵地前沿，拖回了四十几具日伪军的尸体，然后战士们把敌人的衣服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李红光也穿上一件呢子军服，肩佩大尉军衔。杨靖宇看着大家装束完毕，便低声命令：“全体集合！”唰……战士们迅速排好队伍，只见一个个日伪军装束，还真象回事。杨靖宇上前一步，严肃地进行战前动员：“同志们，你们这次行动关系着全师的生死存亡，你们要有胆有谋，不畏牺牲，争取不放一枪就消灭敌人，为全师突围开出一条路来。”“保证完成任务！”战士们低声但有力地回答道。杨靖宇又走到李红光面前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老李，千万多加小心。”李红光握住杨靖宇的手紧摇了几下，坚定地说：“放心吧，一定完成任务，老杨，你马上组织好队伍准备突围，等着我的好消息。”然后他转头发出命令：“出发！”，便带着队伍消失在夜幕之中。

轱辘屯座落在密林边缘，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在这里驻守着一个小队日本兵，把守着来往通路。夜半以后，鬼子兵一个个酒足饭饱，都跑到屋里睡觉去了。屯口燃着一堆篝火，一个日本兵抱着大枪，睡眼朦胧地来回游荡着。就在这时，从密林边上出现了一支队伍，黑暗中虽看不清模样，却听得脚步声“唰、唰、唰”十分整齐。昏昏欲睡的日本兵被脚步声惊醒，以为抗联偷袭，不禁浑身打了个冷颤，拉上枪栓转头一看，却见一队人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

来。鬼子兵一寻思：咦，怪了，什么人敢这么大胆？是抗联？不可能，那又是谁？正想着，这支队伍已快到近前了，鬼子哨兵慌忙端起枪来：“嘿，什么的干活？”队伍放慢了脚步，只见一人紧走几步，挥舞着指挥刀骂道：“八嘎，快叫你们长官出来回话！”鬼子兵一听，噢，自己人，听口气还来头不小，那还带敢怠慢，慌忙进屋向鬼子小队长报告。小队长一听也有些发懵，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赶忙命令鬼子起来集合，点燃火把，来到屯口。火光映照下，四十几个日伪军横列面前，最前面的是个大尉。那大尉双手拄着指挥刀，满脸怒气，嘴里不停叨咕着什么。鬼子中尉一看上司前来，哪敢疏忽，赶忙上前几步，“啪”地就是一个立正，正要开口说话，只见那大尉气哼哼地走过来不由分说啪啪就是几个嘴巴，厉声骂道：“八嘎！抗联统统的跑了，你们还在这里睡觉，死啦死啦的有！”说完不容鬼子张口，便挥起战刀砍了过去。这鬼子小队长不明不白地就被送回了老家。再看那些日本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都糊里糊涂地被缴了械。不用说，这四十多个日伪军，便是李红光和独立师战士们乔装改扮的。

解决了这一小队鬼子后，李红光马上派人到屯里侦察情况，又派两队战士埋伏在屯子两边，以备万一敌人发觉给予阻击。经过侦察，屯里确实没有敌人，李红光这才放心来，马上派人向杨靖宇发出了信号。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这支被敌人视为囊中之物的抗日队伍，没放一枪，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第二天天刚拂晓：日伪军便又向密林发起了进攻。一顿枪炮过后，他们没遇任何抵抗便冲进了抗联阵地。可这时再看，哪里还有独立师战士的影子，只有四十几具被扒掉军装

的日伪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雪地上。看到这些，气得鬼子军官七窍生烟，疯狂地挥舞着指挥刀嚎叫：“追，统统地给我追！”

可是，上哪追去呢？此时，我们英勇的独立师在杨靖宇、李红光的带领下，早已大踏步地向蒙江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战场去了。

郭景斗、王立新

烟筒山脚下的枪声

1933年端午节的夜晚，驻守在烟筒山镇的伪军警备十四团迫击炮连的军营里，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共产党员曹国安指挥哗变的伪军，击毙伪连、排长，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大道。

应征入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使300万东北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春，中共北平市地下党党员于德俊，受党组织的派遣，和同在北平求学的外甥宋占祥，先后回到家乡吉林，从事抗日工作。

身负重任的于德俊，装扮成失业的教员，只身来到榆树县开展抗日活动。不久，他在榆树新立屯弹棉花坊，结识了一位无职业的青年张瑞麟。于德俊时常到弹棉花坊同他谈天，宣传抗日主张，痛斥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天长日久，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于大哥”。

有一天，于德俊听说驻守乌拉街的伪军警备十四团迫击炮连正招募新兵，决定约张瑞麟一同去应征。可是，张瑞麟一听说要到伪军中当兵，立刻就火了：“那些伪军投降日寇，欺压百姓，咱们再没事干，也不能当汉奸兵，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张瑞麟哪里晓得于德俊当兵的真正目的，于德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张瑞麟更不理解地问：“您笑什么？”

“我笑你不明白咱们当兵的用意。咱们当兵不是为敌人卖命，而是为了抗日救国，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等待时机成熟，咱们从敌人内部下手，不是连人带

枪都有了？”

张瑞麟这才恍然大悟，但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于大哥，您有把握？”

于德俊见张瑞麟脑袋开了窍，就向他介绍了这个部队的伪军情况。“这部分伪军原是驻守在长春南岭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向日寇投降，曾经提出过抗日要求，只因力量单薄，被吉林的大汉奸熙洽收编，派他的外甥赵某某任连长，成为日寇镇压人民的帮凶，然而大多数的士兵却不甘心为日本人效劳，我们到伪军中去一定能把一些弟兄争取过来。”

“要是那样我们去当兵还是真值得。于大哥，我听你的，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一位同于德俊混熟了的农民曹国安，听说于德俊要去当兵，也要同他们结伙同去。于是，他们3人一起上路了。不料，在去乌拉街的途中，曹国安因患急症，突然身亡。于德俊望着这位朴实的农民潸然泪下。为永远怀念这位农民朋友，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曹国安。

发动士兵

1933年初，曹国安与张瑞麟顺利地打入迫击炮连，被分到一排和三排当兵。这个连对士兵管理不严，曹国安和张瑞麟几乎每天都能见面。

曹国安每和张瑞麟见面，就向他讲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的革命斗争。张瑞麟逐渐猜测到曹国安是共产党员，于是，张瑞麟向曹国安提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时曹国安既为朋友的进步感到欣慰，同时又勉励他说：“只要你做好工作，到时候党会来找你的。”

曹国安和张瑞麟所在排的排长都没有文化，曹国安经常代排长填填报表，写点东西，伪连长见曹国安字写得漂亮，就调他到连部当上士“贴写”（文书）。张瑞麟虽赶不上曹国安的文化高，但是一排也就属他了，因而也很受排长的器重。

1933年2月，伪十四团转移到吉林的“东大营”。这时曹国安和张瑞麟已经联络了部分士兵结拜成“盟兄弟”，使更多的士兵渐渐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一天早饭前，曹国安和张瑞麟约了十分要好的士兵来到松花江沿的一座龙王庙里，烧香磕头，结拜金兰。曹国安说：“我们兄弟今后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关头也绝不能出卖兄弟。”士兵们跪拜发誓，称兄道弟，十分亲密。按年龄排行，曹国安年岁最大，有文化，又有才干，弟兄们一致推举曹国安为“老大”。曹国安感谢弟兄们的信赖，接着对他们说：“如今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为挽救民族危亡，不当奴隶，不做牛马，弟兄们要携起手来，拧成一股绳，效仿文天祥、岳飞的榜样，卫国保家，抗击日寇侵略！”

一席话，说得弟兄们心里热乎乎的，各个摩拳擦掌。哗变伪军的发动工作在悄然进行着。曹国安心想，为了适应将来的抗日游击战，光有迫击炮不够，如果能有机枪配合，那该多好。于是曹国安决定回永吉，准备把外甥宋占祥找来，打入机枪连，协助他哗变伪军。宋占祥来了之后，因机枪连不招新兵，只好补充在迫击炮连里当兵。这样迫击炮连的三个排都有了自己的人。曹国安经常和大家按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碰头会面，交待任务，交换情况，研究对策。哗变伪军的计划在顺利的运筹之中。

1933年4月，伪十四团接到命令，到吉林南山里“讨伐”南满抗日游击队。出发前伪连长叫曹国安在省城留守，曹国安只好嘱咐宋占祥和张瑞麟，进山后要多做弟兄们的工作，如有机会在战场就地起义，不必等他。但是，一定要慎重行事，要尽可能和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配合行动。

伪十四团从吉林出发，到烟筒山车站下车进山。山路崎岖难行，士兵背着枪，扛着迫击炮、炮弹箱，头顶烈日，爬山越岭，累得筋疲力尽，怨声四起，都背地大骂伪连长。他们在山里奔波了10多天，连游击队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好草草收兵驻守在烟筒山。

碰巧，曹国安为护送伪连长的老婆也从吉林来到烟筒山。曹国安来到了伪军驻地，在了解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果断做出了在烟筒山哗变伪军的决定。一是利用士兵们的厌战情绪，二是烟筒山离游击队活动地区近，三是青纱帐长起来便于藏身。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机不可失，哗变伪军迫在眉睫。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哗变伪军取得胜利，曹国安趁五月初三下午士兵休息，约宋占祥和张瑞麟到驻地附近的小苗圃散步。

曹国安对张瑞麟说：“你要求入党的愿望实现了。”这时宋占祥从衣兜掏出一个小纸盒，打开一看，在盒底上用铅笔画着镰刀和铁锤的小党旗。曹国安把党旗工工整整地挂在树枝上。

“我和宋占祥介绍你参加中国共产党，现在举起右手，向党旗宣誓。”张瑞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曹国安和宋占祥都是共产党员。

晚上，曹国安召开第一次党小组会，详细地布置了端午节夜晚哗变伪军的计划，并确定了口号、口令、信号等。

哗变成功

1933年5月28日（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伪连长摆宴请客，连长、排长团团围坐，一庆佳节，二贺连长荣升少校团副，宴席上摆着大鱼大肉，酒香四溢。可是，士兵们仍旧是高粱米饭，菠菜汤连点肉星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不满情绪骤然而起，曹国安抓住这个机会，拿出钱来给士兵买些酒肉，并同士兵们共庆佳节。

正当宴会热闹进行的时候，突然值班长跑到伪连长旁低声说：“团座，我看曹国安可能要把队伍拉出去。”伪连长根本不相信，就凭憨厚的书呆子怎么会有那么大胆子。连长根本不相信，反而痛斥了值班班长真是“扫帚星，扫了他的酒兴”。值班班长被骂得狗血喷头，尴尬地溜走了。这时恰巧伪连长的传令兵也在席上，他借故出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曹国安。虽然伪连长没有在意，但是曹国安却感到应该认真对待。他迅速派了几名骨干士兵，以伺候客人为由，暗中监视连、排长们的行动。如有风吹草动，立即动手。

恭维、捧场的伪军排长们，从下午3点一直喝到夜幕降临，一个个酩酊大醉。按曹国安的安排，自备肉菜的士兵们，也已酒足饭饱，和衣而卧了。

初夏时节，暖风融融。到了夜深人静之际，曹国安吩咐骨干士兵，假装喝醉，鼾声大作，暗中却睁大双眼静听外边的动静。

刚过午夜，第五班开始换岗。曹国安看时间已到，命令宋占祥和张瑞麟立即行动。他们分头跑到排里高喊：“日本人缴械来啦——”喊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一些士兵闻讯

后也大声喊：“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啦！”士兵们边喊边云集在院子里。伪连长和两名排长也被惊醒，来到院子里，惊慌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啦？”曹国安坦然自若地凝视着他们。一个士兵回答说：“日本人来缴械啦！”伪连长酒意已醒，猛然意识到有人制造恐慌，可能要出事，便故作镇静地瞅了曹国安一眼，命令各班、排长马上到连部集合，其余人一律回去睡觉。

曹国安意识到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他果断地命令弟兄，“干掉他！”只听一声枪响，伪连长还没等反应过来，就应声倒下了。欲负隅顽抗的两名排长刚要掏枪，立即被当场击毙。顿时，士兵们欢声雀跃，纷纷摘下伪军的标志，举枪欢呼。曹国安立即集合队伍，作了简洁明快的讲话后，率领浩浩荡荡哗变的迫击炮连奔向抗日战场。

东方破晓，曹国安率领的哗变伪军80多人（60多支枪，一门迫击炮，17箱炮弹）出发了，于5月29日上午到达红军游击队根据地玻璃河套。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书记李东光、游击队总队长都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哗变迫击炮连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占祥任政委，张瑞麟任中队长。从此以后，这支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驰骋在松花江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6年12月2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师师长曹国安率二师100多人转战到长白县三道沟，在与数千名敌军激战中，被冷枪击中胸部。但是，他仍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后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壮烈殉国。解放后，一位抗联老战士怀着崇敬的心情，为曹国安将军纪念碑挥笔题诗：“朔

风怒号呈奇寒，千军万马布雪山，纵横南满挥军将，日寇敬畏曹国安。”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东北人民对烈士的敬仰与怀念。

刘建伟

“机灵”斗敌

说的是公元1933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修成不久的吉海铁路（吉林到海龙）成了日伪军运送兵员、军火的重要运输线。这条铁路有很长一段是在磐石抗日游击区内穿过。磐石县境内各车站和沿路各个道拨房（养路工房）都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反日工人会。铁路工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自己的组织，又有了广大抗日军民做后盾，抗日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他们往往在夜间行驶的火车厢上贴抗日标语，往车厢里撒传单，配合抗日游击队截火车、扒铁路，给游击队购运军需物品，掩护过往的党的地下工作者，遇机会也直接惩治敌人。这里单讲一段年轻的铁路工人“机灵”斗敌的故事。

机灵，名字叫刘晓刚，年纪只有18岁，是烟筒山车站25号道拨房的养路工人，反日工人会会员。他长得敦敦实实，浓眉大眼，聪明伶俐。在当养路工前他曾在车站当了几个月车厢连结员，挂车时车上车下地跳，轻巧又灵活，后因冒犯了顶头上司，被调来当养路工。晓刚虽然年轻，却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他处事机警、主意多，很得养路工们的信赖，每当工友们在一起商量个什么事儿，总爱听听他的意见。他的主意也确实高明，按他的办，准没错。于是，大家便送给他个绰号——机灵。

1933年5月的一天，伪军绿杠队一百多人要乘火车从烟筒山街去磐石整编，然后再开赴玻璃河套抗日根据地攻打磐石游击队。他们乘的是从吉林开来的一列客车后面加挂的一节闷罐车。他们要在下午1点从烟筒山车站上车。

那天上午，25号道拨房反日工人会书记、地下党员王检

获得了这一情报。为了破坏伪军的这次行动，他立即召集刘晓刚、孙连栋、李景山3名年轻的会员到树林里秘密开了个小会。

王检说：“下午的客车后面加挂一节货车厢，共有一连伪军。这队伪军为日本人效命，要去磐石装备好了再来对付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顺利到磐石，大家想想办法，看怎样惩治他们。”

话音刚落，孙连栋说：“我们可以赶在列车前头，把道轨拆掉一根。”

李景山说：“那样，整个列车上的人都要遭殃，车上多数是旅客，还有我们自己人，那怎么行！”

机灵刘晓刚在低头沉思，仿佛没听见他们二人的议论。王检此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过了一会儿，机灵慢慢抬起头来，有条有理地说出自己设想的办法。同伴们听了一致赞同，立即议定按机灵的主意办。

天过午，一列客车开进了烟筒山车站，后面果然挂了一节闷罐车。一队伪军在戒备森严的站台上登上了那节闷罐车。机灵假说要去海龙办事，向工头请了假，便乘上这列客车的最后那节车厢。

列车一声长鸣，象一条长蛇缓缓地爬出了烟筒山车站，向南驶去。机灵临窗眺望，家乡壮丽的山，秀美的水，辽阔的田野，茂密的树林，历历在目，令人心醉。他想：这大好山河怎能任日寇任意蹂躏！身为中国的子民怎能不为捍卫祖国驱逐贼寇出力！他恨不得一掌把后面那节闷罐车推翻，让那些打自己同胞的伪军见鬼去。

这时，列车行至明城、永宁两站之间的老爷岭北坡，喘

着粗气吃力地向上爬着。天上漂起蒙蒙细雨，空中好像挂了一张偌大的轻纱，观看数米之外的景物已是朦朦胧胧，不甚清晰。机灵不断地将头探出窗口向后张望，忽然，他透过雨雾隐约看到后面远处弯道上跟来一辆日军铁路警察队的巡道车（俗称摩托卡、压道驴子），这可是个最好的时机，可收到一箭双雕之功效。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想到这儿，他立即起身，装做上厕所出了车厢后门，熟练而迅速地把后面挂着的闷罐车摘了钩。然后飞身跳下车，躲进铁路旁的密林之中。

闷罐车借惯力向前滑行了不远，稍一停，便开始沿坡路向后下滑，越滑越快。远处跟上来的那个巡道车上的日本兵由于雨雾遮掩，一时没看清闷罐车是迎面往回滑来，仍然往前开，待发现迎面冲下来的闷罐车时已来不及后退。刹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两车撞到了一起。巡道小车哪能经得住猛冲下来的大车厢的撞出，一下子就被掀翻抛出了老远，十几个日本兵随着一阵惨叫便和车上的枪械、弹药一起飞了出去，象天女撒花一般扬了一大片。鬼子兵被摔的摔、碰的碰、砸的砸，无一活命。

载着伪军的闷罐车经过碰撞，也歪倒在路旁的护坡上。伪军们乱叫着争先恐后地持枪钻出了车厢。见是撞翻了日本人的巡道车，没有发现其他情况，这才惊魂稍得安定。领头的伪军连长李青山见到日本兵的惨状，而自己也有不少弟兄受了伤，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想，日本人抓不到肇事者，要是再回到他们那里去，恐怕连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了，于是，他和几个头目一核计，便让弟兄们把巡道车上洒落下来的大批枪枝弹药尽数收起，搀着伤员进入了密林。

躲在路旁窥视的机灵看到两车相撞、十几个日本鬼子血

肉横飞，真是心中大快。看到那批军火被伪军拿走，不禁想道：他们人地生疏，既不敢再去见日本主子，又怕碰上红军，必然象无头的苍蝇一样乱撞。此地距离玻璃河套红军抗日根据地不到 20 里山路，何不去告诉游击队来收编他们。于是，他便不顾疲劳，穿山越岭，直奔玻璃河套。

红军游击队领导听了机灵的报告，立即派出两名精干的游击队员和 1 名军医，由机灵带路去老爷岭北一带山林里寻找从火车上下来的那队伪军。4 人走了两个小时左右，便发现那伙人正在一个山沟里生火作饭。机灵让三位游击队员先在山坡上的树林里等候，自己一个人向那伙人走去。

到了近前，他大声说道：“我要见你们的领头人，有事奉告！”

连长李青山见是一个徒手的小伙子找他，便凑上前说：“有什么事情你说。”

机灵说：“我是这段铁路上的巡道工，看见你们乘的闷罐车撞翻了日本人的巡道车，砸死了日本人，碰伤了不少弟兄，猜想你们一定有困难。我对这一带情况较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李青山心想，在这人地生疏的旷野中找个领道的也好。于是他说：“小兄弟，你能帮我们什么忙呢？”

机灵假装想了想说：“你们要到日本人那里去吗？”

一句话触到李青山的痛处，他长叹一口气，无精打彩地说：“你看我们还能去吗？撞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又找不到肇事者，日本人会轻饶我吗？”

从话语中机灵已经摸到李青山的脉搏。为了稳妥，机灵又试探地说：“此地离红军游击队根据地不远，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恐怕碰上他们也不好办哪？”

李青山已经是六神无主了，也用试探的口气说：“小兄弟，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机灵看着李青山垂头丧气的样子，立即精神一振说：“我帮你们找一条生路，不知道你们同意不？”

李青山闻听此言，便十分客气地说：“小兄弟，请你说说看。”

机灵接着说：“红军游击队主张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对付日本人，象你们这样的队伍，他们一定会很愿意和你们合作的。”

李青山想，早听说这一带红军势力很大，如今又无处可投，莫不如暂时和红军合作，也免得和他们发生冲突。他和身边的头目商量了一下，便问：“怎么联系？”

机灵说：“他们的代表就在那边山坡上，还来了军医要为撞伤的弟兄们疗伤。”

随后，杨灵便喊话，让山坡上的3名游击队员下来。

3名游击队员来到后，表明了游击队愿和他们团结合作的态度，并代表游击队领导邀请他们到根据地去，同时军医立即开始给他们的伤员疗伤。这时队伍中多数民族意识尚未泯灭的士兵，也叫嚷着表示愿意随长官投靠游击队。这就迫使李连长做出了去抗日根据地的决定。

这支队伍在几名游击队员和机灵的引导下来到玻璃河套抗日根据地，受到热情的欢迎。后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团结战斗，跟随杨靖宇将军转战在南满的抗日战场上。

机灵刘晓刚再没有回到烟筒山车站道拨房，也参加了红军抗日游击队。他作战机智勇敢，立了不少战功，两年后便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担任连长。1936年秋，刘晓刚在一次对日寇作战中壮烈殉国。

官天祐

地窝棚里的战斗

年轻的小战士朴春日，看着坐在一旁的团副官郑仁洙两手正卷着旱烟，真有些着急了。他用手分开前面没人深的茅草，探出头看了看相距百十多米远的地窝棚，还是不见一个人影，回过头来转动着两只大眼睛说：“郑副官，情况是不是有变化呀，按约定时间，他们早该来了。”

副官郑仁洙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先别急，再等一会儿看看，情况随时都会有变化的，我们要细心观察动静。”

朴春日这个小战士，平时最崇敬团副官郑仁洙。因为他在抗联二军四师一团是个多次立过战功的英雄，什么带抗联小分队袭击日军据点啦，伏击歼敌 100 多啦，搞得这一带的鬼子一听郑仁洙的名字都惧怕几分。还有什么孤身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呀，烟集岗集团部落袭击战等等，他的故事可多了。一有时间，朴春日就跟在郑仁洙身后，要他给讲战斗故事。

郑副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激励着朴春日。就拿那次夜闯大商人南君弼家为抗联队伍筹集军费来说吧，那真是干的干净利索。

1934 年深秋的一天，郑仁洙接到为抗联游击队筹集军需物资的任务。抗联游击队人数天天增加，军资需要也越来越多，到哪里去筹集呢？到群众那里去，大家的生活也够困难啦，不能再去扯累他们。他心里一转念，有了主意，龙井市有个大奸商南君弼，家里可有钱了，为什么不叫他出力呢？于是郑仁洙化妆成一位商人，脸上架着一付漆黑的墨镜，又带上队员小李作助手，坐上一台人力车，打着汉城满鲜谷物贸

易株式会社社长的旗号来到南君弼家。等与南君弼商谈妥粮谷交易事宜后，天色已晚，就宿在南家。南君弼心里非常高兴，他想，能与汉城满鲜谷物贸易株式会社做上生意，赚大钱的机会可就来了。因此他把郑仁洙和小李当作贵宾贵客接待，那丰盛的晚餐就不用说了。半夜时分，夜深人静，郑仁洙和小李轻轻地起身，一声不响地摸进南君弼的卧室，用手枪对准南君弼的胸口：“我们是抗联游击队，是为抗联筹集军资来的，你放明白些，赶快打开金库拿钱！”

南君弼整夜都在作发财的美梦，哪里能想到两位客人是下山的游击队。他知道来者不善，吓得魂不附体，哆哆嗦嗦地叫来家人，打开储钱柜，拿出十万日元，连夜把郑仁洙和小李打发走了。

这回郑仁洙所在部队一团转战到蛟河境内，正逢日军秋季大讨伐，一团新来咋到，人地两生。头几天在大青背黑瞎子沟里夜袭了一个日军讨伐队，将一百多名鬼子全给包扎了，可是游击队里也有一些人受了伤。轻伤员都跟着游击队转移去了桦甸，特留下郑仁洙等八名同志，任务是把重伤员朴正哲、李春玉等护送到青背撮草顶子抗联密营师部医院治疗，然后再去筹集粮食和物资，准备过冬。

当郑仁洙把重伤员送到师部医院，已是中秋节前夕，医院里留守人员吃的眼瞅着快断顿了。于是他们八个人分成了四伙，到各处去筹集军资，捎带弄点节日用的食品。郑仁洙和朴春日前天来到这个地窝棚，正好见到了安万中、徐成朱等三人在收割水稻，一打听才知道，这块稻子地是地主崔永万家的。崔永万在蛟河街内是个有名的大地主，他在街里仗着有钱有势，横行霸道，和警察署里的人也打得火热。安万中等四人，是崔永万家的伙计，可能是吃谁向着谁，他们也

成了崔家对外的打手。郑仁洙当时就叫安万中给崔永万捎信，让崔永万给抗联筹集棉布、胶鞋等物资以及过中秋节用的食品。按约定时间，今天天一放亮来到地窝棚里交货……。

安万中等四人收工回到家里，立即把在地窝棚里见到抗联人员的经过报告给了主子崔永万。地主崔永万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高兴，一改往日面孔，眉开眼笑地说：“好，咱们发财的机会到了，警察署有规定，谁抓住一个抗联，不但能得到一笔赏金，还要晋升官职，然后免费去日本东京观光一次。”他见几个打手听得入神，接着又说：“我姓崔的若是得到了好处，也忘不了你们在座的几位，但是，你们要听从我的安排。”

地主崔永万真地按着副官郑仁洙的要求办了，除了买上布匹、胶鞋和中秋月饼、水果等食品外，还备上一桌酒席，并指定他们几个人按原定时间、地点去交货。崔永万安排好以后，转身到警察署报告了抗联队伍里的人下山要东西的经过以及他的安排。警察署副署长间岛一郎得到这一消息，凑到崔永万近前，一手伸出大拇指，一手拍着崔永万的肩膀说：“你的，大大的好人，赏钱多多的给你！”

然后间岛一郎立即调动日本关东军驻蛟河守备队和警察100多人，集中待命，准备围剿郑仁洙。

再说在树丛里等得不耐烦的朴春日，这时又一次拨开茅草丛，望望地窝棚那边，马上高兴地说：“他们来了！”

郑仁洙从树空儿里望着升起一丈多高的太阳，又看了看从地边走向窝棚的人，有些不解地说：“约定的时间已过去两个多小时，怎么才送来呢？再说，前天来的是三个人，今天怎么多来了一个？”

两个人仔细地观察一下来人，走在最前边的大个子正是安万中，他用背夹子背着东西。后边跟着的人，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拎着包袱，慢慢走近地窝棚。

郑仁洙想：“不管怎么样，也得出面去接货。”于是两个人整理一下随身武器，一前一后奔向地窝棚。

安万中老远见郑仁洙走出树丛，心里十分高兴，抗联的人上勾了。他急忙撂下肩上的夹子，热情地把郑仁洙让到地窝棚里，并指着地上放着的東西说：“你要的东西，东家都给买了，还给你们二人准备了点酒菜，请二位享用吧！”

郑仁洙扫视了一下窝棚周围的树林子，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心想：“反正东西拿来了，顺便再吃点饭也可以。”他便把朴春日安排在窝棚外面一棵树下放哨。

郑仁洙坐在地中央，那四个人也围坐了下来。他们纷纷给郑仁洙敬酒夹菜，边吃边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话。这时郑仁洙发觉，围着的四个人一个个鬼头鬼脑，不时的东张西望，他意识到情况有变。

原来这四个人在蛟河出发时，坐的小运转火车晚点了，他们没有和间岛一郎联系上。安万中到了窝棚，仍不见日军守备队和警察到来，心里有些慌了，唯恐郑仁洙识破他们的奸计跑掉，因此，四个人争着给郑仁洙斟酒夹菜。郑仁洙几盅酒下肚，准备叫朴春日也进来吃上几口。就在这时安万中一个高儿从地上跳起来喊道：“动手，别叫他跑了！”那个叫徐成朱的人一步抢上前，死死地抱住了郑仁洙的腰，另一个人忙上去夺郑仁洙的手枪。朴春日听到窝棚里有动静，又见一个人向他扑过来，知道坏事了，身强力壮的朴春日，忙向扑来的人飞出一脚，正踹到哪个人的小肚子上，他“哎哟”一声倒在地上。

朴春日刚想冲进地窝棚，郑仁洙的手枪响了，抱腰的那个人脑袋开了花。郑仁洙虽然撂倒了一个，可他的身上也被安万中砍了几镰刀，鲜血流了出来，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这时他忙对外面的朴春日喊：“小朴，你快撤走！”

朴春日本想冲进窝棚，可再一看，一群日本守备队和警察从后面包围上来，他急忙闪身，滚下山崖钻进了树丛。地窝棚被鬼子守备队团团围住，郑仁洙寡不敌众，不幸壮烈牺牲，当时年仅三十九岁。

王凤阁

双胜夜擒慕保长

老双胜祁永全是活动在蛟河、桦甸、敦化一带有名的抗日山林队首领。自1934年他参加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南满抗日联合军，任“双胜支队”长以来，率部坚持战斗在抗日救国的前线，打了许多胜仗，最后，于1940年1月在同日伪军的遭遇战中牺牲在蛟河境内的棺材顶子山上。

1939年，东北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双胜支队在深山的密营全被敌人破坏，加之日寇实行“归户并屯”、制造无人区的策略，抗日联军失去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支援，处境非常困难。日本鬼子在山区加紧讨伐，双胜支队不得不经常转移驻地，同敌人周旋。他们白天行军打仗，夜间露宿山林，给养无来源，部队常断炊，队伍减员越来越多。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双胜不气馁，也不低头，继续同日本鬼子斗。

祁永全早就听说蛟河县慕家崴子有个汉奸保长叫慕成功，有钱有势，仗恃日本鬼子撑腰，更是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因其当汉奸有功，甚得日本人欢心，特赏赐他到日本观光，好不风流。

这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有人向双胜报告说，慕成功从日本回来了，正准备宴请大大小小的汉奸。双胜立即想好了夜袭慕家崴子，活捉慕保长的作战方案，一来煞煞这个卖祖求荣的汉奸的威风，二来搜缴他的不义之财，为抗日军筹集给养。

当年祁永全已经61岁了，他治军很严，落草为“寇”30多年，从未袭扰过平民百姓。蛟河、桦甸一带山区群众都亲切地称他“双胜大爷”或“老双胜”。他非常熟悉蛟河县

漂河川、大青背的山山岭岭、村屯部落。第二天深夜，老双胜带领队伍穿越山林，绕过村庄，来到慕家崴子，突然包围了慕家大院。慕成功正做着升官纳妾、招财进宝的美梦，双胜支队战士的枪口已顶住他的脑门，从被窝里把他拉出来，连同他的三个儿子，五花大绑捆个结结实实。双胜支队管粮的军需官搜查了慕家钱柜，收集了一些粮食，押着俘虏迅速撤离了慕家崴子，进了后山。走出三里多地，老双胜叫队伍停下来，命令做好警戒。他从腰间解下用虎腿皮做的烟荷包，满满地装上一袋旱烟，用火石打着了火茸绳，点着了烟袋，猛的吸了一口，来到慕成功跟前。老汉奸搭拉着脑袋，浑身哆嗦着直筛糠。他抬头见老双胜站在眼前，吓得一屁股蹲坐在地上。老双胜用烟袋锅点着他的脑门，叫他站起来，他双腿抖的更加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就势跪在了地上。

双胜厉声问：“慕成功，你知罪吗？”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老汉奸诺诺连声的认罪，还不住地屁股朝天、头朝下的叩头，一扫平时的威风。他以为老双胜要就地枪毙他，讨饶说：“双胜大爷，我慕某不是人，大人不见小人怪，你老原谅我这次，今后一定痛改前非，再不替日本人办事，做个良民百姓。”

双胜不愿听他罗嗦打断他的话说：“慕成功，你把祖宗都忘了，当汉奸做恶多端，一点中国人的味都没了，还想当什么良民百姓？”

老汉奸听到这里，吓得魂飞魄散，瘫倒在地，喊叫着“双胜大爷饶命，饶命……”

老双胜制止说：“你不要干嚎了，我们抗联支队虽说有政策，一般不杀俘虏，但对你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例外。不

过今天暂不杀你，给你个赎罪的机会。现在放你回去，给我们筹集给养钱款。你要耍花招，下次逮着你算总帐。你别忘记了，我们手里还有你3个宝贝儿子，什么时候照数送到钱粮，什么时候放你儿子回去。”

慕成功听说放他回去猛地一愣，接着又跪地叩头，感谢双胜不杀之恩，还起誓说：“照双胜大爷的吩咐办，决不翻悔。”

老双胜大喝一声“滚！”即率队押着3个俘虏回山了。双胜支队等了几天，一不见慕成功托人说情，交纳钱粮，二不见日伪军讨伐报复。老双胜知道是慕成功狡诈谎言，翻悔不认帐了，马上带领部队转移到深山。

那天晚上，老汉奸摸黑从山路上跌跌撞撞滚尿流地跑回家里，压根不讲是双胜放他回来准备赎票①的事，一劲地吹嘘他是如何老练，挣脱绑绳，跳进深沟逃跑回来的。

慕成功真的死心蹋地当汉奸，与抗日军为敌到底，连亲骨肉儿子都不要了吗？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对他老婆、儿媳们也没说实话？没说。为什么？他怕照实说了，走漏了风声，县里上上下下汉奸官吏们知道真情，谁还能瞧得起他“慕保长”？日本人还能信任他吗？尽管老婆、儿媳们哭喊着、闹腾半宿让他想办法弄钱“赎人”，他也没答应。凡是反动透顶、利欲熏心的人，恐怕骨髓里流的也都是坏水，那能顾得父子亲情呢！老汉奸宁可亲儿子不要，断子绝孙，也要与人民为敌到底。

第二天，慕成功就跑到伪警察署、日本宪兵队吹牛邀功去了。老汉奸隐瞒真象这招挺灵，果然得到日本主子的夸奖。

“慕桑②，你的大大的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吡着金

牙，伸出大拇指。受宠若惊的慕成功，围着鬼子点头哈腰，活像讨主子欢心的哈巴狗在摇尾乞怜。

双胜支队虽然没有得到慕成功的赎款，但是从他家带走的粮食、钱款也维持一阵子，当然慕家的3个犬子也没有释放，由专人看管随队伍钻进了山沟。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一次反讨伐的混战中，慕成功两个儿子被乱枪击毙，只有他的大儿子慕恩荣乘机挣脱逃跑，捡了条活命。

注：①旧社会“胡子”（土匪）抓人，叫“绑票”。家里人用钱把人换回来，叫“赎票”，如果“胡子”把抓的人杀了，叫“撕票”。

②慕桑：日语，桑当“君”讲，类似汉语“老张”、“老李”的意思。

徐庆林

借灯桥的故事

在桦甸市老金厂乡头道岔通往老牛沟去的山间小路上，有一个离奇的地名“借灯桥”。

1945年以前这里确实有一座简易小桥，那是人们为了行走山路方便，在两座山崖之间横上几根木头临时搭起的便桥。

1934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老牛沟金矿以后，为了掠夺黄金，派来大批矿警队，其中有一个叫山田的警佐最坏。这家伙高兴的时候，拿鞭子打劳工开心，忧愁的时候，拿鞭子打劳工解闷儿。这个坏家伙还经常趁夜间带上几个日本鬼子来往于头道岔和老牛沟之间巡逻。劳工们都恨透了他，矿（劳）工们一起琢磨，终于想出一个惩治巡逻队的办法，让日本鬼子再也不敢来这一带巡逻。

一天夜里，天阴得伸手不见五指，山田和他带的一队鬼子兵在矿上窑子（妓院）里寻欢作乐之后，一个个手拎着嘎斯灯（电石灯）巡逻过来。当他们走到两山之间那座简易小桥上的时候，突然前边树荫里跳跃着出现了一排又高又大的“无头鬼”。无头鬼们身穿黑袍，上无脑袋，只在脖领上披散着长长的黑发，在灯光下跳着，如雷般吼道：“借灯来，找脑袋！借灯来，找脑袋！”

看那无头鬼怀中一明一灭的鬼火，再听那震耳欲聋的吼声，当时就有几个鬼子，双脚一瘫，掉下山涧，一阵叮当乱响，摔成了一摊摊肉泥。其余的日本鬼子连滚带爬掉头往回走，刚刚摸到桥头，没想到，迎面又窜出几个“无头鬼”，和对面的一应声儿喊道：“借灯来，找脑袋！”

别看山田平时穷凶极恶，耀武扬威，此刻却被吓得屙了一裤兜子屎，横趴在桥上跟死了一样。

不一会儿，远处一声鸡啼，桥两头又高又大的“无头鬼”呼啦一下不见了。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直趴到天大亮才敢动弹。不过，山田被抬回矿警队以后，便神智昏迷，口中常常大喊“鬼、鬼”，没几天，便一命呜呼了。

从那以后，侥幸活下来的日本鬼子，一听说那座小桥，便都一个个心惊肉跳，并添油加醋地说那几头鬼如何高大可怕，弄得别的鬼子也谈鬼色变，再也不敢夜里来这里了。

从此，那座简易小桥便得了个“借灯桥”的名字。现在，这里虽然已修上了公路，桥也不存在了，但这“借灯桥”的名字却一直流传着。

刘忠

老双胜痛击日伪军

参加抗日联合军

1934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临江县三岔子密营过了春节之后，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将军决定召开一次抗日军联席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进一步扩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巩固长白山区抗日根据地，开创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独立师以师长杨靖宇的名义发出邀请信。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补充旅旅长的祁永全（老双胜）接到邀请信后，即率部奔赴临江三岔子抗联密营。除独立师外，共有17支抗日军、山林队首领参加了从2月21日开始的联席军事会议。经过6天的协商、讨论，一致同意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通过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和赏罚条例。会上，大家一致推选独立师师长杨靖宇为抗日联合军总指挥，将参加会议的抗日军整编成8个支队，老双胜祁永全的部队被编为第五支队，也称双胜支队，祁永全任支队长。从此，老双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正式参加抗日联合军。

祁永全是一位贫苦家庭出身的抗日志士，从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到举旗抗日的救国军旅长，奋斗了20多年，到1934年56岁的时候，才找到了救国济民的出路。他仰慕杨靖宇大名已久，敬佩杨司令的人品、骨气和才华，也经常听到杨司令率兵巧设埋伏、严惩日伪军的胜利捷报。这次同杨司令一起开会，平起平坐，共同商讨抗日救国的大计，欣慰此生没有虚度。会上，祁永全听杨司令精辟、透彻地分析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指出各路抗日救国军为什么失败、溃

散，人民革命军为什么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关键是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人民革命军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充分相信群众全力依靠群众，因此，越战越强。祁永全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道理，胸中似开了两扇门，心中赞叹：“还是共产党站的高，看得远，中国有希望了。”杨靖宇，像块巨大的磁石，把各立山头、一盘散沙似的山林队，凝聚成一支抗日大军，更使老双胜心悦诚服。多年孤立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心才能齐，拧成一股绳，力量才能大，我祁永全才能有个好归宿。

散会离去的时候，祁永全表示，“坚决抗日到底，决不叛变投敌。”从此，祁永全率领抗日联合军第五支队，经常配合独立师和其他抗日军作战，驰骋在长白山麓，战斗在莽莽林海和皑皑雪原之中。

巧设埋伏歼敌制胜

1935年10月23日，双胜支队驻守在漂河头道沟秦培显的老房场。日军坂田、管原讨伐队从大青背向漂河川进发，欲偷袭双胜支队。当日军到达头道沟岭岗时，被群众发现，立即报告了老双胜。祁永全立即把队伍部署在地形有利的树林里埋伏起来，准备迎击侵略者。敌尖兵刚一露头，就被路旁的战士用枪托打倒，刺死。日军后续部队没有发觉，仍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前进。待日军全部进入埋伏圈后，双胜举枪发出信号，战士们们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一齐射入敌群，当即死伤10余名敌人，鬼子兵受到突然袭击，调转头顺来路夺命而逃。

1935年12月，大雪封山以后，日伪军发动冬季大讨伐，双胜支队也被敌人咬上了。祁永全运用游击战术，牵着敌军忽东忽西，满山遍野地转。一天，老双胜带队到了平顶

山伐木场，在林业工人掩护下，埋伏起来。被拖得精疲力尽的敌人赶到伏击区，双胜支队突然一齐开火，打死日伪军10余人，打伤多人，老双胜乘胜率队转移到安全地带休息。

夜袭敌营鬼子归天

1936年7月，老双胜从伪军内部得到情报，日伪军有14辆大车从蛟河往漂河运送给养。祁永全派人报告了在附近活动的抗日联军二军一师崔（贤）团，双胜支队与崔团紧密配合，在大青背以南的路两侧密林里布下口袋阵。敌军给养大车一到，顿时伏兵四起，战士们神兵天降般齐刷刷端枪站到大路两侧。押车的伪警察和自卫团丁个个吓得跪地求饶。抗联战士没费一枪一弹，14辆大车和军需物资悉数成了抗日联军的战利品。驻蛟河的日伪军头目得知给养被劫，气得七窍生烟，噢噢直叫，冲着下属发火。派兵封锁山路。蛟河日本守备队出动30多人，由一名少佐、一名大尉督战，进山追剿。敌军在大青背的山林里钻来钻去，连抗联的一点影子和踪迹也未找到。7月盛夏，骄阳似火。累得疲惫不堪、狗熊似的日军守备队到了罗圈崴子就迈不动腿，再也不想走下去了，太阳还未落山，就搭起帐篷，就地宿营。

双胜支队负责监视日军行动的游动哨见敌人钻进罗圈崴子再未出来，知道敌军已经宿营，赶忙回去向双胜报告。半夜里，老双胜率领抗联支队的勇士们，紧紧包围了日军的几座帐篷，一阵机枪、手榴弹，将这支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报销了。日军少佐不知正做着什么美梦，就带着30多个罪恶的鬼魂回老家去了。抗联战士趁着烧帐篷的火光清点战果，共缴获机枪两挺，小钢炮两门，步手枪20多支和部分弹药。

老双胜夜袭日军守备队的消息，成为漂河川家喻户晓的

最大新闻。

夜闯清原城

罗圈崴子歼灭战后，双胜支队从蛟河、桦甸转移到辉南县境，与南满第二游击大队（臣军）配合，在大吊鹿沟同日军松木小队和伪骑兵连打了一仗，后又到清原县境惩治了一些汉奸地主，筹集了些给养。可到了年关，双胜支队的年货还没有着落。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老双胜带一名贴身警卫，装扮成办年货的农民，混入清原县城。白天转游一圈，选准了目标。晚上吃饱喝足，到了更深夜静的时候，二人来到清原县最大的商号兼烧锅“谦聚海”，找老板化缘。店伙计把老板找来后，老双胜从腰间拔出双枪往柜台上一放，说：“要过年了，我的弟兄们还没有‘嚼咕’，特来贵店赊点年货，用这家伙抵押。”

旧社会的买卖人脑瓜灵便，凡是带枪的人要赊货物，都是生打硬要的手把，哪敢怠慢，要什么抵押物，更何况是匣枪。谦聚海掌柜见双胜的架式和膀大腰圆的随从手中紧握的匣枪，一不敢拒绝说个“不”字，二不敢声张，生怕脑袋搬家，乖乖地拱手照办了。

掌柜说：“你老抗日劳苦功高，本应孝敬。兄弟我也是中国人，献上些小薄礼也算我支持抗日军的一片诚心。”

老双胜说：“早知掌柜这样爽快，我也不该失礼。”说完把双枪插入腰间，“不过，帮人要帮到底，还要烦劳大驾，把东西送出城去。”

这下子把掌柜的吓坏了。他心想：“舍点钱物不要紧，以后还可赚回来，要搭上性命可大不上算。”

老双胜见他满脸恐惧、紧张神色，马上解释说：“你不

要误会，既然献了年货，就够义气，我们不再绑你票了。我们担心出城遇到麻烦，你地面上熟，站班的哨兵谁敢拦你老板的大驾呀。只要把我们送出城，你就可以回来，保证过个太平年。”

老双胜是干什么的？他智勇双全，计谋高人一等。他怕前脚走了，你老板后脚到日本人那儿去报信，不仅年货保不住，说不定还有人身危险。让你老板护送出城，就解除了后顾之忧。

他们把上等粳米白面，猪、牛、羊肉，鸡、鱼和蔬菜，满满装了一爬犁，由商号老板护送着出了清原城。

营地的战士们见一爬犁拉回这么多年货，那高兴劲就别提了。老双胜笑着对大伙说：“弟兄们，今儿个咱好好过个年，吃得饱饱的，日后好好教训那些东洋鬼子！”

“那还用您说，咱早就憋足劲了！”战士们齐声应着，笑声洒满了营地的各个角落。

徐放

山里红的故事

在吉林省磐石县城西北 40 里的三棚乡，有座红石砬子山。此山沟叉交错，峰岭相连，丛林茂密，地势险峻。抗日战争时期，我南满游击队就经常驻扎、活动在这里。当时，游击队里有一位朝鲜女战士，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游击队里的同志都称她“侦察英雄”；在敌占区，她叫刘艳华；而在根据地的群众中，她又说自己姓洪，从山里来，久而久之，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山里红”。她在执行任务时经常穿一身红衣裤，打鬼子、除汉奸，机智勇敢，每到百姓遭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她的身影，因此，又有好多人称她“红石女侠”。直到今天，当地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山里红或红石女侠的神奇故事。

乔装改扮救乡亲

夏天，雨后初晴，阳光明媚，山里红穿着一身红绸衣裤，脚上白袜子黑皮鞋，手里提着一个白地红花麻布提兜从山上下来去县城执行任务。由于任务紧急，山里红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路。当她走出一片小树林，翻过一个光秃秃的小漫岗时，突然发现岗下散居的四户农民的房子周围有二十多个日伪军，正逼着四户农民并屯，强迫他们搬到集团部落去，并将两个年轻姑娘绑了起来准备带到县城去。山里红看清了敌人，敌人也看见了山里红，双方只相距 20 多米远，躲？肯定来不及了。山里红稍镇定一下，便沉着地走了过去。

鬼子小队长正挥舞着战刀嚎叫，一转头忽然发现一位天仙般的美女向他走来，不禁呆住了。只见来人中等身材，体形姣美，白白的面皮，水汪汪的眼睛，瓜子儿脸，高鼻

梁，一头乌黑的学生式短发，打扮得不俗不媚。鬼子小队长不转眼珠地盯着她，身边的日伪军个个也都成了木雕泥塑。正当他们看得发呆的时候，忽听一声怒斥：“放开他们！”日伪军这才有些醒过腔来，忙端起枪，冲着山里红颠三倒四地问：“喂，你……说什么？你，什么地干活？”山里红把头一扬，满不在乎说：“我叫你们放人，听明白没有？”鬼子小队长把刀一挥：“巴嘎，你的什么的干活？”“怎么，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好，我让你们看看这个。”山里红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来，上面印着“张景惠”三个金字。日伪军小队长一看是伪国务总理的名片，心想来头不小，马上来了个立正，然后客气地问：“小姐，你的总理的什么人？”山里红一听，心中有了底，看来这个名片还挺管用，便端起架子，把眼皮一耷拉，爱理不理地说：“我嘛，是总理的侄女。”伪军们听了都吃惊地伸了伸舌头，可那鬼子小队长脑门转了几圈儿觉得不对劲：总理的侄女，独身一人到这荒山野岭来干什么，莫非……想到这儿便接着说：“小姐，你的不在新京（即长春），来这里什么的干活？”“探亲。”“什么亲戚？”这家伙还是紧追不舍。“怎么，我看你是管得太宽了！”山里红脸色一沉，用手指着两个被绑的姑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告诉你，她们就是我的表妹，你们马上给我放人！”鬼子小队长心中的怀疑并未消除，现在听山里红让他放人，觉得这事挺难办：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她真是总理的侄女，我要不放人一定会有麻烦；可要是放了人，而她是个冒充的，我可怎么向上司交待？哎，有了，我只要跟住你就行，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想到这儿，他便一挥手：“统统地放开！”

山里红见人已放开，便对那两个姑娘说：“大妹、二妹你们先回去，我还要进城办事去！”说完他又对日军小队长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车呀？”鬼子忙问：“小姐，用车干什么？”“我要到县城去找井坪联队长办事。”日军小队长一听，正合心意，忙应道：“小姐，车的没有，马的有一匹，小姐骑马可以？”山里红一笑，“好吧，咱们这就走。”小队长把手一挥，命令伪军把马牵过来。那伪军牵过马来恭恭敬敬地一哈腰：“小姐，请上马”。山里红翻身上马，正要策马前行，鬼子小队长忙拦住道：“小姐，这里道路不好，我的给你带路。”说完一使眼色，命令一个鬼子到马前拉住了缰绳。原来这家伙一直不放心这个“总理侄女”，所以才派人去牵马以防止山里红跑掉。山里红早看穿了敌人的鬼把戏，心中一笑，顺手把缰绳扔给了鬼子。一行人摇摇摆摆向磐石县城走去。

转眼间已走出了六七里路，人马来到了马鬃岭。大家正待往岭上走，忽听山里红“哎呀”一声，众人一看，原来她提在手里的提兜掉在了地上。“请给我拣起来！”牵马的日军忙低头去拣提兜，后面的日伪军也把目光集中在提兜上。就在这时，只见山里红双腿用力一夹，那匹马忽地挣脱缰绳冲了出去，山里红伸手从腰间抽出双枪，冲着敌人就是一梭子，把20多个日伪军打得晕头转向，呼啦啦跌倒一地。趁此机会，山里红策马冲进了密林中。日伪军刚才吓得只顾保命，待听得马蹄声远，才想起开枪射击，可哪里还有山里红的影子！鬼子小队长恼羞成怒：“巴嘎，统统地追！”20多个日伪军一窝蜂似地冲进密林。可是他们再也找不到山里红的踪迹，密林中只是不时回荡着鬼子小队长杀猪一样的嚎叫声。

深入虎穴杀井坪

抗日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气得鬼子屡次进山讨伐，却收获甚微。于是鬼子想出一条诡计，在讨伐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强迫百姓迁入集团部落，把百姓散居的住房统统烧掉，妄图以此切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日伪军强迫百姓迁居时，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处搜罗漂亮的花姑娘。原来县城的井坪联队长最近死了老婆，这些日伪军一直想找个花姑娘送给井坪，借以讨好献媚。

这一天，酒井中队长带着一队鬼子兵到红石山下，相中了村里的三个农村姑娘，酒井以为邀功请赏的机会到了，忙命令鬼子把三个姑娘抓走。她们的亲人那能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送进虎口，一个个泼了命地与鬼子搏斗，杀人不眨眼的酒井恼羞成怒，命令鬼子开枪，立时七、八口人倒在血泊之中。看着在鬼子手中无助挣扎的姑娘，听着她们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呼喊，酒井摸着八字胡发出一阵狂笑。

正当这时，忽听有人怒斥一声“放开她们！”酒井等被这喊声吓了一跳，转过头来，却见一位姑娘不慌不忙地从山坡上走下来。这群鬼子以为是游击队，都把枪端了起来，酒井也忙把指挥刀抓在手中，待见这位女子手无寸铁，方才松了一口气。只见这姑娘二十出头，个子匀称，瓜子儿脸，高鼻梁，细长的眉毛下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脑后梳着一条乌黑的长辫。身上穿着高领红绸衣和红绸裤，脚踏一双红布鞋。嗨，这相貌，这打扮，在周围青山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漂亮。这女子一步步走过来，快到近前了，酒井才忙一挥战刀：“你的，快快地站住！什么的干活？”那女子并不慌张，双手叉腰在鬼子面前一站：“不认识吗？我就是抗日游

击队的红石女侠。”一听这话，这群鬼子都慌了神，忙四下观瞧，生怕遇到游击队的伏击。待看清四周没有动静，酒井这才定下神来，“红石女侠，土匪的干活，统统的死啦死啦的有！”说着举起了战刀。可红石女侠并不在乎：“哼！怕死就不来了。听着，你们赶快给我放人！”酒井一听：“放人，放人给井坪队长送什么？”他又一打量红石女侠：哟嘻，这个姑娘大大的好，井坪队长一定会高兴，想到这便说：“她们的可以放，你的跟我们走。”出乎他的意料，红石女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酒井见状，忙派人将红石女侠浑身搜了一遍，见没有什么，便要把她绑起来。红石女侠身子一挺：“绑什么！要跑就不来，来了就不跑！”鬼子一听，奸笑着说：“哟嘻，快快地开路。”于是他们带着红石女侠回到了磐石县城。

再说井坪联队长，这两天正为讨老婆急得团团转，忽听有人报告说酒井带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井坪真是心花怒放，“快快地带进来！”酒井带着红石女侠走了进来。井坪一看，呀，这真是仙女下凡哪，自己还从未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酒井心中好不欢喜，不过他还是附在井坪耳边道：“队长，她说她是土匪的干活。”井坪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心想哪有这样的土匪，也不在意，赶忙命令安排宴席，举行婚礼。酒席上大小日伪军官推杯换盏，直至傍晚人才散了，井坪这老色鬼急急忙忙奔入洞房。

在灯光下，红石女侠显得愈加美丽动人。井坪看得心荡神摇，急不可待地奔过来，却被红石女侠拦住：“慢，太君，我们山沟里有个规矩，入洞房要喝团圆酒，不喝团圆酒就不能入洞房。”井坪一听，“哟嘻，”马上命令勤务兵把酒菜端来，俩人就在洞房喝起团圆酒来。一杯、二杯……昏

了头的井坪完全失去了警惕，一会就被红石女侠灌得酩酊大醉，可他还没忘了入洞房，摇晃着站起来又向红石女侠扑过来。这时，只见红石女侠站起身来装作要去搀扶，却一把将井坪腰中的短剑抽了出来，借井坪扑来之势，顺手一送，只听“噗”的一声，短剑从井坪的心窝扎了进去。井坪在一击之下猛地抓住红石女侠的手臂，想要叫喊却发不出声来，只在喉咙里呜咽了几声，便一松手栽倒在地上。

门外的勤务兵等了许久，估摸着井坪该上床休息了，便进来收拾酒菜。一进屋却发现井坪倒在地上已经咽气了，那个新娘也不见了，后窗户敞开着。这家伙赶紧报告中队长。酒井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没晕过去：这还了得，上面知道了，我这小命难保啊！于是他马上带人来到洞房，一看井坪没救了，新娘没影了，气得酒井暴跳如雷，“巴嘎，追，快快地追！”于是日伪军全体出动，把县城闹了个天翻地覆，却连红石女侠的影子也没见到。

原来红石女侠在刺杀酒井后，偷偷溜出司令部，趁城门未关混出县城。待酒井在城里搜查的时候，她早已到老爷岭下的蛤蟆河子传送情报去了。

调虎离山斗敌人

红石女侠刺杀井坪不久，在老爷岭又杀死一个鬼子，夺了武器，这下把日伪军搞得人心惶惶。为了保证铁路运输不被破坏，鬼子特地从吉林调来一个大佐代行井坪职务，这个大佐命令伪军少将朱力罕带着本部人马保护磐石到烟筒山一段铁路的安全。

朱力罕这家伙在同游击队的战斗中占过几次便宜，很快被提升为少将，他自己也觉得对付游击队实在是小菜一碟。看到鬼子们被一个女游击队搞得狼狈不堪，这家伙心中一个

劲冷笑：真他妈一群笨蛋，让个黄花闺女搞成这样，还他妈的叫什么大日本皇军呢，屁！

朱力罕接受保护铁路的任务后，便把指挥所设在明城车站，把保护重点放在老爷岭一带，并派铁甲车每天在铁路上巡视。眼看过了十多天也没什么动静，朱力罕不觉有些洋洋得意。

这一天，他正躺在床上抽大烟，忽听外面“啪啪啪”三声枪响，他那窗上的玻璃稀里哗啦被打碎一片，直吓得朱力罕一骨碌从床上滚到地下，慌忙拎起手枪，猫着腰跑到门后躲起来。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然后就听门外的伪军乱喊着向火车开枪。朱力罕探头一望，见站台上人们乱成一团，伪军们正向离去的火车射击。

“他妈的，怎么回事？”朱力罕出门问道。

“报告，刚才一个穿红衣的女人向你屋里打了三枪，扒火车跑了。”

听了伪军的报告，朱力罕眉头一皱，难道是红石女侠？也好，老子正愁找不到她呢！想到这里，他马上给老爷岭车站打电话，让他们截住火车，他自己带着人马上了铁甲车一路追了下去。

远远地，他们就看到老爷岭山洞前停着一列火车。伪军们纷纷叫道：“就是那列火车！”待铁甲车来到近前，朱力罕马上带着30多个伪军将车围了起来，挨个车厢搜查。可是整个火车前前后后搜了一遍，也没看见那个女人的影子。问火车司机和车长，也都说没看见什么穿红衣服的女人。这下把朱力罕气得破口大骂：“他妈的。难道她飞走了不成？”正当朱力罕围着车厢团团乱转的时候，守山洞的伪军班长过来报告说，您要抓的穿红衣的女人现在正在您的指挥

所里，她打电话来请您马上回去有要事相告。朱力罕听了把大腿一拍：“他妈的上当了，她肯定在半路跳车了，赶快回车站！”一行人又乱哄哄地钻进铁甲车往回赶。

当铁甲车进入明城站时，就见一群伪军正围着指挥所“砰砰”地胡乱射击。朱力罕气得火冒三丈：“一群饭桶，她就一个人，放什么枪，给我冲进去抓活的！”也怪，伪军们一个也没伤着就冲进指挥所里去了，四下一看，咦，人那去了？朱力罕跟着进了屋，见没抓着人刚要发火，忽然发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借衣甲马匹一用，红石女侠。”抬头一找，墙上挂着的那套少将服果然不见了。就在这时，骑兵连又打来电话报告说他的白马不见了。这一下，把朱力罕和伪军们都搞愣了，半晌朱力罕才回过神来气急败坏地对手下骂道：“笨蛋！在这看什么，还不快给我追！”说完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

老爷岭山洞的哨所里，一个伪军正在站岗，忽然看到一个伪军官骑着白马匆匆从岭上下来。那个军官来到哨兵前也不理会哨兵的敬礼便开口问道：“你们队长在哪，快，紧急集合，到山下去截击红军游击队的骑兵！”守山洞的伪军接到命令连忙集合起来冲下山去，远远就望见一队骑兵卷着烟尘急驰而来，伪军们忙卧倒射击。追来的正是伪骑兵连，正追赶间忽然前面传来枪声，他们以为有游击队埋伏，赶紧滚下马来举枪还击。双方对射了一阵儿，守山洞的伪军终于发现对方是自己人，连忙高喊：“连长，别打了，是自己人！”骑兵连长一看可不是，真是一肚子气不知向哪撒，赶紧骑马过来问：“你们都瞎了眼？怎么开枪打自己人？”伪军忙道：“刚才来了个骑白马的军官说游击队的骑兵在追他，让我们来这儿阻击……”骑兵连长一听急了：“妈的，

她才是游击队，快，她在哪？”“在山上。”骑兵连长不敢怠慢：“快，上山抓活的！”可他们转头向山洞口一看，只见浓烟烈火烧得正猛，待他们冲上山去，哨所已快烧落架了，再一搜查，又是踪影皆无。

骑兵连长无奈地叹了口气，带着队伍回到了明城。朱力罕这时正等着好消息呢，一听说哨所被烧了，红石女侠跑了，自己人打自己人，气得他一蹦三尺高，可落在床上却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唉，我一个堂堂少将军官，让一个黄毛丫头搞得如此狼狈，真是惭愧。”说完便瘫倒在床上，好半天没有起来，先前那种趾高气扬、骄横自负的神气劲早就飞到爪哇国去了。

郭景斗 王立新

身背婴儿斗顽敌

炎炎的烈日，晒得西安县（今辽源市）城门热气炙人。在城门旁，一群人正顶着烈日，冒着使人透不过气儿来的炎热围看一张告示。告示的右上角画着一位羊肚手巾包头，身背不满周岁婴儿的朝鲜装妇女半身画像，布告写的是：以300元赏金缉拿女匪首赵明信。有一位抱着孩子的汉族青年妇女，也在围观的人群里不动声色地看着布告。一位50多岁的庄稼老汉注视了这位青年妇女一会儿后，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青年妇女的肩头，小声地说：“你家来客人了，让你回去呢！”然后转身离去。青年妇女稍一踌躇后，也随着老年人若无其事的情情离去。她，就是被日伪悬赏缉拿的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委员、中共西安区委组织部部长赵明信。那位老人是中心县委派来通知赵明信转移的县委交通员老刘。

1936年夏，日伪的法西斯统治越来越残酷，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反日斗争越来越艰巨。由于叛徒的出卖，日伪警察、宪兵在西安地区开始了大搜捕，中共西安区委遭敌破坏，赵明信是敌人搜捕的重点对象。但是由于她终日走屯串户发动群众，居无定所，又加上她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敌人很难找到她的踪影。搜捕她的主要对手是伪警察“讨伐”大队长郑喜文，他虽然十分狡猾诡诈，可是搜捕起赵明信来却束手无策。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贴出了布告，用300元伪币的赏钱，悬赏缉拿赵明信。

赵明信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后，按照县委的指示转移到头道沟一带坚持工作。从此，这位年仅27岁的女共产党员，身背不满周岁的婴儿，怀着国仇家恨经常一个人活动在前后

倒木沟、钓鱼台、流沙嘴子等地的群众之中。她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因此她有时也背着孩子参加游击队的一些小型武装战斗。

深秋的一天，她带着6名游击队战士在头道沟的一座秘密仓子里研究工作，真是冤家路窄，仓子突然被郑喜文带领的伪警察“讨伐”队包围。在战斗中同志们怕伤着孩子便紧紧地把她母子围在中间，边射击边准备伺机突围。但是，敌我相差悬殊，突围又谈何容易。

赵明信怎能甘心让同志们保护自己呢，她不停的给同志们往匣子枪梭子里压子弹，有时也乘机打上几枪。她一边射击一边在想突围的办法，突然她喊道：“有了！”正在战斗的同志们一愣问：“怎么了？”她很沉着地说：“咱们这么办……”

密营内的枪声逐渐的稀落了。

根据枪声敌人判断出密营内剩的人可能不多了。于是他们也减轻了火力，并向密营高喊，让密营里的人投降。赵明信灵巧的做了一个投掷手榴弹突围的手势后说：“我们将计就计吧！”于是她也向敌人高喊道：

“你们不要打了，抓活的有多好！”敌人听声音是个女人，他们以为一两个女人是好对付的，于是七嘴八舌地喊叫：“你们把枪交出来吧！我们也和你们一样交枪不杀。”

“你过我们这边来吧，我们给你找个好当家的”……

听着敌人的阵阵鬼叫，赵明信虽然肺都要气炸了，但她仍强制着自己不发火。她胸有成竹地一边准备，一边高喊：

“你们稍等一等，我们这就出去。”说着她先把两颗手榴弹投了出去，紧接着6名战士每人都投出了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一阵鬼哭狼嚎。在手榴弹爆炸的硝烟

掩护下，赵明信和同志们冲出了密营，上了后山。等敌人清醒过来时，看到一名背着孩子的朝鲜族妇女和几个游击队战士已消失在密林之中了，郑喜文不禁惊叫一声：“赵明信又跑了！”赵明信等脱险了，但不幸的是背上孩子的小腿却挂了花。

天气逐渐冷了起来，赵明信身背幼子继续走门串户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加之孩子的腿伤未愈，这就更加困难了。11月初，已是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的严寒季节，为了给孩子找个安全地点疗伤和过冬，她来到老堡垒户李福家，对李福夫妇说：“大哥、大嫂，孩子爸爸在游击队打游击，我一天天东奔西跑，天这么冷，孩子小腿上还有伤，实在受不了，请你们给抚养一冬吧！开春后我就抱走。”李福夫妇眼里噙着泪水接过孩子说：“大妹子，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你就放心的去工作吧！”稍停他们又说：“为了你们母子的安全，咱们得订一条规矩，你想看孩子就偷着来看，如果你进屋看不到孩子，屋里也没孩子的东西，这就是出事了，你得赶快离开这里，行吗？”赵明信一听立刻接过话来说：“大嫂想得真周到，就这么办了。”从此，小孩就成了李福家的一员。

赵明信安顿了孩子后，工作更加积极了。她利用自己一口流利的汉语，经常化装成汉族妇女，有时装成走娘家的新娘，有时扮成阔家小姐，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和哨卡，继续深入地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活动。

身背幼子的朝鲜族女共产党员赵明信，已成了敌伪要人心中必须逮捕的重点对象。因此，日伪当局又提高了赏金，由300元增加到500元，再次贴出布告悬赏缉拿赵明信。

铁杆汉奸郑喜文是搜捕赵明信片的主要人物。他经常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处搜查。虽然他们如此下功夫，结果还是只听鞭钯把儿响，就是不知道井在哪里，依然找不到赵明信的行踪。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情报，说赵明信的孩子在李大房子一带寄养。虽然他认为不太准确，可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要去探查一下。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时刻牵动母亲的心。赵明信片在工作中也时刻想看看孩子，看看孩子的伤好利索了没有，看看孩子胖不胖。11月末的一天，赵明信片带领两名游击队员回县委汇报工作，正好路过李福家。她把两名游击队员安顿在李福家的后山上，并嘱咐说：

“我进屋看看就走，在这中间万一发生情况不要轻举妄动，等我回来后再作处理。”说完她怀着极端喜悦的心情走进李福家院门。这时的赵明信片身穿青斜纹布的大棉袍，脚登三皮脸的布棉鞋，头上梳着疙疸髻，围着一条约长又宽、又厚的绒线大围脖，一身标准的汉族妇女打扮。她走进屋本想看看孩子就走，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福夫妇和孩子都没在屋。她想来回回也不易，就稍等一会儿吧。一种地下工作的警惕立即使她战胜了思儿的感情。她四周打量一下，屋里什么东西都没动，只是小孩的东西却一件也没有，她站起身打算立即离开这是非之地。

事有凑巧，就在她向外走尚未出房门的时候，伪警察“讨伐”大队长郑喜文这个赵明信的冤家对头带着四五个伪警察闯进院来。赵明信片听到院里洋刀链子响，心里“咯噔”一下子，她知道情况有变，走是来不及了。她稍一思索，立刻想出了应付办法，于是她从容不迫地迈出了屋门，对着郑喜文等用流利的汉语说：

“您来了，请进屋休息！”

郑喜文等手抚洋刀把赵明信上下仔细打量一遍，一声没吭，就狐假虎威地走进屋里。

“请坐吧！”赵明信客气的让着他们。郑喜文坐下后虎着脸问：

“你是这家的吗？”

“我是来舅家串门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摸起了烟筐箩给郑喜文装烟。“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哪能吸老百姓的旱烟袋呢，他们自己掏出了“花道”牌香烟，赵明信马上给他们逐个点火。赵明信一边点烟，一边头脑飞快地转动，想着脱身之策。她想：言多语失，决不能让他问过多的话，以免露出破绽遭他纠缠。于是她边点烟边说：

“各位是找我舅舅的吧？他就在东边不远处砍柴，我这就去找他回来，请各位稍等一会儿。”

郑喜文边吸烟也在边琢磨：她是谁？是赵明信吗？赵明信是个朝鲜族妇女，这是个汉族人，她还没有孩子，她……他向屋内又看了一眼，这家也不象有小孩的样子，见赵明信正在给最后一个人点烟，就突然问道：

“你舅家几口人？”

“就老俩口儿。”

“你没有小孩吗？”郑喜文冷冰冰的问。

“我刚结婚不久。”

“你当家的是做什么的？”

“在军队里当连长。”她一语双关的回答了郑喜文。赵明信爱人是红军游击队的指导员。

“在什么地方？”

“在新京。”

“什么部队？”

“近卫部队第七连。”

郑喜文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这是一个连长太太，不太好惹呀！原来伪满一向是警察怕国兵，何况又是个官太太呢。经过这一连串的问答，赵明信不仅对答如流，说话又是一口纯正的东北腔，郑喜文有点相信了。赵明信看他不再问了，稍停又说：

“诸位等一会儿，我这就去找我舅舅去。”郑喜文没动声色。赵明信转身向屋门走去。郑喜文又突然大声喊道：

“站住！”赵明信心里暗暗一惊，但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她这是敌人使诈。她站下稍事镇定，转过脸来问：

“还有事吗？”郑喜文察颜观色，见她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样子，便信以为真了。他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声慢语地说：

“没事了，你去吧！”赵明信一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她微微一笑，安稳的转身出屋，从容地走出了大门，一拐弯儿走上了后山。

赵明信到后山找到了两名游击队员，见他俩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李福家的院内动静。赵明信把郑喜文所带的人数及武器向他们做了介绍，最后她说：

“咱们人数少，武器不如他们好，尤其是在屯里一旦打起来对群众安全不利，咱们放两枪把他们赶跑就算了，不能和他们硬拼！”

于是两名队员抽出匣子枪朝天各放了几枪，眼看着郑喜文等慌不择路，夹着尾巴逃跑了，赵明信这才长出一口气，率领着游击队员回中心县委去了。

李福夫妇和孩子哪去了呢？原来郑喜文要来搜查李福家

抓赵明信孩子的事，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已获得了准确情报，一大清早组织上就派专人把这一情报转告给李福，并帮助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安全地转移到东丰县去了。

高庆山

夜袭伪军机枪连

1935年，在伊通至磐石公路边的小镇营城子，驻着伪军骑兵团的机枪连，连长、连副都是铁杆汉奸。他们经党到辽源、磐石境内进剿抗日军民，对我磐石中心县委（驻玻璃河套，离营城子很近）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县委决定寻找有利时机消灭这股伪军。

1935年10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参谋长丁宇龙奉命率70多名战士从蒙江打回磐石，在抗日山林武装中做统战工作，联合了“登山好”、“七侠”等11股山林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江北总指挥部”，为袭击营城子之敌做了兵力上的准备。

10月20日一早，县委老宋和“登山好”的王海荣化装成商人潜入营城子侦察机枪连动静。他们先到柴家店住下，让我联络员以王海荣名义请机枪连士兵温启发到振兴饭庄见面。王海荣与温启发过去都在东北军中一起当兵，是生死朋友，“九·一八”事变后，王海荣所在连队哗变，走上抗日道路，从此两人一别几年。这次来，首先要摸清温启发对抗日的态度。

温启发按约定来到了振兴饭庄，因为还不到饭时，店内十分清静，只有老宋、王海荣、温启发三人围坐在桌前边喝边唠，饭庄掌柜和联络员在门外边唠边放哨。王海荣告诉温启发，自己人哗变后一直坚持抗日，最近和革命军在一起打日本，这样才觉得自己有爱国心，才是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说温启发也要作个中国人，也要有爱国心，不然死了没脸见祖宗。温启发当即表示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己是个小

当兵的没有能力组织哗变，只身脱离部队，又找不到安身之地，不知如何是好。老宋一听有门儿，就单刀直入地说，这次来就是有事相求。王海荣随即拿出100块大洋送到温启发面前，说事成后再给100块。温启发看着面前白花花的大洋，心想，肯拿出这么多钱，不是买枪就是买子弹，反正是为了抗日，于是就很爽快地说：“王大哥，宋大哥，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抗日救国人人有份，还提什么钱呢！”老宋见状接过来：“温老弟痛快，我们是革命军，想打营城子的机枪连，你能帮我们吧情况弄清楚吗？”温启发一听，觉得有点突然：机枪连有三个排，70人，有6挺机枪，50余支步枪，还有10来支短枪，住在有高大围墙的院子里，院子四角有4个炮台，还有哨兵日夜观望，要打机枪连，决非易事。想到这儿便忙问：“你们打得得了吗？”老宋说：“你放心，只要你把情况看准了，约定个时间，到时候你把门打开就行，外边怎么打，不用你管。”温启发想了想，说：“你们俩在这等一天，我回去画个图给你们，”就这样，事情就说定了。

温启发走后，宋、王二人又回到柴家店，两人一夜没有合眼，恐怕发生意外。第二天早饭后，联络员到约定地点见到了温启发，把他领到了柴家店。温启发拿出自己画的地图，指点着说：营房在东门外道北，东侧靠土堤，堤下有渠道，人后可以隐蔽在这里；营房四周有围墙，四角有炮台，炮台设了了望哨，来时要小心；院里正房是连部，下屋是二排、一排、三排、仓库；机枪连经常出去清剿，一般是三排看家，因为三排两挺机枪都很破旧，不能出去打仗。等连队出去打仗，我再给你们送信。宋、王二人听完后马上回到磐石朝阳山的三道沟，向县委和丁宇龙做了汇报。县委又

通过其他途径核实了温启发的情报，决定调活动在朝阳山六马架的磐石县委游击队 12 名队员到三道沟待命，准备配合二师部队袭击营城子。

几天后，温启发的情报经联络员传递，报到了县委：“11月11日一排、二排去西安（辽源）。我半夜 12 点值班，你们按时来吧。”

11月11日天黑以后，二师部队、磐石游击队、王海荣的山林队共几十人从三道沟出发。走到伊通县大酱缸村东，见前面一个人急匆匆的迎面赶来，队伍赶紧隐蔽。老宋认出了来人是联络员，他告诉老宋，温启发说今夜不能打了，一排、二排没有走，而且又从西安来一个连住下了。县委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二师部队和县游击队驻三道沟，离营城子近一点，便于行动。县委同志回六马架，王海荣因故去了海城县。

11月18日又接到情报，20日行动。我二师部队、县游击队夜半前到达敌军驻地东侧的土堤下。十二点到了，丁宇龙带领战士爬上土堤。突然，从炮台的枪眼里伸出一条木杆，上面挑着一条白毛巾，这是事先约好表示敌情有变的暗号。丁宇龙看到后，把手一挥：“撤！”队伍悄悄离开了阵地。原来夜间八点钟，日军两个小队带两挺歪把子机枪和两个掷弹筒突然闯进了机枪连，温启发不能脱身报信，又怕我军遭受损失，提前来到炮台换岗，发出了敌情有变的暗号。那个提前下岗的伪军从心里感激温启发，临下楼还紧说“温大哥够朋友”呢。

11月25日早，温启发又送来情报：“昨夜一、二排去伊通，营房只剩三排和许连副，今夜十二点来。”战士们擦枪、磨刀准备了一天，天黑从三道沟出发，第三次来到营城

子土堤下。为防止敌一、二排不期而归，丁字龙派出8名战士到兵营以西向伊通方向警戒。十二点丁字龙率两个班爬出土堤，摸到了营房正门，重重拍了三下巴掌。大门轻轻地打开了，温启发闪身出来轻声说道：“今晚炮台无岗哨，西下屋是三排士兵，上屋是许连副和一个日本女人。”丁字龙当即令老宋领一班去西下屋，自己带二班奔向正房。

西下屋19个伪兵正在酣睡，老宋等人进屋用枪逼住敌人：“不许动！我们是红军，谁动打死谁！”伪军排长从梦中惊醒，起身去摘墙上的手枪，一个战士上前一枪托子把他打昏了过去，其余伪军吓的一动不动，红军战士收完枪，令伪军穿上衣服到院中集合。

上屋是五间大瓦房，东面两间，西面三间，各走各的门。连长住东屋，因去伊通，屋内空着。西面三间房，连副住东间，勤杂兵（兼警卫）住西间。丁字龙来到门前推了推，门插着，推不动，便一脚踹开了门，丁字龙带俩人直奔东间，班长带四人进西间解决警卫，其余战士在门口、窗下守候。踹门声惊醒了许连副，他本能的把手伸向枕头企图摸枪反抗，两名战士跃到炕前按住他的手，丁字龙的手枪已对准了他的脑袋，他不情愿地低下了头。西屋的两个警卫没做丝毫反抗就举起了双手。和许连副同床共枕的日本女人叫山本花子，是黑龙会的成员，学过武术，她与许连副在大连相识，这次由大连去长春，特意绕道来营城子与许连副叙旧，怎么也没料到碰上红军的袭击。她开始有些惊慌，稍一定神，看战士没有注意她，就一翻身从枕下摸出手枪，跳到地上，举枪对准了丁字龙，丁字龙手急眼快，一脚踢飞了花子的手枪，两人在屋中耍起拳脚来。屋内窄小，战士怕伤着丁字龙不敢开枪，便踹开窗户把许连副押向院子。花子也随身

从窗口跳出，守候在外的战士看清了来人，一扣板机，随着清脆的枪声，女特务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堤下守候的我军战士按预先计划也来到了兵营，背枪的，找军服的，搬子弹的，押俘虏的各有分工。见敌兵营已被收拾干净，丁宇龙说了一声：“撤！”奇袭成功的部队，迈着自豪的步伐离开了兵营。丁宇龙来到营外，望着阴云渐少的天空，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从容的掏出手枪，枪口对着天空，“叭、叭、叭”连放三枪，这是庆祝胜利的枪声，也是对向伊通方向警戒的8名战士发出的“撤回”的命令。

在回返三道沟途中，许连副说要大便，骗得押解战士给他松了绑，他以为有机可乘，撒腿便跑，不听战士“站住，再跑就开枪了”的警告，最终被我战士击毙。

回到三道沟，在我军的感召下，一些伪军参加了红军，有的领5块大洋的路费回家了，温启发领了一百块大洋回家做买卖去了。这次夜袭，虽经几次周折，但战前准备充分，只发一枪，就获得了缴获机枪两挺、步枪16支、子弹8000发和大批军服、被褥、医药的重大战果。

郭景斗、张永生

姜殿元拒降除害

抗日战争时期，桦甸县的小夹皮沟屯有个小伙子叫姜殿元。他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哥仨相依为命。他排行老三，屯里人都叫他“姜三儿”。

1936年，哥仨为了活命，就到本屯大地主滕万财家当了长工。滕万财阴险刁猾，心狠手辣，还勾结日伪，欺压穷人。佃户和长工吃尽了苦头，他们恨透了滕万财，更恨透了日本鬼子。

1936年冬，姜殿元在给地主扛活期间，就经常偷偷给山里的抗联队伍送些粮食、食盐、咸鱼、火柴什么的。1937年5月的一天，姜殿元进山送粮，被滕万财发觉报告了伪警察。姜殿元听说警察要抓他，哥仨连夜进山，投奔了范德林领导的抗联后勤小分队。

姜殿元人缘好，又是当地的山里通，范德林就让他专门发动群众，筹集粮食和军需。姜殿元熟人很多，经常去红石砬子水曲柳沟南岗、烂泥沟子一带，找到一些在地里干活的老乡，动员他们想方设法支援抗联。1937年秋，姜殿元等人为抗联部队共背回苞米、黄豆两千五百多斤。就连全光的副官魏大麻子也拍着姜殿元的肩膀说：“姜三儿，你真是个好样的。”

提起魏大麻子，红石砬子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名子叫魏喜廷。因为长了一脸麻子，群众背地里都叫他“魏大麻子”。1936年，他曾在桦甸县苇沙河当伪甲长。有一次给抗联二军政治部主任全光办事后被他人泄露，日本宪兵和警察都要来抓他。他走投无路，于1936年8月投奔了全

光的抗联队伍，当了副官。1937年5月，姜殿元到了范德林的抗联后勤小部队后，全光和魏大麻子曾经到范德林的密营来过，后来魏大麻子也知道姜殿元在后勤小部队中是个骨干力量。

1938年7月，魏大麻子终于经不住抗联队伍艰苦生活的考验，投降了桦甸宪兵队。到了宪兵队后，他为了讨主子的欢心，极力为其主子卖命，千方百计侦捕我党我军工作人员，四处调查与镇压反满抗日爱国活动，大肆残害无辜群众，搜集我抗联活动情报。他还献计说：“要是把姜三儿降过来，抗联后勤小部队就垮了，那时，抗联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冻不死也得饿死他们！”他还派出狗腿子崔长好（朝鲜族）来收降姜殿元。

1938年秋，崔长好领着两个汉奸到红石砬子江南至水曲柳沟一带煽动群众，破坏抗联同群众的关系，扬言非把姜殿元降过来不可。此时，抗联后勤小部队的二十多人正在这一带筹集粮食。这一天，姜殿元同几名抗联战士每人扛着一麻袋苞米棒子送回仓子后，刚返回来，就有一个老乡告诉姜殿元说：“背了这趟可别再来了！”姜殿元问：“咋的啦？”“崔长好正领着两个人到处找你，要收降你呢！”姜殿元灵机一动，小声告诉说：“你见到崔长好就告诉他，我想找他唠唠，让他在这等我。”姜殿元回到部队后立即向连长范德林作了汇报。范德林一听不禁说道：“来的正好。”于是找来一排长商量，对这次行动作了周密安排。第二天，姜殿元和一排长带领五个战士又来到红石砬子江南，他们在河边吃了点儿大尖饼和咸菜，然后安排五个战士埋伏起来，姜殿元和一排长大步流星地来到那个农民的仓子里。崔长好果真已在那里等候，姜殿元若无其事问他一句：“你现在干

啥呢？”他说：“我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姜又说：“那好，既然是找我来了，那你就得说实话，你现在到底在哪干事儿？”

崔说：“你们全光的副官魏大麻子不是投降了吗？”姜假装说：“是吗？我不知道哇！”崔又说：“我就在魏大麻子手下干呢。”姜说：“你今天专程找我来干什么？”崔说：“魏大麻子派我来劝你也过去，到他那里干事儿。”姜说：“你要是真心让我过去，那也好办，咱们找个地方唠扯唠扯。”崔长好三个人同意了。姜殿元和一排长把他们领到吃大尖饼那块儿，坐到石头上，崔长好接着说：“你们在这吃的、住的多苦哇，你们哥仨过去以后，保证吃好的、住好的，到哪里都吃得开。”姜殿元说：“那好，就这的吧！”姜殿元一摆手，事先埋伏好的五名战士立即上来把崔长好三个人绑得结结实实。姜殿元对他们说：“先委屈你们一会儿，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一段，换个地方再唠。”大约走了四里多地，来到后勤仓子的东面，他们把崔长好等三人分别绑在三棵小树上，由姜殿元和五名战士看着，一排长回密营向连长报告。一排长回来后对姜殿元说：“连长对你很信任，捉住崔长好，连长很高兴，把你好顿表扬。今儿晚上没有其他任务，也不出去了。把三个狗腿子结果了，今晚上好好休息，再过三天，完成筹粮任务，就回密营去。”说完，一排长把从密营拿回来的枪上好刺刀，就要去刺崔长好。姜殿元想，一排长的手腕子负伤还没有好，使不上劲，于是就从一排长手中把枪要了过来。此时，那三个狗腿子早就筛了糠，姜殿元走上前去，只听“嚓嚓嚓”几声，结果了三个家伙的狗命。大伙齐动手，把三条死尸拖到仓子北面二百多米处扔掉了。姜殿元他们宰了三个狗腿子还不解恨，总想找个

机会干掉魏大麻子，杀杀日寇的威风。

坏蛋作恶，天怒人怨，这机会终天来了。1938年11月封江后的一天，抗联后勤小部队得到可靠情报，说魏大麻子正在小夹皮沟滕万财家里，滕万财也在红石砬子宪兵队当了特务。姜殿元想，这两个坏蛋互相勾结起来，附近的群众可就更得曹殃了。姜殿元当时就下了决心，绝不放过他们！

第二天，姜殿元和一排长双合带领十个人穿过冰封的松花江，来到小夹皮沟，在离屯3里远的一个场院里停下来。他让一个打场的农民刘某回屯告诉滕万财和魏大麻子，就说姜殿元带领二、三十个弟兄投降来了，让他俩到这儿来相见，今晚不来也要给弄点吃的来，来时不许带兵，如果带一个兵，就开枪打，坚决不投降。当晚，滕万财和魏大麻子真的没来，却派人给他们送来了大尖饼和小咸鱼，还有几个大饼子。战士们吃饱了，就在附近休息。晚间在外面过夜实在太冷，大家就在场院附近拢火取暖，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等困得受不了时，就轮流到场院的乱草堆里睡一会儿。虽然天寒地冻，但抗联战士早已习惯了这种艰苦的生活。大伙熬过一个寒冷的夜晚，天一亮，姜殿元又派人捎信，让魏大麻子给送来二、三十双棉鞋、腿绑。下午天黑前，真的有人把棉鞋、腿绑送来了，但是魏大麻子和滕万财还是没有来。姜殿元和战士们在屯子外等了一天又一天，到了第四天，这俩家伙还没来。有的战士等得不耐烦了，要回营去，有的主张打进屯子去。这时，姜殿元和一排长分析了魏大麻子的心里状态，决定继续等下去。果然到了第六天下午，远处的小路上，出现了魏大麻子和滕万财的身影，真的没带一兵一卒。战士们立即紧张起来。一排长告诉大家：“要沉住气，没有命令不许开枪”。魏大麻子来到场院

里，笑嘻嘻地问姜殿元：“姜三儿，怎么样？你很好哇？你真要跟我干吗？”姜说：“你不是早就要收降我吗？我们在山里实在不好过呀，没吃、没住，太苦了！我这些弟兄实在熬不住了，就投靠你来了。没想到我们在这儿冻了六天五宿，你们连见都不见我们，你今天再不来，我们就都回去了。你看看，这不，二、三十人就剩下我们十二个人了。”魏大麻子诡辩说：“这几天我们不是忙着给你们准备东西嘛，来晚了，你们别生气。”地主滕万财也随和说：“对，对，真是这样，别生气。”魏大麻子接着说：“你们没回去就对了，到我们这边来，生活多好哇！吃的、住的、穿的，哪样不比你们山里强啊，你看你们现在多好……”接着魏大麻子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在宪兵队里的好处，战士们越听越生气，姜殿元实在忍不住了，不想再听他罗嗦了，立刻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不过，你的好日子可过到头了！”接着—摆手，给战士们使个眼色，姜殿元的大哥姜殿臣—抬手“当”的一枪打死了魏大麻子，朝鲜族战士黑树密（音译）又一枪，滕万财也象死猪一样倒在了地上。战士们从魏大麻子身上搜出了桦甸宪兵队的证件，又从滕万财身上搜出了红石砬子宪兵队的证件。这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战士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了密营。

第二天，魏大麻子和地主滕万财被枪毙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红石砬子，成为群众街谈巷议的话题，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纷纷称赞抗联战士又为民除了一害。

李海军

飞兵巧打会全栈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那年春天，在桦甸县松花江畔的山村小镇——会全栈，我抗日联军出奇制胜，打了漂亮仗。这件事老一辈传给新一辈，口口相传，直到在百姓之间还流传着这个动人的战斗故事。

那天是阴历三月十六。早晨，在松花江畔的老岭岗西侧联军一军二团的深山密营里，团长史宝奎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警卫员小金子一掀地仓子的门帘蹦了进来，高声道：“报告！”史团长说：“什么事？”小金子说：“侦察员张有金回来了，有重要情况要面见团长！”史团长喜出望外，急忙跳下土炕说：“快，快让他进来！”小金子急忙出去打个招呼，领着张有金一前一后走进仓库。提起这张有金，真是康熙皇帝买马——百里挑一。人，长得帅，今年23岁，大个子足有一米八、九，搞侦察是一身是胆。他凭着在“家理”的关系，结识了敌人驻会全栈的两个密探头儿，一个叫钟振起，一个叫张宝平。是，这小张经常化装进入据点察看敌情，得到了不少情报。

史团长见张有金那满面红光的样子，就知道他又搞来了情报。他让小金子给小张倒了一碗白开水，小张一扬脖子咕嘟喝了个碗底朝天，这才报告说：“团长，我在钟头儿照看下，在会全栈住了一天一宿，摸清了敌情：下午，会全栈里守备军奉命全都滚回了桦甸，留下了很多。原来驻扎在会全栈的敌伪混成旅二十四团的四连和营大部分派往四外骚扰百姓，会全栈街里只剩下新打县

城调来的赵副官、五连长和少数兵力唱‘空城计’。眼下，正是我们攻打会全栈的大好机会。如果错过了今天，去红石砬子开饷的敌伪军一个排可能回来！”

史团长根据小张的侦察报告，马上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经过一番细致研究，做出了飞兵巧打会全栈的战斗计划。

太阳离山还有两竿子高，由各连挑选出来的五十多名身强力壮的抗联战士，在郭池山同志的率领下，穿密林、过小溪，急行军来到通往红石砬子的咽喉要道——二道沟口子。这儿距离会全栈有二十多里，距离红石砬子有五十多里，有早年韩边外采金的金场，遍地是废弃的金坑，适于隐蔽，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郭池山探察了地形后，马上命令战士们隐蔽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天刚眼擦黑儿，从红石砬子开饷回来的一排敌军，大大咧咧地从大路上走过来。他们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斜背着大枪，一步三晃地走进了我军的伏击圈。郭池山同志瞅准时机，向战士们一挥手，压低声音说：“同志们！上！”抗联战士从金坑中一跃而起，齐乎啦地冲了上去，高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就这样，一排敌军，还没等弄清是怎么加事，就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老郭命令几个战士把俘虏押到附近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看管起来，并悄悄嘱咐他们在天亮之前见机行事甩掉俘虏，带上缴来的钱款和步枪返回密营。然后，他厉声地对俘虏来的敌排长说：“你要死要活？”吓得那敌排长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长官……我要……要活！”“那好，你要活，给我们带路，悄悄摸

进会全栈去！不过，你要不老老实实带路，小心我敲碎你的脑袋！”“是是是……”这家伙一口气儿说了八个是。

于是，抗联战士们押着敌排长，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会全栈。这会全栈是当时桦甸东部山区松花江畔土副产品的一大集散地。镇内的人口超过千人，光挂红晃儿的商号就有十几家，大烟馆、杂货铺、饭馆、客栈……应有尽有。闹抗联以来，有时候驻扎着上千敌军重点把守，上千人口的小镇，再驻扎上千敌军，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样子。

眼下，会全栈里正唱“空城计”。抗联战士们抓住战机乘虚而入，打大院的后角门儿进去一举摸到守备队的门口儿。因为守备队暂时调回了桦甸，这大院儿竟成了五连的天下。门口上有两个站岗的哨兵，正在拄着大枪唠嗑儿，只听一个哨兵先说：“哎！我说兄弟，今晚没事儿，你一个人先应付一会儿。屋里正打麻将，我去卖个呆儿！”另一哨兵说：“你可快点回来呀！”“好！”剩下一个哨兵，没有人聊天儿，竟哼起了《打牙牌》：“天牌呀，地牌呀，我不爱呀……”哼着哼着，不一会就抱着大枪打起瞌睡来了。

老郭指挥战士们先摸掉哨兵，然后战士们飞也似地冲进正房，大吼一声：“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五连长刚刚和了一把满贯，正在喜笑颜开地捡钱，一把钱还没捡完，就当俘虏了。你再看他下家那位商号的大财东，吓得钻进牌桌底下，屁股撅在外面，嘴里忙不迭地喊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老郭一个箭步窜到五连长背后，用手枪顶在他的腰眼上大声喝道：“你赶快下命令，全部缴械投降！不然，我就先开枪打死你！”五连长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光棍不吃眼前亏，急忙点头哈腰地说：“兄弟

一定照办！兄弟一定照办！”他嘴里虽然说照办，可是却隔着间壁墙的玻璃窗向电话室里递眼色。电话室里有两个电话生，看了五连长的眼色心领神会，便要往红石砬子警察署打电话求援。然而他俩也是痴心妄想，他们哪里知道战士们在冲进正房的同时，就把电话线掐断了。只见这两个电话生抓起电话使劲地摇，可怎么也摇不通。他俩的举动激怒了抗联战士，“嗖！嗖！”一个战士隔着玻璃甩进去两颗手榴弹，炸得电话室里尘土飞扬，一塌糊涂，两个电话生也在哭爹喊娘后断了气。这阵势直把五连长吓得屁滚尿流。战士们一清点人数，不见了赵副官的踪影。这时候赵副官正在西山根营房四连的驻地。赵副官新来乍到，四连有几个老相识，正在请他喝酒行乐呢。那两颗手榴弹的爆炸声，使赵副官顾不上喝酒了，急忙带着勤务兵过来察看动静。这时候，他还不知道守备队大院已经被我抗联战士占领，于是让勤务兵上前叫门。勤务兵拍了拍高大的门扇嚷道：“开门！开门！”里面的抗联战士喝问道：“谁？”赵副官听了满肚子不高兴，朝着大门踢了两脚：“他妈的！怎么连我赵副官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老郭在院子里听了心中暗喜：“小兔崽子！找你还找不着呢，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他转念一想，隔着大门喊道：“赵副官！刚才我们听了两声爆炸声，可能是抗联下山来了。现在，大门不敢开，你委屈一下，打大门儿下边的门闩里爬进来吧。”其实，老郭是想用这个办法抓个活的，好多弄些情报。

赵副官在大门外听了，有心爬吧，怕失掉身份，有心不爬吧，又怕时间长了真就来了抗联，何况方才还听到了两声爆炸声。他一琢磨：他妈的！顾命要紧，先爬进去再说。他趴在地下，先把攥着手枪的右手伸了进来。战士们看见手

枪，怕他进来反抗坏了大事，等他往里一伸脑袋，有人冲着他的后脑勺“叭！”地一枪，那赵副官连一动都没动，就地窝老了。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所有的俘虏都集中到院子里。老郭同志给他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劝他们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要改恶从善。然后，把他们锁进了一个大筒子房里，战士们开始清点战利品——二挺轻机枪，一百二十多棵大盖子，那给养足足装了两挂大车……

东方放亮的时候，抗联战士们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密营。

徐明举

买瓜

1938年的夏天，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带着大队人马从蛟河境内出发向东部转移。当队伍沿着张广才岭行进到牡丹峰顶时，天已晌午了。那火一样热的太阳，直射头顶，行进中的战士，背上好似背着一个大火盆，烤得口干舌燥，连气都喘不上来。由于天气炎热，战士们一路上又穿林爬坡，连口水也没喝到，饥渴难忍，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走在队伍中间的陈翰章见此情景，感到非常不安，暗想自己没有照顾好战士，可是又能怎么办呢？这牡丹峰海拔800多米高，上哪去找水为战士们解渴呢。部队昨天在笄条顶子打了个大胜仗，打死了100多名鬼子讨伐队，然后队伍一步也没有停就转移了，走了一宿加上小半天的路，大家是够辛苦的了。于是他走出队伍往路旁一站，对身边的通信员小刘说：“马上传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战士们听到命令，有的身子往石头上一挨就响起了鼾声。

年轻的抗联战士李国富和郭明海，嗓子渴的冒烟了，顾不得一路急行军的疲劳，放下身上背的东西，急忙去坡下为同志们找水。两个人走出林子边，一阵习习的微风把清馨的瓜香吹了过来。二人定神一看，前面不远处一块平坦地上，用蒿草撮起一人多高的地窝棚，地窝棚四周是一片瓜田。二人走进瓜田一看，每棵瓜秧上都结着四、五个青皮泛白的大香瓜。瓜田中间的小道旁，矮墩墩的芨芨草花开得正红。满园的瓜香，沁人肺腑。两人进到窝棚里，却不见种瓜的人。

小郭一看高兴地说：“小李，咱俩不去找水了，摘些瓜带回去给同志们吃了，又解渴又解饿。”

“对，给大家摘瓜吃！”

两个人脱下上衣，包起摘下的瓜回到队伍，高兴地喊着：“哎，大家快来吃瓜，快来吃瓜！”

两个人的话音刚落，从对面的树丛中走出指挥陈翰章，他瘦高的个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往地上放瓜的小李、小郭和那几个抢先来拿瓜的战士，稍一思索，他严肃地说：“哎，大家等一等，先不要动。”他几步跨到近前，望着两个年轻的战士问：“这瓜是从哪里弄来的，共花多少钱？”

小李和小郭知道是惹下祸了，平时指挥总是嘱咐不要随便拿群众的东西，这是违犯纪律的。两人不敢在首长面前说慌，只好如实地讲了摘瓜的经过，并承认了随便拿群众东西是犯纪律的。

陈翰章听完了两个战士的话，态度十分严肃地说：“我们眼下的环境很艰苦，就拿今天来说吧，走的路是在牡丹峰的顶端，连口清水都喝不到，我们是够艰苦的了。”他停了一下又说：“可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就越要遵守纪律，不能因为一时的饥渴，就损害群众的利益呀！”他又抬头看了看正在休息的战士们说：“我们在这一带林区打了几次胜仗，都是和这里的人民群众给我们的支援分不开的，要损害了群众的利益，那还叫什么抗联队伍！”

一个抢先拿瓜的战士从地上站起来说：“对呀，我们从不作损害群众利益的事，这瓜不能吃！”说完把手里拿的又大又长的“羊角瓜”轻轻地放回原处。

陈翰章看两个摘瓜的战士站在他面前有点不好意思，便

没再讲什么，把手一挥说：“走，找瓜园主人去！”

这时瓜园主人下山办事回来了，发现瓜田里的瓜被人摘走了，心里很不高兴，又恨起那些经常进山讨伐抗日联军的森林警察来，气得哆哆嗦嗦的，边察看边嘟嘟囔囔地骂着。

正当这时陈翰章走了过来，他对着老人和蔼地喊着：“老大爷，你不要生气了，都怪我们的小战士不懂山里的规矩，摘了你园里的瓜，我们是来付钱的！”

瓜主人抬头一看，站在地边上说话的人是个瘦高个子，他身穿褪色的绿布衣服，腰间挎支短枪，正笑容可掬的向他道歉，一旁还站着两人年轻人。老人明白了，扭头向四周看了几眼，惊喜的叫了起来：“啊，你们是抗联队伍吧！”陈翰章笑着点了点头。种瓜老人忙指着瓜窝棚说：“快请到里面坐，快请到里面坐！”

几个人进了窝棚后，老人凑到陈翰章近前说：“自从你们上月端了警察狗子的老窝，把那些狗杂种都吓破了胆，多日子不最来这里瞎咋乎了。听说你们昨天又把100多个日本鬼子讨伐队给包扎了，你们干得好，干的好呀！”接着老人又忙站起来歉意地说：“你看，光扯别的啦，来到瓜园，要尝尝我种的瓜的口头怎么样。”说着就走出窝棚，转眼之间，拎回一大筐瓜放到地上叫陈翰章他们吃。

三个人在种瓜老人盛情招待下，一边吃着稀酥崩脆的香瓜，一边同老人闲聊着。

老人姓周，是这一带山里有名的猎户，靠冬天打猎、夏天种瓜为生。他早知陈翰章队伍在这一带林区打鬼子的威名，相互间越唠越近乎。陈翰章通过对老人的问话也打听清楚了种瓜最好年份的收入情况，就和老人商量，说出了想把整个瓜园的瓜都买下来的主意，一来补上两个年轻人背着主

人摘瓜的歉意，二是让战士尝尝鲜，解解渴。周大爷认准了他们是抗联队伍，无论怎么说也不肯收陈翰章的瓜钱。陈翰章说“如果不要钱，大家就不能来吃瓜了。”老人无奈，只好同意陈翰章的办法。陈翰章按丰年瓜田的全部收入付了瓜钱。接着命令身旁的战士说：“小李，你快回去把同志们喊来吃瓜”。

小李一听把同志们都叫来吃瓜，高兴地来个立正说：“是，陈指挥！”

老人一听小李喊了声陈指挥，心里就更明白了，一手接过陈翰章付给的瓜钱，一手紧握陈翰章的手说：“说了半天，你就是陈翰章同志呀！”老人眼里顿时闪出激动的泪花，一老一少的两双手握得更紧了。

王凤阁

陈翰章攻打额穆城

1939年11月，吉林山区天气已经很冷了，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方面军的冬装还没有着落。司令员陈翰章十分着急。一天，派出的侦察员报告，敌人的冬装已到，全部放在额穆县城的仓库。陈翰章决定寻机攻打额穆县城，夺取敌军装以为己用。可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去攻城制敌呢？

调虎离山

额穆县（现该县建制已撤消，所辖地区分别划归蛟河、敦化两市）在吉林东部山区，东接蛟河，西临敦化，境内山高林密，是抗联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日本侵略者为“进剿”抗日军民，在这里常年驻有重兵。1939年额穆镇内驻有三股敌军。一股是伪军骑兵11团所部300多人，人多势众；再一股是蛟河岭东行署肃正办事处，头目是日本浪人森山，手下有一个中队，他们占据旧县衙，深沟高垒，易守难攻；还有一股是伪警察署，署长姓杨，副署长大道重次郎是个日本人，手下有60多警察，但一个个都是兔子胆，专会欺压老百姓，没多大战斗力。陈翰章经过再三分析，认为对穆额县城不能强攻。一是城内敌兵多，凭借城墙护卫，一时很难攻下。二是蛟河驻有日军守备队，战斗一旦打响，蛟河出兵，我抗联可能两面受敌。若智取，消灭伪警察署后，部队迅速出城可以办到，但仓库里的冬装，武器却成了负担，会影响部队撤离，可能被尾追的敌人死死咬住，后果不堪设想。强攻、智取都不是万全之计，要解决冬装、消灭伪警察署之敌，最好的办法是调敌主力出城再乘虚而入，一个

调虎离山的作战计划在陈翰章的脑中逐渐形成。11月3日，陈翰章找来参谋人员把想法一说，大家一致认为可行，于是制订围绕攻打额穆县城的包括“准备、攻占、阻击、转移”一系列步骤的完整作战方案。会后，陈翰章当即派人去烧锅屯的11团3营2连驻地，找伪连长任孝先联系。

伪骑兵11团是陈翰章的老冤家。陈翰章在敦化牡丹岭活动期间，日军曾多次用重兵去“讨伐”。陈翰章凭着丰富的游击经验和对家乡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在深山密林中兜圈子，几经穿插迂回，找到敌人的弱点就敲他一下。1939年8月大沙河一仗，打死、打伤、俘虏日伪军500多人；9月24日夜寒葱岭伏击战，击毙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全歼日军100人，击毁日军汽车11辆。日军见“讨伐”收效甚微，损失惨重，不得不改变招法。先是用5000元悬赏缉拿陈翰章，接着用重兵阻隔抗联三方面军与外界的联系。被日伪称作“能攻善战”的伪骑兵11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官地、大山嘴一带充当“拦路虎”的。这时陈翰章一边率军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一边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跟11团正面作战，暗中却通过地方党组织做争取11团的工作。3营2连连长任孝先被我争取过来后，经常给抗联提供枪枝、弹药、给养和军事情报。日军见“拦路虎”“讨伐”抗联不力，便把团长关文龙撤职，换上铁杆汉奸刘东坡。刘东坡受宠若惊，上台伊始，便死乞白赖的与抗联纠缠，陈翰章就是不跟他接火。真是冤家路窄，陈翰章率队到额穆一带活动，鬼子又把11团调到了额穆县。陈翰章决定利用刘东坡求功心切的心理，给他来个调虎离山之计。

抗联来人找到了任孝先，把陈翰章的意图和作战部署做了详细的介绍，要求该连伪军配合行动。任孝先表示一定按

计划行事，报效国家。

11月4日陈翰章在烧锅屯南边的大崴子里“攻击”任孝先的伪军11团2连。虽然双方都向空中放枪，但枪声密集，战斗进行的很“激烈”。任孝先“顶不住了”，派人分别向刘东坡和日军守备队报告，请求速派援兵。太阳落山的时候刘东坡带驻扎在额穆县城的伪军来到北山脚下，日军守备队来到南坡，同时向山上的抗联开火。天黑之后，抗联战士在陈翰章的指挥下，主动撤出一个山头，合兵一处，居高临下猛打一阵，往东撤走了。山上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直到天亮，刘东坡才发现和日军守备队打上了，打死了不少日本兵，知道上了抗联的当，闯下大祸，慌忙扔下队伍只身逃走了。日军守备队气急败坏，把伪军和自己队伍合兵一处，往西进山“追剿”去了。

火烧“讨伐队”

11月5日夜，伪11团和日军守备队还在西边山区寻觅抗联的踪迹，陈翰章已指挥部队主力来到了县城附近，摸上了额穆的北山岗。他先派出一个尖兵小分队，化装成“讨伐队”来到额穆县城东门。日军岗哨问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会日语的战士回答是“讨伐队”回来了，大部队在后面，一会儿就到。日军岗哨将信将疑，准备用电话与城中守备军联系，可摇了几次都未接通。原来通向伪肃正办事处和伪11团留守部队据点的电话线早被预先潜入的我军战士掐断了。乘日军岗哨与我尖兵小分队一问一答、进屋打电话之际，我两名战士悄悄爬越围墙，解决了敌哨，打开了城门。打入伪军自卫团的内线顺利引导主力进入城内，包围了警察署，冲进办公室和宿舍，兵不血刃，俘虏了伪警尉郭某及其以下30余名伪警察和十几名伪自卫团员。副署长大道重次郎企图反

抗，被当场击毙。这一仗缴获各种枪支 50 余支（其中一挺轻机枪）和大量粮食、棉花、布匹、军装，部队撤出县城前，又散发了《告父老同胞书》。

在我大队人马撤出县城后，陈翰章命令后卫部队有意向两个敌人据点打了几排枪。片刻间敌人据点乱做一团，胡乱向外射击，枪炮声响成一片，白费了许多子弹。

我军胜利完成任务，背着战利品，押着俘虏撤出县城后，为了引诱敌人上钩，特意顺着来时的行军路线往回走。过了青沟子，进入大雪封盖的深山老林后，队伍停下休息，教育、释放了俘虏。事隔两天，11月9日早敌人“讨伐队”循着抗联的足迹追上来了。敌人拼凑了驻吉林的小村部队和驻蛟河的守备队共 300 多日本兵，加上县警务科以日本人下西为首的、临时从各伪警察署、分驻所、森林警察队抽调而来的 400 多伪警察，号称千人。陈翰章率队边打边走，在广阔的海雪原之中反复迂回穿插，引敌追击。敌人依仗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穷追不舍。这天过午，敌军闯进了我军事先埋伏好的包围圈小青顶子。这里是两坡夹一沟，南北宽五、六华里，东西长十多华里，夏天沼泽里长着没人深的荒草，人畜不慎就有陷进深沟不能自拔的危险。敌军来到后，一个日军军官拿起望远镜四下张望。突然，埋伏在山坡高地的抗联战士枪弹齐发，敌人还未来得及还手，就已有 20 多个日本侵略者倒下。敌人凭借猛烈的炮火拼命向高地冲来。抗联战士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下午 3 点，敌人仍在猛扑，陈翰章知道，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一面观察战况一面思考退兵之策。山下草塘中的芦苇有几处被炮火燃着，冒出呛人的浓烟，这引起陈翰章的注意。他立即令部分战士下山，在芦苇塘的西北角点

燃了芦苇。干透了的芦苇、荒草立即熊熊燃烧起来，西北风一吹，风借火力，火助风威，整个草塘顿时成了浓烟滚滚的火海。敌军吓得鬼哭狼嚎，东奔西突。趁敌人慌乱之际，我军发起了冲锋，200多名象猛虎一样的战士，向山下扑去，他们用手榴弹炸，用枪打，用刀砍，用刺刀挑……鬼子兵虽然受过严格的武士道训练，但身着厚厚的大衣，脚穿大头鞋行动不便，再加上战斗序列被打乱，哪里经得住抗联战士的冲杀。伪军和警察更是军无斗志，当场有40多伪警乖乖地向抗联战士举枪投降，其余的趴在雪地上，龟缩成一团，再不肯为他们的主子卖命。

夕阳西下，我军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人，大部分迅速撤出阵地，向青顶子以北转移。日伪军经过一阵火烧，杀伤，见大势已去，便趁夜幕降临，仓惶向额穆县城溃去。火烧芦苇塘，俘伪警40多人，伪军连长邱某某被击毙；日本军警死50多人，重伤20余人。

智过三岔口

日伪军在几天内连打两次败仗，吃了大亏，怎能善罢甘休。3天后，他们从蛟河、敦化、宁安、海林、牡丹江等地调来大批人马，从额穆到青沟子一线挤满子日伪军警部队，他们象拉网似的逐个山头搜索，每搜完一处就留下部分兵力，以防止抗联迂回潜入。不少抗联密营遭破坏，陈翰章所部不得不一步步向南转移。一天，他们来到敦化黄泥河西南10里的五人班屯，抓住了正在赌钱的姚警尉补。从他嘴里得知黄泥河伪警察署存有进山“讨伐”部队的口粮给养，于是他们押着姚警尉补来到黄泥河，命令他叫开了伪警察署的大门，一举攻占了伪警察署。战士们砸开仓库，得到了大批给养。敌人“进剿”多日，终于发现了陈翰章的行踪，遂令大

部兵力向黄泥河扑来。敌人以为陈翰章已被逼入死亡三角区，不禁洋洋得意。确实，这时抗联处境十分险恶，南面是敦化至延吉的铁路，沿线深沟护卫，碉堡林立，有护路队、警备队等把守；东面是敦化至宁安的公路，路面开阔且夹在两侧大山之间，山上有日伪军居高临下日夜监视着公路的动静；西面和北面则是一路“追剿”而来的日伪“讨伐军”。怎么办？为保存有生的抗日力量，粉碎敌人的“讨伐”计划，必须死里逃生，陈翰章决定从黑石岭过牡丹江向宁安靠拢。

黑石村位于额穆以北，敦化以南，是个较大的村子，有大路东通官地。黑石岭下的三岔口江桥是东渡牡丹江的必经之路，守桥敌军已得到上峰命令，把沿江船只都集中看管起来，江桥两头都修了隐蔽工事，桥面上设暗哨，只等抗联部队经过时，来个东西夹击一举歼灭。

陈翰章率队来到后，见三岔口江桥异常平静，他感到奇怪。按惯例，被围追堵截的抗联，很有可能过牡丹江北上，这是常识，敌人不会不知道；既然知道，桥头、河岸应设重兵堵截才是正理。在没事的情况下，桥头设岗盘查行人早已司空见惯，为什么今天倒无人防守？这里一定有诈。陈翰章隐蔽了部队，亲自到江桥附近观察：沿江没有一只船，桥上行人稀少，也没有日伪军露面……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设下埋伏，准备阻击大部队。陈翰章将计就计，把部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4至5人或5至10人，陆续过桥。过桥后立即抢占制高点，做好战斗准备。部队开始过桥了。第一组过桥，敌人以为是尖兵，放过去了；第二组上桥，敌人又以为是零散部队，又放过去了；接着第三组、第四组……接连过去很多人，敌人才发现上当了，马上开枪，我军随即

在江桥两岸一齐开火。敌人经不住两面夹击，防线很快就崩溃了，陈翰章率领部队胜利渡过了江桥。待敌人增援部队赶到时，我军早已过桥，凭借牡丹江这条天然屏障阻止了敌人的追击。

守候在官地之敌接到黑石打响的报告，立即顺公路赶往黑石。愚蠢的敌人把抗联想象得太简单了，他们认为黑石至官地只有一条路，抗联即使渡过江桥，必走公路经官地，而他们顺公路西进，可能给抗联一个迎头痛击。他们哪里知道，陈翰章早知官地有敌军守卫，过了三岔口江桥后，部队立即下了公路，沿着无人行走的牡丹江河谷向下游奔去，在大山嘴上上了公路。额穆、三岔口、官地之敌汇合后，知道陈翰章已上了公路直奔宁安，这时再想派兵追赶早已来不及了。

张永生

越 狱 记

伪满吉林省第一监狱（也称省模范监狱），座落在吉林市巴虎门里，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监狱高墙深院，墙上拦着电网。三道大门有荷枪实弹的狱警看守。监狱四角高高的岗楼上，昼夜有狱警架着机关枪守护。

当时全省被判重刑的所谓“要犯”，如共产党员、抗联战士，爱国志士，江洋大盗等，都集中关押在这里，有数百人之多。

“模范”监狱 顿起风波

1939年9月16日，吉林监狱晚点名时，发现少了两名“思想犯”（即政治犯）。

嚯！吉林监狱即刻乱套喽！

代理典狱长、各部部长和各牢房的狱头，举着灯笼火把找遍整个监狱的犄角旮旯，也不见两个“犯人”的踪影。因“案情重大”，代理典狱长瞞是瞞不住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向上峰报告。

伪吉林省警务厅接到报告后，十万火急连发三道通缉令。省城的警察、宪兵、特务倾巢出洞，四处追捕。伪新京司法部的要员也来吉林坐阵指挥缉拿“逃犯”。3天过去了，毫无结果。伪满《大同报》首先披露了“犯人”脱逃消息。写道：“吉林监狱羁押中之犯人于某等两名，均因某种重罪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于昨日午后3时顷，用巧妙手腕乘人不备，于服役工作时由监中脱出，两名同时潜逃无踪……并有一现职人员与之同逃，至18日午前

尚无着落……。”

报纸消息一发，本已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的日伪当局，更添一份“熬糟”。但是，客观上却替“逃犯”做了义务宣传。

身陷牢狱 心怀自由

越狱者之一，名叫于树功，40来岁，河北省静海县人。他原在北平读书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受党组织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业后被派到苏联炮兵学校学习二年军事。

1929年冬，在我国东北发生“中东路事件”，整营、整团的东北军官兵，被苏联红军俘虏，关在西伯利亚战俘营。1930年初，于树功被苏方派到伯力战俘营当营长，化名朱晖文，管理被俘的东北军，至同年夏季，苏联把东北军战俘全部遣返回国。

1931年3月，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门掌握日本关东军有蠢蠢欲动的迹象，决定派于树功潜回东北，侦察日军动向。起初于树功不愿接受任务，理由是许多东北军官兵都认识他这个俘虏营长，到东北等于自投罗网，麻烦太多。他的意见被驳回，还得执行苏军命令。结果，于树功刚到松花江下游的富锦县城，即被驻军捉住。这些外战外行、同外国人打仗充当俘虏，而在国内整治自己的同胞却有两下子的丘八们，抓住于树功怎能轻饶他。把他打的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还要枪毙他，借以报负“老毛子”。

于树功为了活下来，争取将来再同反动派算帐，他胡编了一套假口供，把派遣任务说得玄乎其玄，真把那当官的唬住了。他们不敢自作主张就地枪毙他，而是层层上报，递上初审笔录，最后报到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

作相门下。于是，于树功就被押解到吉林省城，交省高等法院审理。最后，以“叛徒罪”将于树功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于树功被关押在吉林监狱的来龙去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皇帝溥仪在新京（长春）登基，实行所谓“特赦”。于树功被减判15年有期徒刑。到了1939年于树功已在吉林监狱熬过9个春秋。然而，沉重的脚镣没有磨灭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壁垒森严的牢房锁不住革命者向往自由的胸怀。于树功每天节带沉重的脚镣坚持锻炼身体，他等待着，寻觅着，观察着，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被他等来了。

秘密活动 播洒火种

于树功在监狱里“遵守监规”，“老实服役”，被认为是“品质最佳”犯人，得到狱方“信任”，于是给他去掉脚镣，派到医务科当杂役，干些烧水、扫地、送水、送药等杂活，比其他犯人相对有了些“自由”。

1936年，吉林监狱医务科新来一位20左右岁的青年，名叫赵绍先，在药局（药房）做调剂，在监狱不管什么部门工作，统称看守，犯人对他就称赵看守。

赵绍先家住乌拉街，原来在永吉县中（吉林市内）读书，因家贫交不起学费辍学。托人介绍到吉林希天医院学徒，已有两年了。该院院长孙宗尧先生与监狱医务科的黄科长交好，一天，黄科长谈及监狱医务科缺一名药剂员，请孙院长帮忙物色，于是，孙完尧即把赵绍先推荐给黄科长。

赵绍先到监狱医务科正式上班后，黄科长告诉他，杂役犯人叫于树功，是共产党“思想犯”，还是留过洋的大学生哩。

赵绍先在县中读书时就听说共产党是穷入党，也有人骂

他们是“红胡子”、“共匪”，可是从来没见过。他在心里琢磨，像于树功这样留过洋、有学问的人，怎么也是共产党呢？他很奇怪，天天注意观察于树功的一举一动。一天，趁医务科没有人，赵绍先悄悄问于树功：“你真是共产党吗？”

于树功也早注意这位赵看守了。他虽然也穿着狱警黑制服，但是，他年轻，单纯，没有染上一般狱警的恶习。他曾暗想，这位或许是我争取的对象吧？

这回赵绍先主动发问，从他的口气和眼神里看不出什么恶意，于是轻轻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往来的话语多起来了。因为赵绍先并不满足于知道于树功是否是共产党员，他的好奇心驱使他要解开心中的谜团，必须求教于这个老成持重的“犯人”。若只有他们两个人时，赵绍先就问有关共产党、红军的事情，于树功一改过去的沉默寡言的态度，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苏联留学的见闻，称赞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讲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官僚地主剥削、压迫穷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救国的道理。赵绍先每次都听得专注、入神，心里折服。于树功还经常向赵绍先灌输“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不愿当亡国奴，就要团结斗争”的观点。久而久之，赵绍先认为于树功有骨气，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由衷地敬佩这位穿着囚衣的长者，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真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于树功在阴暗的监牢里播下的革命的种子，开始发芽、生根，而且很快就要开花结果了。

患难之交 心心相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38年。一天，赵绍先问于树功，“将来你出去想干什么？”“老本行。”于树功毫不动摇的说。

“我也和你去投共产党吧！”赵绍先试探着说。

于树功心里的话被赵绍先说出来，觉得他有胆有识，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有为青年。

接着，赵绍先坚定、诚恳地说：“老于，我带你逃出去吧，我一天也不愿与汉奸为伍，在这残害同胞了。”于树功被感动了，说：“小赵，我十分感谢你，也相信你的诚意。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要走，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条件具备了，才能万无一失。一旦疏忽，草率从事，将造成千古遗恨。”赵绍先被说服了，他佩服这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遇事冷静，沉着，考虑问题周全。

这年8月，新监房又增加一个犯人。于树功经常给犯人送药，发现这个新犯人举止文雅，不爱说话，不参与别的犯人间的花言乱侃。他想，这个人一定有些来历，得想法试探一下。有一天，于树功来到新监，趁看守离开廊道，凑近铁栏边低声问：“哪来的，什么罪？”

“哈尔滨转来的，叛徒罪。”那人当地口音，他说的“叛徒罪”，通指反满抗日的共产党员，抗联战士等。于树功心里有了底，一有机会就同他说几句话，渐渐知道，他叫赫长荣，吉林省德惠县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任秘书，曾为李大钊烈士撰写过碑文，后入党。北京党组织遭破坏后，转移到哈尔滨，以私立大陆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8年初，因坏人告密被捕，判处15年有期徒刑，转来吉林监狱服刑。

于树功把赫长荣的情况告诉了赵绍先，让他进一步考

察、了解。当然，他也把赵绍先介绍给赫长荣，是信得过的朋友，有事可找他帮忙。

1939年春天，赫长荣请赵绍先托人“保外就医”，争取出狱后再设法营救于树功。赵绍先认为，托人找门子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动监狱的大鬼、小鬼，实在不上算，有钱不如逃跑做路费。这件事更促使他下决心，带领于树功、赫长荣逃离监牢。

万事具备 只欠东风

1939年5月的一天，黄科长有事外出，让赵绍先代劳。赫长荣趁机请假到医务科“看病”。赵、于、赫3人在药房里研究越狱计划。他们最后商定4条：一要备足路费；二要找好落脚点；三要有人联络接应；四要找最好时机。

赫长荣写信让爱人何怡平来探监，偷偷地把机密事告诉她，让她找赵绍先联系，协助做好准备。何怡平与赫长荣原来都在北平读书，也曾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很支持丈夫的革命工作。听赵绍先讲了详细越狱计划，她表示路费花销全包了，并负责找好落脚点和接应工作。

何怡平回到德惠同婆母商量，卖掉10垧好地，得款1000元。她到米砂子赫长荣的表哥李万镒家安排第一落脚点，又给北平的同学、好友写信，安排他们帮助接待朋友等事情。这些事情落实以后，她都及时告诉了赵绍先。

赵绍先这些天格外忙，既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备考参加晋级考试，居然以“优异成绩”晋升为“委任官”看守部长。同僚称赞赵绍先“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逢场做戏、掩人耳目而已。

赵绍先趁星期天休息，带着于树功的亲笔信，找到曾是于树功的同监难友谢雨天先生。谢雨天原来在吉林五中任

教务主任。为人正直，富有反帝爱国思想。1930年10月，因反动的国民党员朱一士诬告而被捕，成为“吉林五中共产党案”的受害者，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吉林监狱里，谢雨天与于树功相识、相知而成至交。谢出狱后时常资助于树功，且常有书信往来。

谢雨天看了于树功的信，听了赵绍先的介绍，非常高兴，表示支持他们的举动，慷慨资助200元伪币。赵绍先牢记谢雨天的叮嘱，要“慎密、周详、机警、沉着”，不辜负这些正直的中国人的期望。

赵绍先自己也凑了100多元钱，共1300元，费用足够了。他照常上班，经常早去晚归，争着替别人值夜班。在同僚眼里，赵绍先晋升部长后是何等尽职尽责啊！

巧遇良机 逃脱牢笼

伪满监狱典狱长实行轮换调动制。1939年9月初，吉林监狱姓齐的典狱长在吉林任职期满，要调到奉天（沈阳）监狱。赵绍先得知这个信息立即报告于树功，说：“机会来了，旧的要走，新的未到，趁群龙无首的时候，我们行动。”于树功当然也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位老共产党员，社会经历、革命斗争经验多，沉思一下说：“时机成熟，不可错过。但是你要弄到合法签证手续，走出狱门，才能不留隐患。尽可能争取延缓敌人发觉、追捕时间，这样我们才能成功。”

赵绍先心领神会，仔细琢磨老于每句话的分量，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到赫长荣服役的印刷工厂，告诉他做准备，“装病”，在病号监里看管不严，便于行动。

赵绍先从监狱档案室借出一些犯人档案，当然包括于树功和赫长荣的。他把他们两人的照片扣下，偷办了两张“良

民证”（改名换姓的身份证）。同时，他趁值夜班时，把自己的档案偷出来，同于、赫的一齐销毁了。

赵绍先有个美满的家庭，新婚妻子金晰文，吉林女高毕业。她长的漂亮，人又机敏，接受新事物快，在丈夫的启发引导下，逐渐产生了反满抗日思想。赵绍先把决心冒死营救两位共产党员越狱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妻子，她完全赞成，支持丈夫的义举，并自愿协助他做接应工作。

9月13日，黄科长交给赵绍先一项任务，说是代理典狱长让医务科带几名犯人给未到任的新典狱长公馆扫除、消毒。赵绍先马上把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转告给于树功、赫长荣，经商量决定15日行动，让赫长荣当晚即装病。

何怡平早已来到吉林，专候接应。金晰文协助她买好了3套西装礼帽、皮鞋，就连剃刀、香皂、毛巾、手帕以及内衣等物品也都买了3套，分别装在3支手提箱里。

赵绍先告诉何、金二人，买好15日由延吉（经吉林）开往长春的的火车票。

天有不测风云，9月15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三，赵绍先一早就请代理典狱长签发押解犯人外出作业的出门证。谁知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快晌午了还不见天晴。监狱规定，凡下雨天禁止犯人外出作业。赵绍先着急、后悔，为什么没想到会有雨天，事先做好应变准备呢？更急的是何怡平、金晰文，火车已经开走了还不见他们人影，计划变更了，还是出事了？何怡平急中生智，找个僻静处给赵绍先打电话。

“喂，你是绍先吗？我是大姐，听说今天送客人走吗？”她用隐语询问。

“啊，今天客人不走了，下雨天留客么，你不用着急，

明天晴了再送客人走也不迟呀！”他一语双关，何怡平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9月16日，晴空万里，秋雨过后有些凉意，人们的精神格外清爽。

8点30分钟，吉林监狱洞门大开，门警验过出门证，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轻的看守部长，穿着笔挺的警服，挎着洋刀，押解两名扛着扫帚、铁锹，身背消毒器的“犯人”，向东南方向的胡同走去。他们三转两拐，进了原法院废弃的旧房里。这地方十分僻静，很少有人来，赵绍先早已侦察好的理想所在。于赫二人放下工具，迅速脱掉囚衣，露出一般百姓穿的衣裳，这是他们早已备好，头天晚上就已穿好了。

赵绍先把警服脱掉，连同洋刀、囚衣卷在一起，用破砖烂瓦盖起来。然后，赵绍先引路，3个人保持一定距离，来到通天街（现解放路）雇了3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

何怡平、金晰文买好车票早已等在车站。他们每人接一支衣箱，到厕所里去换装。于、赫二人在卫生间刮去胡须，换上衣服。出来时，两人西服革履，礼帽领带，穿着考究，显得十分精神，谁还会怀疑他们的身份呢？

火车一声长鸣，开出吉林车站，带走了生的希望，抛在身后的是苦难的囚徒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树功辗转回到北平。建国后重新入党，任北京文物工作队队长，致力于文物保护、研究工作。1985年病逝，享年86岁。赵绍先、赫长荣被党组织派回吉林省工作。赵绍先改名赵晰、赵公民，曾任永南县长。建国后在吉林省卫生厅任副厅长。“文革”武斗期间，不幸在长春遇害，年仅49岁。赫长荣改名李复、赫询。建国后先后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车间主任，省科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1984年在长春病逝。

徐 奔

“陈三秧子”送粮

1939年秋天，抗日英雄魏拯民同志率领一部分抗日健儿在抚松县的嘟噜河同日军打了一仗。在这次战斗中，虽然打死打伤很多敌人，但是，终因敌众我寡，我军不得不冲出重围，做战略性转移。在突围时，魏拯民负了轻伤。

战士们用两根木棍套上衣服支撑起来，做了一付简易担架，抬着魏拯民同志经过几天跋涉，转移到金银崮江南的扫屁股砬子，休整了一冬。第二年开春以后，部队开始出击，经过几个月的转战，到1940年秋末冬初，部队来到桦甸县夹皮沟岭东的二道河子。

当时，很多密营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二道河子是郭池山副官的密营，由于日本鬼子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逼迫散户归村并屯，打算切断老百姓与抗联的联系，使密营里早就断了粮食，生活十分艰苦。

魏拯民同志住进二道河子郭池山的密营之后，一来因为伤未完全好，二来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胃病，缺医少药，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没有粮食，大家只好以菜叶子、野蘑菇和松树皮充饥。战士们把松树的老皮剥掉，取下里边的一层嫩皮用凉水泡过，上锅加水焙干，用刀剁碎，再放在石臼里捣烂，没有箩，就用钉子把脸盆底扎上眼儿代替，筛成面煮着吃。要说荤腥儿，那也就是跑到二、三里地远的山涧小溪里捉几只喇蛄，放在火上烧一烧，也就算是改善生活了。由于生活条件过于艰苦，战士们一个个都面色苍白。有的人还得了浮肿病，魏拯民同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忍痛让战士把自己心爱的战马杀掉，大家吃了几天，度过了一

时的难关。

马肉吃光了，照样吃树皮、草根。警卫排长黄正爱眼瞅着魏拯民同志的身体渐渐衰弱下去，十分心疼。他眼含热泪地说：“副司令，让我带几名战士到后山去打野兽吃吧！”魏拯民同志考虑再三，批准了他的请求。不过，在临行前特别嘱咐他：“我们虽然身居密营，也尽量不要打枪，免得枪声响过暴露目标，所以，你们要多加小心！”黄正爱说：“请您放心吧！警卫排前些日子巡逻，看见山后一个树洞里有一只蹲仓子的黑熊。我们多带几把斧子，不必开枪！”说完，他挑选了几名警卫战士就出发了。几个年轻的警卫战士出去了一天，魏拯民放心不下，惦记了一天。晚上，战士们回来了。黑熊是打来了，可黄正爱排长却被负伤的黑熊咬成重伤，这位可敬的从朝鲜过江而来的国际主义战士，当晚就停止了呼吸，牺牲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

密营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苦，魏拯民想方设法为战士们搞些给养。当时，抗联里有很多人在“家理”，魏拯民也是在“家理”的。去年六月，他还在二道河摆过香堂，借以联系群众。于是，他就利用家理教讲义气的有利条件，派郭池山下山到夹皮沟联系。

郭池山副官对夹皮沟一带很熟。他穿密林，走小路，在夹皮沟东大岭上遇见了一个砍柴的。两个人一唠扯，都是在“家理”的，越唠越近乎。砍柴的人说：“我叫陈德寿，家住夹皮沟。郭副官，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弄点给养！”于是，两个人就隔三差五地在这东大岭上接头。

提起陈德寿，在这夹皮沟屯是小有名气的。他这名气倒不是家大业大，或者有权有势，只因他仗义疏财，磕头拜把

子，什么人都交，再加上有些游手好闲，穷人摆个阔架子，所以弄了个外号——“陈三秧子”。在那艰苦岁月里，他还真没少为抗联出力。他不光为魏拯民的部队搞过给养，后来还接济过金日成的部队呢！

在一回，陈三秧子打听到夹皮沟东卡子门那儿是他一个磕头的把兄弟站岗，便准备从那儿出去给抗联送粮。他带了粮食刚要出卡子，可临时来了一个日本鬼子，把他抓进了警察分所。日本鬼子看他带些粮食要出去肯定是私通抗联，于是就压杠子、灌辣椒水……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肚皮都打破了。这陈德寿也算是一条汉子，不管鬼子施用什么酷刑，他硬是咬紧牙关，到底也没有供出抗联的下落。关了半个多月，鬼子看看没啥结果，才由夹皮沟几家商号出头具保，花了些钱把他保释出来，养了三个多月伤才好了。

转眼到了冬天，密营里药断粮绝，这事儿可急坏了陈德寿。立冬以后，又下了一场小雪，人一行动，雪地上就留下一串脚印，再加上夹皮沟四处修起了高高的围墙，自卫团白天黑夜地敲梆子站岗，直是令人插翅难飞。陈德寿想来想去，只好假装上山砍柴，每天揣上几个大饼子出去。这大饼子还不能多揣，揣多了，出卡子门又是麻烦。到了东大岭接头的地方就把大饼子放在一块巨石后面，等着抗联战士来取，他自己则饿着肚皮。尽管他家里的柴禾几年也烧不完，可还得假装着砍些木头，扛起来歪歪咧咧地往回走。因为肚子饿，十有九回到了家里一身虚汗，弄得衬衣象水洗的似的。老伴劝他多注意身体，他却笑着说：“咱们流点汗，比起抗联战士流血牺牲可差得远着呢！”

这一天，早晨起来天就阴得沉甸甸的。陈德寿高兴了，他白天足足睡了一天大觉。到了傍晚，天上飘起了鹅毛大

雪。他把早已准备好了的一斗苞米楂子、二升小米，还有几碗盐和一包火柴用背夹子绑好，背起来顶着大雪来到了房后的一条小河沟上。原来日本鬼子修大墙时，到这小河沟上没法修，只好把墙架空过了河沟子。现在小河沟早已结冰封冻，冰上有一个小洞，将就着能钻过一个人去。他听着自卫团的梆子声渐渐远去，就先把粮食等从洞里塞了过去，自己跟着也爬了出去。然后他顶着大雪，背起背夹子爬上北山，走五道岔，奔北大顶子，一口气来到二道河子密营。

密营里，魏拯同志病得很重，连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去，大家正想派人下山联系，正好陈德寿来了。魏拯民同志很高兴，坐起来拉着老陈的手说：“老陈，怎么这么些日子没见你来？”陈德寿说：“别提了！副司令，夹皮沟所有进山的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日本鬼子扬言要把抗联饿死冻死在山上，街里白天黑夜搜查得很厉害，弄得老百姓不得安生！”“真难为你了，这么困难的环境，你还来给我们送粮。”魏拯民说到这里停了停，环视了一下四周的抗联战士们说：“敌人想切断我们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那是痴心妄想。大家应当牢记，不论在什么时候，人民群众都在支持我们！我们要把人民群众给予我们的支持化作力量，去消灭日本鬼子！”陈德寿听了魏拯民对人民群众的赞许，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唠扯一阵，陈德寿说：“副司令，这些天，一粒粮食也没有，你们是怎么过的？”没等魏拯民答话，一个战士揭开锅盖说：“老陈！你看……”陈德寿往锅里一看，煮了一锅干广东菜叶子。他心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副司令！这些日子叫你们受苦了！”“为革命吃点苦算得了什么？要知道，干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别看敌人张牙舞爪，用不

上几年，他们就完蛋了。到那时候，建立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我们就该过上幸福的日子了。”陈德寿笑着说：“副司令，我今年都五十开外的年纪了，恐怕赶不上了。”魏拯民同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家伙！你以为这样的日子还会很远吗？”一席话，把大伙都说乐了。

陈德寿怕回去晚了天一亮惹出麻烦，就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魏拯民和战士们，后半夜顶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夹皮沟。因为天上始终下着大雪，所以，陈德寿送米上山，来去都没有留下脚印。

二十年后——一九五九年夏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化访华团来到中国。有一位文化部副部长遵照金日成主席的指示，来桦甸拜望为金日成多次送过给养的张忠胜。很遗憾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见到这位支援抗联有功的人。这个文化访华团在桦甸逗留期间，听民政部门的同志介绍了陈德寿为金日成部队送过给养的事后，访华团专程驱车赶到夹皮沟拜望了陈德寿。因为他为抗联作过贡献，访华团赠给他一枚朝鲜国旗勋章。

徐明举

乔 装 取 粮

那是1939年初冬，山里早已飘起雪花，大地渐渐封冻了。龙凤村的农民们都聚集在自家的小场院里打场。他们手捧着金灿灿的粮食，心里琢磨着：粮食打下来了，如果不赶快隐藏起来，叫日本鬼子发现了，轻者给抢走，重者给你扣上私通抗联的罪名，非治罪不可。再说，村里还有自卫团丁，他们整天盯着农民，不准任何人私自进山，怕老百姓和抗联通气。因此，大家都起早贪黑的干。

原来龙凤村这一带，地处北大秧山区，当地农民早就和经常在这一带森林里活动的抗日联军陈翰章的队伍有联系，军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农民们每年打下粮食，首先想到的是长年战斗在深山密林里的抗日联军，总要想尽办法把粮食运进山里，接济抗联队伍。他们有时把打下的粮食加工好，用袋子装上，夜间趁团丁不注意的时候，送到抗日联军经常出没的路口，或者放到指定地点，等着抗联队伍来取走。

这一天上午，农民正在场院里忙着，只听压场的碌子吱吱嘎嘎地响着，场上的农民，翻场的翻场，扬场的扬场，装袋子的装袋子。正当这时，从村外走来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讨伐队。场上的农民一看这阵势，不禁提心吊胆起来，心想：“信早捎去了，怎么还不见队伍里的人下山呢？这下子又完了，准是坏蛋给鬼子告了密，他们才提前来抢粮食！”几个年岁大的农民不放心，偷偷尾随讨伐队想看个究竟。讨伐队进村后，没有解散，步伐整齐，直奔自卫团丁的住所。你知道这支讨伐队到底是什么人吗？他们就是抗日联军的一个支队，在陈翰章的带领下，按约定的时间下山来取

粮食了。

村里的自卫团丁此时正呆在住所里鬼混。有的喝酒，有的赌博，还有的团丁到村子里去捞“外快”。他们这帮家伙，作梦也没有想到抗联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伪自卫团长林大烟（抽大烟）听团丁报告外边来了一队日本讨伐队，急忙放下手里的赌具，来到外面迎接。

抗联队伍里有个中等身材的车轴汉子胖李，一脸胡茬子，象个小日本鬼子，他走出队伍，向站在院中点头哈腰的自卫团长问话：

“共军来了没有？”

伪自卫团长战战兢兢地回答：“没有，没有！”

胖李见自卫团团部门前没有站岗的人，又质问说：“站岗的哪边干活去了？”话音还没落，林大烟的脸上就响起了“啪啪”的嘴巴声。“自卫团的干什么去了？”伪自卫团长不敢怠慢，忙把二十几个在家的团丁喊到一起，列成一队，一个个站得象木头棒子似的等着挨训。

陈翰章一看时机已到，对着战士们一挥手，穿着讨伐队外衣的抗联战士一拥而上，缴下了自卫团丁的全部枪支。站在一边的农民见自卫团被缴了械，知道这里准有差头。这时，只听有人喊：“乡亲们，我们是抗联队伍，今天来和自卫团‘算帐’，不给他们点厉害，他们是不老实的……”原来这支“日本讨伐队”正是大家天天盼的陈翰章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乔装改扮来到山里取粮，捎带着把自卫团给收拾了。群众们纷纷把准备好的粮食拿出来，装上大车，随着抗联队伍一同把粮食送进山里。

王凤阁

李承雨单刀赴会

1933年的初春，乍暖还寒，凉气袭人，浑浊的乌云笼罩着磐石县红石砬子八家沟的群山。在密林深处，中共磐石县委正在召开重要会议。

一座简陋的用圆木桩搭成的窝棚里，七、八条汉子围坐在长方形青石板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位浓眉大眼、年约20多岁小伙子的讲话。提起这位年轻人，在磐石县内的革命群众中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年仅18岁就曾率领百余贫苦农民大闹县衙，火烧恶霸地主宅院刘家楼。参加革命后，他风里来雨里去，踏遍磐石的山山水水，宣传抗日，发展抗日组织，发动群众，为驱除侵略者，挽救垂危的祖国而艰辛地工作着、战斗着。他就是中共磐石县委组织部长李承雨，熟悉他的农民都亲切地称他为“李先生”。

此刻，李承雨正兴奋地向县委汇报磐石县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和团结各方抗日力量的统战工作情况。

“磐石地区，在镇压了三个民愤极大的铁杆汉奸并对他们镇压抗日活动、挑拨离间汉、朝民族关系的罪行进行清算之后，人民发动起来了……我们应该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还要把那些‘双料’货山林队引上保境安民、抗击日寇的正路上来……”

没等李承雨把话说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讲话。一位放哨的士兵进了窝棚，“宋国荣（原东北军营长）的副官给李先生送来一份请帖，送信人正在门口等候。”

李承雨略一沉吟，站起来对众人说了声“我去去就来”，旋即同那位战士走了出去。

风停息了，天依然阴沉着。李承雨和放哨的战士顺着沟上的林中小路来到沟口。经放哨战士的介绍，一个身穿灰军装、头戴藏青礼帽的瘦高个汉子“啪”地一个立正，向李承雨敬个礼说：“李先生，宋营长同各路首领请您去共商联合抗日大计，务请光临！”随即双手奉上红底儿黑字的请帖。李承雨当即对送信人说：“请转告宋营长和各路首领，李某一定按期赴会！”

李承雨回到窝棚之后，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领导认为，有些救国军、山林队反复无常，加上近来日伪军的疯狂“围剿”抗联，所以让不让李承雨前去赴会有些犹豫不决。李承雨听完县委领导的议论之后，胸有成竹地说：“我常和这些抗日军打交道，他们的首领多数是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汉子，我相信会说服他们共同抗日的。不入虎穴，难得虎子。只要能扩大抗日力量，纵然冒点风险也值得！”县委又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后才同意李承雨单刀赴会。

翌日午后，天朗气清，在重峦迭嶂、奇峰绝顶的大炕山下，走着两位青布裤褂短衣打扮、腰插短枪的年轻人。大步流星走在前面的那位眉宇间透着威武和刚毅的小伙子就是李承雨，紧随其后的是警卫员小刘。他们踏着松软的积雪，穿过密林向山上攀行。他们攀上山顶，迎面是两峰夹一沟的山口。他们刚来到沟口，忽听一声断喝：“来者报号！”接着是拉动枪栓的响声。李承雨当即回答：“在下李承雨，奉宋营长之邀前来赴会！”他的语音刚落，从山口两旁“噌噌”窜出一高一矮两个身着灰军装、双手端枪的汉子，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审视半天，又对他们背后的山下望了一下才收起枪，拱手道：“原来是李先生，得罪、得罪！”李承雨微微一笑说道：“不知者不怪，请二位前面带路！”

那两个汉子面面相觑，面现难色。矮壮汉子上前一步嗷嗷地说道：“李先生，按山里的规矩，客人进山前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也不能带随从前往，您看……”。

“好，就按山里规矩办！”李承雨拔出腰间短枪回身递给警卫员小刘大声说：“你先回去，太阳落山前我一定赶回！”说完他又暗地向小刘递个眼色，意思是按原先说的办。原来李承雨早已料到只能一个人进山赴会，所以约定小刘在山下等候，如果太阳落山还不见他下山就一定是出事了，要他立即回去报信。

“李先生……”没等小刘说完，李承雨已随两个放哨的汉子走进了山口。

拐过山口，他们顺着大炕山北坡，踏着林中的积雪向山上攀登，来到一处比较空旷的雪地。高瘦汉子指着对面说：“到了，请李先生等一下，我去通报！”李承雨向对面一看，仍然是雪地和一排排高大的树木，只是不远处堆放着一排排伐下来的原木。原来这就是宋国荣所部的密营。所谓密营，就是宋国荣依山建造的地下窑洞，窑洞上面用伐下的原木垒成棚盖，半地上，半地下，远远看去只是一排排堆放的原木。这种窑洞，冬暖夏凉，又很隐蔽，当地群众称作“地窖子”。

那瘦高汉子回来后说了声：“请”，便领着李承雨来到一排隐蔽得十分巧妙的地窖子前。李承雨侧目一看，只见周围都有暗哨藏在树后或树上。在一座较大的地窖子前，宋国荣领着几位首领迎接着李承雨。走进地窖子，里面点着数盏煤油灯，一字排开的简陋长桌，木凳。宾主落座之后，宋国荣一一介绍了“青山好”、“红枪会”、“赵旅”、“马团”的首领。众人寒暄一阵之后，很快就转入了正题。

宋国荣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慢悠悠地说道：“宋某不才，蒙各路首领推举，今日在此作东，邀请李先生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不知李先生有何高见？”

李承雨站起来一拱手说：“诸位，承蒙厚爱，在下多谢了！大家都知道，自日本人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占了我东三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远的不说，前不久，在黑石沟子，灭绝人性的日本人用松木杆和铁丝把20多人绑在一起，然后一批一批地用机枪射死，尸积如山，沟里几天流出的水都是殷红的血水，全村300多口人死伤大半哪！赵三大爷的儿媳正怀孕，日本人将她轮奸后用刺刀把胎儿剜出母腹……。”

泪光莹莹、眼喷怒火的李承雨一番述说，令在座的无不悲愤难忍。

李承雨揩干眼中的泪水，顿了顿又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家从前虽然有些怨愤，但是在国仇家恨面前，这又算得了什么！在这国家危难的时候，大家应拧成一股绳，一起同日本人血战到底，光复我东三省大好河山！为我惨死的同胞报仇，为张大帅报仇！”

李承雨的最后一句话深深触到了宋国荣和赵旅、马团首领的痛处。他们三人都是前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旧部，当年曾随张作霖出生入死，啸聚山林。张作霖登上大帅宝座之后，他们也都被封官晋职，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他们悲痛欲绝，立志为“大帅”报仇，甚至当东北军奉命撤往关内也不愿同去，执意拉出人马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宋、赵、马三人同时挺身站起，宋国荣向李承雨一抱拳说：“大帅捐躯，百姓涂炭，我们兄弟没齿不忘！”其他三位首领也先后站起来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杀敌报

国。

这时，宋国荣面向众人一拱手说：“今日诸位义气相投，心同一理，兄弟备薄酒一杯，以示庆贺，大家请！”众人也不谦让，一同就地入席，落座。

桌子上的酒菜摆上以后，宋国荣起身亲自为每个人斟满一杯酒，然后举杯说道：“今天各位团结友好，共图大业，兄弟之意，借酒一杯，发誓立盟，生死同心，抗日救国，请痛饮此杯，干！”众人齐声叫道：“干！”六只殊路同归的大碗碰撞在一起，发出清亮的脆响，在一片豪迈的纵情大笑声中，众人将酒一饮而尽。

此时，夕阳的余辉，洒向仍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起伏迭宕的峰峦。李承雨与几位盟誓抗日的首领商讨完有关联合抗日的事宜之后，才告别众人，独自循原路下山。

李承雨被这次谈判的成果鼓舞得喜不自胜，一身的疲倦和悄然袭来的醉意，都浑不知觉。等他来到和警卫员小刘约会的地点，才想起“太阳落山前见面”的约会。他四处找小刘不见，抬头看看天色，太阳已落山，四处现出朦胧之色，就加快脚步往回赶。

就在他行至小保安屯北拐子炕河边沙滩地时，突然从林中窜出七、八个黑布短袄的陌生汉子，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杀掉他。

李承雨收住脚步，镇定自若，当问清他们是赵旅、马团、毛团的人之后，冷静地说：“打死我可以，但你们得让我把这次来的情况说清楚！”于是他向这些人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与几位首领达成的协议，渐渐地，多数人都转怒为喜，自动告退，只剩下两个自称是毛团的家伙仍喋喋不休地破口大骂：“他妈的，共产党是想吃掉我们，我们

宁愿投靠日本人，也不让你们吃掉！”说着便冲了上来。

毛团原来也属东北军，宣布抗日之后，又扩充了一些土匪进来。这些人仍然匪性不改，残害群众，敌视共产党和抗联。此次得到李承雨赴会谈判的消息，便蒙蔽几个赵旅马团的人想置李承雨于死地。没想到节外生枝，反而在李承雨的劝导下走了五、六个人，不禁恼羞成怒。

李承雨知道再劝也是对牛弹琴，于事无补，于是拉开架势，严阵以待。拳来脚去几个回合，那两个匪徒仍不能占半点便宜，于是暗生毒计。一个匪徒乘机捉住了李承雨的双臂，另一个匪徒掏出匕首猛力刺进李承雨的胸部，殷红的鲜血染透了他的衣裳。李承雨双眼圆睁，怒目而视，慢慢地倒了下去。

中心县委接到警卫员小刘的报告，立即派游击队前去接应，可是为时已晚，战士和群众面对倒在血泊中的李承雨无不失声痛哭。

碧血洒黄沙，青山埋忠骨。年仅 26 岁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抗日救国的忠诚战士李承雨，就这样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入党的誓言——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长 凡

午夜行动

伊子凤站在马路边昏暗的路灯背影处，转身往后扫了几眼，连个人影也没见到，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消消汗，跺了跺冻得硬帮帮的乌拉鞋，然后对同来的老邵头说：“两个跟梢的总算被甩掉了，咱们快去找县委吧！”站在一旁的老邵头应了一声说：“好，快走吧，这么大的事情，可得让县委先知道。”两位老人一路上提心吊胆，直到进了县城，悬在半空的两颗心才算落下来。

此时正是 1945 年 12 月 18 日晚 7 点整。

伊子凤和老邵头家住前进区，两人都是县委干部家属。老邵头是县保安司令部教导员邵连奎的父亲，是个老贫农，在家排行老三，都叫他邵三叔。伊子凤是县委秘书兼妇联主任伊文治的老叔。今天一清早刚开门，两人就被土匪头子赵宝山打发的人把他们传去，硬逼着他俩到县里给混进县保安大队的伪警察李兴洲和驻蛟河县城苏联红军传送策反信。临上路前，李兴洲在前进的亲信王永富（伪满初期任蛟河兴隆校校长，后升为教育科督学官，吸烟成癖）这个坏东西，还当着两个人的面威胁说：“你们两个老家伙听着，把信送到地方没说的，若是走了风声，你们的家都住在这个屯里，你们知道该怎么办！”赵宝山怕出现意外，还暗中派了两个土匪跟在两个老人后面盯梢。

自称国民党先遣军司令的土匪头子赵宝山，前不久就预谋攻打县城，行动暴露后，在途中被县保安大队给打个落花流水，又潜回退转区。但是赵宝山贼心不死，又将残部集结

起来，勾结县保安大队的李兴洲，企图来个里应外合，攻下县城，接管新生政权，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到来。这时，县城以及附近的各区村早已在县城保安大队的控制之下，赵宝山几次企图靠近县城都没有实现，最后他想出个主意来，强迫伊子风和老邵头传送密谋策反信。是啊，这不是闹着玩的，赵宝山这个土匪头子，杀人不眨眼，邵、伊两家十几口人的生命都掌握在他的手心儿里，万一路上出点差错可就完了。两个人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策反信，转身直奔县城。

接 头

按赵宝山的指令，伊子风和老邵头进到县城后，第一个落脚点是李兴洲家里，让李兴洲知道整个行动部署，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把另一封信送到驻蛟河的苏联红军司令部，求助苏军司令部在赵宝山进攻县城时不要干预。伊子风和老邵头一想，这样不行，若是县委不知道这件事，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了，那可就坏了大事。再说，伊、邵两位老人不识字，不知道信中写的是什麼，必须把信送到县委，让县领导先看个明白。于是二人冒险分头去送信。老邵头累得气喘嘘嘘地来到县委，首先找到伊子风的侄女伊文治。伊文治是党组织从关内老根据地派来的第一任年轻的女干部。伊文治把老邵头让进办公室，边倒水边寻问着家乡的情况。老邵头哪还有心唠家常呀，忙从乌拉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纸团交给伊文治说：“这是土匪头子赵宝山硬逼我和你老叔来县城给李兴洲和驻蛟河苏联红军司令部送的信，你老叔去苏联红军司令部了。我们两个人不来送信不行，临上路时，土匪把咱人两家人都给看了起来，要是不按时把信送到，全家人都得枪毙呀！”

伊文治接过纸团展开一看，信是赵宝山的亲信王永富写

给李兴洲的，内容是要李兴洲策划好保安司令部重机枪排长李春久，在赵宝山攻打县城时从内部接应。事关重大，伊文治看完后，立即把信转交给县委书记罗孟文。

伊子风和老邵头分手后，伊子风先找到县长周化南，他送的那封信的内容是：“在赵宝山攻打县城时，希望驻蛟河苏联军队不要出面干涉……”

周化南县长看完信说：“你们二位老人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把这两封事关重大的信送来，使县里更进一步了解了这股土匪的活动情况，太感谢你们了。苏联红军那边你就不用去了，由我和他们联系。”

周县长接着叫来通讯员小康带着伊子风老人去休息，临出门时又说：“老伊，你们家属的安全问题，你们就放心吧，县大队会想办法保护他们。”

行 动

县委书记罗孟文、县长周化南分别看了赵宝山的策反信件。立即召集在机关的县委成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将计就计，粉碎这起叛乱阴谋。为了不让李兴洲等人发觉，他们又将两封策反信件折回原样，交给两位老人分别送出。

县委会上，罗孟文和周化南对粉碎这起反革命阴谋叛乱作了全面部署，命令县公安局和县保安司令部的警卫连战士全部出动，对李兴洲这伙叛乱集团的行动严加监视。

午夜时分，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公安局干警、警卫连战士等各路人马分别行动。县公安局局长刘仲武带着10多名干警来到李兴洲的住处。这是一座三合院，干警们悄声翻过土墙跳进院里。他们扒着门缝儿向里一看，见李兴洲正卧在床上架着烟枪吸大烟呢。局长刘仲武一脚踹开屋门，一个箭

步跨到李兴洲的床前：“姓李的，你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李兴洲被这突然发生的情况吓呆了，还没等他摸到身旁的手枪，一付冰凉的手铐早已卡上他的双手。

其他几路人马，也都旗开得胜。不到一个小时，就分别将李兴洲、刘春久和与这次谋乱有关的付昆山（伪县政府雇员，苏联红军进驻蛟河后，他摇身一变，钻进了新成立的中苏友好组织——苏联之友社，当上了委员长，不久，在组织清理中被开除）、王子孚等人逮捕归案。在逮捕李兴洲的过程中，搜出了他们制订的预谋叛乱行动纲领一份，内容有五条：

- 1、联络信号。12月22日夜12点，国民党先遣军赵宝山部，提前埋伏在县城北大庙后边，鸣枪三响作为总攻信号，刘春久将重机枪排拉出，作为内应。

- 2、进攻路线。国民党先遣军赵宝山部，走大路进城，以示军威（走小路怕苏军视他们为土匪）。

- 3、逮捕首要者。总攻开始，首先逮捕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局长等人。

- 4、退却路线。暴动一旦不成功，退却时要走小路，以防苏军顺路追击。

- 5、家属安置。暴动如果失败，首先把家属安排好，一同出城。

经审讯，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李兴洲被迫交待了这次预谋策反暴动的全部事实经过。

原来李兴洲和赵宝山早有密谋，他们策划在新的民主政权在全县尚未巩固之时，合谋串通混进县保安大队中的不良分子，来个里应外合，夺取蛟河县的新生政权，然后等待驻吉林的国民党来蛟河接收，并委任付昆山为国民党蛟河县

长，王子孚任公安局局长，扯起青天白日旗，到那时，蛟河县的党政大权就会掌握在赵宝山、李兴洲等一群土匪的手中。哪曾想他们的美梦没做成，一夜之间就彻底失败了。

赵宝山、李兴洲等策划的反革命暴乱被粉碎以后，其余匪徒不断遭到县大队的袭击，匪队士气大减，不久就各自逃散了。

王凤阁

拂晓前的枪声

1945年夏天，正当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民不聊生的时候，桦甸县横道河子打松花江北来了一个王瘸子。这个王瘸子是个在“家理”的，在横道河子和常山屯一带摆“香堂”，收徒弟，捎带着行医看病。就连那伪警察和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参加过他摆的“香堂”。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瘸子竟是东北搞日联军第一路军派下山来开辟群众工作的王成山！就是他，拖着一条同日本鬼子作战致残的伤腿，在桦甸再度点燃了人民反满抗日的火种。王成山来了没几天，一首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再呆二年用不着！”和那句歇后语“满洲国旗——黄的面大”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后来，竟传到了伪警务科，弄得敌人非常恼火。

王成山在横道河子街里外转悠了一个多月，通过观察摸底，把组织反日武装暴动的计划告诉了两个穷苦人：一个是家住地局子村的高思孝，另一个是家住八道河子太平岭的姜达山。这两个人近几年来吃尽了日本鬼子统治的苦头，日子过得吊锅无米。听了王瘸子的打算，他们十分高兴地说：“日本鬼子把咱们中国人欺负苦了！老王，有你挑头儿，咱穷哥们儿一定跟着上！你说怎么干吧！”

于是，三个人在高思孝家里把窗户挡得严严的，围着个豆粒大的豆油灯，足足研究了一宿，决定了两件事：第一宣传反满抗日，组织暴动队伍；第二，农历六月初一起事，先

攻打八道河子警察署，夺取武器，然后，过松花江上山打游击，投奔抗联。

第二天，按照计划，高思孝和姜达山悄悄来到大河森给日本鬼子挖松明子的劳工队里，找到了把兄弟王明志和陈佩忠。当时，王明志是劳工队的中队长，陈佩忠是小队长。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劳工队里的小头目，但是平时也没少受日本工头的气，看见劳工们累死拼活的干活，还挨打受骂吃不饱，心里十分气愤。听说要组织反日暴动，两个人十分赞成。因为他俩平日待劳工们和气，说话办事总是向着劳工们，在劳工中间挺得人心。他俩连夜在工棚里找知心的劳工们串连，大伙听了说：“这么捱下去干受罪，还真不如暴动，也许能有个出头露日呢！”一宿功夫，就有20多名劳工同意举事，再加上王成山在各屯串连，很快发展到40多人。

也是高思孝急于暴动的心切，无意中竟把这么大的事情透露给当过伪警察因为得罪上司而免职在家的刘振山。刘振山这小子为了讨好上司图得个一官半职，急忙把这事报告给外号叫李土豆子的横道河子警察分所长李良臣了。晚上，李土豆子在杜家店喝酒，酒过三杯，嘴就有点不听使唤，顺嘴咧咧，拍着店掌柜杜连溪的肩膀说：“不瞒老兄说，我李土豆子出息的日子到了！”村掌柜听了一愣说：“老弟又有什么升官发财的机会？”李土豆子眨了眨一对小眼睛，说出了要抓高思孝等几十个人送到县里请功的事儿！杜掌柜是高思孝的好朋友，听了这话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是，他表面却装着不动声色地说：“李所长，咱们莫谈国事、喝酒！喝酒！”接二连三几杯酒下去，把个李土豆子灌得烂醉如泥，都快成土豆酱了。

杜掌柜悄悄溜出 连夜找到高思孝说：“刘振山那小子把

你们要组织反日暴动队的事情捅到李土豆那里去了。李土豆要抓你们送到县里去请功受赏。兄弟！事不宜迟，我看你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高思孝听了暗想：我走了，抛下那联系好的几十个弟兄怎么办？不，我不能走！他送走杜掌柜，转身去找王成山，事不凑巧，王成山过江去了，他只好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刘振山。两个人一商量，与其坐着等李土豆领着警察来抓人，不如提前动手！于是，两个人马个分头行动起来。

两个人已经暴露了目标，只好东藏西躲，白天上山，晚上四处活动。那李土豆领人要抓他俩，几次都扑空。可又不知道还有谁要暴动，想抓也抓不成，这事儿也就暂搁下来。暗地里，高思孝被大伙推为领头儿的，约定在五月节后起事。

转眼之间到了农历5月13——大家约定起事的日子。这一天，太阳刚刚落山。接到提前行动通知的王明志、陈佩忠、闫喜春、胡文福、万永贵、郭喜山、康永贵、郭玉仁、郭维春、姜玉堂等20多人，陆陆续续地来到八道河子东门外海浪布屯的韩殿生家里。吃过晚饭，高思孝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弟兄们！形势越来越吃紧，咱们不能等王成山了。今天是农历5月13，是关老爷单刀赴会的日子。我们穷苦人要借关老爷的虎威，今天晚上去砸八道河子警察署，夺取武器，然后上山打游击，找抗日联合军去！”大家听子，各个摩拳擦掌地说：“对！我们这苦日子可该过到头了，打开警署，有了枪，上山打游击去！”

然后，王明志把从挖松明子工地带来的一捆尖镐把分给大家作为武器。胡文福操起窗台上放的一把小斧子别在腰里说：“咱拿这玩艺儿，到时候比尖镐还管用！”高思孝

说：“你再拿上根镐把儿。”胡文福说：“那我这可是双武器了！”一席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天快半夜了，八道河子大街上出现了一伙喝醉了酒打架的：高思孝、胡文福和王明志三个人假装醉酒扭打在一起，其他的人都假装围在四外看热闹。撕打了一会儿，各说各的理儿，围观的人群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你们快到警察署去找警察给评个理吧！”“对，咱们上警察署评理去！”于是，大伙拉拉扯扯地连那些热闹的，不下几十人，一齐涌进了警察署。

偏巧，署长和日本人署副屈口警尉陪着白天打县里下来视察的县警务科科副北岛太郎到街里喝酒去了。空空荡荡的警察署里只留下一个伪警察值班。那小子开头还挺横，狗仗人势地学着日本人腔调：“八嘎牙路，你们半夜三更地打架，良民的不是！”可一看来者不善，人人手里都掐着大棒子，才知道不妙。一个劳工上前一把扯住他的脖领子喝问枪枝下落，这小子吓得屁滚尿流，乖乖举地了手：“枪，在……在枪库……枪库……里！”

高思孝指挥大家掐断了电话线，摘下了墙上挂着的几支大枪，押着那个伪警察找到了枪库。胡文福一斧子下去，“咔嚓”一声，劈开了门锁。大伙一涌而入，齐下火龙关夺取了二十八支大枪，一支手枪，子弹一千多发。高思孝看见有一挺拆开的轻机枪散放在油布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一划拉，用油布一裹，背起来往外就走。

刚走到大门口儿，日本署副屈口喝得醉醺醺地扔下署长和北岛太郎，提前趑趄趑趄地回来了，这鬼子一见院里一群人，破口大骂：“什么的……干活？八嘎……牙路！三宾的……”没等他骂出“给”字，那尖镐把儿象雨点

毆地砸在他的头上、身上。那屈口真是有点“屈”了“口”，再也没吭一声，两腿一蹬，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大家冲出警察署，路过村公所的时候，放了一把火，然后撤出街外。日本开拓团的人发觉了。因为天黑，离得太近，鬼子只好对空胡乱地射击。高思孝喊道：“弟兄们！咱们也还他几枪，给鬼子们一点颜色看！”大家用缴来的武器劈劈啪啪地打了一阵。这拂晓的枪声，庄严地向人们宣告：在不屈的桦甸大地上，抗日的烽火再一次燃烧起来了。！

大阳刚刚冒红，高思孝率领大家转移到横道河子。那刘振山一见不妙，急忙来了个凉贴饼子——溜了，暂时成了漏网之鱼。李土豆子还没钻出被窝就束手就擒，乖乖地交出了一支手枪。大家把他押到警察分所，又夺取了八支大枪和一些子弹。然后，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把李土豆子押在当街示众；另一部分人砸了大烟馆和“配给所”，又把白面、豆油、盐和布匹分给穷人。并且向群众宣传赶走日本鬼子，推翻满洲国，号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人团结在一起，上山打游击，投奔抗联。

于是，又有当街的王友、裴洪志、高继贤、韩喜祥等劳苦群众加入进来，队伍很快扩大到50多人。吃过午饭，人人分得了武器，队伍开拔。横道河子的当街百姓几乎倾室而出。你再看那暴动队伍里，人人昂首阔步，个个扬眉吐气，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向肇大鸡山上那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走去。

徐明举

民兵英雄黄金龙

桦甸市木其河西岸有一个金龙屯，这个屯子在1947年前叫徐家屯，那么为啥改叫金龙屯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江东徐家屯搬来了黄金龙一家四口。他家原来住在公吉乡下联合屯，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全家生活全靠他一人在煤矿做苦工维持。“八·一五”光复后，煤矿停产，他只好携带老小来到徐家屯，当淘金工人谋生。这年冬天黄金龙要求参军，因是独生子而没被批准，于是参加了民兵。在民兵队伍里，他刻苦学习射击要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民兵们都夸他的枪法准。

黄金龙身强体壮，身材高大，什么累活都难不倒他。他为人憨厚、平易近人，爱为穷哥们儿打抱不平，枪法又准，在淘金工人和徐家屯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乡亲们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找他拿主意。他机智勇敢，办事果断，很有号召力，民兵们都很“服”他，参加民兵不久就被推举为民兵队长。

黄金龙带领民兵经常到江西敌占区密什哈、大秃子、二秃子、迟家大院、吕大房子一带活动，割电线、破坏敌交通、惩治作恶多端的伪保甲长，使敌人闻风丧胆。不久，他又被提任区民兵联防中队长。

1946年2月，经桦树林子区委书记卓树基和蔡文两位同志介绍，黄金龙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

194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黄金龙带领八个民兵秘密地来到敌占区密山屯。敌人在这里修了碉堡，设了岗哨。黄金龙和另一个民兵悄悄地摸到哨兵背后，一个箭步蹿上去，黄金

龙的大手一下子把哨兵的嘴捂得紧紧的，另一个民兵缴了他的枪。黄金龙低声威吓说：“不许出声，出一声就捅死你！”说完，把尖刀在他面前晃了晃。黄金龙等人把敌人哨兵拉到僻静处，经过审讯，了解到这里的敌军都去附近的碉堡开会去了，有的带着枪，有的没带枪。之后，就把这个哨兵用绳子捆了起来，绑到一棵树下，嘴里塞上一块毛巾，并告诉他说：“等你们的人回来，就告诉他们，我们是黄金龙的民兵队伍，向你们借枪和子弹来了！”敌哨兵连连点头。黄金龙率领民兵迅速地进入碉堡，找到四五支枪和多发子弹。临走时，发现锅里还冒着热气，打开一看，锅里煮的全是鸡，民兵们用枪刺把鸡挑出来带走了，只给敌人留下半锅汤。到了外面，黄金龙又告诉民兵向空中放了几枪，然后潜入青纱帐里。附近一个碉堡的敌人听到枪声前来增援时，黄金龙带领民兵乘机又“摸”了这个碉堡，等敌人回来时，民兵们又都无影无踪了。黄金龙率领民兵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办法，一夜之间就“摸”了三个碉堡。

黄金龙带领民兵运用麻雀战、游击战，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摸岗哨、抓“舌头”、杀走狗、打伏击、截给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江东解放区的老百姓一提起黄金龙的名字，无不称赞；江西国民党官兵一提起黄金龙的名字，个个谈虎色变，心惊胆战。当时，国民党六十军士兵打赌时经常说：“我如果说话不算数，叫我出门碰上黄金龙！”

1946年6月，黄金龙被桦甸县政府民兵武装科授予“模范民兵中队长”的称号。他所带领的民兵中队时常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经常执行放哨、带路、侦察、枪救伤员等任务。

1947年旧历正月初三，黄金龙率领民兵30多人，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吕大房子守敌。战斗中，许多战士冻伤了手

脚，黄金龙冻掉了大脚姆趾。战斗结束后，区委书记卓树基强迫黄金龙回家休养。

1947年2月22日（旧历二月初二），黄金龙的冻伤还没有痊愈，上午听说区委要派人到江西敌占区去开展群众工作，便不顾伤痛跑到区委，主动要求承担这个任务。区委看他态度诚恳，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下午，黄金龙就带领11名民兵奔赴敌占区。

2月25日凌晨，他们由同拓屯（今常山镇同兴屯）出发，经三道沟、二道沟、头道沟的密林，脚趟积雪，穿过荒野，早8点多钟，接近了靠山屯。经侦察得知，屯内无敌军，便进入屯内，决定召开群众大会，会场设在王皮铺家。

黄金龙带领民兵进驻靠山屯的消息，被敌人自卫队的密探得知，便把这一情报立即报告给伪保长和乡自卫队长，这两个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又把这一情报送给了驻守在常山屯的国民党六十军二六八团营长杨大麻子。杨大麻子听说黄金龙来了，以为自己升官的机会到了，亲自带领一个连由大路乘坐马爬犁直奔靠山屯，乡自卫队长带领30余名乡自卫队员由太平沟山路奔高丽帽子山包抄后路，也直奔靠山屯而来。当两股敌军接近靠山屯时，被在屯外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便慌忙进入会场说：“不好啦！屯子外来了那么多国民党兵！”黄金龙带领民兵迅速冲出屋外，一面指挥群众撤退，一面抢占有利地形。他带领两名民兵刚刚抢占了屯东头的小空房做掩体，激烈的战斗就打响了。

这时，民兵小队长陈志田正在一农家做群众工作，一听到枪响，就马上冲出屋门，迎面正遇上两个国民党兵和一个自卫队员，于是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两个国民党兵被陈志田刺倒，另一个敌人开枪打中了陈志田胸部。陈志田

挣扎着没有倒下，还想举枪还击，被敌人又一枪打中头部，年仅 23 岁的民兵小队长陈志田光荣牺牲。

黄金龙等三位民兵在小空房内掩护其他民兵撤退，七个民兵跳进屯后水沟内，奔五里营子方向撤去。等战友们全撤了，黄金龙等三个人已被敌人包围。民兵们猛烈地向敌人射击，打得敌人始终不能靠前。这时，黄金龙发觉子弹不多了，便对民兵说：“同志们！注意节省子弹！”敌人的机枪猛烈地向小空房射击，黄金龙端起他的长瞄七九枪，一枪把敌机枪射手帽子打掉，头皮也被穿了一趟沟，敌人的机枪哑巴了。可是其他敌人却向小空房逼近，100 多敌军将小空房团团围住，三个民兵又从不同方向向敌人射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的子弹用光了，黄金龙手中也只剩下三发子弹。黄金龙很镇定地埋伏在门旁瞄准了敌人，开枪打死一个国民党兵，冲到烟筒根下又打死一个国民党兵，接着又瞄准了第三个敌人，但子弹臭子，没有响。黄金龙遗憾地摇摇头，转身严肃地对两个民兵说：“现在关键时刻到了！同志们，上刺刀！”敌营长杨大麻子见小房内枪声停止，断定民兵子弹用尽，便声嘶力竭地喊：“抓活的！”敌人蜂拥而上，三个民兵战士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黄金龙冲出屋外，一枪刺倒了跑在前面的国民党兵，两个民兵也同敌人格斗起来，但终因寡不敌众，黄金龙三人被俘。

黄金龙等三位民兵被敌人用一根绳子串绑在一起。杨大麻子走到黄金龙身边自鸣得意地问：“姓黄的，这回还有什么说的？”黄金龙昂首挺胸怒视敌人，大声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就不和你们斗！”杨大麻子说：“想死？没那么容易，带走！”刚走几步，黄金龙又回过头来大声喊道：“大麻子，你别得意，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由于绳子

短，绑得紧，走路迈不开步，敌人就连推带拽。当走到靠山屯东 300 多米外的大院时，敌人想把黄金龙三人吊在树上，因绳子太短，吊了两次未能吊起，几个敌人便对他们用脚踢，用枪托打。面对凶残的敌人，黄金龙大声痛骂，敌人恼羞成怒，那个被打破头皮的敌人机枪射手向黄金龙开了枪，几个敌兵又上前在他的胸部刺了七刀，黄金龙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另外两个民兵遭到一顿毒打后被押往常山屯，在解放常山的战斗中被我军营救。

杨大麻子本想活捉黄金龙到他的主子那里请功领赏，当他听到枪响赶到大榆树下时，黄金龙已停止了呼吸。杨大麻子高喊：“是谁开的枪？”敌机枪射手向前走了两步，站在那里默不作声。杨大麻子走到他跟前，打了他两个耳光，嚎叫说：“谁叫你开的枪？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黄金龙！”敌机枪射手和几个国民党兵顿时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杨大麻子把这几个人带回常山屯后，又是一顿斥骂，最后气极败坏地一枪打死了这个机枪射手。

黄金龙、陈志田两位烈士的遗体被运回桦树林子区徐家屯，乡亲们全都泣不成声，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

黄金龙、陈志田牺牲后，中共桦甸县委、县民主政府在徐家屯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追认黄金龙、陈志田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授予“民兵战斗英雄”称号。为了永远纪念烈士，教育子孙后代，县委、县民主政府把黄金龙生前所在的徐家屯改名为“金龙屯”。

李海军

会战朝阳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支持下的县维持会和治安大队控制着舒兰县。12月初，我东北人民自卫军三纵队二支队——田松部队进驻舒兰境内。国民党统治区的老乡经常到田松部队，向首长和战士们控诉维持会和治安队的匪徒们欺压百姓的罪行，要求田松部队给他们报仇雪恨。田松部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听说老百姓如此遭匪徒的欺压，战士们气得咬牙切齿，纷纷向田松首长请战。

以维持会长周士章为首的反动武装，听说田松部队要攻打县城，就企图固守舒兰县城的屏障——朝阳镇，扬言要与田松部队决一死战。

朝阳镇是舒兰县的旧县城，有近千户人家。镇的四周有土墙、壕沟和碉堡，易守难攻。镇内守敌有舒兰县治安大队及其下属各队一千多人，五常县各治安中队近千人，共计二千多人。周士章亲自坐阵，蒋仓任总指挥。

为了歼灭敌有生力量，扫除进军舒兰的障碍，支队首长决定，集中兵力，会战朝阳，二支队全部投入战斗，我吉林独立支队范德林团一部配合作战。

老奸巨滑的周士章为了争取时间，试探我军虚实，于12月15日下午2时派出亲信杨玉奇等人，举着白旗到焦家岭我支队司令部“谈判”。他们一进门就高喊：“不能打了，中国人怎么能打中国人呢！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两党要精诚团结，合作建国。”坐下谈判后，杨玉奇说：“只要不打仗，周会长答应给你们筹划粮饷，你们要北上，周会长供给路费。”田松支队长听他们没有投降之意，便对来人斥责说：“周士章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你们

只有缴械投降，才能争取宽大处理。”之后，田松支队长限治安队当夜12点以前缴械投降，否则，便要发动全面进攻。杨玉奇等人见田松支队长义正辞严，无隙可乘，只好灰溜溜地返回朝阳。

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午夜以后，部队向朝阳发起了总攻。田松支队一大队在南面担任主攻，二大队在西南担任佯攻，范团一部在朝阳东北方向担任阻击。

这里头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平地雪深过膝，雪后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20多度。当天晚上，晴空万里，皓月当空，月光映着白雪，如同白昼，给我部队向前运动造成很大困难。战士们不惧寒冷，不畏艰难，踏着冰雪向敌人据点进发。担任主攻的一大队刚来到离朝阳四、五里路的一片坟地，突然遭到敌人的伏击。前卫三排判明情况后，在副排长带领下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击溃。二大队听到枪声，立即加速向敌人运动，并发起火力攻击，以吸引和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一大队在扫清城南外围障碍之后，沿着干河沟向城东南方向前进，在接近壕外一片民房时，再次遭到敌人的伏击。尖刀排在三排长马思祥率领下向敌发起冲锋，又占领了几栋房屋。接着，大队长季忠明率大队赶到，与三排一起肃清了敌人。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三排长马思祥在率队强攻时不幸中弹牺牲，三排8名正副班长全都负伤了。

一大队长看到三排负伤过多，决定由一排担任突击任务，由副指导员邹世桂指挥。突击排顺着小河沟匍匐前进到距城几十米处发起突击，但由于天气寒冷，故障屡屡发生。仅有的一挺机枪不响了，掷弹筒也打不出去，我方火力大大减弱，突击排的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战士们卧在雪地里手脚冻得毫无知觉。在这严峻形势下，大队长

季忠明命令突击排凭借步枪、手榴弹等轻型武器，向敌人发起冲锋，尖刀班终于冲进去了，突击排冲进去了，主攻连也随着冲进去了，镇内敌人被分割包围。由于没有重武器火力的支援，攻坚虽然获得成功，但是我军付出了很大牺牲，尖刀班只有两名战士未负伤，多数战士被冻伤，有的甚至致残。

我军突入镇内以后，一、二大队将顽抗的敌人分割成若干块逐步吃掉，经过激烈奋战，最后剩下的敌人被压缩、包围在伪警察署等几个大院内垂死挣扎。我军用炸药包炸毁碉堡，用铁锹挖通围墙，终于冲进大院，消灭了敌人。

12月16日清晨，战斗胜利结束，守敌大部分被歼，小部分溃逃，我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但我军伤亡也很大，仅一中队就有中队长季忠明、指导员邹世桂等10人负伤，排长马思祥、战士包作霖等32人壮烈牺牲。包作霖是独生子，在山东老家坚决要求参军进军东北。会战朝阳前，大队副政委刘金凯让他到大队当文书，他坚决要求打完朝阳之后再上任，牺牲时年仅17岁。首长、战士们对小包的牺牲感到特别惋惜。

朝阳战斗结束后，支队首长命令部队乘胜追歼敌人，奔袭舒兰县城。舒兰县城是舒兰的新县城，它是在火车站四间房的基础上扩建的。当时县城很小，没有围墙和碉堡，从朝阳逃到县城的敌人喘息未定，我军已跟踪赶到，发起攻击，城里的敌人闻风丧胆，一片混乱。战斗打响之后，我军顺利突进县城，敌人抵抗微弱，一部分被歼，一部分溃逃。16日上午9时许，舒兰县城宣告解放。

从朝阳镇、舒兰县城溃逃之敌，一部向北逃到舒兰、五常交界的平安屯和山河屯一带，一部分向西逃到榆树新立屯

一带。周士章苦心经营的三县联防和重兵阻击被我军彻底粉碎了。经过朝阳会战，解放舒兰，三县国民党治安队的有生力量被歼灭了，为我军继续解放榆树、五常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业鸿、刘建伟

单身匹马追叛贼

1945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长春后向吉林进逼。我军奉命实行战略转移。永吉县保安团从乌拉街撤退到缸窑。

保安团三营副营长金正镐想投靠国民党升官发财，他心里盘算着：一个人单枪匹马前去投靠国民党，即使接纳了也不可能被重用；要是把队伍拉过去可就不同了。可是，一个营好几百人，一旦事情不成泄露出去，后果可就惨了。正在举棋不定之际，他想起了几个所谓生死之交的弟兄。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这几个心腹说了，于是，他们便绞尽脑汁计谋起来。其中有的人说：“三营大部分官兵是朝鲜族，有的父兄被国民党杀了，有的妻子姐妹被国民党军官污辱，他们对国民党军有深仇大恨。如果带领他们去投降，他们会调转枪口对付我们的。”也有的说：“不过大部分官兵仇恨国民党军队，这是我们把队伍开到乌拉街的理由。我们在全营官兵中把仇恨国民党的劲头鼓得足足的，然后佯装去攻打乌拉街，到那时候再动手解决那些反对投降的人，事情就可盼成功了。但是，办事一定要稳妥，要先安排一个精明强干善于交际的人到国军那联络一下，看看他们和态度的条件。如果能令人满意，再与他们研究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计议一定，金正镐一面命令严守秘密，一面派遣亲信去乌拉街与国民党军88师联系。联系人回来之后说，国民党军队负责人答应，如果金正镐能把一个营的兵力带过去，就委任他当团长兼永吉县韩国青年同盟会会长，赏给20万元东北流通券。

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金正镐高兴极了。他表面上继续

装得很积极，暗中加快叛逃的步伐。

一天，保安团命令三营驻守大口钦，任务是监视乌拉街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当营长去缸窑开会时，金正镐认为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他马上召集排长以上的干部开忆苦会。有两个连长忆了阶级苦，金正镐接着说：“国民党就是我们穷苦百姓的苦难根源，不消灭他们，我们永远不能彻底翻身。他们杀害我们的父母，污辱我们的妻子、姐妹。现在中央军就驻在乌拉街，大家说，这个深仇大恨我们要不要报？”

金正镐说得声泪俱下，感动了苦大仇深的连排长。有的排长站起来说道：“副营长说到我们心坎上了。我们要坚决打回乌拉街去，替死难父老兄弟报仇，洗刷姐妹们的耻辱！”随即会场上呼起“打回乌拉街，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声。

二连、三连连长都是八路军的老战士，他们见此情景先后站起来表示不同意，理由是没有上级的命令擅自行动是违反军纪的。

“国民党军队杀害咱们的亲人，污辱我们的姐妹，你俩竟敢无动于衷！”金正镐怒气冲天用力地敲着桌子说。

“把这两个胆小鬼捆起来，不许他扰乱军心！”好几个排连长这样地呼喊着重。

金正镐看到火候了，当即下令缴了两个连长的手枪，命令将他俩临时押起来。同时指定二、三连副连长代行连长职务，并命令全营做好准备，待命出发。

夜幕渐渐降临，三营的战士们听说要攻打乌拉街，替乡报仇，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出发。

到了二更天，夜象涂了一层黑漆，伸手不见五指。三营开始向乌拉街进发，夜行军悄无声息，很快到了张老河东

岸。队伍就地休息待命，金正镐命令做好渡河准备，等尖兵返回后，立即渡河。

所谓尖兵，是蒙蔽士兵们的圈套，其实是他派出的两个亲信。在出发前，他对一人亲授锦囊妙计，让他俩告知88师的头目，派兵埋伏在张老屯外，等三营进入屯里后，突然出击，使全营措手不及而全部生俘，如此全员携械投降。

这天晚上，永北工委召开办事处、保安团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研究了反蚕食武装斗争和支援前线等重大问题。突然，三营营长杨永安气喘嘘嘘地闯进会场报告说：“根据得到的消息，副营长金正镐率全营部队往乌拉街方向开去，可能要叛变投敌！”

杨永安讲完，永北工委书记兼保安团政委左军问保安团团团长陈明友：“三营的情况你清楚吗？”陈团长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说：“没有团部的命令，擅自行动，其中肯定有鬼！”

与会的领导同志也都认为三营行动反常，有叛变投敌的可能，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制止。

“全团立即集合，把三营追回来！”陈团长严肃而果断地说。

“不行！全团行动不便，弄不好还会伤害好人，也容易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实力。我一个人去，赶快备马！”左军斩钉截铁地说，同时把手枪从腰间解下来，交给警卫员。

大家对左军的决定都投以惊诧的眼光，关切地说：“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也有的说：“这太危险了，绝对不行！金正镐把你抓起来做投降的资本怎么办？”“这是冒险行为，我不赞成！”陈团长气急了大声地说。

左军同志镇定地微微一笑，他先感谢同志们的关怀之

情，然后用肯定的语调说：“我会把三营囫圇个儿带回来的。我一个人又没带武器，他们不会生疑。我相信大多数指战员是跟党走的好同志，能听我的劝告。如果金正镐真的死心塌地，顽固不化，大多数指战员决不会放过他的！”说着转身跨出门去，骑上马飞也似的消失在苍茫的夜色里。

漆黑的夜辨不清东西南北，战马沿着通往乌拉街的土路，四蹄蹬开飞快地奔驰着。左军在马背上颠簸着，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赶上队伍。他想，金正镐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没经得住困难的考验，竟然率领全营叛变投敌，我怎么向上级交待；若是全营人马都落入敌手，会给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他越想越是怒火中烧。但是他在心里又叮嘱自己，千万不能激动，要沉着、冷静，弄不好，丢掉自己的性命是小事，给革命造成损失，是无法挽救的。一定要以静制动，以智取胜……

战马好象理解主人的心意，不停地向前飞驰。左军向前张望着，前面黑乎乎的一片，象是一个村落。距离村子越来越近了，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狗叫声。他警觉起来，仔细观察着前面的动静，接着他猛磕马腹，马象箭一般向村子里冲去。

进了村子，除了嗒嗒的马蹄声和此伏彼起的犬吠声外，什么动静也听不见，似乎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其实不然，在国民党发动内战、老百姓不得安宁的日子里，黑天半夜谁敢出来看动静。在村子里他没有发现部队的踪影，于是又飞快地向河边追去。

奔出村外，张老河两岸高大的树木影影绰绰映入眼帘，快到河边了。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渡口木思忖着，必须抢在队伍渡河之前赶上他们，他多么希望战马插上双翅，一下子

就飞到三营面前。此时，战马周身湿漉漉的如同水洗过一般，不时地喷着响鼻儿。左军心疼地拍一下马背，战马通神似的扬起四蹄向河边飞快地奔去。

此刻，金正镐在河边焦急地等待“尖兵”的回音。忽然，一阵疾驰的马蹄声惊醒了坐在河边闭目养神的指战员，他们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顺着声音望去。战士们高兴得悄声叨念着：“后续部队来得好快呀！这回可好了，全团出动，攻下乌拉街不成问题！”

左军在马背上望见模模糊糊的攒动着的人头，心里开了两扇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放开喉咙大声喊道：“我是左军，队伍不要过河，去乌拉街会吃亏上当的！”

左军的声音大家非常熟悉，几句简短有力的话语也听得格外真切。大多数指战员听政委说不让去乌拉街，立刻觉得疑惑，难道这次军事行动有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跑到左军身边，异口同声地问道：“政委，这是怎么回事？”

左军把战马交给身边的一名战士，接着劈头就问：“你们的金副营长呢？”战士们听了政委的问话口气，越发疑惑起来，怎么出发前金正镐营长说打乌拉街是团部的决定，现在政委又追上部队不让过河，没有打乌拉街的意思，莫非金正镐在搞什么鬼把戏不成？保安团是左军亲自组建的，战士们的政治素质都很高，大家立刻警惕地把子弹推上膛，哗啦一下子将政委围在中间，面向金正镐，瞪得溜圆的眼睛，在黑夜里似乎发出一道道逼人的寒光。

金正镐及其心腹们听到左军的一声呼喊，心里为之一震。立刻从期待“尖兵”的焦急中清醒过来。眼前站着的分明是政委左军。他已知是末路穷途，便要做困兽之斗，想要掏枪干掉左军，可是乌黑的枪口早已对准他们的脑袋，指战

员的眼睛正怒不可遏地盯着他们。金正镐等人心胆俱裂，双腿发颤，已是六神无主，象泄了气的皮球堆缩在地上。

面对现实，投敌已成泡影，金正镐在侥倖心理支配下，觉得“天机”尚未暴露，擅自行动，只能受到纪律处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重新振作一下，将腰间的手枪交给通讯员，壮着胆子，怯懦地走到左军面前，行了军礼说：“我报仇心切擅自行动，请求上级处分！”

“没上级命令，你凭什么擅自行动？”左军质问金正镐。

金正镐听到左军也说他“擅自行动”，好似得到了一道赦免令，心里有了底，忙上前辩解道：“政委，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江北大屯、阿拉底一带，把朝鲜人装在麻袋里扔到松花江去。三营朝鲜族战士多，亲人受害的也多。指战员复仇心切，强烈要求攻打乌拉街，我顺应了他们的要求。虽说是擅自决定，但也是革命行动。”

左军听出了话中有弦外之音，不由得火冒三丈。但冷静一想，觉得不驳倒他的谬论，这支队伍就不好带回去。于是左军笑了笑语调平缓地说：“中央军杀害我父老兄弟，奸淫我姐妹的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东北军分区已做了部署。仗我们一定要打，不过，你们这200多人去打乌拉街，行吗？你们想过没有？乌拉街由国民党的88师驻守，那是国民党的王牌军，你们这几条枪，这么几个人，不等于把绵羊赶到狼群里去了吗？仇，不仅报不上，还要落个全军覆灭的下场！”

沉寂良久，左军面向全营指战员问道：“同志们，我们是打乌拉街去还是回大口软去？”

“坚决跟政委回去！”指战员们大声回答。

队伍将要返回时，两个“尖兵”从西岸涉水过来。他们见金正镐站在那里的一副窘相，心里已有几分明白，刚要上前跟他说点什么，金正镐厉声厉色地吼道：“不要讲了，赶快归队！”这两个家伙左顾右盼地瞅了瞅，见左军正站在队伍的前面，便不知所措地溜到战士中间去了。

左军命令一连连长暂代副营长职务，从三连抽出一个排做掩护，防备河西岸敌人的追击，把金正镐交给一连看管，队伍向大口钦进发。

队伍刚刚离开河边，对岸就响起一阵机枪声，子弹拖着火舌，划破夜空，从战士们的头顶上嗖嗖地掠过。

左军骑马走在队伍的前头，战马迈开稳健的步伐，轻快在向前迈进。

孙已清

抗日烽火中的共青团员

1945年8月1日上午，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二道河子监狱的审讯室里，李隆木等7位年轻学生被判处徒刑。

这些青年人是当时吉林县（即永吉县）永新农场附设农业学校秘密共青团支部的共青团员。永新农场附设农业学校的团支部，直接由沈阳市地下党领导。从团支部建立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为驱除日本侵略者、争取祖国的解放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1943年12月20日夜里，团支部负责人权重范、张永云在一个看稻谷的小窝棚里，召集李隆木等6名共青团员开会。煤油灯下，权重范老师庄重地说：“我们每个人入团时都曾宣誓，要为自由、民主、平等而奋斗，准备随时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现在，有重要任务要我们去完成。”

接着，张永云说：“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接二连三地遭到惨败。德、意、日侵略者的末日快到了，我们每个同志都要为打败法西斯出力，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侦察日伪军在东北边境的布防情况，每一位共青团员都要完成一项侦察任务。”李隆木在会上接受了赴佳木斯一带侦察敌情的任务。佳木斯属边境地区，日本关东军控制很严，对出入境的行人实行人身检查，凡认为可疑的人，就被抓去。

新年刚过，李隆木回到家乡赵屯，在家里简单收拾一下行装，以去佳木斯邀请亲戚朋友给母亲办寿为由，办理了通行手续，从吉林经长春，直奔佳木斯。

到佳木斯后，李隆木在亲属的引导下，偷偷地查看了日

本关东军的驻地，停放坦克的地点及数量，晚上用暗号记在小本子里。十多天的时间，李隆木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离开佳木斯的前一天，李隆木路过一座围着铁丝网的院子，突然，院子里窜出两条狼狗，狂吠着向李隆木奔来。跑已经来不及了，如若束手挨咬，肯定被这两条狼狗撕得粉碎。他想猫腰吓唬狼狗，可是狗仍汪汪狂叫着，向他头上扑来。就在这危机时刻，李隆木双手抱起路边一块大石头，向其中一条狗砸去。石头打在一条狼狗的右前腿上，疼得这条狼狗嗷嗷叫着退了下去，另一条狼狗的凶猛气焰也收敛了许多，只在李隆木的身前身后狂吠，不再敢往身上扑。

恶狗尚未被制服，随着粗暴的叫骂声，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兵出现在李隆木眼前。狗仗人势，稍稍怯阵的狼狗又开始大逞犬威，扑在李隆木身上狂咬起来，瞬间，他的肩膀、腿肚子被咬得鲜血直流。

日本兵冲着狼狗哇啦、哇啦几声怪叫，狼狗退到一旁。日本兵上前一把抓住李隆木胸前的衣服，把他拉了一个踉跄。鬼子大声喝道：“什么的干活？”未等李隆木分辩，日本兵就把他拽到院子东面一所房子里面。

李隆木一瘸一拐地被带到一个屋子里，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的军官盯着李隆木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走到这里来？老老实实地说，不然，死了死了的有！”

李隆木强忍伤痛用日本话回答道：“我是侨居在吉林县赵屯的韩人，因母亲办寿，来佳木斯请亲戚、朋友去吉林祝寿，对佳木斯不熟悉，路走错了，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请原谅。这是我的证明。”

李隆木说完，用双手很有礼貌地把证明递给日本军官。

只听“喀喀”几声，那个呲着黄板牙的日本军官把证明撕得粉碎。

李隆木被两个日本兵拖到刑讯室，开始用子弹拨肋条，李隆木立时疼得昏了过去。日本兵用冷水把他浇醒，又给李隆木灌辣椒水。辣椒水顺着食管呛到气管、鼻孔里，连辣带呛，他浑身瘫软无力，很快又失去了知觉。

日本关东军用酷刑没有撬开李隆木的嘴，抓不着任何证据。按照李隆木提供的亲戚、朋友的姓名、地址进行了查对，结果都一一吻合。关东军这才通知李隆木的保人，释放了他。

李隆木在亲戚家养好了伤，取道回永新农场附设农业学校。

永新农场附设农业学校团组织，派人把每个共青团搜集的情报转给了上级组织。

不久，上级党组织又指示永新农场附设农业学校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利用团员均为朝鲜族人的有利条件，派人到朝鲜半岛侦察日军调动情况。

农业学校团组织负责人权重范、张永云考虑再三，又决定派李隆木去汉城。李隆木没有犹豫，接受了任务。

权重范、张永云再三叮嘱：“到了朝鲜半岛一定要见机行事，且不可凭一时勇气，也不能义气用事，我们还等着你胜利归来。”

1944年5月初，李隆木以去汉城、大邱探亲为由，在吉林县警务科办理了通行证。

到了大邱以后，李隆木很顺利地找到了中学教员吴治根。在吴治根的安排下，侦察到很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了慎重起见，李隆木把情报写在本子上，一有时间就反复默

记，直到全部背下来为止，然后将小本子烧掉。

5月下旬，李隆木乘火车回到汉城。亲属告诉他，在汉城一定要多加小心，日本兵隔三差五就到各家各户查夜，见到可疑的人就统统抓走，抓走之后，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为防意外，李隆木夜里就睡在防空洞里。由于防空里很潮湿，没几天，他的身上就生满了疥疮。

病痛并没有压倒李隆木。白天，他随同亲属以观看市容为由，到各处游逛，体察民众的情绪；夜晚，他整理收集到的情报，反复默记。他不畏恐怖的威胁，克服阴冷潮湿的困境，忍受周身奇痒的痛苦，在亲属帮助下，搜集了大量日军从本土往朝鲜半岛调动的情报。

这一年的6月4日，李隆木从汉城回到吉林县的江密峰。到了叔叔家。刚一进门坎，叔叔就惊恐地说：“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自从你去朝鲜后，警察两次去你家找你，因为没抓到你，就把你弟抓走了。”

李隆木没有回赵屯，就住在叔叔家里。他白天藏在山上的树丛里，晚上就睡在外边的稻草堆里。一到晚上，蚊虫一群群地扑来，他既要扑打蚊子，又要用手挠身上的搔痒处，两只手忙个不停，根本不能入睡。草堆里闷热得喘不过气来，被雨淋过的稻草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气味，呛得他不敢深呼吸。好容易熬过了夜晚，未等天亮，就要急急忙忙揣上几个饭团子钻进树林子里，靠在树干上打瞌睡。

几天后，李隆木征得叔叔的同意，于6月10日乘火车来到吉林。可刚一下火车，就被吉林省警务厅特务科扣留。6月13日，李隆木被押到伪满洲国都新京。

1944年10月初，李隆木被押到审讯室，负责审讯的是警长何田、联络官中田，都是日本人。

何田把一堆材料啪地摔在李隆木面前：“你们组织的名单、活动情况全记在上面，认不认由你。承认了，免得皮肉受苦；不承认，有苦头让你尝。”

李隆木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农业学校团组织，从负责人到团员的名单，全写在上面。他还从材料里得知，权重范、张永云、金正德三位老师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农校团委支部是永新农场党组织批准建立的……

李隆林看后，摇了摇头说：“材料里记的，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也不是共青团员。”

“大大的不老实，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承认的。”何田拍着桌子吼道。

两名狱卒把李隆木吊起来，用皮鞭劈头盖脑地抽打起来。衬衣被抽碎了，遍身抽出一道道血痕，疼得李隆木大汗淋漓，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

几次这样的审讯，李隆木都咬牙挺了过去，什么也没有承认。

冬天到了，下了头场雪，李隆木得知，罗永道等几名团员和权重范、张永云两位老师也被押进监狱，永新农场的共青团组织彻底被破坏了。

李隆木等7名党员坐了9个多月的牢，直到1945年8月初，才被日、伪当局判处徒刑。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李隆木等人才获得了自由。

注：李隆木曾任吉林市木材公司副经理，1987年离休后病逝。

武殿福、刘建伟

张清华智取赵昆天

1945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十一月就已经下了几场雪，刺骨的西北风飕飕地刮个不停。

这天早晨九点多钟，驻扎在吉林东关火磨厂附近的吉林游击总队司令部走进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头顶日本关东军人造毛棉军帽，外面披着关东军棉大衣，脚蹬一双崭新的乌拉，上面还绣着万字儿。他一出现就引起了司令部门卫的注意。

这个人来到门前就对哨兵嚷开了：“你们张司令在不在，我要见张司令有要事商量！”门卫还要询问，无奈他说不见张司令不能说，只好把他领进屋里。

这个人进了屋，找了把椅子坐下来，伸手摘下帽子放在桌上，然后点起一支烟不耐烦地抽起来。卫兵出去不一会儿，从屋子套间走出一个人。见此人身材十分魁梧，尖头顶、瓜子脸，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身穿黄军装，扎着裹腿，显得干练而利落。他径直走到外间靠窗子的办公桌边坐下来。随着又走出一个年轻人，他中上等身材，四方脸，一双闪亮有神的大眼睛里透出一股威武的生气。坐着的，就是吉林游击总队司令员张清华，那个年轻人便是司令部参谋马仁文。

那人一看这两人，猜测是大干部，不禁有些慌乱，忙站起来把烟捻灭扔在地上。

马仁文走到他近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找张司令有什么事？来来，坐下慢慢讲！”边说边把椅子往那人身边挪

了挪。

那人稍稳定一下情绪，慢慢坐下，回话时却显得有些激动：“我叫吴天学，是国民党先遣军赵师的一个营长。今天来这里，就是想请贵军张司令出兵消灭赵昆天，替家乡的黎民百姓除害！”

张司令和马仁文听了这番话，都觉得有些意外。张司令站起来走到吴天学的身边：“吴营长，你在赵昆天手下又当官又吃俸禄，是个美差嘛，怎么要找我们去消灭赵昆天？”

吴天学一听这话不觉长叹一声：“唉，张司令，这说起来话长啊……”

原来，吴天学是赵昆天手下的营长。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根据蒋介石关于日、伪军等就地维持秩序、等待中央军接收的命令，旧军阀出身的纪大祚、赵昆天在长春挂起了国民党先遣军的牌子，准备趁此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纪大祚自封军长，委任赵昆天为师长。赵昆天借机从伪满军官学校拉出100多人，配备日式装备，搭起了赵师的架子。

赵师下设三个团，其中李团是赵师的主力，康营是李团的主力，而由那军官学校出来的百十人组成的警卫连，则又成了康营的主力，连长叫王子清。

到了9月中旬，赵昆天一看队伍有了模样，便拉出来向吉林进发。一路上，赵昆天吹嘘自己的部队是正牌的中央军，来这里当兵吃得好、穿得好，使得一些兵痞流氓削尖脑袋往里钻，一些庄稼人也被花言巧语骗进来，这样一路经过马家店、饮马河、土门岭、河湾子、桦皮厂，七拼八凑也拉起了六百多人的队伍。

这一天，这支杂牌军开到了通浆沟、白虎沟和达屯一

带。在旧军队混过一阵子的赵昆天以为这里群山环抱，树大林深，南接吉沈铁路，北靠吉长公路，离吉林市也不远，是个屯兵的好地方，就把队伍驻扎在这里。

虽说赵昆天把一切吹得天花乱坠，可是从来未得到国民党的一粒米、一裸枪，因此队伍中怨言纷纷，不时有士兵开小差。为了拢络住人马，赵昆天一边继续编造谎言，一边派警卫连严加看管。驻扎时他把警卫连摆在通浆沟口，师部设在白虎沟屯，那些新兵则安置在通浆沟、白虎沟之间的屯子里，其意是警卫连在前门守卫，既能保卫师部，又能看着新兵。白虎沟四周都是高山，出易进难，往东过几道山梁就快到吉林了——这是赵昆天“狡兔三窟”的如意算盘。

自从赵师在这里住下后，老百姓可就遭殃了。这600人队伍的吃喝，全要靠附近的村屯负担，本来当地的百姓生活就很贫困，拿什么养活这些杂牌军？赵昆天一看收不上来吃喝，便每天组织一百多人到各村屯挨户翻箱倒柜地搜，凡是吃的用的一律抢走，见到什么猪、狗、鸡鸭更是一个不留。尤其是赵昆天的二姨太，喜欢吃鸡翅膀和鸡胗，没有这两样便不能下饭，结果不到一个月，这一带的鸡几乎绝迹。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便气愤地称这支队伍为“打狗队”、“平鸡团”。又因他们除警卫连外其余队伍都没有武器，又叫他们“秃爪子队”。

且说赵师刚驻下时为了装装样了，为人还算安份，可时间不长，兵痞们就熬不住寂寞开始胡作非为起来。10月的一天，康营一个姓冯的排长在达屯相中一个姑娘，便拖到驻地给强奸了。不巧，这个姑娘正是吴团一营营长吴天学的叔伯侄女，吴天学闻讯后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去找赵昆天要他做主严办那个姓冯的排长。赵昆天当面满口答应要军法科严处

冯排长，可后来只关了几天禁闭就放了出来。吴天学觉得处罚太轻，又去找赵昆天，可赵昆天哼哼哈哈，根本就不理他。吴天学一琢磨，康营是赵昆天的心腹，他能当师长全靠这些人扶持，怎么会处治他们呢？吴天学越想越觉得窝囊，气得几天没出屋。有心和他们硬拼，可自己势单力孤，不是对手；那就咽下这口气！吴天学真是既憋气又窝火。就在这这时他的堂弟吴天珍匆匆来到他的家里，附在他耳边神秘地说：“吉林东关火磨厂驻着一支队伍，司令姓张，人们说他们是从关里来的老八路。”说着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八”字，接着又说：“我看咱们不妨找找这个张司令，把这的底细告诉他，让他们来收拾赵昆天，咱们也好找个机会抓住那个姓冯的，整死他报仇解恨，这叫借刀杀人。万一姓张的打不过赵昆天，咱也搭不上啥，你看咋样？”吴天学左思右想了好一阵子，最后一点头：“行，就这么办！”就这样，吴天学来到我游击总队司令部。见到张司令后，他就把这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出来，当然，他和吴天珍怎么核计的就省略了。

张司令听了吴天学的话，点了点头：“噢，是这样。”他沉思一下，忽又抬起头直视着吴天学：“吴营长，你这一营之长，官可不小啊！这说明赵昆天也待你不薄，你来这里是不是和赵昆天设好了圈套让我们钻？”

吴天学一听这话有些急了，马上表白：“报告司令，我吴天学在民国时当过兵，对小日本是齿切仇恨哪，只是没有报国的机会。光复后，先遣军招兵，我以为机会来了，就加入了。赵昆天看我行武出身，对这一带情况又熟，就让我当了营长。可是，这是什么他妈的中央军哪，没吃没喝又没枪，全靠抢老百姓的。这帮家伙对老百姓也够狠的，烧杀抢

掠，无所不为，我看和他妈小鬼子差不哪去。张司令您说说，这谁能看得下去？尤其是那个姓冯的糟踏了我侄女，赵昆天还包庇他。这口气，我，我他妈的从哪出啊！”吴天学越说越气愤，直说得唾沫星满屋子飞舞。

马仁文倒了一杯水端给他：“吴营长，有话慢慢说，别着急啊！”

张司令看了看吴天学，低头想了一下：“好，吴营长，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们先研究一下。”说完张司令和马仁文走出屋子。

来到外面后，张司令马上让马仁文通知司令部干部和中队长开会。一会儿大家到齐了，张司令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问：“大家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小马第一个发言：“我看哪，这个吴营长说的可能是实话，可是他的目的是想借咱们的手给他自己出气。”“那不一定，”另一个接着说，“也有可能是他真正对反动派有了认识才这样做呢！”又一人插话道：“要我说，咱们也不管这个吴营长目的如何，只要能消灭赵昆天，那就是做了件好事。”“可不是，这一阵我也听说赵昆天一伙为非作歹，老百姓可让他们给坑苦了。”听过大家的议论后，张司令站了起来：“同志们，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赵昆天我们早就想收拾他，只是苦于不了解敌情不能盲动，今天这个吴营长来了，咱们不管他的目的是出气也好还是打国民党也好，只要能真实反映赵昆天的情况，协助我们行动，我看咱们就不必强求他别的了，所以，我们必须仔细了解情况，如一切属实，那我们就马上出击。”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便分头去作准备。

张司令和马仁文又回到了屋里。张司令坐在吴天学身边用平静的口气对吴天学说道：“吴营长，我们相信你的话，

你看咱们用什么办法去打赵昆天呢？”

吴天学一听这话立时兴奋起来：“张司令，我给你们带路，趁赵昆天没准备，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嗯，很好。”张司令点头道：“那么请你把赵昆天的兵力部署及周围的地形地势给我们详细讲讲！”

“行，我给你们画张地图。”于是吴天学拿张纸把赵昆天的兵力分布、四周的山头、村屯和道路等一一画了出来。张司令认真看了看，嗯，与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看来这吴营长的话还可信。他又用探询的口吻问吴天学：“吴营长，你看这一仗怎么打好？是智取，还是强攻？”

听张司令这样问他，吴天学忽然激动起来。原来，吴天学虽然来司令部不长时间，却觉得在这里有一种回到家里的亲切感。他以前也当过兵，可那是啥滋味，上司对士兵非打即骂，抓住对方的人更是毫不留情。可今天到这里，人家以礼相待，堂堂的司令员一口一个吴营长的称呼自己，不仅相信自己的话，还和自己探讨作战方案。他吴天学哪受过这个呀？在赵昆天面前，自己还是个营长，又有谁把自己放在眼里。想到这些，吴天学情不自禁地忘了自己的真正企图，而开始实心实意地向张司令献起计策来。

“张司令，赵昆天虽然有六百多人，可有战斗力的只有王子清的警卫连，如果把警卫连解决了，那赵昆天的师部就不攻自破了。”看到张司令在一旁暗暗点头，他又接着说：

“王子清这人我了解，他有正义感，只是总觉得国民学政府是合理合法的政府，正统观念很强。他跟着赵昆天也觉得没啥前途，可又找不到其它路可走。我看咱们可以把王子清给拉过来！”

“怎么个拉法呢？”

“王子清家住在口前，咱们可以把他的家人带去作人质，让他的家人向他讲清成败利害，我想，王子清会倒戈的。其余的人大多是被欺骗来的，只要讲清道理，谁也不会给赵昆天卖命！”

张司令听到这里已是胸有成竹，“好，吴营长，我们就按你的意见办。”

这时吴天学忽然站了起来，一把抓住了张司令的手，“张司令，我……”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吴天学脸涨得通红，“张司令，我、我原来打算让你们打赵昆天，我想趁机干掉姓冯的出口恶气，打胜了自然好，要打不过赵昆天，我就溜边走人，可现在我……”

“哈哈……”张司令握着吴天学的手爽朗地笑了，“吴营长，其实你的想法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不过你能协助我们打赵昆天，就已立了一功，怎么，这次战斗我们要是失败了，你还溜不溜？”

吴天学不好意思地说：“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吴天学跟你干定了。”

“好！”张司令紧握住吴天学的手道：“吴营长，我们欢迎你啊！”

吃过午饭，张司令便带领 50 多人，在吴天学的带领下向口前出发。为了造声势迷惑敌人，还特地带上几挂鞭和五六个洋铁桶。

小分队经过 3 个小时的急行军，在傍晚时分来到口前，找到了王子清家。敲开大门，迎出来的是王子清的三叔和大哥。张司令说明来意交待了政策，并向他们保证全家的安全。王子清的三叔沉思了一下，便同意跟他一起去劝王子

清。

11月22日夜，正是农历十月十八，小雪。天很应节气，空中乌云密布，不大不小的西北风使落下来的清雪变成了颗粒状，打在人的脸上火辣辣的。在王子清的三叔和吴天学的引导下，队伍急匆匆向通浆沟方向进发。崎岖的山路特别难走，不时有战士摔倒在地，可战士们知道又要打仗了，一个个特别兴奋，走起路来不仅速度快且声音不大，不到两小时，就悄然摸到了通浆沟。

进村前，张司令命令5挺轻机枪分别设在南、北两个山头上，又把带来的鞭炮挂在山头的树枝上，下面用洋铁筒罩上，另外留下18名战士在村口的有利地形处埋伏起来。见一切安排妥当后，张司令向王子清的三叔交待了几句，然后交给他一封写给王子清的亲笔信，让他火速找到王子清。

先遣军驻扎两个月来，一切都很平静，自然生出一种安全感。在今天这种又冷又黑的夜里，士兵们早已吃饱喝足，躺在老百姓家的炕上鼾然入睡了。不过在白虎沟贾家大院墙内的正房东屋，却还灯火通明，喧闹嘈杂。原来赵昆天、康营长、李团长和赵的二姨太正在兴致勃勃地打麻将。二姨太扭动身躯用媚眼骄嗔地乜斜着赵昆天，嗲声嗲气地埋怨：“都啥时候了还出五条，真臭！人家好好一把清一色都没和上。”

正当赵昆天兴致犹酣时，王子清的三叔悄悄摸进了王子清的住处。王子清一抬头见三叔进来，不禁一愣，刚要开口，三叔一把抓住五子清急急地说道：“子清，快投降吧！吉林游击总队的张司令带着500人的队伍，还有50挺机关枪，已经把屯子包围了，张司令让我转告你赶快集合队伍，接受改编，他张司令保证你原来的职务和咱全家人的性命安

全，现在你大哥已被他们扣押了，要是你不同意，那可就不得了呀！啊，这还有张司令写给你的一封信。”说着慌慌张张地把信交给王子清。

王子清急忙扯开信封，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不禁沉吟起来：想我王子清一心从军报国，可现在当的这叫什么兵，天天鱼肉百姓，欺压良民，实在可恶，现在共产党军队来了，怎么办呢？想了一会儿后，他便让勤务兵去召集排长们来开会。大家到齐后，他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大家听了不禁议论纷纷。有的说，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仁义之师，看人家这事办得就不赖，先礼后兵；还有的说，咱们只有百十人，被人家500人包围，还有50挺机枪，硬打肯定是死路一条。王子清看大家都有接受改编的意思，便下定决心接受改编。他马上命令排长回去集合队伍。

正当警卫连集合时，不料惊动了张团、吴团那帮秃爪子兵，顿时村里一阵大乱，人叫狗咬，人喊马嘶。张清华在村口一看时机已到，便掏出手枪朝天空“叭、叭”开了两枪，霎时，各山头上挂起的鞭炮点燃了，各种枪械也一齐开火，只听得劈哩啪啦的枪声与山谷间的回音混在一起，响成一片，在屯子里的人听起来，真象有千把条枪在射击。赵昆天的先遣军们一个个从梦中惊醒，慌忙从热被窝里钻出来，匆忙中有的穿上棉袄却来不及穿上棉裤，有的找到鞋子却找不到衣服，便穿着短裤光着脚往外跑。到了屋外又傻了眼，只听得四周都是枪声，哪里是条生路啊！直吓得这些人哭爹喊妈，四处乱窜。

张清华见敌人不打自乱，便带着战士冲进村子，直奔王子清的警卫连。来到近前见警卫连已集合，张清华马上命令警卫连把武器集中放在指定的地点，然后又派出一排人协助

战士去集合张团、吴团的秃爪子兵，接着转过头来对王子清讲道：“王连长，今天你立了一大功。来，咱们现在马上去抓赵昆天。”在王子清的带领下，他们赶到贾家大院，王子清第一个冲进屋内，却发现已是人去屋空。只见地上的八仙桌上麻将横躺竖卧，炕上扔着女人穿的红绿颜色的衣物和几双皮鞋，赵昆天和二姨太的绸缎被还铺在炕上呢！

原来，赵昆天等人麻将正打在兴头上，忽听外面响起了枪声，便扔下麻将出了屋子察看动静。开头判断交火地点是在通浆沟口，赵昆天一看大事不好，慌忙进屋穿上大衣，命两个勤务兵轮流背着二姨太，带着李团长、康营长往东北翻过山梁，向吉林逃窜。

天将破晓时，战斗胜利结束了。赵昆天的先遣军们被集中在一个空场上，只见这些家伙个个丢三落四，缺衣少帽，很多人都抱膀缩脖，浑身不住地打着寒战。

张清华健步走到队前，站在木板凳上，用洪亮的声音讲道：“我们吉林游击总队，是共产党的队伍，本来我们准备到官马山一带去剿匪，却听说赵昆天的先遣军在这里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和土匪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所以我们不能允许赵昆天这样祸害百姓，因此才要为民除害。不过我们也知道，你们很多人是被骗来的，故此我们对你们不予追究，现在你们自由了，愿意参加游击队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

听到这儿，下面响起一片要报名参军的喊声。一清点，有200多人，张司令就把他们改编成一个连，由王子清担任新兵连连长，同时，对那些要求回家的经过教育后全部放了回去。

然后张司令把队伍集合起来，命令通讯员到各山头通知

虚造声势的30多名指战员撤回电子，接着他十分严肃地发布命令：“警卫排带新兵回吉林，一营留山上警戒，二营赶赴官马山。”我们的指战员们听了张司令的话个个心中不禁都暗暗发笑。命令完毕，30多名指战员带着新兵们，扛着缴获的武器弹药，凯旋而归。

武殿福、王立新

针锋相对 挫败敌人

1945年9月24日，万毅、周赤萍领导东北挺进纵队启程来东北。10月中旬二支队进驻口前。11月中旬，吉林市党组织要求派员进吉林市担当警卫工作。经支队首长研究，决定调傅作英连去吉执行任务。

当时，因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有条约，不允许我大部队进入城市，所以他们进吉林市时都换了装。有穿伪满警察服的；有穿日本关东军旧军装的；还有穿老百姓衣服的，形形色色，连他们自己互相看着都觉得好笑。

进吉林城后，傅作荣连长率一排进驻原道德会旧址，负责中共吉林市委机关及李维民等领导人的保卫工作。副连长张柄营率二排进入市政府（现吉林医学院址），负责市政府沈越等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三排长周英山率战士去原熙洽公馆，保卫吉林全省保安队司令员王效明等首长的安全。还有两个班在吉林全省警务处执勤。他们的任务是：一、为省市党政军机关站岗放哨，做警卫工作；二、保卫机关首长；三、执行临时任务，协助省警卫处锄奸反霸，打击日伪残余势力。

从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我们党就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946年1月上旬的一天清晨，中共吉林市委突然接到我们派到市公安局内部工作同志打来的电话，市公安局局长霍鹏九（国民党分子）正集合队伍，要去市委缴械！当时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没有在市内，去官马山了。市委副书记李维

民同志立即召集警卫战士和机关全体同志，做好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不多时，霍鹏九等乘大汽车来到市委门前。傅作荣和曲绍卿等四名警卫人员随着李维民同志走到汽车跟前。傅作荣连长挺着胸，腰别两枝短枪，紧贴在李维民身边，曲绍卿等人也手持轮盘枪，密切注视着霍鹏九及其一伙的行动。

“霍鹏九，你要干什么？！”李维民同志严厉地问。

“本人来巡逻，执行公务！”霍鹏九阴阳怪气地回答。

“巡逻也不看看对象，这是共产党的市委机关，不是你们的势力范围！”李维民驳斥道。

“老子例行公事，不管你们共产还是共什么的……”霍鹏九顿时凶相毕露，紧握手枪，要撒野了。

“霍鹏九！你放老实点，不许你乱说乱动！”李维民同志气愤地说。

这时，我们的警卫战士，唰！突然一齐出现在墙头，哗地拉开了枪栓，子弹推进枪膛，居高临下瞄准敌人，齐声高喊：“霍鹏九！不许你乱说乱动！”霍鹏九见势不妙，举起的手枪又垂了下来。

李维民同志逼问：“霍鹏九，你不是来缴我们的械吗？”

“不，不，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霍鹏九不停地解释着。

“没有那个意思，为什么拉着武装来这里？”

“出来巡逻，汽车出了毛病，来这里修理。”

“霍鹏九，不要狡辩了，你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清楚。过去我们曾多次警告过你，可是今天你又来捣鬼，这回你说怎么办？”

“缴他们的械，让他们把枪扔下！”警卫战士齐声高喊。

霍鹏九更慌了，一个劲地说：“李书记，使不得，使不得，咱们是友党，团结为重，团结为重……”

李维民同志把手一挥说：“算了吧，你们这些话我们听够了……今天我们可以不缴你们的械，再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事有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下次我们就不客气了！”

说完，李维民同志急转身，带着四名警卫人员，大步进入大门。“砰！”的一声，门被重重关上。

这时，只听大门外汽车的发动机乱响一阵，霍鹏九一伙夹着尾巴溜了。

霍鹏九仍不甘心，为了破坏共产党的声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怂恿他们到处抢劫民财，胡作非为，劫后留下署名“十八集团军”的字条。老百姓不明真象，一时谣言四起，在吉林市影响很坏。

针对这一情况，李维民指示我方人员关锡庚去市公安局同霍鹏九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天，关锡庚身穿苏军保卫机关发的军服，佩戴手枪，来到当时的市公安局。门岗得知是共产党的代表后，立刻领到霍鹏九的办公室。霍鹏九听完介绍，假惺惺地说：“友党代表来了，欢迎，欢迎！”接着又说：“到处找你们一直没有找到，今天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坐！请坐！”关锡庚根本没搭他那个茬儿，义正辞严地陈述我党的方针和主张，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阴谋。霍鹏九听完后一再狡辩，说事情不是他们干的。接着，关锡庚严厉地警告：如果再发生类似事情，共产党将认真追究！临走时，霍鹏九问关贵姓，关佯称姓张！他又追问道：“不知张

同志在何处办公？”关说：“有事可到苏军保卫局找我！”霍鹏九听后张口结舌，吱唔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这次警告确实起了作用，以后再也没发生上述事情。

1946年2月，蒋介石调动大军向我四平进攻，国共两党已无合作可言。因此，在吉林市不允许有国民党的市公安局长存在。吉林全省警务处副处长巩维明征得苏军同意后，在一天晚上由苏军保卫机关的一个少校带苏军战士同我们的侦缉人员刘健、王福利、李健军等十几个人来到江沿路369号（当时的门牌）霍的住宅，将霍鹏九逮捕。巩维明要求将他交给我公安机关处置，苏军不同意，将霍用飞机送到苏联。时隔三年后，我军解放东北全境，苏军才将霍鹏九送回中国。交给市公安局看押，由政府处置。但送回来的霍鹏九，已奄奄一息，不久就病死在公安局拘留所里。

蒋振兰

宫尔臣遇险除奸

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永南县的一个故事。

那时，日本鬼子刚宣布投降，蒋军就嚣张起来，占据了永吉县的大部分地区。我党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把永吉县划分为永南、永北两个县。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我地方武装部队划整为零，组成若干武工队，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中共永南县委领导的以宫尔臣为队长的武工队有60多名人员，活动在偏僻的大岗子等地敌人的夹缝之中。他们临时以东响水河子为根据地四出活动，边宣传群众，边瞅冷子消灭零散的敌人，立了不少战功。

一天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宫尔臣又带领队伍悄悄地出发了。战士们瞪大眼睛一个瞟着一个的身影向前行进。

天刚蒙蒙亮，武工队恰巧走到一个叫秃尾巴岭的地方。秃尾巴岭呈东西走向，往西为岭头，是悬崖峭壁，往东渐渐低缓下去。时值六月末，岭上林木稠密、枝叶繁茂、遮天蔽日。战士们从宿营地到秃尾巴岭走了也有20多里地，都已困乏，队长宫尔臣布置岗哨爬到树上监视敌人，战士们躺在密林中休息。

宫尔臣仰卧在半尺厚的枯叶上，睁大眼睛，盯着高大的树冠，透过枝叶的缝隙可以看到一块块瓦蓝的天。林中很静，他的身心也暂时松弛下来，不由地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想到了艰苦的八年抗战，想到了必定胜利的解放战争，更想到了自己应该如何带好这支队伍，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想得很远，想得很细……

大概是战士们香甜的鼾声感染了他，一丝倦意袭上身来。他刚微闭双眼，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惊得他立刻睁开双眼就势坐了起来。一看原来是哨兵向自己跑来，他知道有情况，单手一撑地站了起来。哨兵来至近前，喘着粗气报告说：“队长，蒋军已向秃尾巴岭包抄过来，看样子足有一个营的兵力。”

宫尔臣急忙吩咐哨兵叫醒战士，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自己随哨兵爬到最高的一棵树一看，只见几百名蒋军正端着枪从东北三面向岭顶搜索而来。看样子，他们还未掌握武工队憩息的准确地点，但敌人知道我武工队在山上则是确定无疑的了。宫尔臣非常清楚，如果敌人包围圈形成，面对数倍于我之敌，武工队就有全部覆灭的危险，形势已经严峻到了极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宫尔臣来讲，最重要的当然是冷静。他意识到，敌人如此包抄前进，武工队突围的可能性很小了，如撤退，现在东南北三面都是敌人，唯一退路只有西面，而西面又是悬崖绝壁。

怎么办？宫尔臣一时拿不出好主意了。他心里犹如燃起了一团火，烧得全身出汗。看来只有硬拼了，硬拼的后果他当然十分清楚，但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抬眼看看战士们，内心一阵愧疚。多么好的战士，几年来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都活过来了，难道面对胜利在即，却让他们在此葬身荒岭吗？

“宫队长！宫队长！”宫尔臣正在思索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呼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抬头看了看战士们，谁出没喊他。

“宫队长！……”又是几声呼喊，这时无论耳朵怎

么背的人都可以听到了。宫尔臣和战士们顺着喊声找去，原来声音是从距战士们憩息地 50 米的地方发出来的。大家仔细一找，才发现在古树严密遮蔽的下面，有一个二丈多深的大坑，呼喊声就是从坑下发出来的。宫尔臣俯身向坑下一看，果然在坑底站立一人，正仰面向上看，于是问道：“老乡，喊我有什么事？是掉在坑里出不来吧？我们可以救你。”

“不，你们赶快想办法下来，我知道敌人包围了你们，底下有路，我带你们走。”坑下人回答说。

宫尔臣茫然了，下面明明是一口象枯井似的深坑，怎么会有路？但现在已来不及多想，先让几个战士下去探探再说，下去后如果没有路，暂时隐蔽一下也许会躲过敌人。

其实这里的奥秘只有井底的老乡才知道。此人姓王，叫王长锁，他爷爷在世时发现了“枯井”秘密。王长锁的爷爷叫王山，年青时身强力壮，虽说家境贫寒，可他不愿受人驱使，扛活打工全不做，就是一人钻深山，采集各种药材换钱糊口。那时山参还算不少，遇到幸运时采到一棵老参就够全家活一年了。

因为山上树木太密，一次王山不小心，一下掉进了这口枯井。这个地方极少有人来，他在枯井里叫两天，也没人救他，幸好身上带着干粮，才没被饿死。他在枯井中乱撞，撞来撞去发现枯井两壁似乎有空声。他凭着侥幸的心理用手往里挖去，从泥土里抠出一块长尖石，成了他的工具。越挖空声越大，大约干了一个下午，却意外地看到了光亮。他惊喜若狂，挖得更猛了，不一会，挖成了直径足有二尺的洞。从挖的洞爬出来，却看到外面的天地。原来这里别有洞天，只见四面青山，皆呈悬崖状，中间就象个深底的大盆，只是悬崖在侧顺着山势有个陡坡，直通山内而去，因为在大树绿叶

的掩映下，一般人根本无法发现。

王山顺着山的陡坡走出去，后来又无路了。找来找去又发现在坡左侧有个洞，王山也顾不得什么了，就又钻了进去。感觉是越走越向上，终于从一个坟墓窿里钻出来。他定了定方向才发现，是他经常出沒的古墓群，从这回家就很近了。他意外地拣回了一条命，而且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还捞了不少野参、灵芝等名贵药材。此后为了生计，王山就父传子、子传孙，外人一概不告诉，王家祖孙三辈儿的生活也全靠了这一意外的发现。

由于宫尔臣带领武工队在此地，不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虽然他不认识王长锁，可王长锁一家人都十分熟悉他。那么这天为什么王长锁偏偏也在这里呢？

说来也巧，王长锁已很长时间不上山了，今天见天气晴朗，就想上山搞点猎物。刚进出口，就看见蒋军向山上搜来，因蒋军到处骚扰，他也没注意。管它呢，反正进山谁也发现不了，可刚到井口，却听见哨兵向宫尔臣汇报敌情，他才知道武工队遇到了危险，就在下面叫了起来。

于是宫尔臣命令战士们把皮带结起来，有两丈多长，一头拴在树上，一头顺到枯井内。战士们拽着皮带一个接一个地往坑内下。为了麻痹敌人，使他们不至于马上冲过来，宫尔臣命令全体战士摘掉帽子，都挂在显眼的短树梢上，远看就象一个个战士隐蔽地守卫在岭上。

蒋军离岭顶又近了，发现戴着帽子的“武工队员”后，得意极了，以为这下子武工队是跑不了啦。他们还以为武工队根本没发现他们，都弓着身子尽量隐蔽着向岭顶前进，以便近一些，打得更准。

这时，我武工队还未全部撤离，宫尔臣趴在地上，从树

空看到敌人一双双腿向前慢慢挪动。他想，如果敌人照这个速度上，我武工队未撤完敌人就会攻到岭顶，必须阻击他们一下，才能保证武工队全部安全撤离。于是他命令趴在地上监视敌人的六名战士分三面从树底向敌人开火。

敌人正得意忘形，没想到“砰、砰……”几声枪响，有十几名敌人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腿已被枪子掐折了，疼得他们嗷嗷乱叫，吓得其他敌人调头就跑，足足乱了二十分钟才被当官的止住。在当官的持枪威逼下他们重新端枪，向树上帽子猛烈射击。打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帽子全部被打掉了，岭上没了动静。

他们高兴极了，狂嚎着：“武工队员被歼灭了！”一窝蜂的争先恐后跑到岭顶，可是一个武工队员也没见到。浪费了不少子弹，又被打伤了不少人，所获的只是60多顶破帽子，这下他们的眼珠子差点气冒出来，都爹长妈短地骂起来，大官骂小官，小官骂士兵。

这次武工队身遇险境，虽然只损失了几顶帽子，可宫尔臣却不轻松，他深深地思索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敌人距我们那么远，我们的行动又是这样保密，他们掌握得却那么准确呢？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而通风报信的人又在时时监视我们的行动。那么这个奸细又能是谁呢？在内部吗？不大可能，我们的战士都是出生入死，几经考验的，即使真的出了内奸，那么连续紧张的集体活动，也不会有机会给敌人报信，问题肯定出在我们经常活动的几个村子。

宫尔臣立即召开了由指导员、副队长参加的会议。大家详细认真地分析了这一问题，感到奸细不除，必留后患，只有打瞎敌人监视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更好地保全自

己，消灭敌人。经过周密研究，一个智除奸细的计谋形成了。

七月初的一天傍晚，一支 30 多人的蒋军队伍大摇大摆地开进了东响水河子村。一进村，就到处找人了解武工队活动情况，并扬言谁要能提供武工队活动的线索，就给谁重赏。

领头的是山东口音，身材魁梧，一米八十多的个头，显得威风凛凛。当兵的都称他贾长官。只见他嗑呼一会儿后，就到地主杨喜才家找了个独屋住了下来，地主热情招待贾长官及其部下，贾长官酒走饭饱后就准备睡觉了。

刚脱掉鞋，就听到一声轻轻的敲门声。贾长官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个大脑袋、扁平脸、三角眼的家伙。一见面，他就对贾长官点头哈腰，活象一只哈巴狗，鬼鬼崇崇地说有事要向贾长官报告，贾热情地把他让进屋里。

进屋后，来人就立即向贾长官做自我介绍。

原来他姓熊，外号熊坏水，上次向蒋军报告武工队活动的就是此人。今天他见蒋军来到东响水，白天没敢在群众面前暴露，晚间却溜到贾长官这儿来告密。

“现在共军武工队正在南响水河子活动，我已打发我家老二歪脖子去跟踪他们，只要发现他们一驻扎，就立即回来报告长官，他们人不多，完全可以把他们消灭掉。”熊坏水屁股还未挨到凳子上就着急地向贾长官邀功说。

“好，好样的！我不会亏待你，等消灭了武工队，一定大大提拔你们哥俩。”贾长官十分赞扬地说。

话还没唠完，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熊坏水打开门一看，正是自己的弟弟熊歪脖，看样子是跑回来的，满脸的汗水正顺着歪脖子淌下来。

贾长官一看，这位更难看了，斜楞眼、大歪脖、尖下

巴，活活象个大虾壳。再看那汗水滴过的脸，尽是泥道子。贾长官皱了皱眉头，就问：“什么事？”

“长官……武工队，武工队……正从南响水……回、回来了，快去、去打呀！”没想到这位还是个大结巴。

“好！这下你们哥俩可立了大功啦！一会儿就有你俩意想不到的好戏啦！”贾长官边说边穿好衣服，之后挎枪走出了门，熊坏水哥俩象狗似的在后面跟出来。

这时，天虽已近晚十点，但正值七月中旬，圆圆的月亮挂在中天，大地一片银白。贾长官带着队伍刚走到村口，就远远看到了迎面走来的武工队。可他们一点也没有打仗的样子，象是在乡路上散步。

熊坏水从来没见到蒋军这么“大无畏”过，有些傻了，再看对面的武工队，也是大摇大摆地走来，没有一点要打仗的气氛。再看看蒋军，还都笑嘻嘻的，这俩坏小子再也沉不住气了，大声喊了起来：“长官！快打呀！”

只听贾长官大喝一声：“兔崽子，打的就是你们这帮王八蛋！”说完一伸手象拎小鸡似的将熊坏水拎了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立即过来两名士兵将他捆上了。熊歪脖一看，心说坏了，赶快跑吧，可没跑出二十步，又被对面来的武工队给逮住了。

熊坏水还寄一线希望，抬起脸来问贾长官：“长官，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是忠于党国的啊！”

“正因为你们是反动派的走狗，我们才要严惩你们，你以为我们真的是蒋军吗？我们是武工队。”贾长官义正辞严，熊氏兄弟吓得瘫在了地上。

原来这支蒋军队伍是我武工队一部分人扮的。贾长官，

即假长官也，他正是队长宫尔臣所扮。他们为了麻痹奸细，以便引蛇出洞，才演出了这么一出双簧戏。不出所料，熊坏水兄弟果然入了套，这两只凶险的狐狸终于没有逃出猎手的枪口。

刘文和

“求 情”

一般说来，替别人求情，总得有点交情。而在国民党占领桦甸期间，却出现过伪乡长替游击队“求情”的事。

事情还得从集厂子游击队家属转移的事说起。

1946年6月我桦南游击队成立后，在敌人控制薄弱的桦南山区镇压土匪恶霸，抓捕国民党谍报人员，破坏敌通讯线路，袭击敌据点，令该地的国民党军胆颤心惊。游击队还经常骚扰敌人，每隔二、三天就派少数队员趁夜深人静到敌人据点前放上几枪，敌人不知游击队虚实，不敢走出据点，就向外盲目开枪，有时一直打到天亮。在游击队的骚扰下，敌人被搅的寝食不安。

1947年夏，敌人得知集厂子住着我游击队11户军属，於是就打起了抓军属引诱游击队上当的鬼主意。

敌保安团有个班长，家住大碱厂，穷苦农民出身。他自被裹胁参加保安团后，一直就有携械归依我游击队的念头，但又顾虑家属受国民党迫害而迟迟未敢行动。他曾把这个想法与我游击队侦察队长李永华谈过，让游击队照顾他的家属。李永华跟他讲：你可以替我们办事，多留心敌军情况，我们会派人找你。自此，他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游击队从他那获得过不少情报。这天他得知敌军抓军属的计划后，便找个借口溜出兵营，把消息告诉了游击队的联络员。傍晚游击队得到了消息，立即出发赶往集厂子。游击队大队长赵青山命令游击队在集厂子外准备接应，派李永华带领3名队员去村里通知游击队家属立即转移。李永华想：军属大都是妇女和儿童，还有老人，这么急着转移，人出去了，以后日子

怎么过？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尽量多带些东西出去。可时间这么紧，又没有劳动力，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了伪乡长。于是李永华命3名队员通知军属，发动群众帮忙，自己却去了伪乡长家。

乡长一家已吃过晚饭，正在油灯下忙着什么。李永华一进屋，他们全怔住了。李永华说：“不要怕，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乡长帮个忙。”“啥事，尽管说。”乡长一面应付，一面让孩子赶快烧水。

“不用麻烦了。”李永华说：“村里住着11户军属，今晚想搬家，请乡长帮着张罗些人帮个忙。”

伪乡长一听，吓了一跳，心想：你们搬家，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正出事，我还有推托之词。让我找人帮助搬家，万一上边追问下来，落个“通共”的罪名，可真担待不起啊。想到这，乡长决定敷衍一下：“天这么晚了，明天天亮再搬不更好吗？”

李永华见伪乡长不爽快，故意把身子往炕外挪了挪，并从腰间拿出手枪，压在大腿下面：“今晚就搬，我们的人在村外等着了！”

乡长一听，倒吸了口冷气，去年秋后在桦甸城郊发生的一幕在脑中掠过。

1946年10月，游击队通知游击区和敌占区的8个伪村长开会，让他们为共产党筹粮筹款。7个村长迫于我军的压力，同意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周旋，表面听从国民党，暗中也为共产党办事，成为实际上的两面政权。桦甸城郊的大地主杨宏秀依仗有权有势，又处在国民党军的卵翼之下，就没把游击队放在眼里，开会不到，筹粮不交。游击队决定教训他一下。一天深夜，二区区长尚金盈带领区中队神不知鬼

不觉的摸到了杨宏秀家。杨宏秀因有事进城没在家，我军绑走了杨宏秀的叔叔和本村大地主马罗锅子，拉走了杨家十几匹马和不少物品，途经高丽帽子回到治安部落，连驻守在高丽帽子的国民党正规军也没敢下山。杨宏秀回到家，见到游击队给他的信，慌了手脚，忙带着3万元钱跑到治安部落，经我教育后，把人、马匹、物品还给了他。从此杨宏秀对我交派的任务再也不敢怠慢了。

伪乡长想到这些，再看看眼前表情严肃的李永华，知道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了，冷汗从脸上噼哩叭拉的滚落下来。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情愿，脸上的肌肉还是勉强抽动着装出笑脸来连声说：“好、好。看需要谁帮忙，我去告诉就是了。”

李永华领着乡长找到了任弘泽等积极分子和几个基本群众，帮助军属收拾了家具，套上牛车拉着，连夜离开了集厂子。

第二天上午，敌人来后扑了个空，不禁恼羞成怒，抓走了任弘泽等十几个帮助搬家的农民。敌人一口咬定，他们和游击队是一伙的，非治罪不可。任弘泽等人则大喊“冤枉，是乡长让我们干的！”

李永华又来到集厂子，见到乡长劈头就问：“人都被他们抓去了，怎么办？”“他们是老百姓，不是游击队，你得想法把他们救出来！”

乡长无奈，走四乡、窜村屯，动员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一齐到县城求情，“他们确实是好人，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把他们放了吧”

敌军并不给乡长面子，“你们那住着共军家属，你不但报告，还帮他们搬家。这回又来要人，我看你就象共产党。”

伪乡长一听，吓得面如土色。心想若落得个共产党的罪名，身家性命难保，就再也不敢多说话了。回到家再一琢磨：集厂子有自己的房屋、土地、搬不走挪不动，就在游击队的眼皮底下，游击队也是得罪不得的。这下愁得他觉睡不着，饭吃不下，象得了一场大病。

敌军把伪乡长撵走后，第二天派了两个士兵，身穿便衣来到集厂子查访被抓农民的底细，他们住到了乡长家。游击队得知后，决定利用这两个士兵，为任弘泽等人的获释做些工作。这天，李永华又来了。他一身生活比较富裕的农民打扮，没带武器，却带来五斤白面和四瓶好酒。白面和瓶酒在当时农村可是个稀罕东西，也算是比较贵重的礼物了。他见到乡长就说：“听说乡长急病了，我特地来看看。”乡长用眼睛示意：另间屋里有生人，李永华点头表示明白。这时那两个士兵也象无意闲溜一样跨进了乡长的房门。乡长赶忙给李永华介绍：“这是两个熟人，来桦甸办事，到我这小住几日。”李永华起身应酬：“我哥哥住在集厂子听说摊上点事，我想请乡长帮忙……”敌兵一听马上警觉起来：“你哥是谁？”“任弘泽，种地的。”然后李永华当着两个敌兵的面向乡长请求：“种地不容易，误了农时，一年收成就完了，到秋后拿什么交地租、交军粮啊？我哥老实本份，从生下来没离开过集厂子，村里人搬家帮帮忙，谁想会出事？”乡长也顺水推舟，说帮着搬家的人都是本分人，乡长愿以地产、房屋担保，去县里求情。李永华又不断的说乡长面子大，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给县里筹粮筹款什么事都热心张罗，县里用得着他，哪能不给面子。李永华这些话明里说给乡长，实际是讲给敌兵听的。两个敌兵又象唠家常一样对李永华盘问一番，李永华早知道两人的身份，已做了准

备，当然问不出破绽。

不一会，水饺煮好了，李永华、伪乡长、两个敌兵边喝边吃。李永华又把话引到救人的问题上：“光用嘴求求恐怕不行，得破费几个钱吧？”李永华提醒伪乡长，“乡长的钱当然不能白花，我们能记住乡长的大恩大德。”

“我认识商会×会长，听说他能跟县长说上话，县长若是点了头……”伪乡长借着酒劲，口气也大了起来。

“我看不用费那么大劲儿了，大军从桦甸跑到集厂子够辛苦的，不如慰劳慰劳他们。”

第二天两个敌兵回桦甸县城了。乡长又找来了四乡八邻的头面人物，在马车上装了几袋粮食和一口肥猪，又雇了几个吹鼓手，一路上吹吹打打，到县城“慰劳”去了。

敌连长已听了两个敌兵的报告，知道集厂子还要来人，当乡长带车到兵营时，敌连长面带笑容把这伙人迎进了连部。敌连长是个家理教信徒，游击队得知了这个情报后，李永华就通知伪乡长这次进城一定要带一个信家理教的乡绅。一行人坐定后，家理教乡绅主动与连长搭讪，互叙家理教辈份，之后，便与连长以兄弟相称了。敌连长收下了慰劳品，让乡长具保画押后，答应放人。

第二天，被关押的无辜群众任弘泽等人全部获释，伪乡长也没因此事再受到国民党军的刁难。从引，这个伪乡长与游击队来往也密切了。

张永生

汪军长脱险记

1940年冬的一天夜里，一阵犬吠声惊醒了十里通屯熟睡的人们。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拨开窗帘探视；有的在炕上侧着耳朵听。

此时，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亚臣，正在屯东侧道北老温家和温忠臣研究部队筹粮问题。

温忠臣（农民、汪军长的联络员）听到外面由远而近传来的急促脚步声，忙“噗”地一声将灯吹灭，说道：“不好，有情况。”还未等汪军长想好脱身之计，就听见一伙人冲进院子，象饿狗觅食一样，在院子里东寻西找地折腾起来。不用说，肯定是伪警察又来搜捕抗联了。汪军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下意识地环视室内四周，似乎在寻找出路。然而，十冬腊月，后窗户封得严严的，哪里逃得走？

警察在院内折腾一阵儿后，就朝正房走来。老温机灵地把汪军长推到炕上，示意让他躺下，并迅速放下幔帐，然后赶快出去应付警察。

汪军长上炕后，见炕上已有一个年轻的妇女搂着孩子躺着呢，不禁一愣，挨着年轻妇女躺下吧，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可不如此，又怎能躲过敌人的搜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趴到炕上了。

警察进到屋里，为首的张警尉对温忠臣说：“我们是来号房子的，今晚就住这个屯儿了。”温忠臣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但马上镇定下来，赶忙迎上前去热情地说：“张警尉驾到，欢迎！欢迎！快请进屋里暖和暖和。”话音不落，张警尉一搭眼看到炕上放着幔帐，就用手指了指说：“这是……”老温马上应道：“我兄弟媳妇生孩子了。”张警

尉一@1 听是月房，感到很晦气，转身对老温说：“东屋是月房，西屋腾出一铺炕吧！”温忠臣意识到张警尉对东屋有怀疑，连忙说：“好，老总能住在我家，那是警尉对温某的关照。”

为了把警察引出去，给军长一个突围脱身的机会，温忠臣便对张警尉说：“我跟你们去号房子。”

张警尉回答说：“不！不！”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回过身嘻皮笑脸地说道：“老温，祝你喜得小侄，我看看小兔崽子长的什么人模狗样。”说着就用尖刀去挑幔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幔帐里回妈家来住满月的温忠臣的妹妹温忠华，赶忙扯过一床被蒙住了汪军长，慢慢地把幔帐拉开一条缝，惊讶地喊了一声：“妈呀，孩子拉屎了，抹了一炕！”然后掐了孩子一把，孩子哇哇哭了起来。张警尉往帐里看了一下，没看出什么破绽，见孩子又拉屎了，就捂着鼻子转身出去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低声对外号叫大白话的王警长说：“你和赵瘦猴子住在这，可不能大意哟！”并用手指指东屋，说完一溜烟走了。大白话和瘦猴子进了西屋，一眼看见箱盖上有两瓶白酒，一盆鸡蛋，就一个上前拿起酒瓶细看，一个摆弄着鸡蛋。温大娘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心想，让这俩兔崽子喝个大醉才好呢。随即说：“天这么冷，你哥俩喝两盅，驱驱寒吧！”说着温大娘下厨房给他们炒鸡蛋去了。

这时，大白话装模作样地扫视一下屋内，最后走到南炕东间壁墙中间的小窗户前往外看。堂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当即说：“老温，你点支蜡，放到外屋地窗台上，把门挂上。”之后，才放心地坐到炕上。

一盘炒鸡蛋和一盘炒豆腐丝端上来了。俩儿酒鬼二话没

说上炕便大喝起来，喝着喝着，大白话有点云山雾罩了。他打个咳声说：“猴子哥，咱哥俩算是倒霉了，这可不是得意差事儿，万一遇到姓汪的……”

姜猴子呷了一口酒，神秘地说：“想抓姓汪的比登天还难。”

大白话说：“不说这，倒霉事不一定非得叫咱哥俩碰上，喝！”

干了一杯酒，瘦猴子紧接着说：“大白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大白话摇头晃脑地说道：“别说丧气话，吉人自有天相，喝酒！”

西屋说话，东屋听得一清二楚。汪军长悄悄下地，从东屋门往外察看。外屋地灯光通亮，门挂着，后窗户严严的，溜走是不可能了。他掏出怀表看看，已是午夜 11 点多了。离原定到十五顶子接头的时间只剩下两个小时，如不马上想办法脱身就要耽误大事，怎么办？急得他如坐针毡。

这时，又听瘦猴子追问大白话：“大白话，说真的，要是碰上姓汪的，咱们怎么办？”

大白话闭上一只眼睛说道：“就这样。”

瘦猴子不解其意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大白话笑道：“你真是个笨猴子，这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懂吗？”瘦猴子顿开毛塞，笑道：“懂了懂了。大白话，说实在的，我早耳闻姓汪的厉害，说他身高八尺，膀大腰圆，双手使枪，百发百中，康德六年一仗就打死皇军三百多人哪！一提姓汪的，太君都打怵，何况咱俩了！”

汪亚臣听到这里，眼睛一亮，决定出其不意，主动出击。于是他吧匣子枪顶上火，直奔西屋，

汪军长的突然出现，把两个警察吓蒙了。坐在炕头用大

腿压着大枪的大白话愣了一下，才想起伸手去摸枪，汪军长一脚把枪踩住，瘦猴子正要起身去取挂在墙上的那只六轮子枪，汪军长厉声说道：“你不要命了！”接着他拍拍胸脯：“我就是汪亚臣，你们要想与人民为敌到底，别说我不客气！如果你们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咱们交个朋友！”

两个被吓得失魂落魄的警察连声说：“小的不敢和汪军长作朋友，我们高攀了，有事一定照办！一定照办！”说完跪下求饶，磕头如捣蒜。

汪军长说：“不要忘了你们还是中国人，日本侵略者强占我东三省，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我们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奋起反抗，怎能为虎作伥呢？”

这时老温上前劝道：“二位可不要执迷不悟哇！咱们都是中国人，小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老温说完，汪军长把枪拿起来，退出子弹，又还给了警察。

汪军长义正辞严的几句话，打动了两个警察的心。他俩忙不迭地说：“汪军长，你放心，你饶我们一死，终生不忘。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后我们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更不做伤害贵军的事，说实话，你来十里通走漏了风声，我们这次来了七、八十人，目的就是来抓你的。你得赶快离开这里，后半夜要全屯搜查，外边岗哨布置得很严，出去时不要走南门，那里有卡子。”

汪军长又反问一句：“你们讲的可都是实话？”

两个警察连声说：“小的不敢撒谎，撒谎不得好死。”

汪军长觉得他俩说的是实话，就说：“好，告辞了，后有期。”说完，就走出门去，趁着夜色，直奔十五顶子，这时离接头时间只差不到一个小时了。

许庆山。

注：

1. 十里通屯：今舒兰县金马乡长胜村。

2. 汪亚臣：原在东北军二十六旅三十四团当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团投降，他气愤已极，怒火中烧，毅然脱离三十四团，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1934年2月，他邀集五常县一带的反日山林队和附近群众七百多人，组织了反满抗日义勇军，汪亚臣被推举为领导人。1936年初，汪亚臣率义勇军转战到五常县北山区的高丽营子与第三军三师会合，又于四合台同珠河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会晤。从此，汪亚臣领导的反满抗日义勇军被改编为东北革命军第八军，任命汪亚臣为军长。同年九月，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三军、六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汪亚臣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汪亚臣仍任军长。

夜歼“双匪”

1946年5月28日，永吉县委领导的永吉县保安团实行战略转移，撤到永吉县东北的缸窑。保安团决定抽40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武工队，驻在离缸窑十多里地的黄家窝棚，以监视驻守乌拉街的蒋军行动。武工队的队长由经历过八年抗战的保安团二连连长巩二成担任。

新编成的武工队进驻黄家窝棚那天，不少老百姓由于心里不托底，东躲西藏，不敢接触武工队，武工队员们只好搭帐篷睡在外面。好容易和当地老百姓混熟了，分别住进了老百姓家，又由于撤退仓促而发生粮荒。进村那会儿只带了不足200斤的粮食，早已吃光，水煮野菜充饥已经十天了，不少战士脸、腿都浮肿起来。当地老百姓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干着急，帮不上什么。

武工队长急得火烧火燎：如果不解决粮食问题战士们的身体就会垮下去，不用说监视阻击敌人，就是性命也难保，又怎么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呢？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自己亲自带两名战士外出搞点粮食。

到哪去搞粮食呢？黄家窝棚的西面有敌人重兵压境，只有往东碰碰运气了。一天早饭后，刚要出发，几位熟悉的乡亲匆匆跑来，告诉巩二成千万不要往东去，说往东十里的黄花岗，有个号称“双匪”的匪首，手下有二十几名土匪，专门打家劫舍，拦劫路人。特别是匪首“双匪”心狠手辣，身体强壮，手使两支匣枪，百发百中，老乡们很怕武工队遭遇不幸。

老乡们的关心和好意相劝，倒使巩二成有了新的想法。他想既然黄花岗有个土匪窝，那么那里很可能储备不少的粮

食。如果端掉了这个匪窝，不但可以解决武工队的给养，还可为当地老百姓铲除一害，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他决心去捅捅这个马蜂窝。

战士们听说要打“双匪”，尽管身体都十分虚弱，可仍乐得直蹦高。这个说：“好长时间没打仗了，手都直发痒。”那个说：“双匪不是枪法准吗？咱们专打他的手腕子，让他成为‘双秃爪’。”战士们那个高兴劲就甭提有多高了。

可巩二成冷静下来一想，打“双匪”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武工队人数虽多于土匪，可人家吃喝好，身体强壮，都是些敢于拼命的家伙；而武工队呢，个个面黄饥瘦。另外，土匪们钻惯了山林，熟悉地形，武工队却初来乍到，因此必须把困难估计足，不可轻举妄动。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武工队员们，并决定自己带两名战士先去侦察一下。队员们怕巩二成出事，都争抢着要去。巩二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坚持自己去侦察。

当天下午，几名队员去河里摸了半天，才抓了两条不大的鲇鱼，做了给巩二成和两名队员充饥。天刚擦黑，巩二成带着队员小赖和小俞上路了。小赖和小俞是两个能走能跑、打枪又准的小伙子。他们走了大约两顿饭的功夫，就快接近黄花岗了。巩二成不敢冒然再向前走，想找个人打听一下，可是兵荒马乱，路上人稀，找谁打听呢？说来也巧，岔道来了一名白胡子的老者，手里拎着拐棍，肩上背个钱搭子，象是个出外办事的。

巩二成很有礼貌地站到了路旁，等老者走到跟前，轻声地问道：“老大爷，请问个路……”可是那老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似地走了过去。巩二成认为老者可能是个聋

子，于是紧跟两步又问了一句。这位老者不但不回答，反而对他横了横眼睛，径直向前走去。

这时，夜幕渐渐笼罩下来，巩二成估计那老者是黄花岗的，就向两名队员使了个眼色，三人尾随那老者而去。看来那老者很有经验，走大路怕出危险，专门挑山间小路走。巩二成三人也紧盯着老者的背影，翻过一座山岭，就见山下点点闪烁的灯光，那老者更加快了脚步，向灯光处走去。

这大概就是黄花岗了，巩二成心想，于是也紧随老者向前走去。

前边出现了一座破旧的小茅屋，只见老者闪身进了茅屋。巩二成三人悄悄来到茅屋旁时，忽听屋里传出了一声老年男人的骂声：“狗娘养的，我跟你们拼了。”他们急忙凑到窗前，用舌头舔破了窗纸向屋内一看，三个人都大吃一惊。灯光下，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用枪将一位老头和一位老太太逼到墙角。这位老头不是别人，正是方才他们跟踪的人。一个赤裸上身的家伙正将一个年轻姑娘按倒在炕上，狠命撕扯着衣服。姑娘用双手护住前胸拼命地挣扎，嘴里不停地叫骂着。

看到这里，巩二成估计到这一定是近些时候百姓传说的采花贼。他怒火中烧，趴在两上战士的耳旁分别唧咕了几句，就开始了行动。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巩二成一脚将门踹开，一个箭步冲到持枪匪徒的身后，那名匪徒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巩二成的铁拳头早已落在了他的头上。小赖紧跟上来一下将匪徒的枪夺下来。另一个匪徒听到动静想要爬起来，怎奈那姑娘狠狠地抓住了他的猪鬃似的头发。小俞早已气红了眼，手持匕首，狠狠插进了匪徒的后背，疼得土匪像狼一样嚎叫。小

俞怕吓着姑娘，两膀一用力将匪徒拎到了外面，没想到那一刀透过脊背扎到心脏。这名匪徒光着身子下了地狱。

被打倒在地的匪徒见此，吓得跪在地上，头磕得象小鸡啄米一般。那对老年夫妻恨得两眼发红，老头抡起巴掌连扇匪徒十几个大嘴巴，老太太恨得咬掉了匪徒的半个耳朵。巩二成要留活口，怕匪徒被这对老夫妻打死，忙劝住他们。

经审问，原来这两名匪徒即是“双匪”的部下。“双匪”经常派他俩出外摸底，然后去打劫。这两个家伙就常借此机会在晚上闯入民宅强奸妇女，附近的漂亮妇女被他们轮奸的不知有多少。巩二成见这名匪徒罪恶这么大，立即命令小赖和小俞将他拉到山沟里处决了。

就在巩二成审问匪徒时，老太太与姑娘早已把饭做好。老头面带愧色对巩二成说：“恩人，我姓王名叫王老三，我对不起你们。这一带土匪常干坏事。我也担心你们是坏人，才没理你们，从今天看来你们一定是共产党这头的了？”

巩二成点了点头，又向老者询问“双匪”的情况。老人一听说武工队要打“双匪”，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他端上烧酒非让巩二成三人喝。因为晚上要战斗，巩二成说什么也不喝，但老人百般相让，也只好喝了一口。

三杯酒下肚，老头的話更多了。

“多亏你们问我，问别人还真说不清，这帮土匪鬼得很，把窝修在了三面是山的沟里，整个山沟象躺倒的葫芦。不知从哪弄来些外地人白天黑夜地在北山洼里给他们挖洞存放抢来的东西，并在葫芦底的悬崖下修了一座大院子，盖了五间房。土匪窝一建成，那些干活的人就被他们活埋了，然后派土匪把住葫芦沟口，一般人进不去。偏赶有一天我上后山采人参，立陡的石崖从无人敢上，我却摸索到了一条小路

爬到崖上，这才发现了沟里的秘密。”

情况了解清楚了，巩二成决定实地去看一下地形。有王老三带路，确实省去了不少麻烦。他们披荆斩棘，爬到了黄花岗后，巩二成掏出首长送给他的老怀表一看，正是午夜十二点。他怕王老三出意外，让他先回去，自己带领两名战士悄悄下到土匪窝背靠的悬崖。土匪们做梦也没想到后面的悬崖能上来人，因此只在沟口布置几个人放哨，其余的人便开始吃喝玩儿乐起来。

巩二成他们居高临下，借着悬崖上的青草掩蔽，听到一阵喝五吆六的喊叫声从院内传来。巩二成领着两个战士悄悄顺着王老三指引的隐蔽在青草中的小路下到了沟底。他自小练过几天武功，身灵脚轻，见旁边有颗大树，就爬了上去，两名战士在下面俯视着四周的动静。

原来这是个三合院，正房五间，两侧各盖有四间厢房。可能因天气太热，窗子都大敞四开，屋顶吊着四盏大吊灯，照得室内通亮。屋内南北大炕上放了两排炕桌，四周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哭的，有笑的，有打的，有闹的，还有趴在炕上睡大觉的。只有南炕头那张桌上还喝得热闹，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家伙坐在首位，不用说，这就是匪首“双匣”。一个嘴唇红得象猪血似的女匪不知耻地坐在“双匣”的怀中，正端着一杯酒，往“双匣”嘴里倒。

“弟兄们，跟我‘双匣’不亏吧？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他妈的不一定赶上咱们，共产党的部队更是他妈的穷光蛋，哈哈……”匪首“双匣”喝下一杯酒后得意地说。

“那是，那是，可我们就是缺女人，嘻嘻……”几个匪徒粗俗地说笑着。

看到这里，巩二成灵机一动，今晚不是歼灭土匪的最好

时机吗？但凭三个人打显然不行。他急忙下来把小赖和小俞叫到一起商量起来，最后决定让两名战士回黄家窝棚，把武工队调来从沟口摸掉哨兵，然后发起攻击。小赖迟疑地说：“还是回去一名吧，队长一人在这不安全。”

“不！”巩二成坚决地说，“机会不可错过，我个人安危事小，去一人，一旦途中出了问题就要耽误了歼匪的好机会。”

两名战士走了，巩二成重又爬上树去，坐在树杈上监视院内土匪的动静。夜深了，土匪们都醉得不成样子，一一睡过去。巩二成不时地掏出老怀表，一分一秒地等待武工队的到来。

“嗖！嗖！”随着两颗信号弹的升空同时传来了两声清脆的枪声，巩二成心里“格登”一下，心想坏了，一定是武工队被土匪发现了。正在他惊愕之际，只见从外面跑进院内一名土匪，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喊：“不好，武工队打来了！”

不容巩二成多想，抬手一枪，那名土匪脑浆迸裂，死在地上。屋内匪首“双匣”被枪声惊醒了，连喊带拽地叫醒昏睡的土匪，命令大家快取枪。也真可笑，睡着的土匪叫不醒，醒来的土匪找不到枪，屋内乱成一锅粥。

巩二成看到这里，心想，土匪们要是全部醒过来，拿起枪到沟口阻击武工队，可能就要有大伤亡，不如来个出其不意。他心里想着，身子已跳落院中，冲到窗下，手举匣枪，高声喊道：“不准动！谁动打死谁！”“双匣”见只巩二成一个人，没放在眼里，不知从哪把枪摸到手，抬手就要向巩二成开枪，尽管“双匣”被吹得神乎其神，因为醉醺醺的，还是晚了一步，巩二成早已一枪打在了他的手腕上。

“双匪”红了眼，窜出窗外向巩二成扑来，两个人扭在一块。巩二成是什么身手，在抗日战争中，他曾一气挑了好几个鬼子，徒手搏斗，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只见他双脚夹住“双匪”，两膀一叫力，“双匪”的胳膊已经折断，只剩皮筋还连着，疼得他大叫一声，几乎昏厥。这时两名土匪又从后面向巩二成扑来，巩二成听到后面有声，猛地回过头来，两手各薙住一个土匪的头发，双手一并，两个土匪的脑袋磕到一起，疼得他俩饿狼似的嚎叫。

这时，十几个土匪醉得走着舞步，有的还倒拿着枪，将巩二成包围起来，但都是东倒西歪，一碰就倒。正在巩二成与土匪搏斗时，那个妖艳的女匪端起了枪向巩二成瞄准。枪响了，倒下去的却不是巩二成，而是女匪。原来我武工队已全部赶到，打死哨兵攻进了院内，土匪们只有束手就缚。有的土匪直到当了俘虏还未清醒过来。

战斗结束时，东方已经发亮，老百姓听说武工队全歼了土匪，都纷纷聚拢来，感谢武工队为民除了一大害。巩二成吩咐队员们将一部分战利品分给贫苦的农民，然后又雇用大车叫队员们将其余的大米、粉条、咸鱼、酱猪肉等装上车，带着胜利的喜悦，凯旋而归。

刘文和

儿童团捉鬼的故事

1946年的夏天，解放战争开始了，桦甸县第五区横道子屯的男女老少，都忙着生产和支援前线。很久没有下雨了，白天烈日当头，暑热难熬，傍晚才从漂河上刮来一丝凉风。饭后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坐在大树下、街道旁乘凉。屯子东南角的小学校空旷的操场周围，长着柳树和榆树，这里自然成为人们愿意光顾的场所。孩子们聚集在这里捉迷藏，嘻笑之声响遍操场。夜色渐浓，大人们逐渐回家，只有我们这些孩子们，贪夜晚的凉爽而玩兴正浓。村里的灯火陆续熄灭了，为了明天早起抓懒汉，我招呼大家赶紧回家。那时我正在区里当儿童团长。听到我的喊声，季方贤、季方才、周全、李长林从树后、草丛、墙角处转了出来。为了等一些小同学，大家就坐在学校南面的土坡上休息，操场上静下来。夜深入静，树影幢幢，突然我们听到北面的教室里有呼呼的响声。“你们听，谁跑到教室里去敲桌子？”周全站了起来，“走，去抓他们，看看是谁？”于是，我们向教室跑去。打开门，大家一拥而进，可是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找！”大家从前到后，昏晃犄角，桌上桌下到处找遍，仍不见人。“到三年级去找！”可是三年、二年、一年所有的教室全找了，也没有人。一向稳重的季方贤说：“准是谁淘气，等咱们一找，他早就跑回家了，上哪儿去找！”大家一想也对，就各自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上学后，大家不由得相互询问起来。“昨晚是不是你在教室敲桌子？”“哎！冯礼保证是你，昨晚玩完时，就是没看到你，准是你敲的桌子。”问来问去谁也不承认，有的还急了，“要是我，我是小狗！”大家满腹狐疑地上课

去了。

晚间，我们还和往常一样聚集在校园里。当大人们散去后，一些同学不约而同地又坐在南边土坡上，果然教室中又传来了呼呼的响声。大家在周全的指挥下，几个人一堆蹑手蹑脚地向几个教室同时摸去。当布置好专人监视房后窗子后，大家分别进入各班的教室，将所有教室搜了一遍，仍无人影。于是大家凑到一起，猜测看是谁想吓唬大家。一查，发现我不在场，辛生说：“准是咱们的团长，走，上他家找他去。”于是一帮人来到了我的家。可巧这天晚上，我家来了客人，所以我没出去玩。大家不由分说，纷纷指责我装鬼吓唬人。我百般解释，大家仍不相信，非叫我坦白交待不可。最后由我家中的大人和客人们证明我今晚确实没离开过家，才算了事。

第三天，学校教室有响动的故事，传遍了全屯。这时屯里的徐大神借机到处讲：“那是我堂子上的胡三太爷显灵，大家伙儿不要惊动他，以后神仙还要舍药呢？”有些上岁数的老人，也告诫自家孩子，晚上别上学校去玩了。

俗话说，三里地，没准信儿。学校深夜有响动的事儿，越传越远，越传越神。不几天，二道河子上屯就流传说：横道子学校闹鬼了，一到天黑又敲桌子又打门。学校李校长领着学生去抓，刚一开门，就由里面出来个一丈多高、浑身长毛的东西。李校长用肩靠了一下，没挤住，溜滑的就跑了。谣言的传播，闹得人心惶惶，一些学生不敢上学了，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饭间灯下，人们到处都在讲这件事儿。屯里的民兵刘廷玉等不信有此事，晚上约了三、四个人拿着步枪来到学校，果然也听到了响声，人都到了教室的窗前，还听到接连响了好几声。刘廷玉向屋里打了两枪，听听再没动

静就走了。这事一出，更是火上浇油。徐大神双手合十，连说：“罪过，罪过，胡三大爷能怕枪吗？这下子倒把神仙得罪了，要降祸了！”吓得人们一到晚上就关门闭户，再没人敢去学校操场乘凉了。

这一天，区政府区长唐亚范把我和几个高年级学生找到了区政府，向大家讲解了世上没有鬼神的科学道理，并要我们警惕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制造谣言，破坏生产。他说：儿童团不能信迷信，应组织起来，查清“闹鬼”的真实情况。说着他用手拍着我的肩膀问：“小团长，敢不敢完成这个任务啊？”我为难了，不答应吧，这是领导给的任务，说不敢干，那多丢人；答应吧，说心里话，也真胆突突的。我脸憋的通红，直瞅周围的同学，没说出一句话来。唐区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接着说：“不用怕，我还给你们请了三个顾问呢。”于是朝东屋喊了一声：“老史，你们三个来一下。”门一开，进来三个人，前头的是个30来岁的大高个，他是区武工队的史汉民，第二个是小学校长李风葵，第三个是年近六旬的屯里的老中医，他脾气倔犟，不信鬼神，很受人尊敬。唐区长向三个人说：“这个捉鬼的事儿，就交给儿童团了，可是得要你们协助，要当好参谋，怎么样，行吧？”三个人连声说：“行，行！”他又指着我说：“咱们儿童团，哪有不完成任务的啊，是吧，小团长？”见了这阵式，我也高兴了，回头向几个同学一使眼色，大家一齐说：“我们不怕鬼，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从这天起，儿童团们在顾问的率领下，分成三个小组，一个组监视徐大神，不准她造谣吓唬群众；一个组在黑天前就对教室搜查，然后上锁，并在学校四周设了岗哨，监视有没有人进出学校；第三组是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放游动哨，

在学校与区政府旧院中间的东西大道上巡逻。

第二天晚上九点多钟，巡逻组正走在区政府旧院与学校的中间，突然听到了咚咚的响声。大家立即停住脚步，辨别响声的方向。这响声却不象来自学校，而是在区政府旧院内。这时守在学校南坡上的监视组，也发出了听到响声的信号，但他们听到的响声仍是在学校的教室内。为了进一步弄清声音的正确来源，我们两个组坚守在原地。十点左右，咚咚之声继续响起，而且时间较长，大约响了十二、三下。守在道上的巡逻组，一致认为响声来自区政府的旧院内。在学校的监视组，由李校长带领着，声音一响，就迅速靠近教室，细听连续的响声，不在教室内，好象是在教室的北面。这两个情况一集中，大家决定将监视组移到大道上，巡逻组则进入区政府旧院内监听。约过半个小时，响声又起，巡逻组立即判断出，响声发自区政府旧院东侧的马厩内。当冲进马厩时，一切明白了，原来是一匹马在刨槽时，马蹄踏地发出咚咚的响声。

区政府旧院是伪满的警察署，上屋是办公室，下屋是监狱和饭厅，室内铺有地板。解放后，我区政府在此院办公，但房屋年久失修，多处漏雨需要维修，于是区政府迁往伪村长管鸣五的住宅，此院已无人居住，只是将东下屋做了马棚，只有一个喂马的老头儿，每隔几小时来添添草料。其中一匹白马有刨槽的病，不时用蹄子刨地板，而学校是瓦房砖墙，对咚咚的刨槽声发出回音。夜一静下来，在学校的南土坡上听到由北面传来的声音，如在教室内一般。而白天各种声音嘈杂，刨槽声被淹没就听不到了，只有夜深人静，声音才能传出很远。

事实澄清了，我们终于揭开了“闹鬼”的真相。翌日，

在学校召开了群众大会。我站在台上，挥舞着拳头向群众讲说抓鬼的经过，博得群众阵阵的掌声。最后唐区长也讲了话，表扬了我们儿童团破除迷信、勇敢捉鬼的壮举。于是儿童团降妖捉鬼的事，在全区传为佳话。儿童团在胜利的喜悦中，又开始了新的工作，那就是准备批斗徐大神。

常秉智

高亭脱险记

1946年5月，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占领了磐石县城。进城后，四外修碉堡、挖城壕、架电线，增哨卡，盘查行人。

我磐石县大队掩护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到江南红旗庙一带驻守，监视国民党动向，并以小股部队夜里偷袭，骚扰国民党军队驻地和警察局。

1946年12月末，县大队在邓厂吃午饭，村外设了岗哨。不料被国民党保安队发现，便从四面包抄上来。县大队占据有利地形，两下接火，战斗十分激烈。高亭身为县大队武工队长，为了减少伤亡，主动担起阻击任务，掩护战士们安全转移。由于敌众我寡，高亭不幸被俘。时届年关，保安队将高亭暂时寄押在黑石警察局。国民党县长胡日初命令黑石警察局严加看管，以防共军要犯高亭逃跑。

战斗结束后，县长朱光烈、政委雷鸣玉、霍秘书等领导主持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研究如何营救高亭脱离虎口。会议整整进行了一天，直到深夜，最后确定派一名胆大老成、善于言谈的老乡，去黑石警察局找做饭的老高头，商量营救高亭的办法。谁能担此重任呢？掂量来掂量去，终于选下了八铺炕屯70多岁的老猪手，外号人称“神枪手”的王财。王财是老高头的表哥，两人来往密切，而且他为人本份可靠，对县委、县政府极为敬重。去年春节时，老人家领着战士打了10多个狍子和一些山鸡，战士们高兴极了，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痛痛快快地过了个好年。

这一天老猪手身穿羊皮袄，手里拎着一对新打的山鸡，领着扮成回娘家样子的女儿莲花，中午来到黑石江桥，顺利

地通过国民党军的岗哨，到了老高头家。老猎人向表弟说明了来意之后，老高头虽然面现难色，但转念一想，这是共产党、八路军看得起自己才委以重任的，所以还是慷慨地应允了。老哥俩晚上熄了灯，倒在炕上又把营救的办法琢磨了半宿，直到鸡叫二遍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大年三十，警察局放假，只留老高头一人给高亭做饭。老高头找到当班的股长李文说：“李股长，为高亭一个人，我回不了家，剩我老伴一个人在家，这年可咋过？我看这样好不好，这几天我给高亭送饭，看他唠嗑很稳当，不像奸诈之人，过年这几天，我把他领到我家，由我看管，他姓高我也姓高，料他也不会私自逃走连累我老汉全家的身家性命，再者说你也省一份儿心，你看行不？”

李文这个人虽然当了警察局的股长，但对国民党那套腐败作法却看不惯，平时有怨言，同时对自己的将来也有隐忧，所以平时总以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而自戒。听了老高头的话，李文犹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弄不好要危及自身，可不这么办老两口又那么大年岁，过不好年也确实于心不忍。在老高头的恳求下，李文才勉强地把老高头的要求说给高亭，以观察高亭的反应。高亭微笑着说：“感谢李股长和高大爷的好意，请放心，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没有怕死的，更没有不讲信义的。跑了怎能对得起高大爷和李股长一片真心。但不知李股长能不能让我去？”此时李文见高亭谈吐诚恳豪爽，一派正气，毫无苟且偷生之意，心中的疑虑放下了一半：“你真能做到像你所说的那样，就跟老高头去吧，过完年早点回来，要不别人上班了，我就不好说话啦！”

初四那天早晨，李文刚起来，高亭突然推开门走进屋来，“李股长，为了我你年也没过好吧！”李股长说：“那

里，过的很好。”接着又谈了几句赞扬高亭英雄仗义的话。这时饭已做好，李文和高亭边喝酒边唠嗑，当李文问起当前八路情况时，高亭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由磐石县八路军与国民党隔江对峙讲到当前战争发展趋势。他越讲越激动，李文越听越入神。高亭的演讲口才惊人，革命道理、战争形势讲的非常深透，李文佩服得五体投地。接着高亭又进步一说：“蒋介石一心打内战，现在解放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参军参战，真是父送子妻送郎，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全国解放就在眼前，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死了我一个高亭，损伤不了共产党八路军一根毫毛；死了一个高亭，会有千百万个高亭出现。国民党军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八路军不出半年，就会打过江来，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作为弃暗投明的见面礼。到时候我高亭在共产党八路军面前保你立功赎罪。何去何从，李股长请三思，以免事到临头后悔晚矣。”

李文听了高亭的一席话，心里直翻腾。像高亭这样的有识之士，死了岂不可惜！于是在李文心中产生了设法释放高亭的念头。高亭吃完饭站起来说：“好啦，李股长我该回去啦，一会儿人都上班来，你就不好说话了。”高亭起身刚跨出门，李文大声说：“高亭你往那走？我作主放你归队。”高亭听了稍一愣神，回身一把抓住李文的手说：“李股长，这恐怕对你不利，事关生命安危，不是儿戏。”李文说：“我只要敢放你，自有解脱之法，你就放心走吧！”高亭说：“谢谢你李股长，磐石解放，我必登门拜访，后会有期，请君保重。”

李文立刻到黑石街里找了一辆去江南红旗庙拉木头的大车，叫高亭坐上去走了，高亭坐在车上不断向李文招手致

意。李文站在江桥上，目送着大车渐渐远去，然后转身迈着比往日沉重的步伐，踏着嘎吱嘎吱的雪路走回了警察局。回到局里，李文马上向翟希圣局长报告，由于自己看管不严，一时疏忽，共军要犯高亭夜里潜逃，请局长处罚。翟希圣听了大怒，将李文臭骂一顿，立即派人追捕，行文报县。不久胡日初下令，因李文失职跑了共军要犯，李文代高亭处死。翟希圣接文后亲自到县里向胡日初说情，免去了李文的死罪，撤消股长职务，降为警士。磐石解放后，李文在磐郊乡，多次担任大队会计，现任富满村村长。

于耀洲

拔钉子

1946年5月国民党占领桦甸县城后，由红石砬子到桦南的必经之地治安部落和王家店至蒙江（今靖宇）县的必经之地那尔轰成了我东满、南满根据地的重要通道。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由于兵力所限，除在几个重要村镇设据点派重兵把守外，其余山林、村屯均靠土匪、自卫团谍报队之类的杂七杂八的兵痞、坏蛋为其效劳。他们残害无辜百姓，刺探我军情报，袭击我交通人员、无恶不作，是敌人安插在桦南山区的一些钉子，给我方军民活动造成极大不便。1946年7月桦南武工队奉命从红石砬子过江到桦南地区拔掉这些钉子，为我开辟桦南游击区创造条件。

一天夜里，7条壮汉由侦察员李永华带路，疾行在山间小路上。李永华是朝鲜族，20多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枪法很准。因为他是桦甸土生土长的人，所以对每处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用手指了指山下，“前面就是错草顶子，刘万胜家就住在屯子中间。”武工队长冯英奎小声下了命令：“大家要紧跟着，不准掉队不准说话，不准发出任何响声。”7个身影悄悄地扑下山去，包围了刘万胜的家。刘万胜是个老兵痞，平时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国民党进占桦甸后，他网罗一些土匪流氓组成自卫团，坚持与人民为敌，被国民党委任为自卫团长，活动于错草顶子一带。他经常带人在山区村屯中转游，当我方有大部队在山林附近活动时，他就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当我方有小股交通人员活动时，他就带人围追堵截。一次，李永华到德胜侦察，路过错草顶子时到一个百姓家说了几句话。刘万胜得知

后，就把那个老百姓抓起来，严加拷问，硬逼着那个老百姓承认“通共”，吓得其他居民不敢再与我侦察人员来往。刘万胜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坏蛋。但他这个人十分怕老婆，不管白天到什么地方活动，晚上一定要回到自己家睡觉。这个规律被李永华得知后，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决定派武工队铲除这个坏蛋。

当武工队围住刘万胜家时，刘万胜正睡得象死猪一样，连李永华用刀子拨开了外屋门，他也没有察觉。李永华带着一个战士一脚踹开了里屋门，刘万胜被惊醒，厉声问：“什么人？”“武工队！”李永华边回答边用手枪顶住刘万胜的脑袋，“快穿衣服，跟我们走！”李永华大声命令着。刘万胜不情愿地坐起来，开始磨磨蹭蹭地穿衣服。刘万胜的老婆刚才吓得缩做一团，始终没有说话。这时她翻了个身，想坐起来，这个动作把李永华和小战士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狡猾的刘万胜借机把手中的衣裤向李永华一甩，同时一跃而起向窗户跳去。可他双脚刚一着地，守候在窗外的战士的木棒就重重地砸过去，刘万胜立时瘫倒在地，杀猪般地嚎叫着，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他苦苦哀求饶他一命，并赌咒发誓地说他可以远离桦甸，不再替国民党卖命了。队长冯英奎历数了他的罪行后，命武工队员把他拖到村外执行了枪决。

武工队继续西行，后半夜来到德胜屯崔青山家。崔青山是日伪时的巡长，对百姓敲诈勒索，民愤极大，而后又勾结土匪打家劫舍，袭击我军。一次，我部队一个文工团由东满去南满，途经桦南山区时，崔青山引来“九江好”匪队，袭击了我文工团，3名被抓住的女文工团员竟被土匪活活糟踏至死。一提崔青山，桦南军民无不咬牙切齿。崔青山家住德胜屯西头，高墙大院，大门平时总是紧锁着。武工队来到崔

青山家门外，开始敲门。崔青山家常有土匪落脚，半夜来人敲门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怪事。不一会儿，屋里的油灯亮了，崔青山手拎着匣子枪，隔着墙大大咧咧地问：“谁呀？”李永华马上答话：“崔巡长，我们从错草顶子来，走了半宿，想今晚在你这歇歇脚。”崔青山又问了句：“你们是干什么的？”李永华用土匪黑话说：“我们是‘九江好’的手下，有重要口信要带给你。”崔青山一听，放心地把大门打开了。几个武工队员趁势一拥而上，用脚踹倒了崔青山，夺下了他手中的枪。崔青山老婆听到外面有动静，急忙出来，一看自己丈夫被几个臂扎白毛巾的青年人踹倒，以为是土匪绑票呢，急忙跪倒在地：“老大饶命，你们要什么只管开口，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只求饶他一命！”冯英奎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今天就要崔青山的狗命！”接着他掏出了准备好的布告，贴到了崔家大门上。崔青山一看，知道性命难保，便发疯似地从地上跃起，撒脚便往门外跑，边跑边拼命嚎叫：“救命啊！杀人啦！”他刚跑出大门，武工队的子弹就追上了他，作恶多端的崔青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武工队一夜连续行军70多里，处决了两个坏蛋，凌晨才到振兴屯休息。敌人得知后，马上派一个连到振兴屯，向老百姓打探武工队的下落。老百姓明知武工队在东山沟，却往西一指说，“过山往西去了。”敌人被骗走后，老百姓马上把消息告诉武工队，武工队安全转移了。敌军在振兴屯附近的大山里转了一天，也没发现武工队的踪迹。眼看天快黑了，他们不敢在外宿营，便在忠恕屯留下6个特务，其余的都回老巢去了。

留在忠恕屯的几个特务，由一个中尉率领，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名称叫武装谍报队。他们配备了长短枪支和手榴

弹，还有一部电台，到处寻觅我武工队的踪迹。这一天，他们来到孙家屯，装扮成我军七十一团侦察员，向老百姓打听武工队的下落。侦察员李永华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察看了孙家屯的地形，了解了离此最近的敌人据点公郎头上的敌军情况。选择了进路、退路和布岗点后，向队长作了报告，并要求带几个人去消灭他们。队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天一黑，李永华就带人包围了谍报队的住处。敌人住的是三间大草房，东屋住着老百姓，中间是厨房，敌人住在西屋。李永华命令队员把机枪架好，对准了西屋窗户，把手榴弹五颗捆成一束，准备在敌人负隅顽抗时，就用它把他们送上西天。一切准备就绪，队员开始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屋内没有动静，显然他们正待机反抗。李永华悄悄向东屋运动，由东窗爬入屋内，来到厨房。西屋的门关得很严，谍报队的枪口对准了所有门窗。敌人据点接到了谍报队电台的报告，急忙赶下山来，为了给谍报队壮胆，他们刚一动身就开始打枪。敌人的枪声提醒了武工队，情况已不允许继续对峙下去。李永华高喊一声：“快投降！”同时一脚踹开门板，把一支点燃的火把甩进西屋。谍报队惊慌失措，没放一枪就举起了双手。当其他队员进屋捆绑俘虏时，看见 20 余枚手榴弹都已打开了盖。

桦南武工队过江伊始，就收拾了两个坏蛋，又没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敌正规军的谍报队，顿时声威大震，为开展桦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几个月后，武工队（已改称桦南游击队）配合我军主力，击溃了“九江好”匪帮，活捉并处决了匪首“九江好”，桦南游击斗争形势逐渐好了起来。

张永生

六挂鞭换了三座碉堡

1946年5月27日，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需要，中共磐石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共300余人，在县委书记雷鸣玉、县长朱光烈、县委委员、县政府政务秘书霍宗坎（霍明光）的带领下，主动撤离磐石县城，转移到本县的江南（即辉发江南岸）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当时的江南，仅是黑石区的一部分，山多林密，与黑石镇仅一江之隔。我军撤退后，国民党军队便耀武扬威地进占磐石县城，并往各地派驻军队，修建工事。在黑石东部沿辉发河北岸，有一座砬头，紧靠着呼兰河口，叫影壁砬子。顾名思义，这座砬子临江矗立，岩石裸露，悬崖峭壁，犹如一座影壁墙，十分险峻。敌人占领黑石镇后，视影壁砬子为战略要地，因为它可居高临下，控制辉发河的呼兰河渡口，而其对面正是我江南游击队根据地，因此敌人在这里大兴土木，在砬子头上修建了一高两矮三座碉堡，与黑石镇的碉堡群遥遥相对，成犄角之势。同时在碉堡内及其附近又驻扎了一连兵力。自从碉堡建成后，国民党士兵天天向江南打冷枪，严重威胁着江对岸五道荒沟、石道河子等村屯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地农民不敢下河捕鱼，不敢下地生产，秋收时也是提心吊胆地抢收了事。冬天到了，江面封冻了。这时敌人怕我军奇袭，又增加了兵力，整日龟缩在碉堡里，偶尔派出小股部队到对岸偷袭、骚扰。影壁砬子上的三座碉堡成了钉在我江南根据地门前的三颗钉子。

1946年12月，县委经过研究，决定坚决拔掉这三棵钉子，打打敌人的嚣张气焰。因县大队外出执行任务，便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了武工队，由县委委员、县政府政务秘书霍

宗坎（霍明光）指挥。

霍秘书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着手制订战斗方案。他想，县武工队仅20多人，20几条枪，要凭20几个人的武装力量去攻打有一、两个连正规军守卫的敌据点，可是一项极端艰巨的任务。为了摸清情况，在数九寒冬的一天，他派武工队员田霖和李力潜入江北进行了全面侦察，听过侦察员的汇报之后，他又带着警卫员亲自沿江走了一趟，一个行动方案逐步在他心中形成了。

临战前，霍秘书召集全体武工队员开会，对这次行动进行了最后一次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武工队只有20多人，敌人却是一两个连的兵力，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决不能强攻硬打，只有智取才是上策。霍秘书听过大家的意见后，突然问道：

“咱们江南根据地里有没有国民党的密探和特务？”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可把大家问楞了。一阵沉默之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有的说有；有的说他们不敢冒险……

霍秘书待大家议论一阵之后说道：“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根据地虽然没有国民党的名牌特务，但情报员和狗腿子还是有的。”紧接着他进行了战斗部署……

一天晚上七点多钟，天已黑透了，村屯里的农民刚要熄灯睡觉。忽然数匹高头大马，从大路上飞驰而来，马上端坐着穿着整齐的军装、挎着短枪，佩带着“东北民主联军”标记的军人。他们分别奔向了和敌占区黑石镇隔江相对的六家子及影壁砬子对岸的五道荒沟等屯子。

驰往六家子、腰岭子屯等几个屯的战士骑着马在屯子周围绕了一圈，看好地形和环境后，才进入屯子里。他们把马停在屯中央高喊：“乡亲们，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是东北

民主联军的部队，到这里来执行任务，麻烦大家每户给烧一担开水。两小时后备齐，谢谢大家了！”然后他们又拿着粉笔挨门逐户地在门上写上住20人、30人、连部、营部等等字样。

一阵人喊马嘶，惹得鸡叫狗咬，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不一会儿，各屯一片灯火，茅草房顶都飘起了缕缕的炊烟。时隔不久，江对岸的黑石镇却由灯火通明，眨眼变成了一片漆黑。大街上国民党部队的跑步声、问答口令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国民党军的指挥部里，电话铃声此伏彼起，指挥官打电话，下命令调遣部队，特别是把已派往各地的各部队撤回黑石镇，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就在六家子等几个屯的战士们比着号房子，动员群众烧水的同时，五道荒沟等几个屯里也有几名战士在号房子，动员群众烧水。于是几个屯里边都是人喊马嘶、鸡鸣犬吠，灯火通明，俨然是迎接大部队即将到来的样子。

对岸的影壁砬子碉堡内外，起初还有几点灯光，不久即变成了一片漆黑。砬头上的一高两矮三座碉堡，就像一只兽头上的一支独角两只耳朵一样竖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偷听着江南的动静。

近午夜的时候，与黑石镇相对的江南的几个屯里的灯火都熄灭了，我江南岸漆黑一片。

“叭、叭、叭”，江南突然传来三声枪响，紧接着又爆响起“咕、咕、咕”的重机枪一样的枪声。沿江北岸立刻就炸了锅，爆豆一样的枪声响成了一片。奇怪的是江南岸却又一枪不响了。江北的国民党军队盲目地打了一气之后，听江南岸没有了动静，也停止了射击。江北岸稍一沉寂，南岸又响起了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像竞赛一样江北也立刻射击起

来，还不时的夹杂着六零炮的爆炸声。这样反复三次，启明星已从东方天际升起。

单说霍秘书站在影壁砬子江南岸的小山岗上，静观江北砬子头上的变化，屏息侧听黑石方向的动静。武工队员们都按计划分头到各屯召集群众到江边开会，并明确规定开会人员必须携带锹、镐或锯等工具。两、三个小时后，已集合几个屯子的群众二、三百人。霍秘书看看人员已基本到齐，就站在人群前面向群众高声说道：

“乡亲们：江北敌人碉堡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今天我们就拔掉它！大家敢不敢和我们武工队一齐去？”人群一阵寂静，好象连口气都不敢出。霍秘书明白，这是群众心里不托底，怕去了有危险。恰在此时，听黑石镇方面传来密集的枪声。他暗暗说了一声“好极了！”接着提高声音继续向大家说：

“大家不要怕，碉堡里的敌人都跑回黑石镇去了，他们早已顾不了这里了。你们听！这就是黑石镇的枪声，不信你们看……”他边说边拔出手枪，冲着江北碉堡连开三枪。果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家都非常熟悉，一有风吹草动，那里的机关枪早就响了，人群中发出一阵议论。霍秘书环视一周后说：

“过江时大家一定要听指挥，不要擅自行动！请大家随我过江去扒碉堡！”于是他率领武工队向江北出发了。

群众们听了霍秘书的一番话，虽然心中还是不踏实。但见武工队打头阵，便也拿着工具跟在后面。这时已是后半夜了。江面积着一层厚厚的雪，几百双脚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声音撕破了夜的宁静，可碉堡里依然毫无动静，群众心里更踏实了，紧跟着武工队的队伍继续前进。当群众队伍

接近江北岸时，突然从影壁砬子旁的一条沟口走出一队人来，过江的群众立刻紧张起来，走在前面的武工队员高喊一声“站住！”那一队人立刻站住，高举着灯笼喊：“八路军万岁！”武工队员借着灯光一看，原来是20多人的一队群众。霍秘书率领武工队员迎上去，到近前一问，原来是当地保长带领群众来欢迎部队的。保长告诉霍秘书说：“碉堡里的敌军早已得到情报员的报告，说江南来主力部队要打黑石镇，又赶上黑石镇来电话，调他们回去守卫黑石镇，所以都趁机逃跑了。”大家一听都非常高兴，武工队员们都暗暗佩服霍秘书料事准确，江南果然有国民党军的情报人员。

大队人马顺利地爬上了影壁砬子。霍秘书立即宣布：“来吧，大家动手扒碉堡！”群众对这三座碉堡早已恨之入骨，立即行动起来，时间不长，就把三座碉堡扒了个底朝天。

东方出现鱼肚白时，碉堡已被产为平地。霍秘书命令武工队集合群众过江回江南。途中有人问武工队员：“主力部队先打黑石？咋不抬几挺机枪来收拾这三座碉堡呢？”

队员们哈哈一笑说：“这是霍秘书的锦囊妙计，打黑石镇是为了牵制敌人，防备他们来增援。我们在黑石镇也不是主力部队，江南根本就没有主力部队。那里只有十多名民兵，咕咕响的也不是重机枪，那是六挂在洋铁桶里放的鞭炮。”

群众听后，哄的一声大笑起来。有人说：“六挂鞭炮换了三座碉堡，核算！”

高庆山

最后一个碉堡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发动了秋季攻势。十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六纵队十六师奉命攻击口前守敌，为解放吉林省城——吉林市扫清障碍。

口前镇的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四面环山，东西北三面有河。沈吉铁路从镇中通过，吉林至桦甸、瑗珲至大连的公路在此交汇。这里地势险要，是从南进入吉林的必经之路，素有吉林南大门之称。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六十军将一八二师五四五团某营、师直属工兵营、辎重营三个整编营派到了口前，在四周山上修碉堡、挖堑壕，派兵驻守南面的官马山和镇西的小春登河，企图凭借天然屏障和精良武器与我军对抗，阻止我军解放吉林。

十月十七日，我十六师对口前之敌发起总攻。战斗进行了一个上午，摧毁敌人碉堡十九座，先后占领了口前的南山、东山、北山，活捉了敌中校营长张士勋、工兵少校营长刘思远，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大部队由镇西向镇里继续推进。

口前镇西的公路跨越五里河，通向磐石。河上有一座土木结构的大桥，背靠口前镇的河东岸，在桥头上敌人修建了一大一小两座碉堡。大碉堡有七米高，由钢筋水泥筑成，敌人配备了精良的轻重型武器，控制着桥面和公路。小碉堡在大碉堡的左侧，也是钢筋水泥结构，枪口紧贴地面，目标小，不易被发现。当我军攻击部队由河西岸向镇里推进时，便直接暴露在敌碉堡的火力之下，一下子就倒下十几个人。

进攻的节奏顿时慢下来。师部派出一个连，下了死命令，务于日落前，拔掉桥头堡这颗钉子。

我某连指战员对敌喊话，先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然而，敌少校营长杨福顽固不化，命令碉堡里的敌兵用重机枪向喊话的战士开火。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军指战员心急如焚，再次发起强攻。敌人疯狂地用子弹封锁了桥面，我军伤亡很大。有几名战士涉水渡河，刚到河心，暗堡里骤然喷出火舌，有人当场牺牲，受伤的战士躺倒在酱黄色的河水中。已是下午三点了，桥头堡这个拦路虎，还卧在那里，战士们都急红了眼。这时，师部指示：硬打硬拼不行，要采取迂回战术，伺机摧毁之。攻桥连队决定成立一个尖刀班，从河上游绕道渡河，再从东岸沿河接近目标。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党员站出来了，说危险的任务应该党员上。有的战士不服气，把胸脯拍得咚咚响：“我家哥仨，让我把狗日的干掉！”有个山东籍的小战士叫刘振德，他找到连长请战，说什么也要参加尖刀班。他说：“俺忘不了俺的过去，这一堆一块全豁上了，也报答不完党的恩情！”连长考虑他在家是个独生子，这么危险的任务就不打算让他去。刘振德急哭了，死死缠住连长：“论条件，俺个子小，目标小，灵活，就让俺上吧！”连长看他求战恳切，又考虑到他的平时表现，就批准了他的请求。说起刘振德的韧劲，还有个故事呢。刘振德自幼家里很穷，是共产党把他从地主的皮鞭下解救出来，他打内心感激党，立志解救千千万万象他一样的受苦人。他虽然是独生子，但还是毅然报名参了军。从山东转战华北、东北，作战十分勇敢。他仅有一米六几的个头，但枪法很准。为了练好枪法，他常常在步枪前头拴一块砖头，迎着风练，对着太阳练，瞄萤火虫练，无论严冬酷暑，战斗

一有间歇就练，二、三年的功夫，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好本领。这次为掩护战友渡河，他曾打哑了碉堡的两个枪眼。前不久部队在明城子休整，他帮房东大娘挑水、劈柴，什么活都干。大娘看他老实厚道，干活挺在行，打心里喜欢，就对他说：“赶明儿不打仗了你就上我家来，做我的姑爷，别嫌倒插门就行。”他听了，脸腾地红了。打那以后，他帮大娘挑水，总是瞅空挑，怕碰着大娘再提那个碴儿。后来，在连队里他就有了“倒插门”的绰号。

刘振德等九人组成的尖刀班，带着炸药包、爆破筒上路了。他们潜到河上游，顺利地渡过河，沿东岸悄悄地接近敌桥头堡。距碉堡三百米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他们，轻重机枪的子弹像蝗虫似的飞来。有两名战士牺牲了，剩下的七名战士分散开来，匍匐前进。这时，我军解决了春登河敌人，缴获了一门八二火炮和四发炮弹，被俘敌炮手在我劝说和压力下，同意向负隅顽抗的敌人开炮。第一发炮弹在距敌碉堡前几米的河中爆炸，几米高的水柱冲天而起。第二炮打到碉堡后面去了。第三炮削去了碉堡一个角，敌营长杨福见势不好，就率残敌躲进了暗堡。第四炮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碉堡的正中，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钢筋水泥的碎块儿飞上了天空。被敌人火力压住的七勇士一跃而起，准备收拾残敌。不料，一直沉默着的暗堡，空然喷出猛烈的火舌，又有六位英雄倒在血泊之中。尖刀班只剩刘振德一人了，此时，他距碉堡还有几十米远。随着敌人射击间歇，刘振德迅速趴下，然后来个就地十八滚，滚落到碉堡前的堑壕内。河两岸的战友们，就等着他炸毁碉堡发起冲锋了。十分钟过去了，可还没见动静，大伙以为他牺牲了。此时，刘振德在堑壕内仔细观察着敌碉堡的情况，暗堡的枪眼离地面很近，外大里小，向

外射击成扇面形，往里面塞爆破筒必须在正面进行。弄不好就要被子弹打中。个人牺牲事小，拔不掉这颗钉子，部队总攻受阻事大，得想个万无一失的办法。突然他眼睛一亮，堑壕边一块大青石吸引了他。他把大青石搬到了两个枪眼间的死角区，身子一跃，紧贴在两个枪眼之间。在敌人机枪停歇的一瞬间，他把爆破筒从枪眼塞了进去，随手拉响了导火索。滋滋作响的爆破筒落到碉堡内，敌人慌了手脚，立即拣起来，拼命往外推。刘振德早料到这一招，把爆破筒塞进去后，立即用身旁的青石堵住了枪眼，并用身子死死顶住青石板。一秒，两秒……敌人绝望了，像一窝疯子似的向门口挤去。刘振德本已做好牺牲准备，突然感到石块减轻了压力，于是飞身越过堑壕，继而又来个就地十八滚。“轰隆”一声巨响，桥头最后一个碉堡飞上了天。大军东进，解放了口前镇，吉林的南大门被打开了。

赵雅君、张永生

舍命救护区干部

1947年1月6日，正是农历腊月十五。傍晚的时候，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山村、田野被白雪盖得严严实实。在永北县缸窑区傅屯山坳里，有一座破旧的茅草房，直到深夜还亮着灯光。

屋里的南炕上放着张饭桌子，围着桌子坐着七八个年轻人。坐在炕里的一个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是缸窑区政府副区长宋华。

“假农会不解散，群众还是有顾虑的，不靠近我们，就挖不出暗藏的敌人，支援前线的任务就无法完成。我们必须坚决一点，把以张凤山为首的金矿把头儿、地痞抓起来，然后发动群众揭发他们的罪行。群众看我们动真格的了，就会相信我们了。”宋华语气坚决，声音不大。

围坐在桌子四周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悄声议论起来。正当他们议论热烈的时候，从外面传来阵阵狗叫声。屋里的年轻人都静下来侧耳细听。宋华警觉地说：“深更半夜，狗怎么叫得这么凶？”

宋华的话刚说完，屋门就被推开了，放哨的发兵领进了一个气喘吁吁的人。那人一进屋就对宋华说：“不好了！前屯来了一个排的中央军，说屯子来了区干部，正挨家挨户地搜查呢，你们赶快跟我躲一躲。”

进来报信的人，叫刘文山，今年23岁，是傅屯有名的支前积极分子。

听完刘文山的报告，宋华思忖一下，果断地说：“前屯离这不远，我们现在一走会在雪地上留下脚印，告诉敌人我们的行踪，这等于是自投罗网。”

“进沟里往西北拐，就是我舅舅家，那里有两座房子，邻居姓傅，是个穷苦的老实人，很可靠。”宋华的声音刚落，刘文山接过话茬，很有把握地回答。

接着刘文山又说：“这么走不行，雪这么厚，我们踩的脚印不是把敌人引到那里去了？必须想个办法，瞒住敌人的眼睛。”

核计来核计去，最后，房东老赵头儿想出一个办法，大家认为是万全之策。

情况不容再迟疑了，房东从邻居借来一条大牛，拴好套，然后把放在房东面的柞树枝子用绳子捆好，拴在牛套上。战士们趁着漆黑的夜色，向西北岔走去，房东牵着大牛拽着枝柴，在后面把留下雪地上的脚印扫掉。

到了刘文山的舅父家，舅父麻利地把宋华等人藏在一个废旧的菜窖里，上面堆满茅柴。为了显示烧火时到柴垛上取柴，又在房门口到柴禾垛前清理出一条小道，把雪堆在柴禾垛的周围。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嘎嘎的踏雪声，屯中的狗狂叫起来。刘文山当着舅父家人说：“他们的腿好快啊！你们啥也别说，由我来对付他们。”

一个班儿的国民党兵，端着美式冲锋枪，由一个细高条、尖脑瓜儿领着闯进屋里。

刘文山一看，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怎么是他？！此人名叫张凤山，是傅屯农会的财粮委员，过去当过金矿的把头。

张凤山见到刘文山，强挤笑容，向跟来的那些国民党兵呱呱嘴说：“这些老总在家里把我拽出来，让我领路，说缸窑区干部在傅屯。我哪知道，只好领老总们各家走走。老总

们说西北岔偏僻，兴许区干部藏在这里。”张凤山边说边用两只贼溜溜的鼠眼，在刘文山舅父等人的脸上扫视着，可并没发现有异常的变化。

这时，一个镶金牙，堆着一脸横肉的小头目，蛮横地问道：“这家姓啥，屋里的人都是这家的吗？”

张凤山指着刘文山说：“他是老头的外甥，其余的人是老头的儿子、姑娘。”说完，向镶金牙的小头目递了一个使人觉察不到的眼神。那个小头目上来一把扯住刘文山袄领子，大声喝道：“大雪天不在家里呆着，到这里干啥？”

“这是我舅家，柴禾不够烧，我给他家送柴禾，顺便看看舅舅。”刘文山不慌不忙地回答。

镶金牙的小头目，白楞一眼刘文山，就命令士兵搜。

八、九个士兵从屋里翻到厨房，大锅也被拔了出来，还用电筒往炕洞里照了照。这群家伙心里明白，屋子里根本藏不住人，翻过来翻过去，就是为了找点值钱的东西。可是家徒四壁，什么也找不到，只好转向室外。

几个大兵把屋前屋后又好一顿搜，也没有找到什么。最后，把注意力放在柴禾堆上，几个大兵使用刺刀往里乱挑一气，这下子可使刘文山和他舅父捏了一把汗，再往里捣，就是菜窖了。不知是雪深，还是这些士兵感到不耐烦了，一个小个子士兵叫嚷道，这里没藏人。

张凤山在镶金牙的小头目耳边嘀咕几句，小头目冲着刘文山说：“姓刘的，你对傅屯的情况熟悉，跟我们走一趟，帮国军找共产党干部，国军不会亏待你。”没容分说，两个国民党兵架起刘文山的胳膊，就向伪屯长赵庆发的家里走去。

刘文山被国民党兵架到正房东屋，屋里太师椅上坐着一

个30左右的塌鼻子军官。他阴阳怪气地说：“哎呀，我让你们把刘委员请来，你们怎么这么对待，快给刘委员看坐。”刘文山坐在北炕沿上，不紧不慢地说：“我不是什么委员。一个老百姓，种地纳粮的，谁也惹不起，谁来给谁办事，我们长几个脑袋，敢抗着不办。委员的称呼，不敢当，我叫刘文山。”

“好！好！真是快人快语。其实，我们也不用兜圈子了，你们的人把什么都告诉我们了。”

刘文山听完，开始琢磨起来。张凤山果然把什么都向国民党告密了，看来得豁出这一百多斤了。

“刘委员是个能干的人，没少给共产党筹集粮草、军鞋。只要用这个劲头给国军办事，国军不会亏待你的。”

刘文山默不作声，塌鼻子以为刘文山动心了，又继续掀动他那厚嘴片子。“共产党快完蛋了，正规部队被国军赶到江南去了。你不要死心眼儿，替共产党办事，是没有好结果的。”

刘文山坐在那里，还是啥也不说。

“怎么？你不是说当老百姓的，谁让干啥就干啥？我问你，共产党的区干部宋华什么时候进村的，他们来干啥，现在藏在哪儿？”塌鼻子有些不耐烦，单刀直入地问。刘文山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那得看干啥，种地纳粮，不论哪个朝代，有粮都得交。共产党的区干部来傅屯，你们不告诉我，我哪里知道他们在哪。”

塌鼻子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从太师椅子上腾的一下跳了起来，用拳头一擂桌子，气急败坏地喊道：“你他妈的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了，把他拉出去！”

两个国民党兵连推带搡，把刘文山拉到大门口，用绳子

绑紧他的两个大拇指，吊在门梁上。

刘文山的两个脚尖着地，两个姆指被绳子勒得胀呼呼的疼，棉袄被国民党兵扒掉了，上身只穿一件破旧的单挂子。东北的腊月，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刘文山连冻带疼，浑身像刀剜一样，但他没有呻吟，也没有求饶。

“姓刘的，这个滋味好受吗？这么冷的天儿，快说吧，说了就没事了。”塌鼻子站在刘文山旁边，撇着嘴，似笑非笑地说。

“区干部长胳膊长腿的……他们到哪……我怎么知道。”刘文山强忍疼痛，一字一句地说。

“哼！谁不知道你，这个大名鼎鼎的农会支前委员，共产党的支前积极分子。”塌鼻子面带讥讽地说。

“知道你们还问！落到你们手里，要杀要剐全由你们！”刘文山强硬起来大声地回答。

塌鼻子有些不理解，共产党给他什么好处，使这个穷棒子这么硬。他歇斯底里的吼叫着：“好！是硬汉子，给他挂挂腊，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一个国民党兵提着一桶水，呼地一声，从头往下泼了下来。

没有多久，水在刘文山身上结了一层冰。

刘文山被冻得直筛糠，浑身上下，顿时麻木得没有了知觉。

塌鼻子走了过来，威胁着说：“说不说，不说，就勒死你！”

“畜……牲……随你们便！”刘文山愤怒了，声音有些微弱。

塌鼻子一挥手，一个绳套，放在刘文山的脖子上。两个

国民党兵把刘文山提到凳子上，又把凳子踢倒，刘文山被悬在半空。

刘文山感到憋气、恶心，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瞬间，国民党兵又放松了绳套，刘文山被摔在地上，哼哼了一下，又苏醒过来。

塌鼻子无可奈何地劝诱着：“我们这是奉上峰的命令，不得已啊！你不想想，你两腿一登走了，扔下老母和媳妇孩子怎么办？你应该为他们想想。说吧，说了就放你。”

刘文山把眼睛闭上了，他什么也没有说。

塌鼻子没了办法，感到在刘文山身上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就命令士兵把刘文山勒死，埋在山沟里的雪堆里了。

一个普通农民为掩护共产党的干部，在敌人的酷刑下宁死不屈，视死如归，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解放人民的信念，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更多人的幸福。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有多少这样的普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

武殿福、刘建伟

夜袭吉昌镇

1946年6月的一个漆黑的夜里，天空象个大铁锅倒扣在头顶，没有闪电，没有雷声，只有小雨在悄悄地淅淅沥沥地下着。

在泥泞的山路上，有一只队伍在迅速地前进着，他们就是参加四平保卫战的东北民主联军的某部指战员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主动撤离四平正向东进发。大约后半夜3点多钟，千余人的队伍赶到了磐石县吉昌镇地界。

“通讯员，传达我的命令，队伍原地休息！”团长张帆发出了命令。

疲惫的战士们听到原地休息的命令，都顾不得泥呀水的，有的躺在草地上，有的歪在树干上，不一会儿，一些战士就打起了呼噜。夜是那么静，只能听到树叶发出的飒飒声。

“喔喔、喔喔……”从镇内传来的鸡鸣打破了夜的沉寂。张团长抬头用疲倦的眼睛望了一下：雨已经停了，天空仍灰蒙蒙的不见一丝光亮，偶尔有几颗小星星若隐若现。他又转头向吉昌镇内看了看，便对侦察排长刘振山下命令：

“刘排长，你马上带10个战士前去俩寨，探听一下镇内的动静。”“是！”刘排长话音刚落，通讯员小王“咚”地一下跳起来，蹦到张团长面前，向张团长敬个礼说：“团长，我就是吉昌镇人，让我也去吧！”

张团长一下醒悟过来：“噢……我还真忘了你的老家就在吉昌，好，你去吧！”刘排长很快又挑选了9个侦察员，便带队出发了。侦察小分队个个生龙活虎，敏捷而迅速地前进着，不一会儿就登上了一座小秃山。刘排长站在高处向镇

内观察着，只见镇周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这时小王在旁说：“前面就是土城墙，城墙四面有四个城门，每个城门上都有岗楼，咱们前面的是西城门。”

刘排长顺着小王手指的方向定睛一看，可不是，那岗楼上还有灯光，隐约看到有个哨兵在岗楼上像鬼影似的来回游动。他边听小王介绍情况，边在心里琢磨着：吉昌镇虽然不大，防守却很严，四个岗楼都有轻重机枪把守着，硬冲进去肯定伤亡很大，看来有必要探听一下镇内的虚实，然后再作打算。想到这儿，他把手一挥，带着小分队悄悄摸到了城墙下。这城墙有一人多高，用泥土堆砌而成。小分队来到墙下听听没什么动静，便又向城门摸了过去。在离西门百余米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镇内有动静，再靠近些细听，原来是哭喊声、叫骂声和皮鞭抽打的声音。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夜空中传出很远，听起来十分悲惨，令人揪心。

正当大家凝神细听时，猛地见一个人从土围墙上滚了下来。这人一抬头发现了小分队，马上从地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顺着墙根儿往北跑。刘排长一看，连忙用干涩的嗓子低声喊：“老乡，不要跑，我们是民主联军——”听到喊声，那人犹豫了一下，却没有停住脚步。小王一看他不站住，便几个箭步蹿到那人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跑什么呀，我们是民主联军。”边说边打量那人，忽然他失声叫道：“呀，表哥！”原来这人正是自己的表哥孙万山。只见他身上皮开肉绽，满脸是血。小王来不及细问，忙拽着表哥来到刘排长面前，还没等小王开口，孙万山就“扑通”一声给刘排长跪下了，用颤抖的声音说：“亲人啊，可把你们盼来了，镇里的老百姓没法活了，快去救救乡亲们吧！”

小王忙问：“到底怎么回事？”

刘排长一摆手，“嘘——，小心敌人，”然后他让战士们搀扶着孙万山来到一个僻静处，这才向他细细询问镇里的情况。

原来我军撤退以后，国民党地下军林森部（林团）的100来个匪兵就气势汹汹地开进了吉昌镇。这伙遭殃军进镇以后，今天要粮，明天要钱，后天又要征税。又把年轻人抓起来做劳工，给他们修城墙、建工事。这帮家伙还经常在大街上东游西逛，看到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不由分说全都抢到据点里供他们遭踏淫乐。不长时间，就把吉昌镇闹得鸡犬不宁。吉昌镇的维持会长叫李国祥，他虽然替国民党办事，却有爱国爱民心。看到国民党匪军在这里的种种暴行，不禁十分气愤。这一天，国民党又来收捐，李国祥一听，还要捐，捐你个鬼去吧！他干脆来个按兵不动，说，不说由你，反正的就是不干。结果惹怒了匪团长，他连夜派人把李国祥抓了起来，严刑拷打。也巧，这天孙万山刚和几个同伴从磐石跑回来，原来他们先被押着修补吉昌镇的围墙，接着又被送到磐石去修工事。孙万山几个人一商量，这们下去哪有完哪，于是他们便偷偷跑了回来。没想到刚出狼窝，又入虎穴。他们刚进城门，就被匪兵发现给抓了起来。匪团长一看，好啊，我就一块儿教训教训你们。便把几个人押到镇西北的一块空地上，从半夜一直拷打到现在。孙万山被打个半死后给扔到空场边的阴沟里，直到天快亮了，他才趁敌人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讲到这里，孙万山已是声泪俱下：“亲人啊，这帮遭殃军都没长人心哪，他们用皮鞭沾凉水，一打就是大半夜，已经有人给打死了，你们快进去救救他们吧！”

听到这里，战士们各个义愤填膺，恨不得马上冲时镇里

去解救乡亲。大家纷纷请战：“排长，下命令吧，咱们不能眼看着乡亲遭敌人毒手啊！”

刘排长点了点头：“对，我们决不能让敌人肆意横行，不过咱们得研究研究怎么个打法。你们看，这吉昌镇四周都是城墙，又有岗楼又有哨兵，硬打强攻可不容易啊！”

这时孙万山忙说：“排长，我知道一条暗道……”一听这话，大家一下围了过来。小王更着急，摇着他的手连连催着：“表哥，快说，你快说呀！”孙万山把手向城墙一指，“你们看，我刚才逃出来的那段城墙是一段浮墙。前几天人们被押着给他们修墙，这帮家伙不是打就是骂，我们几个人商量，不能给他们好好干。于是就把段墙的外面用砖石砌上，里面全是空的。今天我就是用脚在那踹出一个洞跑出来的，我看咱们可以从那钻进去……”刘排长一听，觉得这办法不错，便说：“那好，镇里的情况你熟，你就给我们带路吧。不过你的伤……”孙万山一摆手：“不碍事，要能消灭这伙遭殃军，我死都乐意。”刘排长握住他的手：“那好，我先谢谢你了。”转头又对小王说：“小王，你赶快回去向张团长汇报，咱们要里应外合拿下吉昌镇。”小王一听噘起了嘴，“排长，我也要进去打仗。”刘排长严肃地说：“小王，这一带你最熟悉，让别人去万一耽误了时间就会影响战斗，这是命令，马上回去！”“是！”小王虽不情愿，又不能违抗命令，噘着嘴走了。然后刘排长一挥手，“出发！”一行人在孙万山的引导下，又悄悄地回到城墙边。快到西门时，孙万山用手一指：“排长，就是这儿！”

果然那城墙上有个窟窿。战士们又小心地把缺口扩大，然后一个接一个钻了进去。岗楼里的哨兵好象听到什么动静，端着枪钻了出来。刘排长马上命令大家隐蔽，然后他从

地上找到一节树枝，三下五除二将上衣脱下挂在树枝上，又将帽子扣在上面，他把树枝交到一个战士手里，低声吩咐了几句，然后弯腰拾起一快石头顺城墙向南扔了过去。岗楼上的哨兵听到声音立刻转过头来：“谁……”喊声还没落就看见一个人影顺着墙根往南跑去，这两家伙立即端着枪追了过来。这时四个战士已搭上人梯等在墙边。等敌兵一过来，一人一个拽住敌人的腿往下一拉，敌兵立即被拖下城墙摔了个狗吃屎。战士们马上把报们绑起来，嘴里堵上毛巾，由两个战士押着回到西门。

收拾了敌人哨兵后，由孙万山引路，小分队迅速来到西北角的空场上。刘排长把手一挥，战士们马上四下散开，把空场包围起来。空场上有十来个匪兵，在匪团长的指使下，正在拷打着被抓回来的的小伙子和维持会长李国祥。他们有的被吊在树上；有的被绑在木桩上；还有一个被扔在旁边的阴沟里一动不动。匪团长一手拎着酒瓶，一手拿着鸡大腿正大吃大喝，对被打群众发出的惨叫呻吟声象没听见一样。其余的匪兵也都是酒气熏天，醉眼朦胧。又一个匪兵拎着皮鞭走到李国祥面前，用鞭柄指点着李国祥的下巴说道：“你他妈的是一镇之长，国军让你们捐 50 万你们都不给，要给谁呀？我看你们他妈的要把钱都留给共产党！”他恶狠狠的用鞭子一指旁边几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百姓，“我告诉你，今天你是有也得捐，没有也得捐，要是收不上来，我就要你的命！”“对，快给老子交上来！”旁边的匪兵也一起嚎叫。李国祥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他已下了决心，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能交。那匪兵看李国祥不言语，气得火冒三丈：“他妈的，给你软的不识抬举，老子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皮鞭的滋味。”说着又举起了手中的皮鞭。就在这时，只见小

分队战士们像猛虎般扑了过来，还未等匪徒醒过腔来，就被从天而降的战士们缴了械。这帮家伙各个抓着头皮发呆，全都傻了眼。获救的群众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李国祥紧紧握住刘排长的手哽咽着说：“还是咱们共产党的军队好啊！”

此时，看押岗楼匪兵的两个战士早已把西门打开了，张团长接到小王报告后，马上率领部队从西门冲了进来。他们和刘排长会合后，根据俘虏的口供，带领战士们悄悄包围了敌人的宿营地。待敌人从梦中惊醒，抓起枪想要顽抗的时候，已经晚了。张团长指挥战士们，只放了几枪就把林团的匪兵全部俘获。而在东、南、北门值勤的几个匪兵一看大事已去，都弃门而去，落荒逃跑了。

吉昌镇人民又一次获得了解放。消灭林团后，大部队没有歇息，他们迎着初升的太阳继续向东挺进。乡亲们都赶来了，看到子弟兵又要出发，他们有的端水；有的送上饽饽；还有的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硬塞进战士们的口袋里……人们聚集在路两旁，目送着子弟兵向前方开进。不知哪位小姑娘，在人群中唱起了东北小调，还是新编的歌词呢：

子弟兵、显神通，
巧袭敌人救百姓。
打吉昌、除祸害，
乡亲热爱子弟兵。

史玉茹、王立新

沈越在吉林二三事

沈越，原名冯仁轩，1916年生于吉林市。少年时期在吉林上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日活动被日伪当局注入“黑名单”，被迫离吉去北平读书，寻求救国真理。在北平地下党的引导下，又于1936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沈越随晋西北干部团来到东北开辟工作。到达长春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袁任远的率领下，于1945年11月1日到吉林市，准备接收吉林省政府。但是苏联红军司令部（军管当局）不允许我党干部接管省政府。虽经多次交涉，却毫无结果，只能先接管吉林市政府。

当时，吉林市的局势十分混乱，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市区经常发生国民党反动势力暗杀事件。沈越也时常接到各种形式的恐吓信。一次，沈越找市政府留用的总务科长崔某谈话。崔进屋后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沈越见他表现反常，革命战争中养成的警惕性油然而生。在谈话中，崔的一只手总揣在兜里，大腿不停地颤抖着。突然，沈越斩钉截铁地大喝一声：“你兜里揣着什么？”警卫员白念国闻声冲进屋里，命令崔举起手来。一支顶着子弹的手枪从崔某的兜里掉落在地上。崔吓得面如土色，马上跪在地上求饶：“长官饶命！我坦白！”原来这家伙是受国民党特务指使，专门刺杀共产党干部的，这次想乘谈话之机暗害沈越。

一天晚上，时针已指向10点，夜深人静。突然，沈越住处的电话铃响了，原来通知他马上到苏军司令部出席紧急会议。白念国立刻叫车夫套上大马车，三人赶紧上路。马路

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行人，白念国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当马车行驶到三道码头附近时，突然“砰！砰！”两声枪响，两颗子弹从他们头顶上方掠过。沈越立即命令：“还击！”

白念国端起轮盘枪连续射击，马车飞快地向前驰去。沈越按时到达了会场。在会上，他谈笑如常，若无其事，好象刚才什么事也未发生过一样。沈越就是这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持做筹建市政府工作的。

沈越刚到吉林时，市委、市政府都未成立，只有一个维持会在“维持”着。会长是马德恩，副会长是王可耕。根据当时形势需要，沈越非常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邀请或访问马德恩、王可耕，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耐心做工作。市政府留用的一些科长、职员也是沈越常来往的客人。当时吉林市的知名人士马瑞麟、马元丰、王仙洲等人，沈越都邀请过，车接车送，以礼相待。

1946年2月26日，在原东北电影院召开了吉林市临时政府、临时参议会联席会议。马瑞麟、马元丰、王仙洲等都参加了会议。这些人手持文明棍，身着长袍马褂……警卫员一看就觉得别扭。看见他们还坐主席台上，就擅作主张，把他们“请”下了台。沈越发现后，立即找到秘书长李玉纯说：“怎么能把客人赶下台？这哪行啊！这一上一下，可是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大事啊！”秘书长豁然开朗，马上把几位民主人士又请到台上，才宣布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市政府。沈越被选举为吉林市第一任市长，于2月25日宣誓就职。

市政府成立后，沈越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优户作风，穿着一身旧衣服，鞋是日本式的水袜子。为了工作上的需要，

市委副书记李维民给沈越弄来一套西服，一双皮鞋，准备出席会议、接待客人时穿。住的条件就更差了。屋子既冷，又阴暗，盖的是一套用更生布做的被褥。后来，吉林全省保安队司令王效明给他送来一套缎子被，沈越说啥也不肯要，一直盖着旧被褥。

沈越平素由于工作忙，不常回家，母亲时常惦念他，就让弟弟每隔七、八天来看他一次。他从不留弟弟在公家食堂吃饭。一些干部当时深有感触地说：“沈越身居领导岗位，手中有权，但从不占公家便宜。”

沈越性格虽然倔强，但是如果自己有了缺点，却能够勇于自我批评。

沈越已经12年没见到母亲和弟弟了，想见亲人心切。他回到吉林市的第二天，只和李维民打个招呼就急忙回家去了，匆忙中忘记告诉自己的警卫员。结果，警卫员到处找他，急得团团转。过了一些天，沈越又回家，这次是叫警卫员跟他一块回去的。警卫员闷着头跟他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沈越的母亲说：“大娘，我把人安全送来了！”又转身对沈越说：“我保护不了你，你赶快找别人吧！”沈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警卫员在生他上次没告诉的气呢！他立刻走上前去检讨说：“上次我做错了，请你原谅！”警卫员被他那诚恳的态度所感动，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1946年5月，形势发生变化，我党决定实行战略转移。5月28日沈越率干部撤离吉林市去吉南，任吉南专署专员。

在吉南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同志们坚持敌后游击战，搞土改、支前，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1948年3月9日，吉林市第二次解放，沈越又回到吉林，继续任市长。直至1950年2月24日被调到东北局工作。任东北局

政研室副主任兼城工组组长。以后又历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国务院东北经济特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副主任。1992年10月11日因病去世，终年73岁。

蒋振兰

虎口脱险

1946年，永吉县口前镇临江街，有一座由兄弟俩开的“杨记茶馆”。老三叫杨林，老四叫杨清。这哥俩虽说不是共产党员，可是由于耳闻目睹国民党“中央军”烧杀抢掠的罪恶，都倾向于革命，和共产党暗中有联系。

6月的一天，时近中午，正是茶馆人多的时候。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农民打扮的人，他在靠墙角的地方落了座，要了一壶茶，从杯中掏出两张煎饼吃喝起来。茶馆里的人熙熙攘攘，你来我往。只见那位农民打扮的人慢腾腾地吃喝完了，又掏出小烟袋吸了两锅烟，仍没有走的意思，足足坐了三个多小时。杨林不禁感到蹊跷，于是叫弟弟早早把门关了。茶馆内清堂了，只剩下那位农民打扮的人。他在茶馆里到处看了看，确信这里只有杨林兄弟之后，才自我介绍说是官马山的马希章，并拿出了一封信。信是口前区于君青副区长写给杨林的。

原来，“中央军”未进口前时，于君青时常来茶馆喝茶并借机开导杨林。渐渐地杨林也就成了共产党外的革命积极分子。今天于副区长给他写信，主要是让他把口前“中央军”的番号、兵力部署、何人投敌等情况搞清楚，然后交给送信人带回。

杨林看完信后，心情十分激动。他心里想，在这样严峻的斗争面前，党对自己还这样信任，不管冒多大风险也要把情报搞到手。于是他安顿了马希章，开始了敌情侦察。

他买了两筐货，一支扁担，又买了针头线脑等小百货，装成货郎的样子，在口前街里走街串巷叫卖起来。只两天功夫，驻口前镇的“中央军”情况就摸得差不多了。原来驻

口前的“中央军”是国民党的十四师，在口前镇里有一个团的兵力。回到茶馆他画了张敌人碉堡、兵力部署图，交给了马希章。

第三天，马希章扮装卖油郎，把杨林的回信和草图卷成个瓶塞，塞在瓶口上。杨林嘱咐马希章，如一旦发生意外，可将油瓶子甩到沟里。

事后，杨林照常与弟弟在茶馆卖茶。

7月6日，保长指派杨林和父亲去给“中央军”烧开水，只剩杨清看着茶馆。上午九点左右，突然闯进两名穿军官服装的“中央军”，一个是大高个，四十岁左右，听口音是辽宁人；另一个是矮胖子，操南方口音。

杨清见来者不善，马上端来两壶茶一盘瓜子，又为他们点上香烟。

“姓什么？”大高个子问道。

“姓杨。”杨清回答。

“口前镇开茶馆有几家姓杨的？”

“只有我们一家。”

“你是老几？”大个子站了起来。

“我是老四。”杨清情绪不好。

“老三呢？”

杨清心知坏了事，就说：“我不知道。”

两个家伙大怒，掏出手枪，对准杨清的胸口叫吼道：“领我们去找，找不到就毙了你。”

杨清无奈只好跟他们走了。心想，我偏不往杨林那儿领，东游西转折腾你们两个狗日的。

没走多远，偏巧杨林迎面走来。杨清假装没看见，马上绕开。杨林不知其中缘故，还紧走几步，撵上了杨清，

高声问了起来：“兄弟，你上哪去？”

话音未落，四五个便衣特务在两个当官的指挥下蜂拥而上，把杨林抓了起来。

事情完全出在那张情报上。原来，马希章只是官马山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弟弟马希恩是于副区长手下的侦察员。这次，于副区长派马希恩到口前通过杨林了解敌情，马希章知道口前认识弟弟的多，怕出事，就由自己代替弟弟去取回了情报。当马希恩揣着哥取来的情报走到五里河时，碰见了与自己同时入党的杨守三。马希恩以为都是党内同志，就把探察敌情的事告诉了杨守三。哪知杨守三在我军撤退时就投靠了敌人，他立即将马希恩所说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军”谍报队。于是敌人马上出动，将马家兄弟俩全抓了起来，之后又派人到口前抓了杨林。

敌人对杨林用起了酷刑，烟火烧脸，木棍夹腿，蹲头发，打嘴巴。杨林已是遍体鳞伤，可就是闭口不讲一句话。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他以私通“共匪”的罪名交军法处判刑。

开庭那天，敌人不允许任何争辩，就将杨林判为死刑。这时，一位脸上有几个麻子的姓卓的法官说了话：“杨林按罪当斩，但他属青年无知，纯属轻率，应从轻处理，感化他将来为党国效力。”哪知卓法官不轻不重的一席话，却救了杨林的一条命。死弄免掉，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这一年的11月，面对东北民主联军的猛烈反击，国民党十四师撤出口前。一天夜里，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杨家人惊醒了。杨清出来开门点上灯一看，原来是卓法官。全家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卓法官毕竟是杨林的救命恩人，于是递水递烟十分热情。卓法官摆了摆手，什么也没

接，急忙对杨家说：“我能救杨林，我是干什么的你们恐怕也猜个差不多。现在十四师已撤走，城内空虚，我们只要组织一伙人劫狱，就可将杨林救出来，否则，敌人红了眼，很可能下毒手。”

杨林父母一听着了急，卓法官就问杨清能否找到人，杨清表示能找到。

经过卓法官的策划，杨清连夜到五里河子南楼山找到于君青副区长，汇报了情况。于副区长立即决定派出十多名精明强干的战士于第二天夜里潜入口前。

晚上 12 点了，看押杨林他们的敌兵仍然不敢去睡。他们也清楚，形势越来越对他们不利了。这时，两名看守从黑影里走来了五个人，立即警惕地端起枪，大声问道：“什么人？”

“我，卓法官。”两个看守也听出了是卓法官的声音，立即把枪放下。可没想到，那几人立即窜上来，将他们抓了起来。刚要问卓法官是怎么回事，嘴还没等张开，却已被塞进了棉花团。

杨清从看守兜中掏出了钥匙，打开牢门。杨林身上的伤不少地方都化脓了，无力站起。杨清背起了杨林，在大家的掩护下撤离了。

1947 年 10 月，口前解放了。杨林身穿军装出现在群众面前。从那以后，他又随军参加了全国的解放战争，立了不少功劳。

刘文和

马团长智斗智斗敌机

1947年10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继夏委攻势之后，又发动了秋季攻势。民主联军六纵队十七师，于10月16日至17日上午，经过一天一宿的激战，全歼国民党60军182师3个营1700多人，首先打开了吉林市的南大门——口前镇。

随着战火硝烟慢慢散去，心情由紧张而变得舒缓的口前居民，家家敞开了房门，欢天喜地迎接民主联军的到来。我家那时在口前镇开了个大车店，屋子里宽敞明亮。几位腰部别着短枪的干部住进了我家，战士们叫他们首长。其中一位大高个儿，身材瘦削挺拔，面颊红润清秀，两眸炯炯有神，穿一身灰军装，说话有点俚，细听是山东口音，大家都叫他马团长。这个人开会讲话还是蛮严肃、庄重，可散了会却面带笑容，显得和蔼可亲。

一天早饭后，马团长把我们叫到跟前。“小鬼，几岁啦？”“9岁。”“头两天打仗你怕不怕？”“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也不是打我们。”听了我爽快的回答，马团长哈哈大笑起来，“想不到你还是条硬汉子哩！”听他这么一夸奖，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马团长接着又问我：“若是来了敌机，又扫射又轰炸，你怕不怕呀？”“它扫射我就躲起来，它走了我再出来。”马团长俯下身子，摸着我的头又笑了起来，“嗨！你还真有办法呀。那跟我们出玩玩好吗？”一听说出去玩，我的耳朵眼儿里好像都伸出了小巴掌，高兴地回答：“好的！”“不过你还得找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可以吗？”我点头应允，撒腿跑到后街，把王大川找来了。马团长端详了一下大川，微笑着点了点头，

表示满意。

我和大川手拉着手，马团长又带了四名战士，背上冲锋枪一起出发了。经过口前大河，从东坡的羊肠小道爬上了北大山。

到了山顶往下一看，口前镇尽收眼底。街道、居民、铁路、公路桥梁，还有操场上演练的士兵……虽说激战刚刚结束，却看不出战争留下的痕迹。只有敌人丢下的大地堡，像个大乌龟似的趴在山顶上一动不动，地堡周围是纵横交错的战壕。

不知什么时候，马团长登上了地堡顶盖，用望远镜四处察看着什么。我和大川被战壕里的子弹壳吸引住了，步枪的、手枪的、机枪的，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一连儿连儿，一堆堆，真好玩儿。我俩忙个不停，把上衣脱下来，每人拣了一大包。

这时，只见马团长跟四名战士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们就向半山腰的几撮秋板柴码子和两堆黄草垛跑去。他们把一捆捆柴斤放倒分散开，摆的很均匀，还有几排撮起来立在那里。他们又从山上拣回来不少敌人的钢盔和黄军帽，分别戴在立着的柴草顶端。从山上往下一看，像一队士兵正往山上摸爬滚打冲锋演习一样。我心想，还是战士们行，玩的比我们高明。

我和大川正看得出神，忽听有嗡嗡的马达声，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大。马团长马上从地堡上纵身跳下来，招呼我和大川过去，不等走到跟前，便抢上一步，把我俩一个胳膊窝一个夹到地堡里。他对我们说：“小鬼，敌机来了，你俩在这好好呆着，不要出去敌跑。”说完一转身跑出去了。我们从地堡的枪眼里看到，四名战士分别爬到了四个

山头上。

敌机飞近了，只有一架，像只大绿豆蝇似的在口前镇上空嗡嗡叫个不停。

我走到地堡门口，只见马团长站在一棵松树下，两手卡着腰，如同然屹立的塑像。仰望敌机，好一派威风凛凛的样子。我当时心已经跳到嗓子眼了。大川的脸都吓白了，互相瞅了一眼，长吁了一口气，似乎什么也不怕了。

这时马团长从兜里掏出一面红旗，穿上木棍挂到了树上。果然敌机发现了目标，往山上飞来，紧接着一个俯冲，哒哒哒哒！一通扫射，马团长一个侧滚翻，躲进战壕里。当敌机过去后，马团长跳出战壕，大声命令四个山头的战士：“注意隐蔽，看准就打！”刚说完，敌机又盘旋回来往下俯冲。这时四个山头枪声大作。虽然没打中，可是等飞机调过头来，却再也不敢超低空飞行了，只是照山腰一排排柴草人猛烈扫射。犹如冰雹落地一样打得尘土四溅，草木飞扬。就这们往复十来次，折腾二十多分钟，突然听敌机像发狂的疯狗似的，嗷嗷乱叫之后，投下两颗炸弹。“轰！轰！”两声巨响，震得地堡顶板尘土直落。只见北山坡浓烟滚滚，碎石喷涌，在空中乱飞。稍顷，随着炸弹炸后的硝烟慢慢散去，敌机的嗡嗡声，也渐渐地离得远了。

马团长带着一身泥土和草末子走进地堡，“小鬼，害怕没有？”我说：“刚开始有点怕，后来看你那么勇敢，就什么也不怕了。”大川说：“现在比刚才那会儿还怕！”马团长拉着我们俩的手笑着说：“现在没事了，走吧！”走出地堡后，他用望远镜看看周围的四个小山头，大声招呼战士，“下山喽！”我看看半山腰的柴草人，已被打得横七竖八乱糟糟的，好几个钢盔也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的。有

几顶中山帽飞到了树上……

归来的路上，我不解地问：“马团长，你把敌机引到这山上来干什么呀！”一小战士插话说：“这叫跟敌机捉迷藏！”我摇摇头心想，捉迷藏是小孩在地上玩的游戏，可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战斗哇，怎么会是捉迷藏呢？骗人！马团长看看我还是迷惑不解的样子，大声告诉我，“这叫做‘调虎离山计’”。调虎离山计，这里有什么名堂呀？我自个儿琢磨着不想再问下去了。

待回到镇上，我一看，部队还在操练，小街上人来人往的，一派安定景象。这时我才有点明白马团长“调虎离山计”的用意了。

李永庆

烽火年代的集体婚礼

这些年来，各地时常为青年男女举行集体婚礼，这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了。然而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里，举行集体婚礼却是罕见的。

那是1947年初夏的事。

当时，桦甸县的党政机关自从撤到江东后，由于工作和战事紧张，县级领导干部中的一部分大龄青年，顾不上处理个人婚事，婚期一拖再拖。当时上级领导机关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规定，在战争年代党政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二八七团”（即28周岁，7年党龄，县团级干部）的条件，才有资格结婚。1947年5月上旬，我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大战役后，又展开了强大的夏季攻势，解放桦甸指日可待。当时在中共桦甸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当中，有三对未婚夫妇已具备了“二八七团”的条件，报请中共吉南地委批准，准备在桦甸解放后进入县城完婚。

5月10日，中共桦甸县委在驻地桦树林子区东南岔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战勤、生产和进城后的有关工作。会议结束前，县委书记汪小川宣布说：“……经县委研究同意，地委批准韩光展（县委副书记）和王惠芬（县委民运工作队员）、冯英奎（县委副书记）和钟黎（四区区委组织委员、区妇女主任）、王依群（副县长）和吴敏（县政府民教科干部）结婚。”他说：“……桦甸县城就要解放了，县委考虑进城后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也很繁重，我的意见，趁今天县委委员和各区委书记都在这儿，下午就给他们举行集体婚礼好不好？”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三对情人毫无精神准备，同志们这个捅他一

下。那个又推他一把，三对情人都红着脸不知所措。等大家静下来后，汪书记又说：“我看这事就请县长吕云奇同志张罗张罗吧。”转头又笑着对吕县长嘱咐说：“办得尽可能隆重点！”吕县长说：“打了一年多仗，不是流血，就是牺牲，我作梦都想办喜事呢！”他站起来手拍胸脯满有信心地说：“这事我包了！”公安局长武建义建议说：“老县长，搞点杜康啊！办喜事不喝喜酒扫兴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欢迎欢迎！”

东南岔村的群众听说书记、县长、部长要结婚，都想看看大干部结婚啥样。村里朱大娘拄着拐棍来到小学校，边走边跟人讲：“我活了60岁，还没听说过大伙在一块结婚的，那得咋个结法呢？”年轻人和小孩们也都早早地来到学校院里，等着看集体婚礼。

下午2点钟，在东南岔小学教室里坐满了参加县委扩大会议的县委委员和各区委书记以及东南岔村政府的干部，共有30多人，门外还挤满了东南岔村的男女老幼。教室中间放了几张桌子，桌上放着4个菜（鸡蛋、粉条、土豆、白菜），一瓶白酒，还有村干部送来的葵花籽，桌子后面并排坐着三对衣着朴素的新郎新娘。这时七十二团和县大队正在围攻吕大房子和横道河子据点，外边不断传来前线大炮的轰鸣声。在这隆重的炮声中，县委书记汪小川宣布集体婚礼开始，然后首先讲话，他说：“……我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大战役后，夏季攻势已经开始，桦甸县就要解放了。进城后的工作任务是繁重的，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还是在未进城前举行婚礼为好。马克思说过，‘人的生命离不开友谊’。但要获得真正的友谊却不容易，友谊要用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

谅解去护理。……你们是同志、战友，又是革命夫妻，祝你们生活幸福！”县长吕云奇站起来，看看桌上的素菜，眉头紧锁，挠了挠光秃秃的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在东北军期间参加过不少婚礼，还参加了少帅的婚礼呢。今天本想丰盛一点，可是没有条件哪，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请新郎、新娘和大家谅解吧！”他刚坐下又忽地站起来，挥着手高声说：“等我的家乡吕大房子解放了，请大家都到我家吃粉条炖猪肉，越吃越香哟。那个时候同志们都敞开肚皮可劲地造吧！……。”大家都笑了。三对新郎新娘感激地说：“这就够好的了，谢谢老县长！”

这时，县工会主任李景钦站起来说：“我提议，请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经过好不好哇？”“好！”大家一齐鼓掌。副县长王依群说：“……艰苦的生活，紧张的工作，残酷的战争，我们没有时间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但我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我们的爱情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县委副书记韩光展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是同志、战友，自由恋爱，没有介绍人，在工作、战斗中我们互相了解，互相理解，建立了深深的革命友谊，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理解和革命的基础上的，我们的爱情是火与血铸就的。”县委民运部长冯英奎感慨地说：“过去有人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今天，我们是战场上举行婚礼！”最后，冯英奎代表新郎、新娘感谢党的关情，感谢大家的光临。三对新人共同向全体同志们敬礼致谢，同志们热烈鼓掌。掌声刚落，李景钦走到桌子对面提议，请新郎新娘唱歌，大家又是一阵掌声。三位新娘盛情难却，站起来合唱了《保卫黄河》，最后又唱了《喀秋莎》。掌声刚落，武建义问韩光殿：“韩书记，惠芬同志美在哪里？”韩光展随口答道：

“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他翘起大拇指接着说：“在敌人的眼睛里，她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人了。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她不亚于西施、貂蝉、王昭君、杨贵妃……”王惠芬在一旁捂着推得韩光展直翘起。

婚礼上，有的干部送贺联，有的干部送条幅，什么“祝愿你们白头到老！”“希望你们生几个小八路！”等等。有的干部向新婚夫妇祝词，祝愿他们新婚幸福。武建义和李景钦等同志风趣而幽默的祝词引起人们一阵阵笑声。这时，东南岔小学六名天真活泼的小学生，向每位新郎新娘献上一束束刚刚采来的映山红，还表演了新学的《拍手歌》。村农会主任李田有兴高采烈地说：“今天书心、县长、部长在俺村成亲，全村人都高兴呀！”武建义又走到王依群跟前，一把将他拉起来，向大家说：“请王县长方首诗好不好？”大家又鼓掌欢迎。王县长满怀激情，脱口而出：

“战斗烽火硝烟，无暇月下花前。

虽未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患难。

彼此理解热恋，经得生死考验。

县长置酒备餐，书记祝贺百年。

前线炮声振天，胜利捷报频传。

山美水美人美，革命夫妻蜜甜。”

婚礼结束后，东南岔村干部把新婚夫妻送到各自的“新房。”新房是由村干部临时安排腾出的三处民房，室内没有任何布置，只是在热炕上放上他们下乡背来的两套行李。婚礼第二天，三对新婚夫妇又同往常一样，和其他干部一起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次集体婚礼是桦甸县历史上党政机关干部举行的第一

次集体婚礼，在江东解放区一时传为佳话。

李海军

军事运输线上的先锋站长——马文轩

1947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反攻阶段。铁路系统根据东北铁路总局的指示，坚持边抢修边抢运的原则，全力以赴地支援解放战争。吉（林）敦（化）线天岗至敦化间的军事运输日益繁忙起来。人民控帛的铁路线不断地从东向西延伸。敦化铁路办事处为适应这一新的开势，调兵遣将，把车务系统的骨干力量都安排到关键岗位上。敦化调度所的调度员马文轩同志就是这种情况下调到张连（今白石山）站当站长的。

张连站距蛟河30多公里，四面环山，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在这里建立了兵站。这里，集结待命的部队来去匆匆，辎重粮秣堆积如山，随军民工、担架人员簇拥在张连内外，满载牛马牲畜，车辆配件的列车不断地从敦化方向开来，一个山沟小站一下子变成了特别繁忙的军事运输前哨站。

当时的张连车站虽然回到人民手中，但一切还未恢复正常。站舍仅剩下半边山墙，设备残缺不全，多数工人都到外面谋生去了。马站长一上任就先召集在家的工人（包括一部分养路工区的人）开会。他说：“现在的张连站比大城市还重要，这里是反攻的前哨阵地。民主联军把我们解放出来，但是还有很多人仍被国民党统治着。我们铁路工人必须一马当先，把子弟兵运到前方打老蒋，解放那里的人们。”他的话朴素真实，一席话点燃了工人们的希望之光。会木匠手艺的王希武说：“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铁路工人离开了铁路就象鱼离开了水，没有用武的地方了。站长，修站舍的活包在我的身上。”其他的人也都七嘴八舌

地说：“我们什么苦也不怕，你敢闯刀山，我们就敢下火海！咱们就干吧，你只管吩咐。”于是这座山中小车站开始大兴土木。壮士尽力，智士尽谋。他们连续几天加班工作，在半砌山墙的基础上修起了两间简易的小房作为站舍和办公室，运输设备也都检修到能够维持接发列车的程度。在员工们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七天时间车站就开通使用了。

张连站的开通加快了部队的调防和军用物资的供应，这对敌人来说是致命的威胁。敌人在地面不敢进犯张连，就借助舒马式小飞机来骚扰。1947年5月的一天下午，飞机的马达声由远而进，刹时间，两架敌机盘旋于张连上空，扔下几颗炸弹后又慌忙遁去。炸弹炸着了车站附近的谷草垛，马站长马上领着人们奋力扑火。火很快扑灭了，这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女孩被炸得粉身碎骨，早已死去，她的爸爸妈妈痛不欲生。员工们劝说者，啜泣着，马文轩眼睛湿润了……。从那以后，他常用这一血的事实教育和动员员工们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繁重的任务。

1947年6月18日下午3点左右，马文轩秘密宣誓入党。他向党表示：要一辈子忠于党的革命事业。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凡是吃苦和危险的事他都抢在前头。

张连站站内线路弯曲且有坡度，这给安全运输带来了困难。一个漆黑的夜晚，马站长正在站台上指挥卸车，突然一辆装满弹药的待卸货车脱钩顺坡道溜了下去。货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而站外不远处有一座沿未修好的铁路小桥，重车一旦在小桥上翻进沟里，车上的军火就要爆炸。情况万分紧急。马站长疾步如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非制服它不

可。他撵上车迅速蹬上手闸台，抓住闸轮拼命进行手制动。终于，这个庞然大物在距小桥2米远的地方缓缓停下了。共产党员马文轩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制止了一起重大的列车爆炸事故。

张连站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48年11月，马文轩被吉林铁路局命名为模范站长，1949年5月他出席了东北铁路总局在哈尔滨召开的首届劳模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工作经验。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周保中将军到张连视察，对车站给予兵站工作的有力支持给予了高度赞扬。

拉法战役后，长（春）图（们）线上的敌人龟缩到吉林、长春，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上又向前延伸。为了加强天岗车站的工作，马文轩被调到天岗站主持工作。这一带的伪自卫团在太平山上打起“长白军”的旗号，经常叫嚣要血洗天岗。因此天岗站除了要保证正常运输外，还要时刻准备对付敌人的武装进犯。上级给这个车站配备了十几条大枪和数百发子弹，员工们手不离枪，坚守在岗位上。

天岗站遭到国民党军的严重破坏，铁路设施也损坏殆尽。马站长上任时，站舍经过整修后环境稍好些，但生活、工作环境仍很艰苦，接发列车都在晚间进行，照明靠小油灯，夜间接发列车也靠手摇信号油灯。

腊月二十三了，晶莹的雪在阳光照射下闪出耀眼的光芒。工人们准备在这里集体过年。他们清扫了站台，清除了股道间的积雪，擦亮了道岔。马文轩特地派了3名员工，去虻牛河破冰扑鱼。

三十晚上，除顶班的员工外，包饺子的、炒菜的、炖鱼的，大家各显神通。当丰盛的年夜饭做好了就要吃时，区政府派人送信说，敌抢粮队正往天岗方向运动，要作撤退的

准备。随后区政府为车站准备的马爬犁也到了。不容多想，员工们马上做撤退的准备，不久前方又传来信息，敌人已被我部队击溃逃跑了。一场虚惊过后，员工们又重新过年，他们庆贺过去的一年，预祝新一年的新胜利。

战争年代的铁路运输工作，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进行的，既考验人又能培养人、锻炼人。

1948年3月初吉林解放，吉林省境内的敌人退缩在长春城内苟延残喘。5月，马文轩刚刚把家搬到天岗，就接到赴营城开站的命令。他打起行李带上几名天岗的员工乘坐货车奔向新岗位，肩负起前线军事运输和往后方输送煤炭的两付重担。

营城站是一个较大的中间站，战争使它破乱不堪，站舍已成残垣断壁，站场股道间瓦砾成堆，杂草丛生，臂板信号机架弹痕累累，臂板歪斜。马站长到任后，除了面前的一、二十名虎虎有生气的员工外，剩下的几乎是一片荒野。为早日建起车站，他和员工们滚到一块，昼夜不停地工作，肩扛手拎、抬的抬、端的端……7天过去了，他们终于用自己的双手把车站修整得算是可以通车了，开站后接发列车是可以了。但是，营城某矿的煤炭却运不出来，因为通往煤矿的专用线还没有修通，他又带人踏察了5公里的专用线。踏察中发现两组道岔已被毁坏，他们就把养路工区的旧道岔运去。安装道岔那天，他和员工们一起抬道岔、打道钉、上夹板、抬钢轨，天黑时，道岔铺设完成。第二天，营城解放后第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开出了煤矿开进了吉林市。煤给城市带来生机，给人民带来的温暖和欢乐。

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长春的包围，九

台站是长春外围的重镇，也是攻打长春的尽头站。但这里的工作被动，堵塞十分严重。7月，马文轩带着新的使命到九台上任。当他拿着行李卷走下火车，站内外纷繁的景象展现在他的眼前，正线机车蹙足了劲鸣笛待发，捣站机车往来于股道间进行甩挂作业，货场卸车的战士肩扛手搬，开赴前线的士兵鱼贯上车，起义的投降的国民党官兵列队走向指定地点……紧张的军事运输和接运难民的特殊任务使得九台站更加繁忙。马文轩上任后，首先抓了装卸车慢造成堵塞的难题。他与解放军后勤参谋组织战士学习不同类货物的不同卸车法、装法，同站调人员商量确定装卸车位置，又要求调车人员对准位置，并亲自参与编制调车计划。经过努力，装卸车速度明显加快，列车编组时间缩短了，车辆的堵塞状况得到了缓解。由于站场周围无栅栏，平交道口车马横越，严重影响到运输安全。马文轩就带领休班员工利用旧枕木、刺线等干了4天，围起500米的栅栏，站内秩序为之一新。

当时协助接运长春难民是九台站的一项特殊工作。难民中能走动的不多，大都需要搀扶或用担架抬。一次，一列难民车开来，马站长看到一付担架从蓬车门抬出来，他忙跑上去接过担架，快步走向粥锅。担架上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她双眼微闭，面色蜡黄，嘴唇不时地翕动着，银发在风中抖动。一匙匙米汤喂到老人嘴里，老人的眼睛渐渐睁开，发出微弱的声音：“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

头雁高飞群雁随。九台站的工作得到了吉林铁路局的肯定，1948年11月间，九台站被吉林铁路局命名为模范车站。

1948年12月东北全境解放后，马文轩被调到梅河口车

站、先后任副站长、站长。这是一个一等站，编组量相当大。二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了。梅河分局管辖的辑安（今集安）站是中朝间三个口岸之一，是集铁路系统车、机、工、电辆及后勤保障各个方面于一体的国境线上的尽头站。1951年2月，马文轩同志接受新的使命，被任命为这个口岸站铁路地区的全权代表，他打起行装告别了妻子和刚刚10个月而又在重病中的大女儿，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辑安的鸭绿江大桥已被炸坏，军列要从大桥下游1000米处的第一便桥过轨。便桥的钢轨紧贴水面，飞机很难发现。面对硝烟弥漫的朝鲜国土，马文轩深深感到口岸运输的重大责任。刚到车站时，他发现第一道与货物线距离近，互相干扰，就提出延长一道线的建议。雨季，他发现好大王碑附近线路路基被山水冲垮，就立即与抢修队联系抢修。口岸的军列都是晚间运行，他要求车站员工以“保证军列18点正点安全过轨”为最高原则。因此，凡是妨害安全有关运输的问题，他都千方百计想法解决。1952年2月，鸭绿江解冻前，他发现上游朝方集结了很多木排。如果不把木排处理好，江面解冻后木排下来，就有可能损坏铁路便桥。他向上级汇报了这个情况，在得到上级指示后，他带着林枫（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同志的亲笔信出使朝鲜满浦郡交涉此事，圆满解决了木排的问题，解除了一个潜在威胁。

辑安是敌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一次，几架敌机飞临上空，炸弹在四处炸响，铁路折返段及段内机车均被炸坏，尤其严重的是站内牵出线咽喉道岔炸断。“怎么办？距离军列通过时间仅有3个小时了！不把大坑填平，修好道岔，军火运不上去，伤病员运不下来，这可是关系到抗美援朝

朝的大事！”时间不容许马文轩多想了，他看看两个弹坑，看看在场的人们焦急的神色，拳头一挥，“干！18点前非抢修通不可！”一场抢修战斗打响了。弹坑渐渐被填平夯实，道岔也被拆换一新。当马文轩手握大板子拧完最后一颗螺丝时，时间刚到17点半。18点军列正点开动了，激战的人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战争伴随着流血牺牲，火与血的考验也更加坚定着大家战胜敌人的信心与勇气。一次敌机夜间空袭时，马文轩正在与同伴研究工作，只听一声巨响，他被一股热浪冲击到一边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他抬头透过破碎的窗子看到夜空星宿点点，便马上喊醒了张奎禄，相互搀扶、挣扎着站起来，咬着牙走到独身宿舍，由宿舍里卫生所的医生把伤口包扎起来，接着又投入工作之中。

1952年1月的一天，敌机又在辑安上空投弹。轰炸过后，大家发现两颗定时炸弹象树桩子似的斜插在股道间。如不及时排除，炸弹一旦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员工们对排弹是外行，如果到几公里外的部队请工兵又怕来不及。马文轩当即决定，排弹与请工兵双管齐下！马文轩怒视着定时炸弹吼道：“把它拽走！”员工们跟着他跑向炸弹。他们用绳子把它捆住拽出了站外。不多时，工兵赶来排除了炸弹的引信，解除了隐患。

马文轩这时虽然已被提为梅铁分局助理分局长，但他仍在辑安工作。他在辑安经历了480多个日日夜夜，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18点一到，辑安过轨军列都正点开往朝鲜。最多时，每天有几百辆空重车在这里过轨、接回。他圆满地完成了铁路代表的工作，赢得了荣誉和人们的尊敬。

36年过去了，马文轩同志于1982年光荣地离开了原吉林铁路局主管运输的副局长岗位，但他仍然担任沈阳铁路局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的工作，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他的余光余热。

边述、傅崇和、程家福

机智勇敢的民兵孙永祥

孙永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家住吉林省蛟河县后桦皮甸子屯，一个地薄人稀的深山沟里。父亲忠厚老实，辛辛苦苦地为地主耕种了半辈子地，最后因病重没钱医治，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家中只剩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苦度日月。为生活所迫，他五、六岁就给地主放猪，受尽地主欺凌，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在他那饱受创伤的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共产党来了，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也给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下长大的孙永祥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他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拿起枪来跟地主恶霸斗，才能推翻阶级剥削和压迫，翻身做主人。从此，他跟着共产党，带领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参加民兵支援前线，积极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中。

解放战争时期的孙永祥，二十岁左右，是个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别看孙永祥平时不声不响，忠诚老实，可是打起仗来，却机灵勇敢。那时，他担任民兵队长，桃山、常山、横道河子等据点的敌人都怕他带领的民兵。省军区副参谋长刘建平称他是一只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窜山跳涧的“东北虎”。

一九四七年冬，孙永祥同志接到带领民兵担架队配合正规部队解放桦树林子的战斗命令。他带领民兵担架队共八十余人，一直跟随主攻部队活动。那天凌晨，天空一片昏暗，大地朦朦胧胧，他们从植林村方向摸到牡丹砬子山下距离敌人碉堡二百多米的地方，等候开战的信号。在刺骨的寒风中，他们静静地埋伏在大雪之中。

牡丹砬子由国民党六十军某团据守，敌人在牡丹砬子下面临江筑起了二米多高的冰墙，在面对着山上碉堡的冰墙处打开了一个缺口，这就是通往山上的唯一通道，然后，顺山坡用水浇成锃亮溜滑的冰墙。凌晨三点，战斗打响了。敌人居高临下，用两挺机枪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我军担任主攻的一连，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我军一个排迅速冲到碉堡前的山坡下。谁知狡猾的敌人从碉堡里喷出强烈的火舌，第一批冲上去的战士，被阻挡在半山腰上，几十个战士受了重伤。六名战士牺牲，王指导员也受了重伤。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桦树林子的解放，孙永祥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几名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把指导员抬下了火线。营长刘中急得两眼冒火，亲自组织几名神枪手，一个齐射，把敌人的机枪打哑吧了。我军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可正面还是攻不上去，锃亮溜滑的冰墙根本爬不上去，子弹、手榴弹打上去只留下一个个白点。在乱枪之中，刘营长不幸中弹牺牲了。孙永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马上召集民兵说：“老乡们，我们的部队从正面牵制住敌人，我们民兵要从敌人的侧翼袭击敌人，一定要配合主力打胜这一仗！不怕死的跟我来！”说完，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挺身走在最前面，从侧面陡峭的石砬子向山上攀登。爬上去滑下来，溜滑的冰墙没有站脚之地，怎么办？经过研究之后，我军用六0炮向那可恨的冰墙一连打了几炮，冰墙被炸得坑坑洼洼。孙永祥和队员利用新炸出的道路向砬子上敌人的碉堡摸去。可刚接近碉堡，就被敌人发现了。一阵机枪横扫过来，他发现和从小在一起长大，同期扛活、闹土改、斗地主的农会主任的头部受了重伤，鲜血从头部流到脸上，流到雪地上。

把雪地都染红了。孙永祥紧紧握着战友的手，急声地呼唤他，可是，他还在昏迷中没有醒来。孙永祥咬紧牙关，心里狠狠地发誓，“同志！同志！我一定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他脱下身上的大衣盖在了农会主席的身上，然后集中了全队十多个人，一起向敌人投了十几枚手榴弹，在硝烟滚滚和爆炸的隆隆声中，孙永祥端着步枪，冲到敌人的碉堡门口。他的帽子被子弹打掉了，胳膊受了伤。但他咬紧牙，不顾疼痛，抡起了枪托把满腔的怒火、满腔的仇恨发作到敌人身上，把一个向门外冲来的敌人打得脑浆崩裂。接着他举起枪来大声喊道：“缴枪不杀！”敌人胆怯了，机枪声停止了。我正面部队也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消灭了正面的敌人。残余的敌人举起白旗投降了。战斗结束后，张永祥和他的战友们受到我警备二旅旅长的表扬。张永祥激动地说：“民主联军流血牺牲，还不是为老百姓。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子弟兵，哪有我今天。”他举起枪，发誓一样对刘副参谋长说：“男儿志在能远行，今后部队打到哪，我就带着民兵跟到哪儿！”孙永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久，他就带领民兵和桦甸县担架大队跟随主攻部队一起奔赴了四平前线。

金 兰

鱼水情深

为了在全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随县委书记到老区采访。当我们的车子驶进爱耕屯（原来的八铺炕屯）时，赶巧碰上早先的“老农会”，虽然老人家是快往八十岁奔的人了，可身子骨儿还硬朗。闲唠中，他说老韩头的小孙子今儿个结婚，新媳妇家住的远，找不到车接，正“熬糟”呢。王书记一听，二话没说，决定先将车借给老韩头娶孙子媳妇用。

“老农会”浑浊的老眼噙着泪花，喃喃地说：“真真想不到，想不到，老韩头儿子结婚时骑的是当年霍秘书的高头大马。想不到他小孙子结婚，又坐上了当今王书记的北京吉普……”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大家非要他讲讲过去的事儿不可。于是，引出下面的一段故事来……

在磐石江南大顶子山北边，有一个八铺炕屯。别看这小屯子不起眼，早在光绪八年（1882），就有人在这开荒种地。民国二十八年（1939）建有五间房、八铺炕，取名“八铺炕”。到了1947年，这里成为磐石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当时的县委书记雷鸣玉、县长朱光烈和县政府政务秘书霍宗坎（霍明光）就住在这里，指挥全县的游击队战争。

霍秘书住在傍山脚下的老百姓家，房东老韩头有座北朝南的三间草房，中间是“外屋地”，东西两屋住人。霍秘书就住在西屋。房东家有三口人，老两口和一个20多岁的儿子。全家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淳朴得象一株株红高粱。儿子叫韩凤山，膀大腰圆，壮实得象头牛，是个脑袋一

挨枕头就打呼噜的主儿。可这几天他躺在炕上，却象热锅上烙大饼，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不，大芦花公鸡又叫了，他还在炕上翻腾着……

为啥？原来按乡俗规定，结婚时新郎要骑高头大马，说什么“马越高，日子过得越好；马越大，日子过得越发。”可屯里让国民党搜刮了一大气，别说高头大马呀，连马驹子也弄不到。马倒是有一匹，可那是霍秘书的，那马用场多着呢！

他清楚记得，在一个滴水成冰的“腊八”前，霍秘书打点通讯员小张骑马而去。到傍晚，小张“背包捋伞”地回来。第二天，大街上就张贴了大告示，听识文断字的人叨咕，上面写的是省委发出的有关拥政爱民的事儿。过了几天，正下着冒烟雪，霍秘书又打点小张骑马而去，他和马的身上都挂了一层厚厚的霜。可这又算得了什么。第二天，照样，在原来的地方又贴上了省委发出的有关农业生产的决定……

就是这匹马，在江南根据地百里方圆奔驰来去，穿梭于村屯之间，让雷鸣玉、朱光烈、霍宗坎研究了多少革命大事，甚至连办秧歌队、军民联欢的事儿也在内。在这宗宗大事前，自己的丁点小事简直就是一粒芝麻。借马，又咋开这个口哟。就是开了口，眼下马也不在呀。马上哪去了？他东打听西打听，才知道这马又派上了用场，这马由一个连长骑着带领几个人穿过封锁线，搞物资去了。又有谁不知道，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的东西缺的“蝎虎”，大的不说，单说火柴吧，吸烟的人为省火，一个人点火大家对着吸。有的干脆用上了打火石。就说雷书记、朱县长、霍秘书吧，那么大的官儿，照样穿着粗布衣，还是用茶筴树染的色儿，

还是上个月才穿上的。听大家说，县大队下了决心，要弄回一些东西，让乡亲们欢欢喜喜地过个年……

“喔，喔，喔……”

大芦花公鸡又叫了起来，纸糊的窗户上透出了青色。躺在炕上的韩凤山“冷丁”地歪起身，靠在被垛上支楞起耳朵，听着当院里人们的喳喳声：

“霍秘书，明儿个过小年，每户去两三个同志，大伙一块热闹热闹！”

听声儿就知道，这是农会的孙成山主任。

“老孙呐，不麻烦乡亲了吧，我们集体立伙，再排些节目，和群众联欢吧！”

这是霍秘书的声儿，一口山东味，总是那么亲切自然，再熟悉不过了。

“霍秘书，那不行，你得照俺农会的章程办！”

“老孙哪，打去年6月县机关移到这儿，建根据地、剿匪、同国民党斗争，群众没少出力，我们麻烦乡亲们够多的了。”

“霍秘书啊，平时价你总爱说党政军民是一家，咋的，平日是一家，过个年就分家了吗？若群众找我们磨叨，看你们咋说！”停了一会儿，老孙的声音高了起来：“如果你硬拔犟眼子，我就去找老雷和老朱！”

呵，老孙还亮出了“王牌”呢。也别说，他和雷鸣玉、朱光烈熟得很，啥都敢侃。他是说到做到，一条道跑到黑的角色。

院子里的声音渐渐地小了，弱了，伴随着越来越远的脚步声消失了……

可年轻人却躺不住了，他心里惦记着马，他结婚就在明

天，急等着马用呢！

腊月二十三，旧历小年，农村把小年很当回事儿。这一天，干部战士分散在各家，挑水的挑水，劈柴的劈柴，扫当院的扫当院。有的和乡亲们盘腿坐在热炕头儿上，边唠嗑边包着粘豆包，还忘不了给粘豆包底下贴上一张苏子叶。

在韩凤山家的大门上，贴上了一副大对联，上下联是：

鱼靠水水帮鱼鱼鱼水水

军爱人民拥军军军军民

横批儿是：鱼水情深

看那苍劲的笔迹，就知道是霍秘书写的。满岭白雪，衬着红艳艳的对联，透出喜气，萌生出希望。这还不算，霍秘书亲自将刚刚赶回来的战马擦了又擦，刷了又刷，将马毛梳了又梳，理了又理，然后郑重地将马牵到老韩头夫妻跟前，朗声地说：

“办喜事儿吧！让你儿子骑上，我们早为这做了安排！”

“这，这……”

两位老人，加上韩凤山，都仰脸瞅着霍秘书，心里热呼呼的，连说活都笨笨嗑嗑的了。

霍秘书亲亲热热地说着，把缰绳硬塞到韩凤山老爹的手里。

一顿饭的功夫，在韩凤山的大门前挤满了喜气洋洋的乡亲们。小伙子、丫头们在大人身边跑来跑去，等着看新媳妇。雷鸣玉、朱光烈、霍宗坎也夹在这人群里，他们都向不远遐的山道拐弯处瞅着。这时农会老孙挤到霍秘书跟前，打趣地说：

“咋样，还得照农会的章程办吧！”

老孙边说边朝雷鸣玉、朱光烈呶呶嘴。雷鸣玉、朱光烈故意板起脸，不理他。霍秘书给了老孙一拳，笑哈哈地说：

“老孙，你呀，你可真能磨……”

“霍秘书呵，说真格的，你时间金贵，别总给老百姓干活，抽空多教我们认几个字儿，以后要派大用场哩……”

鞭炮清脆地响了起来，随着欢声笑语，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升起了缕缕银色的炊烟，融化于瓦蓝的空中……

一群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来，不断溜儿。为首的是高头大马，上面骑着贫农的儿子韩凤山。他穿得板板正正，腰板儿拔的是标杆儿溜直儿，脸上带着腼腆，正咧嘴笑哩。人们不难看出，在马的后边紧跟着霍秘书的通讯员小张。这是霍秘书有意安排的，怕马认生，以防万一……

此刻，庄户人的张张脸上都挂着笑，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太多的喜悦。春节期间，党政军领导要给他们拜年，要和他们联欢，还要给他们发年嚼咕，听说过了年还要搞土地改革呢！

申忠俭

夜擒地主王老尿

地主分子王老尿再也不像蔫头蔫脑的落汤鸡了，他好似浇了水的豆芽菜，又支楞起来了。他每天早晨起来，总是要站到街头向分了斗争果实的贫下中农示威。这不，今天是中秋节，刚吃过早饭，趁着隔壁邻里还没有下地的时候，王老尿又来到十字街口，腆着个大肚子，两腿一叉，扯着那破锣一样的嗓子骂着：“穷小子们听着，共产党八路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这里还是我姓王的天下……”

这正是1947年旧历8月15日，进驻吉林的我党政军机关在战略上大转移，部队也从吉林外围江南东山根一带撤走了。东山根的东疙瘩街，被斗争了的地主分子王老尿看到这种情形，不禁又耀武扬威起来。王老尿原名叫王生财，因为他办啥事总是尿汲汲地，人送他外号叫王老尿。他是这地方有名的大地主，占有土地上千垧，家中常年雇工几十号人。有看门守院的打手，有催租讨债的外柜，住的是深宅大院。王老尿出门走路，总是骑着高头大马，够威风的呢。

民主联军开走后，王老尿一看给穷人撑腰的都走了，就把前一阵子挨斗争的怒火一下子发泄出来。他联络了就近的几家被斗的地富分子，依仗着国民党谍报队长于海涛的势力，勾结国民党官府，开始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

他们先是抓捕农会干部和我军家属并关押起来，有的还被定了几条罪名送到监狱蹲了起来，然后就向贫下中农讨要被分掉的斗争果实。这样一来，有的贫下中农真的慌了手脚，不知道开走的民主联军还能不能打回来了，就偷着把斗争时分得的东西又给地主送了回去。

已经撤到蛟河县天南区的共产党吉林江南区中队听说这

一情况后，决定打掉这些反动的地富分子的嚣张气焰，严惩几个坏蛋，以便稳住贫下中农的心。任务落到区中队侦察排长肖明亮的头上。肖明亮二十五六岁，是个非常精明干练的年轻人。他经常孤身一人闯入国民党六十军占领的吉林市内，搜集国民党的活动情况，有时还带着“舌头”回来。接到任务后的肖明亮，高高兴兴地带上侦察排的战士张化简、丁秀才、郑家风连夜出发了。

8月15的月亮刚刚从东山嘴爬出来，又大又圆，照得远处层层叠叠的群山黑黝黝的，清亮的月光下一片寂静。侦察队对这一带地形不太熟悉，便在临出发前找来了部队家属、王老尿的雇户李大叔给带路。

向导李大叔走在前头，肖明亮带着3名队员紧紧跟随，不到3个小时就来到了王老尿的大院套附近。肖明亮赶忙送走了李大叔，然后围着王老尿的大院套转了一圈，见大门关得严严的。大院修得很讲究，围墙用的是青砖码垛，墙身三米多高，墙头上拉着铁蒺藜。

肖明亮掏出表借着月光一看，正是夜里11点钟，大院也已静了下来。肖明亮一摆手，示意大家准备行动。可怎么进去呢？如若从大门进去，敲门一定会惊动院里人，弄不好王老尿会跑掉，只好爬墙进去。可是墙的四周都是光秃秃的，一点抓手也没有，要爬上去可不容易。4个人悄悄地靠近墙根，象叠罗汉似的搭起人梯，一个踏着一个肩膀，用力爬过墙头，跳进院里。

4个人跳进院后，为了防备万一。肖明亮先来到正面把大门栓拉开。这时守门的老头走过来问他们是哪里来的，肖明亮说：“你歇着吧，这里就不要管了。”为了稳住老头，肖明亮又从兜里掏出前几天得到的“国民党东北九省挺进军

侦缉队”的证明，递给看门的老头，并告诉他说：“我们是来找王生财大掌柜的，有要紧事情要办。”

守门的老头不知肖明亮这伙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再看个个腰间都别着短枪，知道是来者不善，忙把证明还给肖明亮说：“大掌柜的住在西院正房东屋，你们自己去找他吧。”

经看门老头介绍才知道，原来王老尿住的是双套院，分为东西两个院，西院才是王老尿的本家住宅。肖明亮和侦察队员暗中高兴，如果看门的老头不给介绍，那还说不定摸到哪个屋里去呢。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肖明亮向一个战士递个眼神，意思是按原定计划干。于是张化简留下来把守大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他两个人跟随肖明亮，穿过角门，直奔王老尿的住室。

自从民主联军从这一带撤走后，国民党就来到这里。王老尿再也不担心撅屁股挨斗了，整日里做着复辟的美梦，哪里会想到还有人敢来他家闹事。今晚一家老小赏完月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屋里睡觉去了。王老尿回到卧室，把手枪放在一旁，随手点亮了大烟灯，操起烟枪正准备抽上几口过瘾呢，哪曾想突然从外面闯进两个手握短枪的人，象铁塔一样威严地站在他面前。

“王老尿，不准动，你放老实点！”肖明亮一看他要去摸身边的手枪，忙着命令道。手疾眼快的丁秀才两步上前，早已把枪抢到手里。守着风门的郑家风更是机灵果断，他从腰间摘下绑绳，还没等王老尿清醒过来，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王老尿忙求饶说：“爷们，有啥事只管说，用不着这样！”他一时弄不清楚肖明亮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只好顺

口喊叫爷们。肖明亮一摆手说：“别废话，你近些日子干些什么坏事，你心里明白，今天啥也不要你的，就请你跟我走一趟！”

侦察队进院前后也就用了十几分钟的工夫，就把这个反攻倒算的坏蛋王老尿抓到了。然后他们迅速离开大院，踏上了归途。

守门的老头一看大掌柜的被人绑出大院，这下可慌了手脚，连忙到各屋通信儿。院内顿时像开了锅一样，老婆哭孩子叫，他们还以为大掌柜的是被土匪给抓走了呢。有的忙去给谍报队长于海涛捎信；有的给国民党自卫队送信，请求派人去追……

你别说，他们的消息传得也真快，侦察排带着王老尿才走出四五里，20多个全副武装的自卫队就骑着大马，吵吵嚷嚷地从后面追了上来。他们还不时地用手电筒四处扫来扫去。

肖明亮见到后面有人追了上来，看了看周围都是菜地，很难找到藏身之处，他忙命令战士作好准备，应付眼前的情况。这时老远就听追上来的互相喊着：“咱们是不是走错了路，怎么追了这么长时间，连个人影也没见到！”那边又有个人喊：“他们几个人就是长了翅膀，也不会飞的这么快呀，真他妈的神了！”

肖明亮看着越来越近的马队，心想不能硬拚，得找个地方躲躲。往哪躲呢？他四下一望，见不远处有几个大粪坑。只见粪坑里有一米多深的粪水，坑沿上种着快要成熟的葵花。这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于是他把五个人分成两伙，郑家风牵着王老尿，跳进第一个坑里，折下几片葵花叶顶在头上，然后蹲下去，并用枪嘴顶着王老尿的后脑勺说：“你要

出声，小心你的脑袋开花！”

肖明亮和另外两个队员，也同时跳进第二个粪坑，照样伪装起来。

自卫队的人马赶到近前，可是谁也不往粪坑靠近，站在很远的地方用电筒这照一照，那晃一晃，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只听有人又在瞞怨的骂着：“竟他妈的瞎照，你没闻着臭味，快离开这里往前追！”

肖明亮听到马蹄声走远了，心里才稳了下来。他们爬出粪坑，来到小河边洗去身上的粪水，操着小路奔回区中队。

王老尿被扣押在区中队经过几次审讯，他一一地交待了大抓农会干部和军人家属、向贫下中农讨要斗争果实的罪行。区中队命令王老尿亲笔写信给于海涛和其他地富分子，要他们马上放回被抓的人并退还斗争果实，要不按着要求办，就别想活着回去。

王老尿只好按着区中队的意思写信，很快放回了被抓的农会干部和军人家属。从那以后，王老尿等一伙地富分子，在吉林江南一带再也不敢做坏事了。

王凤阁

鸭绿沟阻击战

1947年春节刚过，在鸭绿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军主动向解放区进攻，遭到我军民奋起阻击，使其遭到惨重的损失。

鸭绿沟属桦甸市红石镇的一个行政村，沟长20华里，三面环山，中间有一条小河贯穿而过流入松花江。村管辖四个自然屯，其中龙王庙子在沟上游，江沿屯在沟口，一面街在沟中游北山前，八家子屯在北山后侧。

1946年6月，国民党占领桦甸松花江以西。他们到处抓兵，强迫百姓白天沿江修筑碉堡、哨所、围墙、战沟等防御工事，晚间在江边站岗放哨。蒋军还经常向江东开枪打炮，使江东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同江西敌军针锋相对地开展军事斗争，我二十四旅的三个团、县大队和武装民兵三千多人，在江东筑起了长达300多华里的强大军民联防线。国共两军以江为界形成对峙局面，枪炮声昼夜不断，持续了四个多月。1946年10月，我军由防御转为主动出击，使国民党军处于日益被动挨打地位。

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不甘心失败，想利用冰雪封江的时机作垂死挣扎。他纠集了六十军的一个美式装备师，青年军的一部和县保安队、自卫队等二千多人，命令国民党桦甸县长邓世松任总指挥，进攻江东妄图占领我解放区。邓世松接到梁华盛的命令后，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布署。我原红石区区长韩兆民和原县保安团三营副营长安海峰经不住严酷斗争的考验，先后投降了邓世松。叛变后，分别任国民党桦甸保安队二中队队长和四中队队长。他们知道了主子的企图后

自以为熟悉地形，便主动要求作向导，妄想借此机会立功升官。

1947年农历正月初七，邓世松指挥这些杂牌军分多路向江东进发，企图先占领鸭绿沟，进而实现他的罪恶计划。敌军的行动，及时被我情报员和部队侦察员得知。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五区区长高位同志带领小红石村民兵队长许中仁、队员张录和张彩，于初七晚间由小红石乘坐马爬犁顺江而下进行侦察。当他们走到辉发河口子时，发现江北岸山坡上有闪闪的灯火。突然敌军哨兵喝问：“谁？”高位区长急中生智答道：“保安队！”没等敌兵问口令，我们的马爬犁已急驰过江东，跑到烟筒砬子屯。这时江西的敌军向屯内开了枪，高位和三位民兵又坐马爬犁连夜飞跑到四道沟和龙王庙子屯，把敌情告知驻军后，迅速回到小红石村，又把敌情报告给军队首长。

吉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兼24旅副旅长蒋克诚同志已作好军事部署，命令71团在红石、大船口和小红石一带防线严密监视敌军的行动，作好战斗准备。命令72团的三营，连夜奔赴鸭绿沟的一面街屯的北山设下埋伏。命令小红石屯的一个连和民兵占领小红石的东北和鸭绿沟的南山，设下埋伏。命令县大队两个连连夜到江西牵制吕大房子之敌，配合72团作战。蒋副司令负责总指挥，72团团长杨尚坤、参谋长郎守明和71团团政委夏苾卿亲临前线指挥。

为了做好后勤工作，桦甸县副县长王依群同志随同部队指挥行动，负责战勤、给养供应工作。担架队、妇女会、儿童团组织都做好了支援军队作战的一切准备，只等敌人来犯。

鸭绿沟地处高寒山区，当时正值数九隆冬，冷风刺骨。

在气温零下 30 多度的严寒中，72 团三营的战士们没有棉大衣，身上只穿一件二大棉袄，趴在雪地里。有的人冻得手脚麻木失去知觉；有的人冻成残疾；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可天再冷战士们也经受住了考验，只是因为敌人迟到了，战士们有些不耐烦。

正月初八天刚亮，敌人终于过江了。他们从鸭绿沟口，兵分两路向八家子和一面街屯进犯。这时高位区长的爱人、区委书记张健同志带领区干部正在江沿屯组织群众，准备与敌人做斗争。她得到了敌情后，立即派江沿屯的民兵小队长王金贵同志火速跑到一面街，向 72 团三营张营长和民兵队长闫俊皋报告。这时八家子屯已被敌军占领。张营长命令屯内的一连跑步冲上屯北山顶阵地。机枪班长李文玉扛着机枪，首先进入阵地。他刚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南侧，突然看见石头北侧上来一个敌人正在东张西望，同时还看见山北坡深雪地中有数百敌军。一名军官正指挥着他们准备上山。李班长先将大石头北侧的那个敌人击毙，又照准敌群突突地开了火。这时全连的机关枪、步枪和手榴弹居高临下发挥了威力，枪弹象雨点一样扫去。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指挥官当场被毙。敌军一个个鬼哭狼嚎乱了营，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倒在雪地上一大片。战斗中，被敌人抓去背弹药的八家子屯的老百姓，离我军阵地近的急速跑上阵地，把弹药送给我军战士，离我军阵地远的扔下弹药一哄而散。正当敌人被我军火力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敌军后援部队开始向我阵地发射炮弹。我机枪班长李文玉身负重伤，但他仍坚持战斗，直到把敌人组织的反扑打退才下火线。

战斗持续到上午九时。敌人从鸭绿沟口用一个营的兵力进攻一面街这座空荡的屯子，他们在屯子里用机枪四处扫

射。这时埋伏在屯南山雪地里的我军官兵，一个个早就憋不住了，在蒋副司令员发出三颗信号弹的同时，就象雄狮猛虎一样冲向敌人，冲锋号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震撼得鸭绿沟地动山摇。南北山上的战士们用十几架机关枪连同步枪、手榴弹，居高临下向敌军猛烈开火。敌人凭借人海战术，用炮火掩护，不断向我高地反扑，但每次进攻都被打退。敌军营长被打死，指挥瘫痪。敌人死伤惨重，我军民却越战越勇。

战斗到下午四点多钟，太阳快要落山了。我军分区齐参谋长指挥部队诱敌深入，命令部队让出阵地，撤到鸭绿沟上游的龙王庙子屯南、北山顶，布成口袋阵，准备来一个关门打狗。但敌人却很狡猾。邓世松原是国民党军的师长，曾吃过八路军不少苦头，叛徒韩兆民和安海峰更知道我军的厉害。他们认为我军后退不是败退，必定有计谋。因此，吓得敌人一宿不敢睡觉，也没有向前进军，只是在八家子和一面街两个屯里穷凶极恶地到处搜查，打骂百姓，抢夺民财，使百姓吃了不少苦头。老百姓气愤地骂道：“中央军来了不光人遭殃，小鸡一宿也全杀光。”

初九早晨天不亮，由韩兆民、安海峰两个叛徒做向导带领进犯敌军，从八家子和一面街屯兵分多路狼狈逃到桦甸县城。归逃途中被抓去当兵的纷纷开小差，受伤的敌兵叫哭连天，活着的各个无精打彩，垂头丧气。这次战斗敌军惨败，死一百多人，伤五十多人，被俘二百多人。故此，县长邓世松痛心疾首地哀叹：“这下我可怎么向梁主席交待！”在这次阻击战中，人民群众构成了我军的强大后援。民兵队长闫俊皋同志积极带领民兵上火线，抬伤员、送热水、热饭、运弹药、押送俘虏，同时组织妇女为部队做饭、护理病

员。敌人逃跑时，百姓自动拿起铁锹、棍棒，帮助解放军打扫战场。在清查俘虏中，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伤号，自称是中校团副，是梁华盛派他来督战的，又说他是周保中的老乡。他害怕“土八路”不优待俘虏，吓得一个劲地给民兵磕头，乞求活命。有的民兵质问他，你们蒋委员长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现在半年过去了，共产党却要消灭国民党了！那个俘虏无言可对，只好低头不语。老百姓们都欢欣鼓舞地说：“邓世松、韩兆民、安海峰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战斗结束后，军分区首长和县领导在一面街召开了战斗总结表彰大会，蒋副司令员在大会上说：“我们这次阻击战是自撤出桦甸县城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鸭绿沟军民团结共同作战的胜利。蒋介石破坏和平停战协定，搞独裁，打内战。我们只有军民团结起来，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才能恢复和平。”闫俊皋同志在大会上向首长表示：“我们鸭绿沟人民一定努力生产，参军参战，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鸭绿沟人民为永远缅怀革命英雄的业绩，将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十六名烈士安葬在龙王庙子屯的东山坡上。桦甸县副县长王依群同志在纪念碑的正面题写了“鸭绿沟战役烈士公墓”九个大字，在碑的背面题写道：

美式武装 气焰嚣张 鸭沟一战 老本输光
俘虏成群 呼爹唤娘 关门打狗 夹道捉狼
军威大振 民众欢畅 葵花朝阳 人心向党
全力支前 多打胜仗 打到南京 活捉老蒋
为国捐躯 血染松江 缅怀英烈 世代不忘

鸭绿沟的人民不会忘记，今天的社会主义江山和幸福生

活是用革命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因此，每年清时节一到，当地群众都有组织地为烈士扫墓，以此深切地纪念、缅怀革命烈士的业绩，教育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邵宝祥

三上大顶山

1948年，我军先后解放吉林、永吉，在战斗中被击溃的国民党“长白军”（地方保安队）残匪300多人，在惯匪唐玉、毕书文的策动下窜进永南旺起一带的深山老林里，重操旧业，干起了烧杀抢掠的勾当。这群丧心病狂的匪徒，勾结地主和一些反动势力，破坏土改，侵扰百姓，成为永南山区的一大祸害。

吉林省军区游击部队，在永南县开丰武工队、桦甸县大队的配合下，在松花湖畔张家湾消灭了“长白军”匪帮200余人，活捉匪首唐玉。毕书文和百余漏网残匪，钻进了万字河（现胜利村）一带的深山里。1948年5月，毕书文匪帮在我三面收缩包围的情况下，被赶上了大顶子山。大顶子山，山高坡陡，森林茂密，毕书文匪帮妄图以此为据点，继续与我为敌。吉林省军分区司令员周保中下了命令，剿匪部队务必全歼毕书文匪帮，不使一人漏网。剿匪部队决定采取武力震慑和政治劝降相结合的策略对毕书文发动新的攻势，全部彻底消灭这伙残匪。

剿匪部队进山前，在江东康大砬布下一个营，防止匪徒偷渡松花湖向蛟河逃窜，桦甸常山一带由县大队设卡，防备匪徒向南逃窜。北面是松花湖无路可走。我大部队由西正面进剿。兵力部署就绪后，按事先准备好的名单，我军把山下所有通匪分子全部拘留起来，使山上土匪失去了耳目，断绝了粮食接济。接着，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部队开始攻山，突击部队接近了毕书文匪帮，匪徒不战而退纷纷龟缩到东山的监视哨里。监视哨是日伪修筑的防空观测台，这里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唯一通向山下的羊肠小道，荆棘丛生，

易守难攻，毕书文妄图凭险据守，做最后的挣扎。但毕书文到此之前，想也没有想到，这里与外界隔绝，唯一一条下山之路已被我军死死封住，毕书文已走到了绝境。

剿匪部队把匪帮围住后，并没有立即攻击。因为这里山路狭窄，大部队行动受限制，强攻必然会出现伤亡，因而我军决定采用围而不攻，待敌粮尽士气低落时，再待机行动。为了打探土匪虚实和探求政治攻心的可能性，我剿匪部队决定派人上山进行试探性劝降。第一次，派去了被我逮捕的通匪分子、伪警察林景春上山。毕书文怕军心动摇，拒绝与林景春见面，叫手下人把林狠狠揍了一顿放下山来。并传出话来，谁再敢提投降的事，就地枪决。林景春一瘸一拐地回来了，说山上已断粮，匪徒饿得面黄肌瘦，但他们又害怕投降后难以活命。对毕书文这个人我军是了解的。他曾是我抗联二军的团长，后叛变投敌，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东北光复后，毕书文在安图大甸子占山为匪，1946年3月被我军收编为安图县大队，任大队长。6月因为勾结敦化县土匪、妄图推翻我民主政权被我逮捕，后乘机脱逃。9月毕在安图、敦化网罗100多名匪徒投奔国民党被编入国民党“长白军”任营长。这个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坏蛋，自知罪孽深重，哪肯投降，这是预料中的事。但凭他心黑手狠的本性，并没有杀林景春，说明他心存畏惧，还不想把事做绝。经过反复分析后，我军决定派人第二次上山。这次去的是我开丰武工队副队长李顺庆和被俘的土匪冷少彦。冷少彦原来是唐玉手下的军需主任，没少干坏事，因其投降得到了优待。带冷少彦上山就是让他现身说法，使土匪相信我军的俘虏政策。李顺庆上山后，毕书文命土匪摆出刀出鞘、弹上膛的阵势，企图以此震住李顺庆。李顺庆哈哈大笑：“你们别装模

作样了！我军的包围密密层层，连个兔子都钻不出去，何况活人。放下武器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匪首毕书文怕军心动摇，不再听他讲话，一摆手：“谁再劝降，别怪老子不认人！”李顺庆借机接过话茬说：“你不想活，别人还想活呢！”接着他以冷少彦为例，讲起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一些匪徒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收起了手里的刀枪。毕书文见状勃然大怒：“捆起来！”，几个匪徒慢腾腾地把李顺庆绑了起来。李顺庆大义凛然，怒斥匪首：“你不要绝了自己的后路，不要说攻山，就是困而不打，你们就得活活饿死。”

“我死一个有你们百八十人作垫背的也值得。”毕书文的干儿子上来小声对毕书文说：“两军交战，不杀来使，不投降就不投降。不能留个不义之名，让人指骂！”毕书文瞅了瞅他，哼了一声：“今晚，先押在这儿，明天再说。”这样，李顺庆就被扣了起来。当夜，几个土匪悄悄解开了捆绑李顺庆的绳索，随同李顺庆一起下了山。二上大顶山，虽没说动毕书文，却动摇了匪首的军心，瓦解了敌志。

第二天，李顺庆又带十几名战士伪装成群众，挑着饭菜，送到监视哨下面的一块大方石上。山上的土匪认出了李顺庆，一些人偷偷溜下山来。这些人看着饭菜，馋得直流口水，却都不敢动筷。李顺庆明白匪徒的心思，就从盆里盛点饭菜吃起来。匪徒们见状才盛起饭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李顺庆插空儿向他们讲解解放战争的形势，区分了首恶与胁从的关系，劝他们放下武器，悔过自新。吃饭的匪徒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各自打好了主意，脸上渐渐露出了信任神色。当晚，又有一些土匪下山投降。毕书文的两个干儿子也背着冲锋枪，腰里别着手枪下山投降了。

毕书文眼看大势已去，手下的土匪越来越少，连自己的

干儿子都跑了，自知再难相持下去，于是便和我军相约，准备体面的投降。毕书文提出让部队首长周保中（毕在抗联时认识周保中）在山下接见，双方议定，谈判时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毕书文老奸巨滑，曾在我军当过团长，深知我党的政策，怕一旦落入我军之手，性命难保。所以坚持要与周保中见面，想亲耳听到首长保证他活命的许诺。这次谈判是在监视哨下的大石头上进行的。我军由孙参谋长的警卫员装扮成首长，在两名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谈判地点。在附近的树林里，我军隐蔽了一个骑兵排以防不测。谈判开始了，毕书文见来人不是周保中，一时拿不定主意，先说上回抓李顺庆，是一时糊涂，请大军不要介意。东拉西扯，以此拖延时间，搜肠刮肚地寻求对策。李顺庆听得不耐烦，几次催促，可毕书文就是避而不谈投降的事。于是李顺庆揭穿了毕书文故意拖延、心无诚意、想要花招的诡计，起身装出要走的样子。毕书文一见急了，手慌忙向袖筒里掏去。毕书文的小干儿子十分熟悉毕书文这个动作，知道袖筒里有枪，于是死命与毕书文争夺，同时高喊：“双方规定谈判不带武器，你为什么袖里藏着手枪，你不想活命，我们还想活命呢！”李顺庆命令两个警卫员把毕书文按倒在地，缴获了毕书文藏在袖筒里的一支小型橐子。毕书文杀猪似的嚎叫，死命挣扎还想逃回山上，这时骑兵排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众匪徒面前。毕书文被生擒，其余匪徒也无一漏网。我方派人三上大顶山，终于以生擒梟匪毕书文而告终。

张永生

春蚕吐丝缕缕情

朱光烈县长离开坐惯了的旧木椅，走到东墙下，慢慢地撕下一张日历，在他眼前出现了“1947年10月24日”的字样。他凝视了许久许久，象要把这页日历铭刻在脑子里。随后，他信步来到县政府办公楼二楼的平台上，手扶水泥台沿，俯视着县政府大院、大街对面的银行、商号，以及参差不齐的座座房屋……

此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月光如轻纱，披在他的身上。秋风习习带来阵阵凉意，可他依然穿着在江南根据地时穿的那身黄不黄、白不白的粗布衣裳。在他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平时总是贮满了坚毅的光，而现在，却流露出那么一股股惜别的柔情……

屈指算来，朱县长到磐石县已经两年了。两年来，他踏遍了磐石县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多少张熟悉的面孔，多少次激烈的战斗场景，平时因为忙，来不及细细品味，而今却牵动着他的缕缕情丝，勾引起他多少难忘的回忆。明天，他就要离开这熟悉的一切，奉命到县城去接受新的任务，这怎么能不让他留恋……

他忘不了1945年10月26日这一天。就是这一天，他从山东东海支队65团副团长的位置撤下来，带一个警卫班，来到磐石县组建民主政府。他组建了10个区政府，建立起县大队、区中队。1946年2月8日，他被选为磐石县第一任县长。当时磐石县境内土匪蜂起，匪络趁县内混乱之机，到处危害百姓。面对这种情况，这个全县的“父母官”睡不着觉了。他连夜开会，布置剿匪任务。他带领人首先消灭了匪首“滚地雷”、震慑了各匪络，使磐石县城的社会秩

序初步稳定下来。紧接着开展反奸除霸运动，没收敌伪财产，恢复金融事业，组织中小学校复课……

1946年四平保卫战开始时，他一方面组织民夫、大车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又带领全县做战略转移。1946年5月27日，他最后撤离磐石县城，到江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947年5月末，朱光烈又率领部队打下磐石，使磐石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磐石解放后，政府以他的名义发了几个布告，没收了敌伪财产，接管了万增源烧锅、源茂东和三合油坊。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

这一宗宗，一件件大事，此刻总在他的脑子里萦回。在那段日子里，他每天睡得很少，有时通宵达旦。可他总认为自己的工作干得太少、太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就为他总感到遗憾……

他带着这种心情慢慢地从二楼平台上走下来，刚下楼梯，眼前的情景使他怔住了，原来在一楼的走廊里，站满了等候他的人。见此，朱光烈县长忙快步走下楼梯，嘴里连连地说：“让大家久等了，久等了，看看，来了就到办公室嘛……”

“你太忙，不打扰你了，可大家又总想看看你……”三合油坊的一位青年工人抢先回答。

这时县政府事务秘书郭集仁赶来，朝大伙说：“大家到小会议室坐吧，和朱县长好好唠唠！”朱县长边说边在大伙的拥簇下，走到小会议室。

在小会议室的把头，郭集仁首先致了开场白：“朱县长要走了，这几天，县里各界人士、人民群众一伙一伙、一拨一拨地来看朱县长。借这个机会，大伙聚在一块儿，好好和县长唠唠。至于酒会吗，就不要举行了，这个大家都知

道，朱县长是不会去的。”

“对的嘛，大家扯扯，给我提点缺点，大家随便嘛……”

朱县长坐在人们中间，用炯炯的目光深情地扫视着人们。

“若说朱县长嘛，没说的，文武双全。别的不说，单说抓‘滚地雷’吧。这匪头子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他把枪的零部件都卸下来，如外边发生情况，他能一边装枪，一边从容地往外走。走到外面，枪也装好了，这本事够大的了吧。可照样，在寄骨寺抓住了他，在北干沟沿毙了他……”

三合油坊的青年工人又先开口了：

“朱县长不光是文武全才，他还有胆识。一次，国民党军队都进到磐石车站了，他还站在县政府二楼平台上，镇定自若，他是最后一个撤离磐石县城的。他走到城东门，笑着对老百姓说：‘明年的现在我们还会回来！’咋样，一年后咱们县果然得到了解放……”

民政科副科长李文成接过话茬：

“朱县长不光是有胆有识，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记得县政府刚接收时，他怕院内埋有地雷，自己骑马先在院内驰来驰去。大家都为他捏把汗，他见没问题了，才让同志们进到大院……”

城关区区长马达不知何时进来，做着补充。

“咱们的朱县长还挺幽默的呢，”郭集仁一边给大家倒水，一边接着说：“一次，我穿了一双锃亮的牛皮鞋，朱县长一进屋就对大家说：‘大白天谁把电灯点着了？’我们四处一看，也没点灯呀！看看朱县长眼盯盯地瞅着我脚上穿的皮鞋，我的脸红了，原来是我穿的皮鞋呀……”“哗”的一

下，在场的人全笑了，小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热烈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听不出个数，朱光烈几次想开口都找不到机会。在墙角，三合油坊的一些人，硬是不顾郭集仁的劝说，要在明天给朱县长举行酒会欢送……

开完了座谈会，朱县长和郭集仁最后从小会议室里走出来。在县政府的大楼门口，一个老大娘急忙从地上站起来，一把拉住朱县长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朱县长，恩人呀，听说你要走了，俺拦不住你，俺没啥送的，这点煮鸡蛋，你留在道吃上吧……”

“老大娘，您留着自己吃吧……”

“恩人呀，若不叫你，俺媳妇早叫‘滚地雷’给祸害了。你不收，俺心不安呀，你实在不收，我就不走……”

朱光烈望着满头白发的老人，望着满篮子的熟鸡蛋，心里真是热呼啦的，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接过篮子后，在老郭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什么。小郭就呼呼地跑上楼去，不一会儿，拿来了一个报纸包，包里包着八尺白布。这是朱县长的爱人给他买的，总催他做件上衣穿，可我们的朱县长总是舍不得做！

“老大娘，这布给你做衣服穿吧……”

老大娘还想推托，朱县长硬是塞给了她。然后，朱县长对老郭下了最后的一道命令：

“把老华头找来，用马车送她回家……”

直到望着马车走远，朱县长才慢慢地走回县政府大院……

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白时，朱县长已坐在了昨晚老大娘坐过的那辆马车上，照样由老华头赶着车，奔上了磐桦公路。为了不打扰群众，他绕道去吉林市到省政府报道。

等人们知道朱县长走了的消息后，都后悔不迭，一个个红着眼圈儿说：“朱县长走了，走了……”

“我们的朱县长走了！”

申忠俭

肖明亮雪夜炸电塔

1947年1月，在东北大地上，炮声隆隆，喊杀阵阵，我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着。为了牵制敌人，配合我南满部队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总指挥部吉林军区下了一道密令：炸掉丰满电站向沈阳方向输电的铁塔，并强调准备工作要周密，行动要迅速，必须坚决完成任务。吉林军区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吉南军分区，吉南军分区指定由吉蛟大队派人完成。

松花湖畔，白雪皑皑的山峦把白庙子、三道沟一带紧紧地围拢起来，这里正经历着一年中最寒冷的岁月。我吉南军分区吉蛟大队，就驻扎活动在这一地区。

1月12日晚7点多钟，在三道沟西山下的一座草房里，吉蛟大队大队长赵希良、政委彭山、副政委马寅和副大队长李同进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接到炸电塔的任务后，他们都深感到这副担子很沉重。丰满电厂是敌人重兵把守的要地，且沿途敌情十分复杂，因此这次任务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必须选派一个智勇双全、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的人来担此重任。几位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吉蛟大队侦察排长肖明亮。

肖明亮是中共党员，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操一口山东口音。他参战时间虽短，却头脑机灵，能打硬仗。担任侦察排长后，在王家岗伏击战、严惩叛徒陈黑子以及在丰满、天岗一带的游击战中，肖明亮带领侦察排打了不少漂亮仗，深受同志们的赞誉。这天他听到大队长要他执行一项重要任务的消息后，乐得一蹦三尺高，忙兴冲冲地来到茅屋中。

“大队长，有什么任务，快跟俺说！”一进门，肖明亮就迫不及待地问。

大队长赵希良把手放在肖明亮的肩头，深沉地说：“肖明亮同志，上级命令我们炸毁丰满往沈阳输电的铁塔，我们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记住，这个任务十分重要，你们必须完成。所以在行动中你一定要胆大心细，遇事沉着。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大队长，你说什么时候行动吧！”肖明亮满有把握地问道。

“这次任务很重大，你们要好好准备，明天你先挑选几个精明强干的战士，由他们和你一同执行任务。对了，吉南军分区还特意派了两名爆破手来配合我们行动。你们要好好休息一下，14号开始行动，切记要十分慎重，做到万无一失。”

看着赵大队长严肃的神情，肖明亮也深感到这次任务不同寻常，必须要考虑周全，不容失手。

这一夜，那间草房中的油灯一直亮着，直到天将破晓。

肖明亮回到侦察排后，他马上挑选了郑家凤、邢绍德、张洪权3个战士，连同军分区派来的爆破手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然后大家分头去做准备。

1月14日（阴历腊月二十三）的中午，大队领导特意在部队设宴为肖明亮等人饯行。饭后，肖明亮一行6人来到门外。赵希良等领导和大家一一握手，他十分郑重地说：“同志们，这次炸电塔的任务是十分光荣而艰巨的，完成得好，对于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顺利进行将是一个极大支援。因此，你们要团结一心，不论在途中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小心谨慎，一切以炸电塔为重。同志

们，我们在这里等待你们凯旋归来。”说完他举起右手，庄重地向大家敬礼。

“保证完成任务！”肖明亮等6人异口同声，满怀信心地回答。

“好，出发！”肖明亮一挥手，6个人分乘两架马爬犁，在茫茫的暮色中扬鞭启程了。

天渐渐黑下来，不知什么时候空中飘落起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呼啸的北风中旋转飞舞着。肖明亮等6人扮成农民模样，每3人乘一张马爬犁，爬犁上除了各自的武器外，还放着两大麻袋炸药。

6匹马踏着积雪拉着爬犁飞快地向前奔驰着，工夫不大就快到王家船房了。这里是土匪张冠三的领地，同志们一个个都握紧枪，密切注视着周围动静。眼看到了王家船房，忽听前边有人喊道：“站住！干什么的？”紧接着就是“哗啦……”拉动枪栓的声音。要在往日，肖明亮早就手枪一挥冲过去了，可今天不行，他想到赵大队长临行前的嘱咐，一切要以炸电塔为重，如果硬冲肯定要交火，这里距丰满不远，枪声传到那里，敌人必然会有所警觉。想到这里他马上命令爬犁调头往回返，还没走几步，就听身后“啪啪啪”地响起了枪声。郑家凤（外号大愣）一听枪声就想回身反击，肖明亮一把抓住他：“不行，咱们不能和他们纠缠，那会因小失大的！”跑出一段路后爬犁停下来，肖明亮和大家商量：土匪这一阵乱枪，必然会让丰满守敌有所防备，今天咱们就是绕道过去，执行任务肯定也会有困难。我看咱们找个地方歇一宿，明天再来。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马爬犁掉头向富太河方向奔去。

富太河位于二道沟和三道沟的交界处，吉蛟大队常在这

里活动，因此有很多关系户。他们来到堡垒户李大爷家，李大爷一见非常高兴，忙着张罗包饺子给同志过小年。可肖明亮等人因为出击受阻，哪有心思吃饺子、过小年啊！他们谢过李大爷，草草吃过晚饭后，便又聚在一起研究起行动计划来。

肖明亮掐指一算，前面还要经过三家子、海浪、将军沟、三道砬子、黄沙岭、孟家沟等屯落，这些地方不是有土匪就是有地主武装活动，如果再遇到麻烦，那就要耽误更多的时间了。

“排长”，邢绍德慢条斯理地说，“我看咱们干脆避开这些屯落从湖上走。这冰天雪地的，那些土匪家丁肯定不会到那地方去受罪。”

张洪权说：“咱们还可以搞点伪装，把爬犁和人都用白布裹上，那敌人就不会轻易发现我们了。”

大家听了纷纷点头，觉得这主意挺不错。第二天傍晚，他们反穿上羊皮袍子，驾着用白布裹着的爬犁出发了。这次他们不走村屯大路，而是折到松花湖的冰面上走，果然一路平安，8点多钟就快到距丰满仅10多里路的猗猗沟屯了。

肖明亮命令大家先歇着，自己前往村口侦察一下。他还未走近屯子，使远远看见在屯口的路边，几个伪自卫队员正抱着枪、缩着脖烤火呢！怎么办？绕路走要耽误时间，硬闯又不行，肖明亮眉头紧皱，苦苦思索着……哎，有了，就这么干！他忽然想起个好主意，便马上折回去向同志们做了行动部署。

雪还在下着，几个伪自卫队员正抱着枪在火堆旁跳脚取暖呢，忽然见两张爬犁飞驰而来，还未等他们醒过腔来，爬犁已来到近前。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刚要张口，只见郑家风

猛地跳下爬犁，不由分说冲他就是两个大耳光：“他妈的，你们就这么站岗，还不如回家睡觉去！”

几个耳光打得这家伙晕头转向，猜不透来者是干什么的。另一个队员赶忙上前赔不是，又虚头巴脑地问：“不知兄弟是哪一部分的？”

大愣瞪着眼珠子冲他叫道：“你们管得也他妈太宽了，老子是哪部分的还得向你们报告？”

邢绍德这时忙插嘴：“行了，少罗嗦，快去叫你们的头来。”

那家伙揣摸着这帮人的来头不小，赶紧乖乖地回去报告。

不一会儿，村里的何保长、马牌长迎了出来。这俩家伙也没敢多问便忙着把肖明亮等人请到家中，又是让坐，又是端茶，连大烟枪也支上了。肖明亮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清清嗓子说道：“二位不必客气，兄弟们是丰满谍报队的，来这附近执行一项紧急公务……”何保长一听，谍报队可惹不起，于是更忙着献殷勤，还吩咐下边炒菜、烫酒，要留他们吃饭。肖明亮一想不能再耽误时间，便忙推辞：“兄弟这里先谢谢了，只因公务紧急，这饭来不及吃了。待公务完成，一定有劳何保长。”何保长一见不便强留，便点头哈腰地把他们送出门去。肖明亮边走边很神秘地对何保长说：“何保长，兄弟们这次可是执行重要任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讲。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走漏风声，何保长，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何保长忙点头保证，“那是那是，兄弟一定关照下边严加保密。”他们一直送出屯口，肖明亮等人顺利通过了猗猗沟屯。

过了猗猗沟，他们快马加鞭很快到了黄沙岭下，这里距

丰满只有几里路了，为了缩小目标，肖明亮命令大家把武器和炸药从爬犁上卸下来，然后把马爬犁寄放在肖明亮相识的一个老乡家中，大家扛着炸药小心地向前进发。翻过一座大山岗后，他们来到了堡垒户魏大爷家。魏大爷一见肖明亮等人十分高兴，马上招呼大家进屋。肖明亮拉住魏大爷的手说：“魏大爷，我们不能在这里多停留，还有重要任务呢！”接着把来意告诉了魏大爷。魏大爷一听他们要炸电塔消灭遭殃军，大手一拍，“嗨，这一带我都熟。快过来我给你们说说。”于是大家围拢过来，听魏大爷把去铁塔路上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这前面大道上有个吴家大院，里面住着 20 多个国民党兵，过去时可得小心点儿。还有哇，他们也怕咱们派人来，从大坝一直到这些送电的铁塔都派了不少的人看着，你们要炸的那个电塔旁边还有敌人的一个炮楼，天天有个家伙抱着枪在那里晃悠……”听了魏大爷的介绍，肖明亮等人又皱起了眉头，这吴家大院我们可以绕过去，可敌人的哨兵却有些不好对付，万一让敌人发觉，只要枪声一响，要完成任务可就困难了。魏大爷也为难地说：“这大雪天，人一挪步就把雪踩得‘吱吱’响，不用说靠近前，就是离老远也能听见动静啊……哎，肖队长，我看你们还是脱了鞋去，那样动静还能小些。”

“脱鞋？”肖明亮有些犹豫，这零下 20 多度的大冷天……可不脱鞋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大家纷纷说：“排长，脱就脱吧，完成任务要紧。”这时魏大爷转身出去，一会儿披着一身雪花转了回来，手里捧着一堆乌拉草，“来，你们脱下鞋，用这乌拉草把脚裹上就没事了。”

肖明亮一看这主意不错，便和大家一起脱了鞋往脚上裹乌拉草。可怎么才能把它裹住呢？有的同志要撕棉衣衬里儿

作包脚布。魏大爷忙拦住：“那不行，这么冷的天不穿鞋，上边再不暖和点，可要冻坏了。”说着他站起身走到炕边，把家里仅有的一床棉被扯过来，“撕拉”一声撕成了两半。肖明亮一见赶忙过去阻拦：“魏大爷，这可不行，咋能撕被子呢？”

“咋个不行？”魏大爷脸上的神情十分严肃，“你们为了老百姓流血牺牲，我老魏头撕个被子有啥不行的？快，啥也别说，完成任务要紧！”他边说边动手把被里撕成几块，并挨个给大家把脚包得严严实实。肖明亮和战士们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看着魏大爷做着这一切，他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等给大家都裹扎好了，魏大爷直起腰来，“行了，这回走个10里8里也没事了。”他的眼里流露出一种欣慰之情。

肖明亮过去紧紧握住魏大爷的手：“魏大爷，太感谢你了！”

“哎，谢什么，今儿个我老魏头也不睡觉了，就等着听你们炸电塔！”

肖明亮退后一步，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您放心，魏大爷，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说完便带领战士们隐没在风雪之中。

为了不被吴家大院的国民党兵发现，他们避开大路，走沟塘、钻柳毛子，不时地匍匐下来观察周围的动静，终于摸到了电塔附近。肖明亮示意大家停止前进，自己则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天阴沉沉的，在白雪的映射下，影影绰绰看到通往大坝的路上有几座碉堡。敌人好像都睡了，不见一丝光亮，周围一片寂静。输电塔在前面五六十米处，距电塔不

远果然立着一个岗楼，却不见敌人的哨兵。肖明亮一摆手，大楞郑家凤点头会意，悄悄地向岗楼摸了过去。大家紧盯着大楞的身形，只见他慢慢接近了敌人岗楼，人影一闪就不见了。肖明亮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恍惚听到“噗通”一声，紧接着就见大楞向这边跑过来。待他来到跟前，肖明亮忙问：“大楞，怎么样？”

“行了，我把哨兵干掉了，还真亏魏大爷的包脚布，一点声都没有。”大楞激动得直喘粗气。原来他摸到岗楼前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人影，于是他小心地转到岗楼后边，这才发现一个国民党兵正抱着枪在避风的屋角打盹呢！大楞这次可一点不愣，他先仔细地看看周围，确实没人，这才小心地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紧握在手中，然后一步一步朝哨兵摸过去。包了乌拉草的脚踏在雪地上仅发出轻微声响，可大楞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敌人会被惊醒。庆幸的是那哨兵一直在打唿噜，对这些全无察觉。等大楞来到哨兵近前时，握手榴弹的手都冒了汗。他轻轻地长吸一口气，把右手在衣襟上擦了擦，然后举起手榴弹照着敌哨兵的脑袋猛砸了下去。这一下是又稳又准又狠，那哨兵哼都没哼一声便通的一下顺墙倒了下去，大楞又向四周看看，依然静悄悄的，这才回来向肖明亮报告。

肖明亮见前进障碍已经扫除，便用力一挥手，大家扛着炸药悄悄向输电塔摸去。眼看着电塔就在眼前了，忽听肖明亮低声叫道：“别动！”大家都吃了一惊。待顺着肖明亮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敌人在电塔周围设了电网。大家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及时停下来，那可就误了大事了。可是怎么对付电网呢？肖明亮略一思索：“老张，你去找几个树枝木棍儿来。”张洪全悄悄地向岗楼走去，转了一圈找到两

根本棒子。肖明亮接过木棒，两个人小心地把木棒伸进电网用力别着，终于在铁丝网上别出了一个洞来。战士们先把炸药送进去，然后再小心地钻过去。输电塔就在眼前了。只见这电塔有十多米高，四支角钢支撑着这个庞然大物。在爆破手的指导下，大家把每包20多斤的炸药紧紧捆在4个支脚上，把导火索拉出来系到一起。肖明亮命令大家先退出铁丝网，然后掏出火柴，“嚓”地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哧哧”地冒着烟迅速燃烧着，肖明亮镇定地钻出铁丝网，然后便飞跑起来。他刚刚跑出五六十米，便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巨响，爆炸的火光、输电线路发出的电弧光把大地照得通亮，接着就见那高大的铁塔哗啦啦地倾倒下来。

剧烈的爆炸声惊动了碉堡里熟睡的敌人。这些家伙一时也摸不清情况，还以为有共军来袭击，便慌慌忙忙操起枪从射击孔中胡乱射击起来，顿时，机枪、步枪响成一片，冻土地上流弹横飞，雪雾弥漫。

肖明亮等人见任务已经完成，便一路急奔来到黄沙岭，取出爬犁，在敌人的阵阵枪声中，扬鞭催马胜利凯旋了。

徐荫本、王立新

张文彬智保发电厂

1948年3月8日，往日耀武扬威、驻守丰满的国民党军队，此刻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只见他们进进出出，紧张忙乱地收拾行装、烧毁文件，傍晚又炸毁了弹药库，一副惶惶不可终日样子。原来，近日我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见吉林孤城难守，便命令驻扎吉林市的六十军在3月8日撤往长春。

夜幕降临了，喧闹一天的丰满发电厂显得格外宁静。这时，在电厂配电盘运行值班室里聚集着许多人，有技术员张文彬、工人徐玉珊、刘国珍、姜树怀等。这一天正好是张文彬担任值班长。回顾白天看到的情景，大家议论纷纷：“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就要攻占吉林了。”一个工人说，“可不是，你没看到这些当兵的忙着收拾东西，八成是要撤了。”另一个接着说。张文彬在一旁听着大家的议论不禁想到，看来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象这样的祸国殃民的党和军队，也早该垮台了，不然就别想过舒心日子。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谈到兴头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马达声由远而近。怪了，这么晚了谁还到电厂来？大家狐疑着涌到窗口向外一看，只见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嘎”地一声停在厂门口，从车上乱哄哄挤下六、七个国民党兵闯进了电厂，并堵住了配电所的大门。为首的是个大个子军官，手里拎着驳壳枪晃来晃去。看到眼前的情景，张文彬和工人们心里一阵发紧，这帮家伙荷枪实弹的，到底要干什么？原来六十军在即将撤退时，接到蒋介石的特急密令，要他们炸毁丰满电厂，给共产党留下一片废墟。这群国民党兵就是来执行炸厂任务的。

门被踢开了，三个国民党兵端着冲锋枪闯进屋里，又有两个士兵把一箱手榴弹抬了进来，接着那个大个子军官也走了进来。他先挨个打量了一下在场的人，然后抬起驳壳枪，冲着枪筒“噗噗”吹了吹，这才张口问道：“你们这谁是领头的？嗯？谁管事儿？”没有人回答。军官火了，眼睛一瞪，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妈的，你们可别给我装哑巴，快说，谁管事？”张文彬看着地上的手榴弹，心中一动，于是上前一步说：“我是值班长，有事冲我说吧！”军官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张文彬，然后一挥手：“好，你留下，别人都给我出去！”工人们被国民党兵用枪逼着走出了配电盘值班室。张文彬预感到敌人有阴谋，便对向外走的工人们说道：“都出去吧，告诉水泵厂的人也都出去，一个也别留下。”待工人们走后，那个军官向张文彬亮了底牌：“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来炸电厂的，你领我们走一趟，把重要的地方都告诉我们，别的事不用你管。”说着又掂了掂手里的枪：“你可给我老实点，要是跟老子耍滑头，老子这枪……”听着大个子军官的话，张文彬心中一沉，果然不出所料。他立即想起当初日本鬼子垮台时就要炸毁电厂，由于工人们英勇斗争，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可今天国民党又要炸毁它……张文彬真是越想越气愤。他心里明白，丰满电厂最重要的除了大坝，就是发电厂，若把发电厂炸毁，让敌人阴谋得逞，作为丰满电厂的工人，如何向江城父老交待？不能，决不能！可是眼下怎么办呢？张文彬皱了皱眉头，忽地灵机一动。他从那个军官的问话中看出，他对电厂的内部结构、要害并不熟悉，是个“白帽子”。于是便故意领着他在屋里转圈子，可是转了没几圈，大个子又急了。原来这家伙深怕耽搁久了会受到上司责备，更怕拖延了时间被大部队落下，让

共军包了饺子，于是便恶狠狠地用手枪指着张文彬说：“好小子，你他妈跟我穷磨蹭！快说，你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想活就快点告诉我哪块儿重要？”张文彬看着这家伙气急败坏的样子，心中一阵好笑，好吧！我指给你一个十分重要的“要害”。于是他装着很认真的样子对大个子军官说：“好好好，长官。咱们这就到最重要的地方去。”说着他把敌人带到配电盘前，指指点点地说：“这里是中央控制室，把它炸掉了，发电厂就全完了，再也别想发电了。”敌人看着配电盘上各式各样的开关、仪表、红绿灯……信以为真。于是那个军官命令士兵扔手榴弹炸。一个士兵操起一颗手榴弹掷了过去，不料却被配电盘钢板反弹回来，吓得这帮国民党兵慌忙卧倒，“轰隆”一声，手榴弹爆炸了。等烟雾散尽，张文彬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刚才投弹的那个士兵被炸伤了腿，而配电盘安然无恙。大个子军官一看火了，爬起来上去就是一脚：“你他妈是干什么吃的，真是废物！”说着气哼哼地亲自把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开导火索甩过去。巨响过后，配电盘的铁门被炸了一个洞，同时还炸坏了一块电力表和玻璃罩。为了不使设备遭到更多的破坏，张文彬趁这帮家伙躲避之机，钻进厂配电室一脚踢开了继电器。顿时整个工厂一片漆黑。厂用电一停，排水泵停止运转，一号、四号水轮发电机底部被淹。趁着烟雾未散，张文彬大喊：“这下发电厂被炸坏了，大家快跑吧！一会儿大水就冲进来了！”边喊边跑了出去。愚蠢的敌人在烟雾中一边喊着“值班的”，一边跌跌撞撞地摸到门口，见整个工厂一片漆黑，以为发电厂已被破坏，便对站在门口的工人说：“没你们的事了，都回家去吧！”然后转身登上了吉普车扬长而去。

敌人走后，工人们一下围到张文彬身边。张文彬把事情

经过说了一遍。工人们都十分高兴，纷纷称赞张文彬智谋过人。正当大家准备进屋检查一下设备时，吉普车又转了回来。没等车停稳，那个大个子就从车上窜下来，不由分说，一把抓住张文彬的衣领破口大骂，“他妈的，你敢哄骗老子，老子非毙了你不可！”原来他们炸坏配电盘后，便打电话向吉林六十军司令部邀功请赏。可刚讲几句，话筒里就传出来怒骂声：“混蛋，这里的电灯还亮着呢！我告诉你们，不把电厂炸掉，我把你们统统枪毙！”大个子一听，顿时恼羞成怒，马上带人乘车回转电厂找张文彬算帐。看着大个子军官穷凶极恶的样子，周围的工人都为张文彬捏了一把汗。可张文彬并不慌忙，他一本正经地对大个子说：“长官，你先别急，你把发电的地方炸坏了，有点存电还能点一会儿呢！”为了继续蒙蔽敌人，他把敌人引到往吉林送电的线路前指着变压器说：“毛病就在这儿，它能存点电，再点一会儿就没有了。”那个军官哪里等得及，马上命令士兵用手榴弹炸毁了变压器，瞬间，吉林市的电灯全部熄灭了。愚蠢的敌人以为这下可算完成任务了，便纷纷跳上汽车仓惶逃走了。

丰满发电厂保住了。望着敌人逃窜的背影，再看看眼前高耸的大坝和基本完好的厂房设备，张文彬和工人们欣慰地笑了。

王立新

好大夫——刘治安

刘治安，于1891年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法特乡法特村的一个郎中家庭里。少年时因家境贫寒，只读两年私塾就失学了。父亲刘风云是位老中医，见到孩子求学无门，便领着儿子边学文化，边学医术。

刘治安少年时聪明伶俐，父亲教医时，他才12岁。他好学上进，努力钻研，15岁时便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20岁时便能独立行医，30岁名声大噪，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于是他的事业发达，家业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名医。

1945年12月，舒兰解放了，刘治安与共产党、八路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热心地、无私地为八路军伤病员治病，决心跟共产党走到底，因此受到人们的信赖和称赞。

1955年，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刘治安毅然来到舒兰县城做整骨医生。为了振兴农村的卫生事业，他听从组织分配，后被调到舒郊乡卫生院工作。他把自家的祖传秘方毫无保留地无私奉献给党的医疗事业，为祖国医药宝库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1956年以后，刘治安被推选为舒兰县第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一直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刘治安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从此一病不起，于1978年不幸逝世，享年87岁。1986年他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刘治安的一生有着许多动听的故事。

失学务医

12岁的刘治安，手捧着心爱的书本，站在父亲刘风云的

面前哭诉着：“爸爸，我要上学，我要读书……”

父亲闭着眼睛，依在炕头墙壁上一声不吭。半晌，低声而深沉地说道：“安儿，别念了，咱们家交不起学费呀！”

刘治安依在父亲的身上，呜呜地哭起来。父亲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道：“安儿，别哭了，你跟我学医吧！边学文化，边学医，长大了好给穷人治病！”

刘治安抬起头，看着父亲认真地恳请道：“那你得教我！”“行！行！我教你，我一定教。你一面读书识字，一面学习医术，边学边看，边试验，你一定能学会的。”父亲接着说。

刘治安乐了，他找来了别人用过的纸和笔，同父亲认真地学起来。

刘治安读过两年私塾，加上他聪明伶俐，学习起来不算困难。他每天早起晚睡，孜孜不倦地读书、学字、练字、画骨骸图形，他越学越感兴趣，越学越愿意学。父亲见他肯学，就经常鼓励他，加倍地教他。

刘治安学习整骨兼治伤筋和内伤，既学医又练字，做到了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习效果非常好。他对骨骼形状和各部位块数掌握得特别清楚，记得牢靠。人体各种组织器官受伤，人体四肢与脏腑及关节伤，什么是创伤，什么是挫伤、内伤、筋伤、经络伤，他记得明明白白。治伤时，遇到是否伤气血、脉道不通、气机不顺、血流受阻、呈现肿胀的情况，他都坚持血不活瘀不去则骨不能接的原则。药品配制上，他受其父传教，自己亲自动手，亲自配制，药位要全，药量要足，制剂要精，使用时个人心中有数。

由于刘治安好学上进，刻苦钻研，15岁时就成了其父得心应手的助手，深得其父的喜爱。刘治安学到了文化，学

会了医术，终于爱上了整骨治伤这一行。

给贫苦人治病不要钱

刘治安在同父亲学医过程中，亲眼看到一些穷人有了病没钱医治，痛苦呻吟、悲泣万状，太苦了，真是可怜之至。他下决心学好医术，救济穷人。经过四、五年的艰苦努力和医疗实践，20岁时刘治安便能独立行医了。

在刘治安行医过程中，有的患者被用担架抬来；有的患者被用车拉来；有的被人扶着来；也有的急重患者进屋就喊“救救我呀！救救我！”有的患者呻吟不止，痛苦万状；有的患者愁眉不展，泪流满面……。刘治安劝说者，安慰着。他沉着镇定，逐个细心检查，精心治疗。他手法灵活，动作麻利，复位准确，用药适度，效果显著。当处置完毕，患者立刻转忧为喜、满面笑容，高兴而归。

一些贫苦患者无钱交药费，没等开口，刘治安便说：“我给贫苦人治病，向来不收钱，你们回去安心养病吧！”一席话说得患者及其家属心里热呼呼的，他们含着感激的热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刘大夫的家。

路途遥远的患者，有的起早来，有的贪黑到，一进屋刘大夫就问：“你们没吃饭吧？赶快做饭！”就这样，周围三、五十里的，一提起刘治安大夫，无村不知，无人不晓，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还是共产党、八路军好

1945年12月初，田松部队挺进舒兰县境内，在白旗屯遇上舒榆两县的治安队的阻击，经过激战，我军攻占了白旗屯，敌人惨败而退。在交战中，田松部队也有些伤亡。

晚11点钟，几名伤病员由担架抬着来到法特村，找刘治安大夫治疗。刘治安二话没说，赶紧检查伤情，精心医

治、消毒、复位、固定、包扎、内外用药。不几天，战士们都出院了。部队要付药费，刘大夫说啥也没要。战士们非常感激，只好敬谢而归了。

而刘治安大夫一家人也都深有感触地说：“这几个八路军战士真好，说活和和气气的，举止言行和蔼可亲，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保证能打胜仗！”

刘治安则在屋里合拢着双手叨念道：“愿上帝保佑，主保佑，保佑这样的军队打胜仗。”这以后，县武工队长武传厚、法特区长李振华、桦江支队陈大队长、于队长等经常到刘大夫家与他谈心，讲解革命道理，还经常在他家开会，研究打国民党中央军和斗地主分田地等问题，吸收刘治安参加会议，让他帮助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献策。刘治安对共产党真是服了。

刘治安说：“共产党是咱们的好领导，咱们全家一定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到底！他们说话在理、算数，说得到，做得到。”他常祈祷：“我的主，万事托共产党，人民才能幸福安宁。”

给民主联军伤病员治疗

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松江支队参加了我军三下江南战役。在解放其塔木、德惠、九台等地的战斗中，不时有伤病员辗转各地。由于治疗抢救不及时，给伤病员带来很大痛苦和危险。

刘治安看到此情此景。出于对子弟兵的爱护，毅然决定，救死扶伤，抢救伤病员。

刘治安和其长兄刘振明合计：成立临时医疗站，并把家里作了重新安排。

刘治安和刘振明担任主治医生，他的儿子刘永祥和侄子

刘永喜作助手，妇女们做饭、洗绷布、清理卫生，其他人挑水、劈柴、压药，30口之家，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各负其责，全力以赴。

房舍不够用，就把家里的房屋腾出两间半，两间车棚子搭上板铺作病床。没有火炕的生上炉子，烧得暖暖烘烘的。

伤病员们来到这里，就象回到自己的家。治疗所需药品，如玄羊血、接骨丹、补伤丹、活血丹、虎骨膏、熊油膏等都是他储存多年的珍贵药品，他都命其儿子刘永祥从药库提出来应用。所需中草药，他就命人用脱谷轆子压好、配制。绷带不足，他就叫妇女们把家用的被褥单裁成一条一条的，洗净、煮沸、消毒，然后拿来给伤病员包扎。固定四肢没有板，他就命人把柜子上的板拆下来，锯成小块，做固定包扎用。

伤病员随到随时处置，不分昼夜，不能耽误。轻伤员处置完毕，随时转送到后方大医院疗养。重伤员，如粉碎性骨折、体内含弹片、血管损伤、流血过多、神经损伤、肢体损伤、津液损伤等，一律住院治疗，而且由刘治安亲自检查、抢救、医治。危重患者他还要昼夜守护医治，直至脱离危险方能放手。

从1947年1月至4月，刘治安先后医治了200多名伤病员，长期住院治疗的有四、五十人。所需药品，特别是一些珍贵药品和医疗用品之多，无法计算，而且都由刘治安家全部承担。

东北民主联军松江支队首长要付给医疗费，被刘治安婉言谢绝了。他说：“你们为了解放全中国流血牺牲，命都豁出来了，我这是自家的东西，不值钱，全当尽一份心意吧！”

1947年4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松江支队为表彰刘治安大夫赠匾一块，上写：“感谢刘治安大夫：‘治病救人，舍己为公’，东北民主联军松江支队敬赠，1947年4月5日”，并举行了隆重的赠匾仪式。松江支队班以上干部全体参加，一时彩旗飘舞，鼓乐喧天。除匾额外，还有贺帐十面，牛羊数头。法特区长李振华率领商界、农会、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队伍数百人，长达二里许，浩浩荡荡，盛况空前，围观者达数千人。

张业鸿、刘建伟

模范残废军人金俊太

1919年，金俊太出生在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里。两岁时，母亲病逝。父亲给地主家扛活，劳累成疾，不久也死在床上。从此七、八岁的金俊太开始了沿街乞讨的日子。九岁时，他就开始给地主扛活，经常遭到地主的毒打、谩骂，吃的是残汤剩饭。苦水中泡大的金俊太，在他的记忆中，只有苦难和仇恨。然而艰难的岁月磨炼了他朴实、坚强和勤奋的性格。

1945年12月，舒兰县解放了，全县的劳苦大众翻身作了主人。金俊太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叫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随同解放大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英勇杀敌。战争考验了他，使他更坚强、更成熟了。

在一次战斗中，金俊太的左腿负了伤，由于伤情严重，做了截肢手术，使他终身残废。可是，痛苦和残疾并没有吓倒他，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干革命，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1948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金俊太复员回到了家乡。面对群众和领导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暗暗下决心，要干！要革命！不能躺在国家和群众身上，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一个冬天的早晨，他趁乡亲们不注意，偷偷地拿了工具一瘸一拐地上山割柴去了。天寒地冻，山路崎岖。当他拄着双拐吃力地走到山上时，已经累得快要虚脱了。可无论如何也不能白来一趟！他稍歇片刻，就开始割柴。刚一动手，伤口就火辣辣地疼，冷汗从额上渗了出来。他擦擦汗咬紧牙，又接着割。由于伤口疼的厉害，只好割一会儿，歇一会儿。

用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割了一捆柴。下山的路上，头重脚轻，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到家时，胳膊大腿卡破了皮，血从伤口处一滴滴渗了出来。

晚上，金俊太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白天的事情，心情更加沉重。“老金啊，你这个样子，真的想让人家养活你一辈子吗？”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摸到残废的半截腿，想起复员前部队首长的教导：“回乡以后，生活上可能要有个适应过程，不过要有信心，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应该拿出勇气来，去战胜它！”“去战胜它！”这句话久久回荡在金俊太的耳旁。是啊，在战场上，流血都没怕过，现在却被一条腿难住，这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吗？一个人身体虽然残废了，可革命的斗志不能泯灭啊！

不久，金俊太自制了一个木头假腿，绑在残腿上，扶着炕沿试着走路。刚迈几步，剧烈的疼痛使他昏迷过去，醒来时，只见伤口处渗出了血。他把血擦干净，重新固定好假肢，又扶着炕沿继续练习。几次昏迷，他都是咬牙站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多月过去了，经过顽强刻苦的练习，金俊太终于能抛开双拐迈步了。不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要别人帮忙，而且能下地同大家一起慢慢干活了。流过了多少汗水，金俊太已记不清了，可他始终没有忘的是部队首长的那句话：“在困难面前，要拿出勇气，去战胜它！”是的，他要战胜残疾，战胜软弱，他还要为党工作，为祖国建设出力啊！

1955年，金俊太与三等残废军人金福顺结婚。由于婚后无房，组织上打算给他们盖房。金俊太想，国家目前很困难，如果自己动手盖房，就给国家减少了负担。于是，他选

定了一处废弃的畜舍作为新房的基础，动手干起来。缺坯，就和泥、拖坯，没苫房草，就自己去割。腿上的伤时时作痛，他就吃上镇痛片，咬牙坚持干。砌墙、上房盖、抹灰、搭炕都是他一个人干，每天劳动下来都是一身泥土一身汗。有人说：“你这么拼命干合算吗？”他抹抹脸上的汗笑笑说：“多出点汗少睡点觉没啥，咱可不能给组织上添麻烦啊！”金俊太的房子终于盖成了。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金俊太助人为乐的精神得到乡亲们的一致称赞。一次，一群共青团员为他送来了68捆柴，他说啥也不收。团员们说：“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这点柴禾可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啊！”看着共青团员们的一张张热情诚恳的面孔，金俊太只好收下了。可是事过之后，他又把柴禾一捆捆地分送给了烈军属。他怕人家不收，每到一家，放下柴就说：“这是共青团让我送给你们的。”然后转身就走。

看到金俊太两口子起早贪黑地干，生活还是很困难，政府领导特地为他们送来了粮食和生活用品等救济物资。

晚上，金俊太同妻子商量，“我们只有两口人，这么多东西也用不了，我看咱们还是分给大家吧！”妻子说：“王大妈家最困难，我们先给她家送去吧！”于是，他们又把物资送到王大妈家。王大妈老伴早逝，唯一的儿子牺牲在前线，她只好靠政府救济渡日。看到金俊太他们送来东西，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颤微微地握住他的手说：“我这个孤老婆子已是土埋半截的人了，没想到党和政府不嫌弃我，还有你们这样的好人关心我，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金俊太文化程度不高，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他认准一个理，那就是共产党员在困难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国家和

集体，而不是个人的利益。

1960年前后，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了庄稼的收成，粮食开始短缺，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少数人为了私利，高价抛售粮食、猪肉。此时金俊太已是生产队政治队长，他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气愤，就从自己家最低标准口粮中节约出了140斤粮食，还把自己家养的一头未成令的小猪卖给了国家，以实际行动同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作斗争。党支部以他的模范行为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使全大队顺利完成了节约23000斤粮食的任务，为国家度过难关做出了贡献。

金俊太常说：“是党把我从一名苦孩子培养成一名军人，我如今虽然退伍了，但我还要用自身的余热报效祖国。”1963年5月，当地出现了少有的干旱，生产队一亩半地的水田秧苗逐渐发黄。在采用“以水催苗”育苗方法时，如果不及时解决旱情，秧苗就要全部损失。连着几天，金俊太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天一亮，就拖着假腿到处寻找水源，别人休息他不休息，吃饭时对付一口就走。经过几天奔波，终于在离苗床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泡积水。他立刻兴奋地喊：“水找到了，秧苗有救了！”这个平时言语不多的汉子，此刻恨不得一锹挖出条沟来，让水源源不断地流进田里去。

在金俊太的带领下，社员们纷纷拿起工具，开始挖沟引水灌溉。可是一连干了好几天，旱象还是没有减轻多少。有的人开始发劳骚：“这么干下去，水没引进多少，人可要累死了。”可金俊太呢？他一声不吭，忍着腿的疼痛闷头继续干。社员们感动地说：“一条腿的人都这么干，咱们还有啥可说的！”于是大家又重新振作起来，顶着烈日，奋战了好几天，终于把水引进了秧田，解决了旱情。金俊太忘我的劳动

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誉，他觉得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

1965年，插秧期到了。可天气却异常寒冷，插秧期被迫缩短。金俊太每天早晨两点钟起床，挨家挨户通知做早饭。忙乎完了，自己随便吃点儿饭，就同社员们一起劳动。大家劝他：“你身上有伤，就在家歇着吧！”可他却急了：“我又不是泥捏的，这点伤算个啥？”他干不了重活，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秧苗田里薅苗。腿浸在施有化肥的水里，伤口发了炎，钻心地疼，他也不叫一声。在给伤口换药时，他背着大家，生怕别人知道他的伤情。

第二天一早，金俊太只觉得头昏脑胀，身体象有千斤重。爱人急切地劝道：“病成这个样子，别再去干了！”他说：“我没事，我没事。”挣扎着要起来，可身体却不听使唤，他病倒了。在爱人的照料下，过了好长时间才恢复了体力。

“老金是我们的好带头人，干起活来不要命！”这就是社员们对他的评价。每年秋收时，他都亲自打更护庄稼，稍有闲暇，又为生产队搓草绳。至于割地，打稻子等活他样样都抢着干。有人劝他：“老金啊，你在前线立了功，回家就该享享清福才对啊！”金俊太不爱听这种话，他倔强地回答：“我身残志可没残，怎么能靠大家来养活？”冬天，他顶着风雪拉着小爬犁拣粪，夏天就推着木制四轮车到处跑，从来不嫌脏和臭。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拣粪运动。土地由于增施了优质肥，1964年水稻单产9700多斤，每垧地平均增产了1000多斤。金俊太从1963年到1965年挣了2044工分，等于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收入，实现了“自食其力”的诺言。

1964年夏，金俊太的大女儿患了严重肾炎，他去县民政

局领取了残废金，准备马上送女儿外出治病。在回家的路上，见前边有个人步履艰难地向他走来。他仔细一看，原来是邻村社员冯海彬。“老冯，你怎么了？”他问。可老冯呼吸急促，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看样子病得不轻。金俊太二话没说，赶紧把老汉送进了医院，然后又跑前跑后办理手续。大夫说：“他病的不轻，必须住院治疗。”可老冯所带钱款不足，金俊太就把刚取来的残废金拿出来，帮老冯交了住院费。办好手续后，他又想道，我这一走，老冯连个护理的人都没有啊。于是他就在病床前日夜护理冯海彬。

5天5夜之后，老冯终于脱离了危险，主治医生对金俊太说：“多亏了你，病人才捡了条命啊！你是他什么亲人啊？”金俊太笑着说：“我们是邻村老乡。”听了老金的话，医生护士无不向他投去尊敬的目光。

当金俊太护理冯海彬脱险回到家里时，他的女儿由于抢救不及时，已病死在长春的一个医院里。

金俊太——一个退伍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以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在人们的心中竖立了一座不朽丰碑！

注：金俊太，舒兰县水曲柳镇人，当先过省、市、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6年1月，以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身份出席了全国优抚对象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76年逝世。

陈 鸿 雨

抓特务

当县委领导宣布抓特务有功人员上台领奖时，200多人的会场里顿时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接着，一个身穿灰布上衣、年近三十的中等身材的人，从会场的一侧走上领奖台。他首先向台上挂着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双手接过奖品，频频地向台下致意。他是谁？他就是横道子区区委书记丁维玺。

紧急情况

那是1952年8月初的一个早晨，通信员小李跑进刚刚起床的区委书记丁维玺的宿舍喊：“丁书记，快去接电话，新发村长有重要情况报告。”

丁书记忙撂下手里的茶具来到办公室，操起电话耳机子问：“啊，你是焦村长吗？”

“是，我是焦连清，向你报告一个重要情况，今早有群众报告，昨天夜里有一架不明来历的飞机，在我们屯附近扔下一些东西，你快来一趟吧！”

丁维玺怕情况报告的不准确，又追问了一句：“那个人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还有好几个人都听见了飞机的声音。”

区委书记丁维玺边听电话边想：“上级多次讲，跑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败，一心想反攻大陆，但是他也知道，动武力是不行了，于是就向大陆派遣特务。这些特务有的是从海上潜入的，有的是用飞机空投的。他们窃取军事情报，破坏军事设施，有的建立秘密联络点，暗中发展特务组织，还有的投毒或杀人放火，总之，他们是不干好事。”

“老焦，你等着，我带人马上去你那里。请你转告发现

空投物的那个人今天不要出门了，要他同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丁维玺撂下电话，带上公安助理员和四五个区干部，直奔相距四十多里的出事地点——新发村。这四十里路可不是好走的，不是爬山就是涉水，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晌午。

村长焦连清把发现空降物的那个老头找来。此人姓贺，五十多岁，是这一带挑担串户锯锅锯缸的手艺人，大家都叫他“贺轱辘”。因为平时他说话总是很风趣，所以村长把他介绍给丁维玺时还特地补充一句：“老贺头，你今天说话要靠实点，别虚泡胀肚的，这可是件重要的事情！”

老贺头忙争辩说：“平时说话是平时，飞机扔东西，那可是真事，哪能说着玩呢？”

老贺头接着说：“昨天晚上后半夜，我起来解手，大月亮把天空照得亮堂堂的。我抬眼往东边一看，在东山头的小漫岗上空，有两个白色的东西，样子很像大筐箩，忽忽悠悠往下落，接近树梢时就看不见了。正在这时，听到有飞机的声音，它飞地很低，好象要碰到了树梢，尾巴上还亮着红灯，之后向南边飞走了。我回到屋里觉得很奇怪，黑天半夜的，咱们这大山沟里怎么来了飞机呢？我想，是不是像报纸讲的那样，敌人往这里送特务来了，今天一早我就把这事儿报告给焦村长了。”

现场侦察

零零散散住着几十户人家的新发村，距空降物现场不到二里路。那是一座小山包，山包下是条小漫岗，岗上蒿草长的很高，平时是无人来这里的。他们来到现场，围着漫岗转了几圈，发现第一个可疑点是，在山岗的不远处有一棵山盆

再 版 后 记

本书是经中共吉林市委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为配合中小学“两史一情”教育活动而编辑出版的。全书收录的故事是按发生的年代先后排列的。

中共吉林市委副书记冯俊来亲自为再版作《序》。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磐石、桦甸、永吉、蛟河、舒兰等市县党史办、吉铁分局史志办、市工运史办、市青运史办、市妇运史办的大力支持，谨此深表谢意。

《吉林市革命故事集》由张汝谦主编，张永生、刘建伟任副主编，王立新参加了该书的组稿、改稿、编辑工作。初稿经原市委副书记、市委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李向林和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市委党史领导小组成员李连钧终审。

编辑革命故事集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艰巨复杂的工作，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仍难免有错误、疏漏和不妥之处，诚恳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4年7月15日